

# 主权个人

詹姆斯-戴尔-戴维森和威廉-里斯-莫格勋爵合著

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 · 1997 年版

---

---

中文版译者 deep.com & oftendie.com

2021-10-17

---

---

## 第一章 2000 年的过渡

"感觉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图表向我们展示了人口、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网络地址和每美元的 Mbytes 的年度增长。它们都在世纪之交后飙升到一个渐近点。奇点（The Singularity）。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的结束。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的东西的开始。"1 -丹尼-希利斯的预言

过去一千年来，2000 年的到来一直困扰着西方人的想象。自从世界在基督之后的第一个千年之交未能结束以来，神学家、福音传教士、诗人和预言家们一直在期待这十年的结束，期待它能带来一些重要的东西。比艾萨克-牛顿更权威的人推测世界将在 2000 年结束。米歇尔-德-诺斯特拉达穆斯，他的预言从一开始就被每一代人阅读 1 丹尼-希利斯，"千年时钟"，《连线》，特别版，1995 年秋季，第 48 页。

对未来的不安感已经开始给过去 250 年来西方社会特有的乐观主义色彩。各地的人们都在犹豫不决，忧心忡忡。你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到这一点。在他们的谈话中

听到它。看到它反映在民意调查中，并登记在投票箱中。就像大气中离子的无形物理变化预示着雷雨即将来临，甚至在云层变暗和闪电击中之前，现在，在千禧年的黄昏，变化的预感也在空气中弥漫。一个接一个的人，以自己的方式，感觉到时间正在流逝的生活方式上。随着这十年的结束，一个杀人的世纪也随之结束，同时也是人类成就的辉煌的千年。一切都随着2000年的到来而告一段落。

我们相信，西方文明的现代阶段将随之结束。这本书讲述了原因。像许多早期的作品一样，这本书试图在黑暗中看到一个玻璃杯，勾勒出一个仍将存在的未来的模糊形状和尺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意味着我们的作品在这个词的原始含义上是世界末日。Apokalypsis 在希腊语中是 "揭幕 " 的意思。我们相信，历史的一个新阶段--主权个人的时代即将 "揭开"。

"在你的地里不再有暴力的声音，在你的境内不再有枯萎和毁灭。"以赛亚书》60:18

## 人类社会的第四阶段

本书的主题是新的权力革命，它以20世纪的民族国家为代价解放了个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暴力逻辑的创新正在改变未来必须存在的边界。如果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你们就站在历史上最全面的革命的门槛上。除少数人外，微处理的速度比现在想象的要快，它将颠覆和摧毁民族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将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转变。

它所带来的挑战将更大，因为与过去的任何事情相比，它将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发生。在人类历史上，从最早的开始到现在，只有三个基本的经济生活阶段。(1) 狩猎和采集社会；(2) 农业社会；和(3) 工业社会。现在，地平线上出现了全新的东西，即社会组织的第四阶段：信息社会。

以前的每个社会阶段都与暴力的演变和控制的明显不同阶段相对应。正如我们详细解释的那样，信息社会有望大幅减少暴力的回报，部分原因是它们超越了地域性。如果在新的千年里，控制暴力的优势是 2  
Ericka Cheetham, *The Final Prophecies of Nostradamus* (New York: Putnam, 1989), p.424.

当组织大规模暴力的回报率下降时，较小规模的暴力的回报率可能会跃升。暴力将变得更加随机和地方化。有组织犯罪的范围将扩大。我们解释一下原因。

暴力回报率下降的另一个逻辑含义是政治的消亡。有很多证据表明，对二十世纪民族国家的公民神话的坚持正在迅速削弱。共产主义的死亡只是最突出的例子。正如我们详细探讨的那样，道德的崩溃和西方政府领导人的日益腐败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发展。它证明了民族国家的潜力已经耗尽。甚至许多领导人都不再相信他们口中的陈词滥调。其他人也不相信他们。

## 历史重演

这种情况在过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每当技术变革使旧的形式脱离新的经济运动力量时，道德标准就会发生变化，人们开始越来越不屑于对待那些指挥旧体制的人。

这种普遍的反感往往在人们形成一种新的连贯的变革意识形态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十五世纪末就是这样，当时中世纪的教会是封建主义的主要机构。

尽管人们相信 "圣职的神圣性"，但高级和低级的神职人员都受到了极大的蔑视--这与今天人们对政治家和官僚的态度并不一样。<sup>3</sup>

我们相信，通过对十五世纪末的情况和今天的情况进行类比，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当时的生活已经被有组织的宗教彻底饱和，而今天的世界已经被政治所饱和。

在 15 世纪末，支持制度化宗教的成本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极端，就像今天支持政府的成本已经达到了一个衰老的极端。

我们知道在火药革命之后，有组织的宗教发生了什么。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强大的激励机制来缩小宗教机构的规模并降低其成本。类似的技术革命注定要在新千年初期从根本上缩小民族国家的规模。

## 信息革命

随着大型系统的崩溃速度加快，系统性的强制力将作为影响经济生活和收入分配的因素而消退。在社会机构的组织中，效率将迅速变得比权力的支配更重要。一个不受身体暴力制约的全新的经济活动领域将在网络空间出现。最明显的好处将流向 "认知精英"，他们将越来越多地在政治边界之外运作。他们在法兰克福、伦敦、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洛杉矶、东京和香港已经有 3 个同样的家。辖区内的收入将

变得更加不平等，而辖区间的收入则更加平等。

主权个人》探讨了这一革命性变化的社会和财务后果。我们的愿望是帮助你利用新时代的机会，避免被其影响所摧毁。如果我们期望看到的情况只发生一半，你将面临历史上少有的巨大变化。

2000 年的变革不仅将彻底改变世界经济的特征，而且将比以前的任何阶段性变化更加迅速。与农业革命不同，信息革命将不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来完成其工作。与工业革命不同，它的影响将不会在几个世纪内扩散。

信息革命将在一生中发生。

更重要的是，它几乎会同时在各地发生。技术和经济创新将不再局限于全球的一小部分地区。这种转变几乎是普遍的。它将涉及到与过去的深刻决裂，以至于它几乎将使古希腊等早期农业民族所想象的神的神奇领域变为现实。在一个比大多数人现在愿意承认的更大的程度上，在新的千年里，将证明很难或不可能保留许多当代机构。当信息社会形成时，它们将与工业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就像埃斯库罗斯的希腊与山洞居民的世界一样。

普罗米修斯不受约束：个人主权的崛起

即将到来的转型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信息革命将使个人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第一次，那些能够自我教育的人将几乎完全自由地发明他们自己的工作，实现他们自己生产力的全部利益。天才将

被释放出来，摆脱政府的压迫和种族及民族偏见的拖累。在信息社会中，没有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将被其他人的错误观点所羁绊。地球上大多数人对你的种族、你的长相、你的年龄、你的性癖好或你的发型的看法将不再重要。

在网络经济中，他们将永远看不到你。丑陋的、肥胖的、年老的、残疾的将在网络空间的新领域中与年轻和美丽的人平等地争夺完全无色的匿名。

### 思想成为财富

功绩，无论在何处出现，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奖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财富的最大来源将是你头脑中的想法，而不仅仅是物质资本，任何有清晰思维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富人。信息时代将是向上流动的时代。它将为世界上那些从未充分分享工业社会繁荣的地区的数十亿人提供更多的平等机会。其中最聪明、最成功和最有抱负的人将成为真正有主权的个人。

在生产力的最高峰，这些主权个体将以希腊神话中众神之间的关系为条件进行竞争和互动。下一个千年难以捉摸的奥林匹斯山将在网络空间--一个没有实体存在的领域，但仍将发展出有望在新千年的第二个十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到 2025 年，网络经济将有数百万的参与者。其中一些人将像比尔-盖茨一样富有，每人价值超过 100 亿美元。网络穷人可能是那些年收入低于 20 万美元的人。将不会有网络福利。没有网络税，也没有网络政府。网络经济，而不是中国，很可能是未来 30 年最伟大的经济现象。

好消息是，政治家们将无法在这个新领域中支配、压制和管理大部分商业，就像古希腊城邦的立法者无法修剪宙斯的胡须一样。全球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从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将迫使所有剩余的政府形式在更接近市场的条件下运作。他们最终将别无选择，只能像对待客户一样对待他们所服务的地区的人民，而不是像有组织的罪犯对待敲诈勒索的受害者那样。

## 超越政治

神话中描述的神的领域将成为个人的一个可行的选择--在国王和议会范围之外的生活。首先是几十人，然后是几百人，最后是几百万人，个人将摆脱政治的桎梏。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将改变政府的性质，缩小强制的领域，扩大私人控制资源的范围。

主权个体的出现将再次证明神话的奇怪预言能力。早期的农业人口对自然法则知之甚少，他们想象 "我们应该称之为超自然的力量 "是广泛分布的。

这些力量有时由人使用，有时由 "化身人神 "使用，他们看起来像人，并在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在《金枝》中描述的 "伟大的民主 "中与他们互动 4

当古人想象宙斯的孩子生活在他们中间时，他们受到了对魔法的深刻信仰的启发。他们与其他原始农业民族一样敬畏自然，并迷信自然界的工作是由个人的意志和魔法启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自然和神灵的看法没有任何自觉的预言性。他们远远没有预见到微观技术。他们不可能想

象到它在几千年后改变个人的边际生产力的影响。他们当然不可能预见到它将如何改变权力和效率之间的平衡，从而彻底改变创造和保护资产的方式。然而，他们在编织神话时所想象的，与你可能看到的世界有着奇怪的共鸣。

## 呼叫中心--"Abracadabra"

例如，魔法召唤的 "abracadabra "与访问计算机的密码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在某些方面，高速计算已经使模仿精灵的魔法成为可能。早期的 "数字仆人 "已经服从那些控制他们被封在其中的计算机的命令，就像精灵被封在魔法灯里一样。信息技术的虚拟现实将扩大人类愿望的范围，使几乎任何可以想象的东西都显得真实。遥感将赋予活着的人同样的能力，以超自然的速度跨越距离，从远处监控事件，就像希腊人认为赫尔墨斯和阿波罗享有的那样。信息时代的主权个人，就像古代和原始神话中的神一样，将在适当的时候享有一种 "外交豁免权"，不受大多数时间和地点的凡人所遭遇的政治困境的影响。

新的主权个人将像神话中的神灵一样，在与普通的臣民相同的物理环境中运作，但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的领域。

主权个人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并且超越了许多形式的强制力，他们将在新的千年里重新设计政府和重构经济。这种变化的全部影响都是无法想象的。

## 天才与克星



对于任何热爱人类愿望和成功的人来说，信息时代将提供丰厚的回报。这肯定许多世代以来最好的消息。但是，这也是一个坏消息。个人自主权的胜利和基于功绩的真正机会均等化所暗示的新的社会组织将导致对功绩和个人自主权的极大奖励。这将使个人对自己的责任比他们在工业时期所习惯的要大得多。它还将减少先进工业社会的居民在整个 20 世纪所享有的不劳而获的生活水平优势。在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世界上最高的 15% 的人口每年的平均人均收入为 21,000 美元。世界上其余 85% 的人的平均收入只有 1,000 美元。过去那种巨大的、囤积的优势在信息时代的新条件下必然会消散。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大规模重新分配收入的能力将崩溃。信息技术促进了管辖区之间竞争的急剧增加。当技术是可移动的，并且交易发生在网络空间，正如他们越来越多地发生的那样，政府将不再能够为他们的服务收取超过他们对支付这些服务的人的价值。任何拥有便携式电脑和卫星连接的人将能够在任何地方进行几乎任何信息业务，这包括几乎整个世界上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金融交易。

这意味着，你将不再有义务为了赚取高收入而居住在一个高税收的管辖区。在未来，当大多数财富可以在任何地方赚取，甚至可以在任何地方消费时，那些试图收取太多作为住所价格的政府，只会赶走他们最好的客户。如果我们的推理是正确的，而且我们相信它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所知道的民族国家将不会以任何类似于其目前的形式存在。

国家的末日

削弱主导机构权力的变化既令人不安，也很危险。正如君主、领主、教皇和权贵们在现代早期阶段为维护他们习惯的特权而进行的无情斗争一样，今天的政府也会使用暴力，往往是隐蔽和任意的暴力，以试图阻止时间的流逝。由于受到技术挑战的削弱，国家将以它在与其他政府打交道时表现出的同样的无情和外交手段来对待日益自主的个人，即它以前的公民。越来越严厉的征收技术将是政府和个人之间出现的一种新的讨价还价方式的必然结果。

技术将使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主权。而且他们将被这样对待。有时是作为敌人的暴力对待，有时是作为谈判的平等方，有时是作为盟友。但是，无论政府的行为多么无情，特别是在过渡时期，将国税局与中情局结婚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好处。

迫于形势，他们将越来越多地被要求与自主的个人讨价还价，而这些人资源将不再那么容易控制。

信息革命所隐含的变化不仅会给政府带来财政危机，而且会使所有大型结构解体。在二十世纪，已经有十四个帝国消失了。帝国的瓦解是民族国家本身解体过程的一部分。政府将不得不适应个人日益增长的自主权。税收能力将骤降 50-70%。这将倾向于使较小的管辖区更加成功。设定有竞争力的条件以吸引有能力的个人及其资本的挑战，将在飞地中比在各大洲更容易进行。

我们相信，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解体，后世的野蛮人将越来越多地在幕后行使权力。

像俄罗斯黑手党这样从前苏联剔骨的团体、其他民族犯罪团伙、名流\*、毒枭和叛逆的秘密机构都将成为自己的法律。

他们已经是这样了。远远超过人们的广泛理解，现代的野蛮人已经渗透到民族国家的形式中，而没有极大地改变其外观。

他们是以垂死的系统为食的微型寄生虫。与战争中的国家一样暴力和不择手段，这些团体在较小的范围内使用国家的技术。他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权力是政治缩减的一部分。微处理减少了团体必须达到的规模，以便有效地使用和控制暴力。随着这场技术革命的展开，掠夺性暴力将越来越多地在中央控制之外被组织起来。遏制暴力的努力也将以更多地取决于效率而不是权力的大小的方式进行转移。

## 历史的倒退

民族国家在过去五个世纪中的发展过程将被信息时代的新逻辑所逆转。地方权力中心将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因为国家将演变为零散的、重叠的主权国家。

有组织犯罪的力量不断增强，只是这种趋势的一个反映。

跨国公司已经不得不将所有的工作分包出去，除了必要的工作。一些企业集团，如 AT&T、Unisys 和 ITT，已经将自己拆分成几个公司，以便更有利地运作。民族国家将像一个笨重的企业集团一样逐渐消失。

不仅世界上的权力在变化，而且世界的工作也在变化。微处理创造了全新的经济活动领域，超越了领土的界限。这种对边界和领土的超越也许是自亚当和夏娃在造物主的判决下大摇大摆地离开天堂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发展。"你在脸上流汗，也要吃面包。"随着技术使我们使用的工具发生革命性变化，它也使我们的法律过时，重塑我们的道德，并改变了我们的观念。这本书解释了如何。

微处理和迅速改进的通信已经使个人选择工作地点成为可能。在互联网或万维网上的交易可以被加密，并且很快就会被征税人捕捉到，几乎不可能。免税资金在海外的复利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仍受制于 20 世纪民族国家所施加的高额税负的在岸资金。千禧年之后，世界上的大部分商业将迁移到网络空间的新领域，在这个区域，政府的统治权将不比他们对海底或外星球的统治权多。在网络空间中，自古以来一直是政治的首要 and 次要因素的身体暴力威胁将消失。在网络空间，温和的人和强大的人将在平等的条件下相遇。网络空间是最终的离岸管辖权。一个没有税收的经济体。天空中的百慕大与钻石。

当这个最大的避税天堂完全开放时，所有的资金基本上都将成为离岸资金，由其所有者决定。这将产生一连串的后果。国家已经习惯于对待其纳税人，就像农民对待他的奶牛一样，把它们放在田里挤奶。很快，奶牛就会有翅膀。

## 国家的复仇

像一个愤怒的农夫一样，国家无疑会在一开始采取绝望的措施来拴住和束缚其逃跑

的牛群。它将采用隐蔽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来限制对解放技术的使用。这种权宜之计即使有效果，也只是暂时的。二十世纪的民族国家，以其所有的自诩，将随着其税收的减少而饿死。

当国家发现自己无法通过提高税收来满足其承诺的支出时，它将采取其他更绝望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印钞票。政府已经习惯于享有对货币的垄断，他们可以随意贬值。这种任意的通货膨胀一直是二十世纪所有国家货币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即使是战后最好的国家货币--德国马克，从1949年1月1日到1995年6月底，也损失了71%的价值。在同一时期，美元的价值损失了84%。<sup>6</sup> 这种通货膨胀对所有持有货币的人产生了相同的影响。正如我们在后面所探讨的，通货膨胀作为收入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被网络货币的出现所排除。新技术将允许财富持有者绕过在现代时期发行和管理货币的国家垄断机构。国家将继续控制工业时代的印刷机，但他们对控制世界财富的重要性将被没有物理存在的数学算法所超越。在新的千年里，由私人市场控制的电子货币将取代政府发行的平面货币。只有穷人会成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由于缺乏惯常的征税和通货膨胀的范围，政府，甚至是传统的文明国家的政府，都会变得很讨厌。随着所得税变得无法征收，更古老、更随意的征收方法将重新出现。预扣税的最终形式--事实上的甚至公开的扣押，将被政府引入，以防止财富逃出他们的视野。不幸的人将发现自己被挑出来，以一种近乎中世纪的方式被勒索。提供促进个人实现自主的服务的企业将受到渗透、破坏和干扰。任意没收财产，在美国已经很普遍，每周发生五千次，将变得更加普遍。政府将侵犯人权，审查信息的自由流

动，破坏有用的技术，甚至更糟。就像已故的、离开的苏联试图压制个人电脑和施乐机的使用而徒劳无功一样，西方政府将试图通过极权主义手段压制网络经济。

## 忽悠人的回归

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在某些人群中很受欢迎。对于许多不属于认知精英的人来说，关于个人解放和自治的好消息似乎是个坏消息。最大的怨恨可能集中在目前富裕国家的中等人才身上。他们尤其会觉得信息技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有组织的强迫行为的受益者，包括数百万接受政府重新分配的收入的人，可能会对主权个人实现的新自由感到不满。他们的不满将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你的立场由你的位置决定"。

然而，如果把在即将到来的过渡危机中产生的所有坏情绪都归结为光秃秃的以别人为代价的生活欲望，这将是一种误导。将涉及更多。人类社会的特点表明，在即将到来的卢德反应中必然有一个被误导的道德层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装着道德假发的秃头欲望。我们探讨转型危机的道德和道义层面。有意识的自我利益的把握远不如自我正义的愤怒来激励行动的力量。虽然对二十世纪公民神话的坚持正在迅速消失，但它们并非没有忠实的信徒。每个在二十世纪成年的人都被灌输了二十世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工业社会残留的道德要求至少会刺激一些对信息技术的新鲁德主义攻击。

在这个意义上，即将到来的暴力至少部分地体现了我们所说的 "道德上的不合时宜"，即把从经济生活的一个阶段得出的道

德规范应用于另一个阶段的情况。每个社会阶段都需要自己的道德规则，以帮助个人克服他们在该特定生活方式中所面临的选择所特有的激励陷阱。就像一个农业社会不能按照爱斯基摩人的道德规则生活一样，信息社会也不能满足为促进二十世纪工业国家的成功而出现的道德要求。我们解释一下原因。

在未来的几年里，道德上的不合时宜将在西方的核心国家出现，就像过去五个世纪在边缘国家所看到的那样。西方殖民者和军事远征在遇到原住民的狩猎和采集队伍，以及那些社会仍然为农耕组织的民族时，激发了这种危机。将新技术引入不合时宜的环境中，造成了混乱和道德危机。基督教传教士成功地改变了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突然从外部引入新的权力安排所造成的当地危机。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间，这种遭遇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我们预计在新千年初期，随着信息社会取代那些按照工业路线组织的社会，也会发生类似的冲突。

## 对强迫症的怀念

主权个人的崛起不会被完全视为有希望的历史新阶段而受到欢迎，即使是在那些从中受益最多的人中间。每个人都会感到一些疑虑。许多人将鄙视那些破坏领土民族国家的创新。人类本性的一个事实是，任何形式的激进变化几乎都会被看作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五百年前，聚集在勃艮第公爵身边的朝臣们会说，破坏封建主义的创新的发展是邪恶的。他们认为世界正在迅速走下坡路，而后来的历史学家却在文艺复兴中看到了人类潜力的爆发。同样，有一天，从下一个千年的角度来看，可能

被视为新的文艺复兴的东西，在二十世纪疲惫的眼睛看来是可怕的。

一些被新方法冒犯的人以及许多因新方法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很可能会做出不愉快的反应。他们对强迫的怀念可能会变成暴力。遇到这些新的 "卢德分子 "将使向激进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过渡至少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坏消息。

## 准备躲避

由于变化的速度超过了许多在世的人适应的道德和经济能力，你可以期待看到对信息革命的激烈和愤慨的抵抗，尽管它有解放未来的伟大承诺。

你必须理解并为这种不愉快做准备。转型危机就在眼前。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对现代国家的颠覆性超过了哥伦布航海以来对其主导地位的任何政治威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那些当权者很少对破坏其权威的发展作出和平反应。他们现在也不可能这样做。

新与旧之间的冲突将塑造新千年的最初几年。我们预计这将是一个充满危险和巨大回报的时期，在某些领域，文明程度大大降低，而在另一些领域，则是前所未有的范围。

越来越多的自主的个人和破产的、绝望的政府将在一个新的鸿沟中相互对峙。我们期待看到主权性质的彻底重组，以及在过渡期结束前政治的实际死亡，而不是国家对资源的支配和控制，你注定要看到政府现在提供的几乎所有服务的私有化。由于



我们在本书中详细探讨的不可避免的原因，信息技术将破坏国家对其服务的收费能力，使之超过对支付这些服务的人的价值。

## 通过市场实现主权

仅仅在十年前，很少有人能想象到，个人将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对领土民族国家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所有的民族国家都面临着破产和其权威的迅速消减。尽管他们很强大，但他们保留的权力是抹杀的权力，而不是指挥的权力。他们的洲际导弹和航空母舰已经是工艺品，就像封建主义的最后一匹战马一样威武而无用。

信息技术通过改变资产的创造和保护方式，使市场的急剧扩展成为可能。这的确是革命性的，它对工业社会的革命性超过火药的出现对封建农业的革命性。2000 年的变革意味着主权的商业化和政治的死亡，就像火药意味着基于誓言的封建主义的消亡一样。公民权将走向骑士精神的道路。

我们相信，个人经济主权的时代正在到来。正如曾经被 "国有化 "的钢铁厂、电话公司、矿山和铁路在世界各地迅速私有化一样，你们很快就会看到私有化的最终形式--一个人的全面非国有化。新千年的主权个人将不再是国家的资产，不再是国库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个事实上的项目。在 2000 年的转型之后，非国有化的公民将不再是公民，而是顾客。

主权的商业化将使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的条款和条件像封建主义崩溃后的骑士誓言

一样过时。二十一世纪的主权个人将成为政府的客户，而不是作为被征税的公民与一个强大的国家发生关系。这些政府的组织原则将不同于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世界所期待的那些。

将需要一个新的道德词汇来描述主权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的剩余部分。我们猜想，当这些新关系的术语成为焦点时，它们将冒犯许多作为二十世纪民族国家 "公民" 而长大的人。国家的终结和 "个人的非国家化" 将使一些热烈持有的概念，如 "法律下的平等保护"，变得空洞无物，而这些概念的前提是很快就会被淘汰的权力关系。

就像试图维护穿盔甲的骑士的权力在火药武器面前注定要失败一样，现代的民族主义和公民权概念也注定要被微观技术所短路。事实上，它们最终会成为滑稽的，就像 15 世纪封建主义的神圣原则在 16 世纪被嘲笑一样。二十世纪所珍视的公民概念在 2000 年的变革之后，对新的几代人来说将是滑稽的不合时宜的。

二十一世纪的堂吉诃德将不是一个为恢复封建主义的辉煌而奋斗的骑士，而是一个穿着棕色西装的官僚，一个渴望对公民进行审计的征税人。

## 恢复行进中的法律

除了最广泛的意义之外，我们很少认为政府是竞争性的实体，所以现代人对主权的范围和可能性的直觉已经萎缩了。在过去，当权力等式使得团体更难宣称对强制力的稳定垄断时，权力经常是分散的，管辖权

重叠，许多不同类型的实体行使一个或多个主权属性。名义上的霸主实际上在当地享有很少的权力，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比民族国家更弱小的政府在对当地领土实施垄断性胁迫的能力方面，现在面临着持续的竞争。这 12 场竞争催生了控制暴力和吸引效忠方面的适应性，这些适应性很快又会成为新的东西。

当领主和国王的影响力很弱，一个或多个团体的主张在边境地区重叠时，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双方都不能决定性地支配对方。在中世纪，有许多边境或 "行军" 地区的主权混杂在一起。在欧洲的边境地区，这些暴力的边境线持续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在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和英国人控制的地区之间，在威尔士和英格兰、苏格兰和英格兰、意大利和法国、法国和西班牙、德国和中欧的斯拉夫边境之间，以及在西班牙的基督教王国和格拉纳达的伊斯兰王国之间，都有游行。这样的行进区域形成了独特的制度和法律形式，我们有可能在下一个千年再次看到这种形式。由于两个当局的竞争地位，行军区的居民很少交税。更重要的是，他们通常可以选择决定服从谁的法律，这种选择是通过 "宣誓 "和 "扣押 "等法律概念来行使的，而这些概念现在几乎已经消失了。我们希望这些概念能够成为信息社会法律的一个突出特点。

## 超越国籍

在民族国家之前，很难精确地列举出世界上存在的主权国家的数量，因为它们以复杂的方式重叠，许多不同的组织形式行使着权力。他们将再次这样做。在民族国家体系中，领土之间的分界线趋于明确划定并固定为边界。在信息时代，它们将再次变得模糊不清。在新的千年里，主权将再

次被分割开来。新的实体将出现，行使一些但不是所有我们已经与政府相关的特征。

其中一些新的实体，就像中世纪的圣殿骑士团和其他宗教军事组织一样，可能会控制相当大的财富和军事力量，而不控制任何固定的领土。他们将根据与国籍完全无关的原则组织起来。中世纪在欧洲部分地区行使主权利力的宗教团体的成员和领导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从民族身份中获得权力。他们具有各种民族背景，并宣称要效忠于上帝，而不是效忠于一个民族的成员所应具有的任何亲缘关系。

## 网络空间的商人共和国

你还会看到具有半主权利力的商人和富人协会的重新出现，如中世纪的汉斯（商人联盟）。在法国和弗拉芒集市上经营的 Hanse 发展到包括 60 个城市的商人。7 "Hanseatie 联盟"，在英语中被多余地称为 13（直译为 "Leaguely 联盟"），是一个日耳曼商人行会的组织，为成员提供保护并协商贸易条约。它开始在一些北欧和波罗的海城市行使半主权的权力。在新的千年里，这种实体将重新出现，以取代垂死的民族国家，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里提供保护并帮助执行合同。

简而言之，未来可能会迷惑那些吸收了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公民神话的人的期望。

其中有社会民主的幻想，这些幻想曾经让最有天赋的人感到兴奋和激动。

它们的前提是，社会以政府希望的任何方式发展；最好是响应民意调查和严格计算

的投票。这从未像五十年前那样真实。现在，它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东西，就像一个生锈的烟囱一样，是工业主义的人工制品。公民神话不仅反映了一种心态，即认为社会问题很容易被工程解决；它们还反映了一种错误的信心，即资源和个人在未来仍会像二十世纪那样容易受到政治强迫。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市场力量，而不是政治多数，将迫使社会以公众舆论既不理解也不欢迎的方式重新配置自己。当他们这样做时，认为历史是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的天真观点将被证明具有极大的误导性。

因此，你重新看待这个世界将是至关重要的。这意味着从外部看，重新分析你可能已经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东西。这将使你能够获得新的理解。如果你不能在传统思维与现实脱节的时候超越传统思维，那么你将更有可能成为未来迷失方向的流行病的猎物。迷失方向会滋生错误，可能威胁到你的业务、你的投资和你的生活方式。

"宇宙奖励我们理解它，惩罚我们不理解它。当我们理解宇宙时，我们的计划就会成功，我们就会感觉良好。相反，如果我们试图通过跳下悬崖和拍打手臂来飞行，宇宙就会杀死我们。"-杰克-科恩和伊恩

斯特沃特

重新看待

要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做好准备，你必须了解为什么它将与大多数专家告诉你的不同。这涉及到仔细研究变化的隐藏原因。我们试图通过一种非正统的分析来做到这一点，我们称之为巨型政治学研究。在之前的两

卷书《血流成河》和《大清算》中，我们认为变化的最重要原因不是在政治宣言中或在死去的经济学家的声明中找到，而是在改变权力行使边界的隐藏因素中。通常，气候、地形、微生物和技术的微妙变化会改变暴力的逻辑。它们改变了人们组织生计和保护自己的方式。

请注意，我们理解世界如何变化的方法与大多数预测者的方法非常不同。我们不是什么专家，也就是说，我们假装比那些花了整个职业生涯来培养高度专业化知识的人对某些 "主题 "了解更多。恰恰相反，我们是从外面看进去的。我们是围绕着我们所预测的主题来了解的。最重要的是，这涉及到看到必要性的界限在哪里被划分。

当他们发生变化时，社会必然会发生变化，不管人们有什么相反的愿望。

在我们看来，理解社会如何演变的关键是理解决定采用暴力的成本和回报的因素，每一个人类社会，从狩猎队到帝国，都是由大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这些因素设定了 "自然法则 "的主流版本。生活始终是复杂的，无处不在。羔羊和狮子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在边缘互动。如果狮子突然变得更加敏捷，它们会抓住现在逃跑的猎物。如果羔羊突然长出翅膀，狮子就会饿死。利用和抵御暴力的能力是改变边缘生活的关键变量。

我们把暴力放在我们的大政治理论的中心是有原因的。对暴力的控制是每个社会面临的最重要的困境。正如我们在《大清算》中写的那样。

人们诉诸暴力的原因是，它往往能带来回报。在某些方面，如果一个人想要钱，他能做的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拿钱。对于一支夺取油田的军队来说，这一点与单个暴徒夺取钱包的情况一样。正如威廉-普莱菲尔（William Playfair）所写的那样，"权力总是通过攻击那些拥有财富的人，来寻找通向财富的最便捷之路。"

对繁荣的挑战恰恰是掠夺性的暴力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报酬丰厚。战争确实改变了事情。它改变了规则。

它改变了资产和收入的分配。它甚至决定了谁生谁死。恰恰是暴力确实能带来收益这一事实，使它难以控制。9

在这些方面的思考帮助我们预见了一些发展，而这些发展被更多知情的专家坚持认为不可能发生。例如，1987年初出版的《血流成河》（Blood in the Streets）就是我们试图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巨大政治革命的最初阶段进行调查。我们当时认为，技术变革正在破坏世界权力平衡的稳定。在我们的主要观点中。- 我们说，美国的主导地位正在下降，这将导致经济失衡和困境，包括另一次1929年式的股票市场崩溃。专家们几乎一致否认这种事情可能发生。然而，在6个月内，即1987年10月，市场就被本世纪最猛烈的抛售所震慑。

然而，1989年发生了"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的事件。柏林墙倒塌，革命席卷了从波罗的海到布加勒斯特的共产主义政权。

- 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布尔什维克贵族从沙皇那里继承的多民族帝国会"不可避免地

分裂开来”。1991 年 12 月底，随着苏联的不复存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最后一次降下了 15 面锤子和自行车的旗帜。

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日本股市就崩溃了，几乎损失了一半的价值。我们仍然认为，它的最终低点可能与华尔街在 1929 年后的底部所遭受的 89% 的损失相匹配或超过。

尽管事后证明《血流成河》的主要主题非常准确，但就在几年前，它们还被传统思维的守护者认为是一派胡言。1987 年《新闻周刊》的一位评论员将我们的分析斥为 "对理性的不假思索的攻击"，这反映了晚期工业社会的封闭精神氛围。

你可以想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周刊》和类似的出版物会认识到，我们的分析路线已经揭示了关于世界变化方式的有用信息。但事实并非如此，《大清算》的第一版受到了与欢迎《喋血街头》一样的嗤之以鼻的敌视。比《华尔街日报》更权威的媒体断然否定了我们的分析，认为我们的分析是 "你的姨妈 "的唠叨话。

撇开这种笑声不谈，《大清相国》的主题被证明没有正统观念的守护者所假装的那么可笑。

- 我们扩展了对苏联死亡的预测，探讨了为什么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在未来会面临日益严重的内乱 4 恶性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平下降。

- 我们还预测，将对收入再分配的条款进行重大的重新定义，并大幅削减福利水平。



从加拿大到瑞典都出现了财政危机的迹象，美国的政治家们开始谈论 "结束我们所知的福利"。 - 我们预计并解释了为什么 "世界新秩序 "会被证明是 "世界新混乱"。早在波斯尼亚的暴行成为头条新闻之前，我们就警告说，南斯拉夫将崩溃，陷入内战。

《大算盘》还阐述了一些有争议的论点，这些论点尚未被证实，或者没有达到我们预测的发展水平。 - 我们说过，日本股市将追随华尔街 1929 年后的道路，这将导致信贷崩溃和经济萧条。尽管西班牙、芬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失业率超过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水平，而且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确实经历了局部萧条，但还没有出现像 20 世纪 30 年代内爆全球经济的那种系统性信贷崩溃。

- 我们解释了为什么 "禁毒战争 "是颠覆毒品使用广泛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警察和司法系统的秘诀。由于每年有数百亿美元的隐性垄断利润堆积在一起，毒贩子有办法也有动机去腐蚀甚至是表面上稳定的国家。虽然世界媒体偶尔会报道，暗示毒品资金对美国政治体系的高层渗透，但完整的故事还没有被讲述。

寻找别人不知道的地方

尽管有一些地方我们的预测是错误的，或者从现在已知的情况来看似乎是错误的，但这些记录是经得起推敲的。许多可能出现在 90 年代未来经济史上的东西，在《大清算》中都有预测或预期，并有解释。我们的许多预测不是对趋势的简单推断或延伸，而是对二战以来被认为是正常情况的重大背离的预测。我们警告说，20 世纪 90 年代将与之前的 50 年有巨大的不

同。阅读 1991 年至 1995 年的新闻，我们看到《大清算》的主题几乎每天都得到了证实。

我们认为这些发展不是孤立的困难的例子，这里的麻烦，那里的麻烦，而是沿着同一断层线的冲击和震荡。旧的秩序正在被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所推翻，这场地震将彻底改变体制，改变有思想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尽管暴力在决定世界运作方式方面起着核心作用，但它引起的认真关注却少得令人吃惊。大多数政治分析家和经济学家在写作时，都认为暴力是一个小的刺激物，就像一只苍蝇在蛋糕周围嗡嗡叫，而不是烤蛋糕的厨师。

## 另一个大政治家的先锋

事实上，对于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人们很少有清晰的思考，以至于一张纸上就能写出一份巨型政治分析书目。

在《大清算》中，我们借鉴并阐述了一个几乎完全被遗忘的巨型政治分析经典，即威廉-普莱菲尔（William Playfair）于 1805 年出版的《关于强国和富国衰落的永久原因的调查》的论点。我们的出发点之一是弗雷德里克-C-莱恩的作品。莱恩是一位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他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就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写了几篇深刻的文章。也许其中最全面的是 "有组织暴力的经济后果"，它出现在 1958 年的《经济史杂志》上。除了专业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之外，很少有人读过它，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没有

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像普莱费尔一样，莱恩是为一个尚不存在的受众而写的。

## 对信息时代的洞察力

莱恩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就已经发表了他关于暴力和战争的经济意义的著作。他当然不是在预测微处理或其他正在展开的技术革命的情况下写作的。然而，他对暴力的洞察力为理解社会在信息革命中如何被重新配置建立了一个框架。

莱恩向未来打开的窗口是他窥视过去的窗口。他是一位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尤其是一位贸易城市威尼斯的历史学家，威尼斯的财富在一个暴力的世界中起起落落。在思考威尼斯的兴衰时，他的注意力被吸引到那些可以帮助你理解未来的问题上。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何组织和控制暴力在决定 "如何利用稀缺资源 "方面起着很大作用。

我们相信，莱恩对暴力的竞争性使用的分析，对信息时代的生活可能发生的变化有很多启示。但是，不要指望大多数人注意到，更不要指望他们会遵循如此不合时宜的抽象论点。当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不诚实的辩论和不守规矩的人身上时，大政治的蜿蜒曲折几乎没有人注意。普通的北美人对 O.J.辛普森的关注可能比他对新的微观技术的关注多一百倍，这些技术准备使他的工作过时并颠覆他赖以获得失业补偿的政治制度。

## 愿望的虚幻性

忽视根本性重要事物的倾向并不仅仅局限于看电视的沙发客。形形色色的传统思想家观察到了国家的一个假象--即人们持有的观点决定了世界的变化方式。看似成熟的分析家们会陷入解释和预测，把重大的历史发展解释得好像是一厢情愿地决定。就在我写《再见，民族国家，你好》的时候，《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上出现了这种推理的一个突出例子。

为什么？因为民族国家正在摇摇欲坠，无法再控制经济力量。

在我们看来，这种假设近乎荒唐。假设某种新的治理形式会出现，仅仅是因为另一种形式失败了，这是一种谬误。按照这种推理，海地和扎伊尔早就有了更好的政府，只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是如此明显的不足。

科尔切斯特的观点在北美和欧洲少数思考这些问题的人中广为流传，但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决定哪些类型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可行的更大的大政治力量。

这就是本书的重点。当考虑到弧形塑造新千年的技术时，我们更有可能看到的不是一个世界政府，而是微观经济，或接近无政府状态的烤箱条件。

对于每一次认真分析暴力在决定每个人运作规则方面的作用，都有几十本关于小麦补贴的错综复杂的书，还有几百本关于货币政策的神秘方面的书。这种对实际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问题的思考的不足，很可能反映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权力配置的相对稳定。在河马背上睡着的鸟儿，在河马真正移动之前，不会想到会失去它的栖息

地。梦想、神话和幻想在为所谓的社会科学提供信息方面发挥的作用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大得多。

这在经济正义的大量文献中尤其明显。

关于经济正义和不公正，人们已经说了几百万字，每一页都在仔细分析暴力如何塑造社会，从而设定经济必须运作的界限。然而，在现代背景下对经济正义的表述预示着社会被一种强大的强制工具所支配，以至于它可以夺走和重新分配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这种权力只在现代时期的几代人中存在过。现在它正在逐渐消失。

## 社会保障问题上的老大哥

在二十世纪，工业技术给政府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控制工具。一时间，政府在垄断暴力方面变得如此有效，似乎不可避免地给个人自主权留下了很小的空间。在本世纪中叶，没有人期待着主权个人的胜利。

二十世纪中期一些最精明的观察家根据当时的证据确信，民族国家集中权力的趋势将导致对生活所有方面的极权主义统治。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9年）中，“老大哥”正看着个人徒劳地挣扎，以保持自主和自尊的余地。这似乎是一个失败的事业。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年）以更学术化的观点认为，自由正在被一种新的经济控制形式所剥夺，这种控制形式使国家成为一切的主宰。

这些作品是在微处理技术出现之前写的，微处理技术孵化了一系列技术，增强了小团体甚至个人独立于中央权威运作的能力。

尽管像哈耶克和奥威尔这样的观察家很精明，但他们还是过于悲观了。历史已经展开了它的惊奇。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几乎没有延续到 1984 年。如果政府成功地压制了微观技术的解放方面，一种新形式的农奴制可能在下一个千年出现。但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将看到前所未有的机会和个人的自主权。我们的父母所担心的可能被证明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会生活的固定和永久特征现在似乎注定要消失。只要必要性为人类的选择设定了界限，我们会进行调整，并相应地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

## 预测的危险性

毫无疑问，在试图预见和解释生活组织和将其捆绑在一起的文化的深刻变化时，我们将我们小小的尊严置于危险之中。

大多数预测注定要在充分的时间里做愚蠢的解读。而且他们设想的变化越大，就越是令人尴尬地错了。世界并没有结束。臭氧不会消失。即将到来的冰河时期会溶入全球变暖。尽管有所有相反的警告，油箱里仍然有油。先生。

安特罗伯斯是《我们牙齿的皮肤》中的常人，他避免了冰冻，在战争和经济灾难的威胁下幸存下来，并无视专家们的研究警报而变老。

大多数试图 "揭开 "未来的尝试很快就变成了滑稽。即使在自我利益为清晰的思维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的情况下，前瞻性的眼光也往往是近视的。1903 年，梅赛德斯公司说，"全世界永远不会有多达 100 万辆的汽车。原因是，全世界有多达 100 万名工匠可以被训练成司机，这是不可能的"。12

认识到这一点应该让我们的嘴停下来。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并不害怕站在队伍中接受应有的嘲讽。如果我们犯了很大的错误，后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嘲笑，假定有人记得我们说过的话。敢于思考就是冒着错误的风险。我们并没有僵硬和无用到害怕犯错。远非如此。我们宁可大胆提出可能对你有用的想法，也不愿因担心它们可能被夸大或在回想起来时令人尴尬而压制它们。

正如阿瑟-克拉克 ( Arthur C. Clarke ) 精明地指出的那样，试图预测未来的努力通常落空的两个首要原因是 "神经衰弱和想象力衰弱"。'

在这两种情况中，他写道："神经衰弱似乎更常见；它发生在即使给了所有相关的事实，可能的预言家也看不出它们指向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其中一些失败是如此可笑，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我们对信息革命的探索不尽如人意，那么原因更多的是由于缺乏想象力，而不是缺乏胆量。

对未来的预测一直是一项大胆的事业，它能适当地激发人们的怀疑态度。也许时间

会证明，我们的推论完全偏离目标。与诺查丹玛斯不同，我们并不假装自己是预言家。我们不通过在一碗水里搅动魔杖或投掷星座来预言未来。我们也不写神秘的诗句。我们的目的是为你提供一个清醒的、超然的分析，这些问题可能证明对你非常重要。

我们感到有义务阐明我们的观点，即使它们看起来是异端的，正是因为它们可能不会被听到。在晚期工业社会封闭的精神氛围中，思想并不像它们应该通过既定的媒体那样自由流通。

这本书是本着建设性的精神写的。这是我们一起写的第三本书，分析了目前正在进行的巨大变革的各个阶段。就像《21 世纪的血》一样

在《街道》和《大清算》中，它是一种思想练习。它探讨了工业社会的死亡和它在新形式下的重构。我们期望在未来几年看到惊人的悖论。一方面，你将看到一种新的自由形式的实现，主权个人的出现。你可以期待看到生产力的几乎完全解放。同时，我们预计将看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死亡。西方人在二十世纪逐渐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平等保证，注定要与它一起消亡。

我们预计，现在已知的代议制民主将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市场上新的选择民主。如果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下个世纪的政治将比我们已经习惯的政治更加多样和不重要。

我们相信，我们的论点会很容易理解，尽管它穿过了一些相当于知识界的落后地区



和坏邻居的领域。如果我们的意思在某些地方不完全明白，那并不是因为我们在耍小聪明，或者使用那些假装通过隐晦的声明来预言未来的人的历史悠久的含糊其辞。我们不是模棱两可的人。如果我们的论点不明确，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以使令人信服的观点易于理解的方式进行写作的任务。与许多预测者不同，我们希望你能理解，甚至复制我们的思路。它不是基于精神上的遐想或行星的回旋，而是基于老式的、丑陋的逻辑。由于相当合乎逻辑的原因，我们相信微处理将不可避免地颠覆和摧毁民族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对你们来说，至少预见新的生活方式的一些细节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种生活方式可能比你们想象的更快到来。

## 预示未来的讽刺

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千年期的结束一直被看作是历史上的一个怀孕时刻。850 多年前，圣马拉奇将 2000 年定为最后审判的日期。美国灵媒埃德加-凯斯（Edgar Cayce）在 1934 年说，地球将在 2000 年发生地轴移动，导致加利福尼亚一分为二，淹没纽约市和日本。一位日本火箭科学家伊藤川英夫在 1980 年宣布，1999 年 8 月 18 日行星排列成 "大十字"，将造成广泛的环境破坏，导致地球上人类生命的结束。<sup>15</sup>

这种对世界末日的憧憬是一个丰满的嘲笑目标，毕竟，2000 年虽然是一个雄伟的整数，但只是西方采用的基督教日历的一个任意的人工制品。其他日历和日期系统从不同的起点计算几个世纪和几千年的时间。例如，根据伊斯兰历法的计算，公元

2000 年将是 1378 年。这是个听起来很普通的年份。

根据中国的日历，每 60 年重复一次，公元 2000 年只是另一个龙年。它是一个连续的周期的一部分，延伸到过去的几千年。

尽管有板川教授，关于新千年的预感似乎与基督教信仰和西方主流的时间想象紧密相连。

它们是预言，不是天体物理学。大多数是梦境、遐想和幻觉，或对幻觉的数字解释，就像牛顿对但以理预言的解释。

这些直觉上的飞跃始于将基督的诞生视为历史中心事实的观点。它们因大整数的心理力量而变得更加复杂，每个交易者都会认识到大整数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品质。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两千年不能不成为有直觉的人的想象力的焦点。

批评者很容易使这些预感显得愚蠢，甚至没有涉及到模棱两可、值得商榷的天启和最后审判的神学概念，这些概念赋予了这些预感如此大的力量。即使在基督教框架内，如果忽略了算术上的错误，2000 年似乎才可能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拐点。按照严格的逻辑，下一个千禧年要到 2001 年才会开始。2000 年将只是基督诞生后的第两千年。或者说，如果基督是在基督教时代的第一年出生的，那就会是这样。他没有。533 年，当基督的诞生取代了罗马的建国日期，成为根据西历计算年份的基础时，引入新惯例的僧侣们把基督的诞生计算错了。现在人们接受了他生于公元前 4 年的说法。

在此基础上，自他出生以来整整两千年的时间将在 1997 年的某个时候完成。因此，卡尔-荣格为新时代的开始设定了一个明显奇怪的启动日期。

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妨笑一笑，但我们并不鄙视或否定对历史的直觉理解。虽然我们的论点是以逻辑为基础，而不是以收入为基础，但我们对人类意识的预言能力感到震惊。一次又一次，它救赎了疯子、灵媒和圣人的幻觉。2000 年的转变也可能是如此。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早已固定下来的日期看起来是一个拐点，至少有一半证实了历史是有命运的。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但我们还是相信它是这样的。

我们的直觉是，历史有一种命运，而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是同一现象的两个版本。形成历史的人类互动的行为就像他们被一种命运所告知。就像电子等离子体，一种密集的电子气体，表现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人类也是如此。电子个体运动的自由原来与高度组织化的集体行为是相容的。正如大卫-欧姆在谈到电子等离子体时所说，人类历史是 "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系统，其行为是一个整体"。

理解世界的运作方式意味着对人类社会服从自然过程的数学的方式形成一种现实的直觉。现实是非线性的，但大多数人的期望却不是。要理解变化的动力，你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其他复杂系统一样，具有周期和不连续的特点。这意味着历史的某些特征有重复的趋势，而最重

要的变化，当它们发生时，可能是突然的，而不是逐渐的。

在贯穿人类生活的各种周期中，一个神秘的五百年周期似乎标志着西方文明历史的重大转折点。随着 2000 年的到来，我们被一个奇怪的事实所困扰，即每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都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深刻转型，这种死亡和重生的模式标志着社会组织的新阶段，就像死亡和出生划定了人类世代的周期一样。至少从公元前 500 年开始就是如此，当时希腊民主制度随着公元前 508 年克利斯提尼的宪法改革而出现。随后的五个世纪是古代经济增长和强化的时期，在公元前 4 年基督诞生时达到高潮。

在接下来的五个世纪里，繁荣逐渐减弱，导致罗马帝国在公元五世纪末崩溃。"当罗马处于其最伟大的阶段时。.....将被视为在基督诞生时，也就是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通过同样的方法，将发现它逐渐衰落，直到 490 年"。16 就在那时，最后一个军团解散了，西方世界陷入了黑暗时代。

在随后的五个世纪里，经济萎缩，长途贸易停滞不前，城市人口减少，货币从流通中消失，艺术和文化几乎消失。随着西方罗马帝国的崩溃，有效法律的消失导致了解决争端的更原始的安排的出现。血仇在五世纪末开始变得重要起来。

第一个有记录的神明审判事件正好发生在 500 年。

一千年前，第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再次见证了另一场 "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巨大动荡"。也许这些转型中最不为人所知的是封建革

命，它开始于一个彻底的经济和政治动荡的时期。巴黎大学中世纪史教授居伊-布瓦（Guy Bois）在《千禧年的变革》中称，十世纪末的这次断裂涉及到古代制度残余的完全崩溃，以及从无政府的封建主义中出现的新事物'。17 用拉乌尔-格拉博的话说，"据说整个世界一致甩掉了古代的破烂。"突然出现的新制度适应了经济增长的缓慢复苏。现在被称为中世纪的五个世纪见证了货币和国际贸易的重生，以及算术、识字和时间意识的重新发现。

然后，在 15 世纪的最后十年，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就在那时，欧洲摆脱了黑死病造成的人口赤字，几乎立即开始对全球其他地区进行统治。

火药革命"、"文艺复兴 "和 "宗教改革 "是对这一开创了现代时代的转型的不同方面的命名。当查理八世带着新的青铜大炮入侵意大利时，它以一声巨响宣告了这一点。它涉及到对世界的开放，1492 年哥伦布航行到美洲就是一个缩影。

这次对新世界的开放启动了人类经验中最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它涉及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变革，导致了现代科学的产生。它的思想通过印刷术的新技术得到了广泛传播。

现在我们正坐在另一个千年转型的门槛上。我们期望它能彻底改变世界，而这本书就是要解释这些。你完全有权利怀疑这一点，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在千年内只重复两次的周期显示出足够的反复，在统计学上是有意义的。事实上，甚至更短的周期也被要求提供更多统计学上令人满意的证据的经济学家们所怀疑。丹尼斯-罗伯逊

( Dennis Robertson ) 教授曾经写道，我们最好等上几个世纪，然后再确定 "四年和八到十年的贸易周期的存在"。19 按照这个标准，罗伯逊教授必须暂停判断大约三万年，才能确定五百年的周期不是统计上的侥幸。我们不那么教条，或者说更愿意承认，现实的模式比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静态和线性平衡模型更复杂。

我们相信，2000 年的到来不仅仅是沿着无尽的时间连续体的另一个方便的划分。我们相信它将是旧世界和即将到来的新世界之间的一个拐点。工业时代正在迅速过去。它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已经被一种新的小型化技术所取代。随着新的信息技术的出现，出现了一门新的非线性动力学科学，其惊人的结论只是一些尚未被编织成一个全面的世界观的线索。我们生活在计算机的时代，但我们的梦想仍然在织布机上旋转。我们继续生活在工业主义的隐喻和思想中。我们的政治仍然横跨左右的工业鸿沟，正如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所描绘的那样，他们几乎在现在活着的所有人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了。

我们的观点是，随着世界的转变，工业时代的 "常识 "将不再适用于许多领域。

1911 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和 "西方的衰落 "产生了直觉，85 年后的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一个历史阶段的变化正在发生。20 与斯宾格勒一样，我们看到了西方文明的死亡迫在眉睫，以及自哥伦布向西航行与新世界建立联系以来，在过去五个世纪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秩序的崩溃。然而，与斯宾格勒不同的是，我们看到西方文明的一个新阶段将在未来的千年里诞生。

## 第 2 章 元政治的转变

### 历史观点

"在历史上和在自然界中，出生和死亡是同样平衡的" - JOHAN HUIZINGA<sup>3</sup>

### 现代世界的衰落

在我们看来，你们正在见证的是现代时代的消亡。

这是一个由无情但隐藏的逻辑驱动的发展。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多，比 CNN 和报纸告诉我们的更多，下一个千年将不再是 "现代"。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暗示你面临一个野蛮或落后的未来，尽管那是可能的，而是要强调，现在开启的历史阶段将与你出生的阶段有质的不同。

新的东西正在到来。正如农耕社会与狩猎和采集的群体有很大的不同，工业社会与封建或贵族农业系统有很大的不同一样，即将到来的新世界也将标志着与以往任何事物的彻底不同。

在新的千年里，经济和政治生活将不再像现代几个世纪那样，在民族国家的支配下以巨大的规模进行组织。给你带来世界大战、流水线、社会保险、所得税、除臭剂和烤面包机的文明正在消亡。除臭剂和烤面包机可能幸存下来。其他的就不行了。就像一个古老的、曾经强大的人一样，民族国家的未来是以年和日计算的，而不再是以世纪和十年计算的。

政府已经失去了很多监管和强制的权力。共产主义的崩溃标志着一个长达五个世纪的周期的结束，在此期间，权力的大小压倒了政府组织的效率。那时候，暴力的回报率很高，而且还在上升。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阶段性转变已经开始。事实上，未来的吉本在下一个千年里记录了曾经的现代时代的衰落和堕落，他可能会宣布，当你读到这本书时，它已经结束了。回顾过去，他可能会说，就像我们一样，它随着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而结束。或者随着 1991 年苏联的死亡。无论是哪一个日期，都可以作为文明演变中的一个决定性事件，即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现代时代的结束。

人类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即将到来，也许它最不可预测的特征是它将被称为的新名字。称之为 "后现代"。

称其为 "网络社会 "或 "信息时代"。或者自己编造一个名字。没有人知道什么概念性的胶水会给历史的下一个阶段粘上一个绰号。

我们甚至不知道刚刚结束的五百年的历史将继续被认为是 "现代"。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知道什么是词的衍生，它就不会是。一个更具描述性的标题可能是 "国家的时代 "或 "暴力的时代"。但这样的名称会超出目前定义历史时代的时间范围。根据《Oxford 英语词典》，"现代 "是指与现在和最近的时代有关，与遥远的过去相区别....。在历史使用中，通常适用于（与古代和中世纪相反）中世纪之后的时间。

"4



西方人只有在认识到中世纪时期已经结束时，才会有意识地认为自己是 "现代 "的。在 1500 年之前，从来没有人认为封建世纪是西方文明的一个中间 "时期。反思一下，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一个时代可以合理地被视为夹在其他两个历史时代的 "中间 "之前，它必须已经结束了。那些生活在封建世纪的人不可能想象自己生活在古代和现代文明的中间地带，直到他们意识到，不仅中世纪已经结束，而且中世纪的文明与黑暗时代或古代的文明有很大的不同。

人类文化有盲点。我们没有词汇来描述生活中最大界限的范式变化，尤其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变化。

尽管自摩西时代以来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变化，但只有少数异端分子愿意思考从一个文明阶段到另一个文明阶段的过渡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它们是如何触发的？它们有什么共同点？什么模式可以帮助你判断它们何时开始并知道它们何时结束？大不列颠或美国何时会结束？这些问题，你很难找到常规的答案。

## 对预见性的禁忌

在一个现有系统之外看问题，就像一个舞台工作人员试图强行与剧中人物对话一样。它违反了有助于维持系统运作的惯例。每一个社会秩序都包含了一个重要的禁忌，那就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应该考虑它将如何结束，以及在取代它的新系统中可能存在的规则。隐含的是，无论什么系统存在，都是最后的或唯一的系统，将永远存在。并不是说这句话说得很直白。很少有读过历史书的人会认为这样的假设是现实

的，如果它被阐明的话。然而，这就是统治世界的惯例。每一个社会体系，无论其对权力的依附有多强或多弱，都假装其规则永远不会被取代。它们是最后一句话。或者说是唯一的说法。原始人认为他们的规则是组织生活的唯一可能方式。在经济上更复杂的系统，包含了历史感，通常将自己置于其顶点。无论他们是皇帝宫廷里的中国吏员，还是斯大林克里姆林宫里的马克思主义名流，或者是 4《牛津英语词典》精简版，第一卷（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 年），第 1828 页。

这是真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原因。一个系统越是明显地接近终结，人们就越不愿意遵守它的规律。因此，任何社会组织都会倾向于阻止或淡化那些预计其灭亡的分析。仅仅这一点就有助于确保历史上的重大转变很少在发生时被发现。如果你对未来一无所知，你可以放心，戏剧性的变化既不会受到传统思想家的欢迎，也不会被宣传。

你不能依靠传统的信息来源来给你一个客观和及时的警告，告诉你世界是如何变化的，以及为什么变化。如果你想了解现在正在进行的巨大转变，你几乎没有选择，只能自己去弄清楚。

## 超越显而易见

这意味着要超越明显的事实。记录显示，即使是回想起来无可否认是真实的过渡，也可能在发生后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内不被承认。考虑一下罗马的衰落。这可能是基督教时代第一个千年中最重要的历史发展。然而，在罗马灭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幸存下来的虚构就像列宁的尸体

被防腐处理一样，被公之于众。没有人依靠官员的伪装来了解 "新闻"，直到这些信息不再重要之后，他才会知道罗马已经灭亡。

其原因不仅仅是古代世界的通讯不发达。如果 CNN 奇迹般地开展业务，在 476 年 9 月运行其录像带，结果也会差不多。那时候，西方最后一位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鲁斯在拉文纳被俘，被迫退居到坎帕尼亚的一栋别墅里领取退休金。即使沃尔夫-布利策在 476 年用微型摄像机记录了新闻，他或其他人也不可能敢把这些事件定性为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结束。当然，这正是后世历史学家所说的情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编辑可能不会批准一个标题故事，说 "罗马今天晚上灭亡"。当权者否认罗马已经灭亡。兜售 "新闻" 的人很少会以破坏自己利益的方式参与争论。他们可能是党派人士。他们甚至可能是离谱的。但他们很少报道会说服订户取消订阅并前往山头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技术上有可能，也很少有人会报道罗马的灭亡。专家们会站出来说，谈论罗马的衰落是荒谬的。如果不这样说，就会对生意不利，也许对报道者的健康不利。五世纪末的罗马的势力是野蛮人，他们否认罗马已经灭亡。

但这不仅仅是当局说："不要报告这个，否则我们会杀了你" 的情况。部分问题是，罗马在五世纪后期已经如此堕落，以至于它的 "衰落" 真正躲过了大多数人的注意。事实上，在一代人之后，马凯利努斯伯爵才第一次提出 "西罗马帝国与这个奥古斯都鲁斯一起灭亡" <sup>6</sup>。又过了几十年，也许是几个世纪，人们才普遍承认西方的罗马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当然，查理曼认为他是 800 年的合法罗马皇帝。

重点不是说查理曼大帝和所有在 476 年后以传统方式思考罗马帝国的人都是傻瓜。恰恰相反。社会发展的特征经常是模糊不清的。当占主导地位机构的力量被带入交易，以加强一个方便的结论，甚至是一个主要基于伪装的结论时，只有性格坚强和意见强烈的人才敢于反驳它。如果你试着把自己放在五世纪末的罗马人的位置上，很容易想象得出什么都没有改变的结论会是多么诱人。这种确定性是一种乐观的结论。如果不这样想，可能会让人感到害怕。既然一个令人放心的结论就在眼前，为什么还要得出一个令人恐惧的结论呢？

毕竟，有理由认为业务将继续如常进行。过去也是如此。罗马军队，特别是边境驻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野蛮状态。7 到了第三世纪，军队宣布新皇帝已经成为惯例。到了第四世纪，甚至连军官都被日耳曼化了，而且经常是文盲。8 在罗穆卢斯-奥古斯都鲁斯被赶下王位之前，已经有很多暴力推翻皇帝的事件发生。在他的同时代人看来，他的离开与混乱时期的许多其他动乱没有什么不同。他是带着养老金被送走的。他获得了养老金，甚至在他被谋杀前的短暂时期内，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该系统幸存的一种保证。对一个乐观主义者来说，废黜罗穆卢斯-奥古斯都鲁斯的奥多亚克重新统一了帝国，而不是摧毁了帝国。作为阿提拉的跟班艾德康的儿子，奥多亚克是个聪明人。他没有宣布自己为皇帝。相反，他召集元老院，说服元老院成员将皇帝职位以及整个帝国的主权提供给远在拜占庭的东方皇帝芝诺。奥多亚克只是作为芝诺的宗主国来管理意大利。

正如威尔-杜兰特在《文明的故事》中写道，这些变化似乎并不是 "罗马的衰落"，

而只是 "在国家舞台的表面发生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变化"。7

当罗马沦陷时，奥多亚克说，罗马经久不衰。他和几乎所有其他人一样，都热衷于假装什么都没有改变。他们知道，"罗马的荣耀"远比取而代之的野蛮好。甚至连野蛮人也这样认为。正如 C.W. Previte-Orton 在《剑桥中世纪简史》中写道，6 同上，第 102 页。

### "坚持不懈的虚构"

这种 "虚构" 包括保留旧制度的外表，即使其本质 "被野蛮所扭曲"。9 当最后一个皇帝被野蛮的 "中尉" 取代时，旧的政府形式仍然保持不变。元老院仍在开会。"大法官和其他高级职位继续存在，并由杰出的罗马人担任"。执政官仍然被提名一年，"罗马的民事管理部门完整地存活下来"。的确，在某些方面，它一直保持完整，直到十世纪末封建主义的诞生。在公共场合，旧的帝国徽章仍然被使用。基督教仍然是国家宗教。蛮族仍然假装对君士坦丁堡的东方皇帝和罗马法律的传统表示效忠。事实上，用杜兰特的话说，"在西方，伟大的帝国已经不复存在"。

那又怎样？

在你思考当今世界的状况时，罗马灭亡这个遥远的例子有许多相关的原因。大多数关于未来的书实际上是关于现在的书。我们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使这本关于未来的书首先成为一本关于过去的书。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用过去的真实例子来说明关于暴

力逻辑的重要的大政治观点，你就有可能对未来的情况有更好的看法。

历史是一位神奇的老师，它所讲述的故事比我们所编造的任何故事都要有趣。而许多更有趣的故事都与罗马的灭亡有关。它们记录了重要的教训，可能与你在信息时代的未来有关。

首先，罗马的衰落是历史上更生动的例子之一，说明了在政府规模崩溃的重大转型中发生了什么。1000 年的过渡也涉及中央权力的崩溃，而且是以增加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范围的方式进行的。十五世纪末的火药革命涉及机构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倾向于提高而不是缩小治理的规模。今天，一千年来第一次，西方的巨型政治条件正在破坏和摧毁政府和许多其他大规模运作的机构。

当然，罗马帝国末期治理规模的崩溃，与信息时代到来时存在的原因非常不同。罗马灭亡的部分原因是，它的扩张已经超出了暴力经济可以维持的规模。在帝国遥远的边界驻军的成本超过了古代农业经济所能支持的经济优势。为军事行动提供资金所需的税收和监管负担上升到超过经济的承载能力。腐败成为普遍现象。

正如历史学家拉姆斯-麦克马伦（Ramsay MacMullen）所记录的那样，军事指挥官的很大一部分努力都是为了追求 "其指挥的非法利润"。'~他们通过震慑民众来追求，这就是四世纪的观察家 Synesius 所描述的 "和平时期的战争，一个几乎比野蛮人的战争更糟糕的战争，是由军队的不守纪律和军官的贪婪所引起的"。14

导致罗马崩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安东尼时代的瘟疫所造成的人口赤字。许多地区的罗马人口的线圈 apse 显然促成了经济和军事的衰弱。这种情况在今天没有发生，至少还没有。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也许。新 "瘟疫 "的祸害将加剧新千年的技术演进的挑战。二十世纪人类人口的空前激增为快速变异的微型寄生虫创造了一个诱人的目标。对埃博拉病毒或类似病毒入侵大都市人口的担忧可能是有道理的。但这里不是考虑人类和疾病的共同进化的地方。尽管这是个有趣的话题，但我們在这个时刻的争论不是关于罗马为什么会衰落，甚至不是关于今天的世界是否容易受到一些导致罗马衰落的相同影响。它是关于一些不同的东西--即，历史上的伟大变革被感知的方式，或者说，在它们发生时被误解的方式。

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和在任何地方都是保守的，有一个小 "C"。

这意味着他们不愿意从解散可敬的社会习俗、推翻公认的制度、违抗他们赖以生存的法律和价值观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很少有人倾向于想象，气候、技术或其他一些变量的明显细微变化会以某种方式切断与他们父辈世界的联系。罗马人不愿意承认他们周围正在发生的变化。我們也是如此。

然而，不管你承认与否，我們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一场人们组织生计和保护自己的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它将不可避免地改变整个社会。事实上，这种变化将是如此深刻，以至于要理解它，就必须几乎不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

你几乎每次都会被邀请去相信，即将到来的信息社会将非常像你成长的工业社会。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微处理将使砖块中的灰泥溶解。它将如此深刻地改变暴力的逻辑，以至于它将极大地改变人们组织他们的生计和保护自己的方式。然而，人们倾向于淡化这些变化的必然性，或者争论它们的可取性，好像决定历史如何演变的是工业机构的命令。

## 大幻象

在许多方面比我们更了解情况的作者，却会在思考未来时将你引入歧途，因为他们在研究社会如何运作时过于肤浅。例如，大卫-克莱恩和丹尼尔-伯斯汀写了一本经过充分研究的书，名为《公路勇士》。这本书充满了令人钦佩的细节，但其中大部分细节都被归纳为 31 条。

公路 它充满了令人钦佩的细节，但这些细节大部分是在 31 日论证一种幻觉，即 "公民可以有意识地一起行动，塑造他们周围自发的经济和自然进程 "的想法。虽然这可能不是很明显，但这相当于说，如果每个人都重新致力于骑士精神，封建主义可能会生存下去。在 15 世纪末的法庭上，没有人会反对这种观点。事实上，这样做是异端邪说。但这也完全是一种误导，是蛇试图把未来装进它的旧皮囊的一个例子。

变化的最深刻的原因正是那些不受意识控制的原因。它们是改变暴力发生条件的因素。事实上，它们与任何明显的操纵手段相距甚远，在一个充满政治的世界里，它们甚至不是政治操纵的对象。从来没有人游行中高喊："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规模



经济”。从来没有人打着横幅要求：“发明一种武器系统，提高步兵的重要性”。从未有候选人承诺“改变保护暴力的效率和规模之间的平衡”。这样的口号将是荒谬的，正是因为它们的目标是任何人都无法有意识地影响的。然而，正如我们将探讨的那样，这些变量决定了世界如何运作，其程度远远超过任何政治纲领。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应该很明显，历史上的重要转变很少主要由人类的愿望驱动。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人们厌倦了一种生活方式而突然喜欢另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人们的想法和愿望是所发生事情的唯一决定因素，那么历史上所有的突然变化都将不得不被解释为与实际生活条件的任何变化毫无关系的情绪波动。只有在影响少数人的医疗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才会看到情绪的任意波动，似乎完全脱离了任何客观原因。

一般来说，大量的人不会突然一下子决定放弃他们的生活方式，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很有趣。从来没有一个觅食者说：“我已经厌倦了生活在史前时代，我更愿意过农耕村的农民生活。”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的任何决定性摇摆无一例外地是对生活条件的实际变化的反应。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总是现实的。如果他们的观点确实发生了突然的变化，那可能表明他们遇到了一些偏离熟悉条件的情况：入侵、瘟疫、气候的突然变化，或者改变他们生计或自我保护能力的技术革命。

决定性的历史变革远不是人类欲望的产物，它往往会混淆大多数人对稳定的愿望。当变化发生时，它通常会引起广泛的迷失，特别是在那些失去收入或社会地位的人中。你会徒劳地从民意调查或其他衡量情绪的

方法中了解即将到来的大政治过渡可能会如何展开。

## 无先见之明的 life

如果我们未能察觉到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巨大转变，部分原因是我们不希望看到。我们觅食的祖先可能同样顽固不化，但他们有更好的借口。一万年前，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农业革命的后果。事实上，除了在哪里找到下一顿饭之外，没有人能够预见到任何东西。当农耕开始时，没有任何关于过去事件的记录可以用来透视未来。甚至没有西方的时间观念，将时间分为有序的单位，如秒、分、小时、日等等，来衡量年限。觅食者生活在 "永恒的现在"，没有日历，实际上，根本没有书面记录。他们没有科学，除了他们自己的直觉之外，没有其他智力设备来理解因果关系。

当谈到展望未来时，我们的原始祖先是盲目的。引用《圣经》中的比喻，他们还没有吃过知识的果实。

## 向过去学习

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有利条件。过去 500 代人给了我们祖先所缺乏的分析能力。科学和数学帮助我们解开了自然界的许多秘密，使我们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与早期觅食者的理解相比，接近神奇。由于高速计算机的发展，计算算法对人类经济等复杂动态系统的运作有了新的认识。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艰辛发展{尽管它远未达到完美的程度，但却磨练了对人类行动的因素的理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倾向于对激励

作出反应。虽然并不总是像经济学家想象的那样机械，但他们确实做出了反应。成本和回报很重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提高奖励或降低某些行为的成本的外部条件的变化将导致更多的这种行为。

## 激励措施很重要

人们倾向于对成本和回报做出反应这一事实是预测的一个基本要素。你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如果你在街上扔下一张百元大钞，不管你是在纽约、墨西哥城还是莫斯科，很快就会有人捡到它。这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微不足道。它说明了为什么那些说预测是不可能的聪明人是错误的。任何准确预测激励措施对行为的影响的预测都可能是广泛正确的。而且，预期的成本和回报的变化越大，隐含的预测就越不琐碎。

最具深远意义的预测可能来自于对大政治变量变化的影响的认识。暴力是行为的最终边界力量；因此，如果你能理解暴力的逻辑将如何变化，你就可以有效地预测人们在未来将在哪里丢弃或捡起相当于一百美元的钞票。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你可以知道不可知的东西。我们不能告诉你如何预测彩票中奖号码或任何真正的随机事件。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恐怖分子何时或是否会在曼哈顿引爆原子弹爆炸。或者，如果一颗小行星会袭击沙特阿拉伯。我们无法预测一个新的冰河时期的到来，一个突然的火山爆发，或一种新疾病的出现。可能改变历史进程的不可知事件的数量是很大的。但是，了解不可知的事情与引出已经知道的事情的影响是非常不同的。如果你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一道闪电，你可以很有把握地预测到

雷声即将到来。预测大政治过渡的后果涉及更长的时间框架，以及不那么确定的联系，但这是一种类似的工作。

大规模政治变革的催化剂通常在其后果表现出来之前就已经出现。农业革命的全部影响花了五千年的时间才浮出水面。从农业社会向基于制造业和化学力量的工业社会的过渡发展得更快。它花了几个世纪。向信息社会的过渡将更加迅速，可能在一生中就会发生。然而，即使考虑到历史的缩短，你也可以预期在现有的信息技术的全部巨大政治影响被实现之前，还有几十年时间。

## 主要和次要的大政治过渡

本章分析了巨型政治过渡的一些共同特征。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更仔细地研究农业革命，以及从农场到工厂的过渡，这是前几个大阶段变化中的第二个。在文明的农业阶段，有许多小规模的政治过渡，如罗马的衰落和 1000 年的封建革命~这些标志着权力等式的消长，因为政府的兴衰和农业的战利品从一伙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伙人手中。罗马帝国时期庞大的庄园主，欧洲黑暗时代的贵族农民，以及封建时期的领主和农奴，都吃着同样田地里的粮食。由于不同技术的累积影响、气候的波动和疾病的破坏性影响，他们生活在非常不同的政府之下。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彻底解释所有这些变化。我们并不打算这样做，尽管我们已经勾勒出一些例子，说明不断变化的大政治变量是如何改变过去行使权力的方式的。

随着巨大的政治波动降低和提高了投射权力的成本，政府也在增长和缩小。

以下是你在寻求了解信息革命时应该牢记的一些摘要要点。34 1.

权力的大政治基础的转变通常在权力使用的实际革命之前就已经展开了。

当一个重大的转型开始时，收入通常会下降，这通常是因为一个社会由于人口的压力而使资源边缘化，从而使自己容易出现危机。

看到一个系统的 "外部 "通常是禁忌。人们经常对现有社会的暴力逻辑视而不见；因此，他们几乎总是对这种逻辑的变化视而不见，无论是潜在的还是公开的。大规模的政治转型在发生之前很少被认识到。

重大的转型总是涉及到文化革命，而且通常会引起新旧价值观的信徒之间的冲突。

大规模的政治转型从来都不受欢迎，因为它们使辛苦获得的知识资本过时，并使既定的道德要求变得混乱。它们不是由民众要求进行的，而是对改变当地环境中暴力逻辑的外部条件变化的回应。

向新的生计组织方式或新的政府类型的过渡，最初只限于那些大政治催化剂发挥作用的地区。

除了农业的早期阶段可能是个例外，过去的过渡期总是涉及到社会混乱和暴力加剧的时期，原因是旧制度的混乱和崩溃。

腐败、道德滑坡和效率低下似乎是一个系统最后阶段的信号特征。

技术在塑造暴力逻辑方面越来越重要，这导致了历史的加速，使每一个连续的过渡期的适应时间都比以前少。

历史的步伐加快了

随着事件的发展比以前的转变快了许多倍，对世界将如何变化的早期理解对你来说可能会比在过去的同等时刻对你的祖先更有用。即使第一批农民奇迹般地理解了耕种地球的全部巨大政治影响，这些信息实际上也是无用的，因为在完成向社会新阶段的过渡之前，还需要数千年的时间。

今天却不是这样。历史已经加速了。正确预测新技术的巨大政治影响的预测，在今天可能要有用得多。如果我们能把目前向信息社会转型的影响发展到与拥有目前知识的人能够掌握过去向农场和工厂转型的影响一样的程度，那么这些信息现在的价值应该会高很多倍。简单地说，巨型政治预测的行动范围已经缩减到最有用的范围，即在一个人的一生中。

"回顾几个世纪以来，或者甚至只看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人靠他们在35种暴力武器方面的特殊技能谋生，而且他们的活动在决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弗雷德里克-C-莱恩

我们对大政治的研究就是试图做到这一点——引出改变行使暴力的边界的变化因素的影响。

这些大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暴力何时何地发生。它们也有助于为收入的市场分配提供信息。正如经济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c Lane）明确指出的那样，如何组织和控制暴力在决定 "如何利用稀缺资源 "方面起着很大作用。

## 大政治的速成课程

大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它有助于阐明历史上的一些主要谜团：政府如何兴衰以及它们成为何种类型的机构；战争的时间和结果；经济繁荣和衰退的模式。通过提高或降低投射权力的成本和回报，巨型政治学控制着人们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能力。从最早的人类社会开始，这就是事实。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在《血流成河》和《大清算》中探讨了许多决定历史演变的重要隐藏的大政治因素。解开大政治变化的含义的关键是理解那些在使用暴力方面催生革命的因素。这些变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任意地归为四类：地形、气候、微生物和技术。

地形与气候相结合，在早期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个国家出现在被沙漠包围的洪泛区，如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那里有丰富的灌溉用水，但周围地区过于干燥，无法支持贵族耕作。在这种情况下，单个农民如果不合作维持政治结构，就会面临非常高的

成本。没有灌溉，只有大规模的灌溉，作物就不会生长。没有农作物就意味着饥饿。在沙漠中控制水的人处于强势地位，这种条件使政府成为专制和富有的政府。

正如我们在《大清算》中分析的那样，地形条件在古代贵族农民的繁荣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希腊，使该地区成为西方民主的摇篮。鉴于三千年前地中海地区普遍存在的原始交通条件，生活在离海几英里以外的人几乎不可能在古代世界的高价值作物--橄榄和葡萄的生产中竞争。如果石油和葡萄酒必须通过陆路运输，搬运费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无法以利润出售。希腊沿岸精心设计的海岸线意味着希腊的大部分地区离海不超过 20 英里。这给希腊农民带来了决定性的优势，使他们比内陆地区的潜在竞争对手更有优势。

由于在高价值产品交易方面的这种优势，希腊农民只需控制小块土地就能获得高收入。这些高收入使他们能够购买昂贵的盔甲。古希腊著名的跳伞兵是自费武装自己的农民或地主。希腊的跳伞兵武器精良，斗志昂扬，在军事上非常强大，不容忽视。

地形条件是希腊民主的基础，就像那些不同类型的条件产生了埃及和其他地方的东方专制制度一样。

气候也有助于设定可以行使蛮力的界限。

气候的变化是第一次从觅食到耕作的重大转变的催化剂。



大约一万三千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的结束，导致了植被的彻底改变。从冰河时代首先退去的近东开始，温度和降雨量的逐渐上升使森林蔓延到以前是草原的地区。特别是，山毛榉森林的迅速蔓延严重限制了人类的饮食。正如苏珊-阿林-格雷格在《觅食者与农民》中所说的那样。榉树林的建立肯定对当地的人类、植物和动物种群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橡树林的树冠是相对开放的，允许大量的阳光照射到林地。由混合灌木、草本植物和草组成的茂盛的灌木丛发展起来，植物的多样性支持各种野生动物。与此相反，山毛榉森林的树冠是封闭的，森林底部被严重遮蔽。除了在叶子出现之前的春季一年生植物，只发现耐阴的沉香、蕨类和一些草。

随着时间的推移，茂密的森林侵占了开阔的平原，在整个欧洲蔓延到东部大草原。森林减少了可用于支持大型动物的放牧区，使人类觅食者的人口越来越难以养活自己。

狩猎采集者的人口在冰河时代的繁荣中膨胀得太厉害了，无法靠日益减少的大型哺乳动物群来支持自己，其中许多物种被猎杀到灭绝。向农业的过渡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在被迫的情况下为弥补饮食的不足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在那些较远的北方地区和热带雨林中，觅食仍然占主导地位，因为那里的变暖趋势没有对大型哺乳动物的栖息地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全球变暖趋势也没有产生减少食物供应的反作用。自农业出现以来，由气候变冷而不是变暖引发的变化更为普遍。

在过去的社会中，对气候变化的动态有一个适度的了解，在气候继续波动的情况下，很可能证明是有用的。如果你知道平均下

降一摄氏度会使生长季节减少三到四个星期，并使可种植农作物的最高海拔减少 500 英尺，那么你就知道一些限制人们在未来行动的边界条件。你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预测从谷物价格到土地价值的 37 种变化。你甚至可以就气温下降对实际收入和政治稳定的可能影响得出明智的结论。在过去，当持续数年的农作物歉收导致食品价格上涨和可支配收入缩水时，政府就会被推翻。

例如，近代以来最冷的十七世纪也是全世界革命的时期，这不是巧合。造成这种不愉快的一个隐藏的巨大政治原因是天气急剧变冷。事实上，天气是如此寒冷，以至于凡尔赛的 "太阳王 "桌上的酒都冻住了。生长季节的缩短导致作物歉收，并破坏了实际收入。由于天气变冷，繁荣开始进入漫长的全球大萧条，大约从 1620 年开始。事实证明，它极大地破坏了稳定。十七世纪的经济危机导致世界被叛乱所淹没，许多叛乱集中在 1648 年，正好在另一个更著名的叛乱周期的两百年前。1640 年至 1650 年间，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葡萄牙、加泰罗尼亚、法国、莫斯科、那不勒斯、西西里、巴西、波西米亚、乌克兰、奥地利、波兰、瑞典、荷兰和土耳其都发生了叛乱。

甚至中国和日本也被动乱所席卷。

重商主义在十七世纪贸易萎缩时期占主导地位，这可能也不是巧合。经济封闭也许在该世纪末最为明显，"当时发生了可怕的饥荒"。到了十八世纪，特别是 1750 年以后，气温升高，作物产量提高，西欧的实际收入开始提高，足以扩大对制成品的需求。更多的自由市场政策被采纳。这导致了经济增长的自我强化，因为工业扩

展到更大的规模，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技术和制成品产出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减少了天气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然而，即使在今天，你也不应该低估突然变冷的天气对降低实际收入的影响--即使在北美这样的富裕地区。当现有的机构配置耗尽其潜力时，社会有一种强烈的趋势，使自己容易出现危机。在过去，这种趋势往往表现为人口增长，使土地的承载能力达到极限。这种情况在 1000 年的转型之前和 15 世纪末都发生过。在这两种情况下，作物歉收和低产造成的实际收入暴跌在摧毁主导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这种边缘化表现在消费信贷市场上。如果急剧变冷的天气降低了作物产量，降低了可支配收入，这将导致债务违约以及税收反叛。如果以过去为鉴，经济关闭和政治不稳定都可能导致。

微生物传递伤害的力量或免于伤害的能力，其方式往往决定了权力的行使方式。正如我们在《大清算》中所探讨的那样，欧洲对新世界的征服肯定是这样的。欧洲定居者从充满疾病的农业社会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麻疹等儿童传染病的相对豁免权。他们遇到的印第安人主要生活在人口稀少的觅食队伍中。他们没有这种免疫力，38 人被消灭了。通常情况下，最大的死亡率发生在白人到达之前，因为在沿海地区首次遇到欧洲人的印第安人带着感染物进入内陆。

在行使权力方面也有微生物方面的障碍。在《血流成河》中，我们讨论了强烈的疟疾菌株在使热带非洲在许多个世纪里不被白人入侵方面所起的作用。在 19 世纪中期发现奎宁之前，白人军队无法在疟疾地区生存，无论他们的武器有多么优越。

人类和微生物之间的互动也产生了重要的人口效应，改变了暴力的成本和回报。当死亡率的波动由于流行病、饥荒或其他原因而变得很高时，战争中的相对死亡风险就会下降。从 16 世纪开始，死亡率爆发的频率不断下降，这有助于解释较小的家庭规模，并最终解释今天与过去相比，对战争中突然死亡的容忍度要低得多。这产生了降低对帝国主义的容忍度和提高在低出生率社会投射权力的成本的效果。

由小家庭组成的当代社会，往往会发现即使是少量的战死也是无法容忍的。相比之下，早期现代社会对与帝国主义有关的死亡成本的容忍度要高得多。在本世纪之前，大多数父母都生了很多孩子，其中一些孩子预计会随机地突然死于疾病。在一个早期死亡司空见惯的时代，未来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面对战场上的危险时阻力较小。

到目前为止，技术在决定现代几个世纪中投射权力的成本和回报方面发挥了最大的作用。本书的论点是假定它将继续这样做。技术有几个关键层面。A.

进攻与防御之间的平衡。盛行的武器技术所隐含的进攻和防御之间的平衡有助于决定政治组织的规模。当进攻能力上升时，远距离投射力量的能力占主导地位，管辖区趋于巩固，政府形成更大的规模。在其他时候，比如现在，防御能力正在上升。这使得在核心区域之外投射力量的成本更高。管辖权倾向于下放，大政府会分解成小政府。

B.

平等和步兵的主导地位。决定公民之间平等程度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武器技术的性质。相对便宜、非专业人员也能使用的武器，以及提高步兵的军事重要性的武器，往往会使权力平等。当托马斯-杰斐逊写下 "人人生而平等" 时，他说的东西比几个世纪前的类似声明似乎要真实得多。一个拿着猎枪的农民不仅和拿着布朗-贝斯的典型英国士兵一样装备齐全，而且装备得更好。拿着步枪的农民可以从更远的地方向士兵射击，而且比士兵的还击更准确。这与中世纪的情况截然不同，当时一个农民拿着干草叉，他不可能买得起更多的东西，他可以 39

在中世纪的情况下，一个拿着草叉的农民--他不可能有更多的钱--几乎不可能希望对抗一个全副武装的马背上的骑士。在 1276 年，没有人写过 "人人生而平等"。在当时，从最明显的意义上讲，人是不平等的。一个骑士行使的蛮力远远超过几十个农民加起来的力量。

C.

暴力中规模的优势和劣势。另一个有助于决定是有几个大政府还是有许多小政府的变量是部署盛行的武器所需的组织规模。当暴力的回报越来越高时，以大规模运作政府会有更多的回报，它们往往会变得更大。当一个小团体可以指挥有效的手段来抵抗大团体的攻击时，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权就会趋于分裂。小型的、独立的当局行使政府的许多职能。正如我们在后一章中所探讨的，我们相信信息时代将带来网络士兵的曙光，他们将是权力下放的预言者。网络士兵不仅可以由民族国家部署，还可以由非常小的组织，甚至是个

人部署。下一个千年的战争将包括一些用计算机进行的几乎不流血的战斗。

D.

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在决定最终权力是在当地行使还是从远方行使时，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获得生计的主要企业的规模。当关键的企业只有在大规模的贸易区内组织起来才能发挥最佳的作用时，那些为其保护下的企业提供这种环境的政府可能会攫取足够的额外财富来支付维持一个大型政治体系的费用。在这样的条件下，整个世界经济通常在一个最高的世界大国主导所有其他国家的地方更有效地运作，就像大英帝国在 19 世纪那样。但有时巨型政治变量结合起来，会产生规模经济的下降。如果维持一个大型贸易区的经济利益减少，以前因利用大型贸易区的利益而繁荣的大型政府可能开始分裂--即使在其他方面，进攻和防御之间的武器平衡仍然与以前一样。

E.

技术的分散性。有助于权力平衡的另一个因素是关键技术的分散程度。当武器或生产工具可以有效地被囤积或垄断时，它们往往会使权力集中。即使是本质上属于防御性的技术，如机枪，也被证明是强有力的进攻性武器，在它们没有广泛散布的时期，有助于提高治理规模。

当欧洲列强在 19 世纪末享有对机枪的垄断权时，他们能够使用这些武器来对付边缘地区的人民，从而极大地扩张殖民帝国。后来，在二十世纪，当机枪变得广泛可用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

被用来帮助摧毁帝国的力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关键技术越是广泛分散，权力就越是广泛分散，政府的最佳规模也就越小。

## 大政治变革的速度

虽然技术是今天最重要的因素，而且显然越来越重要，但所有四个主要的大政治因素在过去都发挥了决定权力行使规模的作用。

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暴力的回报是否会随着暴力的大规模使用而继续上升。这决定了火力的大小与资源使用效率的重要性。它也强烈地影响着收入的市场分配。问题是，他们在未来将扮演什么角色？估算答案的关键在于认识到这些巨大的政治变量会以极大的不同速度发生变化。

在整个有记载的历史中，地形几乎是固定的。除了涉及港口淤塞、垃圾填埋或侵蚀的轻微局部影响外，今天地球的地形几乎与亚当和夏娃蹒跚走出伊甸园时一样。而且，在另一个冰河时期重新塑造各大洲的地貌或其他一些剧烈的事件扰乱地球表面之前，它很可能会保持不变。在更深远的范围内，地质年代似乎在转变，也许是对大型陨石撞击的反应，时间为 1000 万至 4000 万年。有一天，可能会再次发生地质动荡，大大改变我们星球的地形。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你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棒球和板球赛季都将被取消。

气候的波动比地形的波动要活跃得多。在过去的一百万年里，气候变化是造成地球表面特征的大部分已知变化的原因。在冰

河时代，冰川开凿了新的山谷，改变了河流的走向，将岛屿从大陆上分割开来，或通过降低海平面将它们连接在一起。

气候的波动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在上个冰河时期结束后催生了农业革命，后来又在温度较低和干旱时期破坏了制度的稳定。

最近，人们对 "全球变暖 "可能产生的影响感到担忧。

这些担忧不能被轻易地否定。然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更可能的风险似乎是向更冷而不是更暖的气候转变。根据从海底采集的核心样本中的氧同位素分析，对温度波动的研究表明，目前是 200 多万年来第二温暖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关于全球变暖的警报可能是令人欣慰的。如果它们是真实的，这就保证了气温将继续在过去三个世纪经历的异常温暖和相对良好的范围内波动。

微生物对权力行使的影响的变化速度更让人困惑。微生物可以非常迅速地变异。这一点在病毒中尤为明显。例如，22 种普通感冒以一种几乎万花筒般的方式变异。然而，尽管这些变异进行得很快，但它们在改变行使权力的边界方面的影响却远没有技术变革那么突然。为什么呢？部分原因是，自然界的正常平衡倾向于使微生物感染但不破坏宿主种群，这对它们有利。太容易杀死宿主的病毒性感染往往会在这个过程中消灭自己。微量寄生虫的生存取决于它们对它们所入侵的宿主不会过于迅速或一致地致命。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可能有改变权力平衡的致命的疾病爆发。这类事件在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黑死病消灭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人口，并对 14 世纪的国际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 可能发生的事情

可以从可能发生的事情和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理解历史。

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理由，微寄生虫不能在现代时期继续对人类社会造成破坏。例如，有可能是行使权力的微生物障碍，相当于疟疾，但毒性更强，可能使西方对周边地区的入侵停滞不前。第一批无畏的葡萄牙冒险家驶入非洲水域时，可能感染了致命的逆转录病毒，即更具传染性的艾滋病版本，这将在新的亚洲贸易路线开始之前就阻止它的开辟。哥伦布和新大陆的第一波定居者也可能遇到疾病，像当地居民受到麻疹和其他西方儿童疾病的影响一样，使他们遭受灭顶之灾。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这种巧合强调了历史是有命运的这一直觉。

在现代时期，微生物对巩固权力的阻碍远远小于对其的促进。处于边缘地带的西方军队和殖民者经常发现，使他们能够投射力量的技术优势被微生物优势所强调了。西方人用看不见的生物武器武装起来，他们对经常毁坏原住民的儿童疾病有相对的免疫力。这使来自西方的航海者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他们来自定居密度较低地区的手对手则缺乏这种优势。随着事件的发展，疾病的转移几乎完全是单向的--从欧洲向外。在另一个方向，即从周边地区到核心地区，并没有相应的疾病转移。

作为一个可能的反例，有些人声称西方探险家将梅毒从新世界传入欧洲。这一点是可以争论的。然而，如果是真的，它并没有被证明是行使权力的一个重要障碍。梅毒的主要影响是改变了西方的性道德。

从 15 世纪末到 20 世纪最后 25 年，微生物对工业社会的影响是越来越良性的。尽管肺结核、小儿麻痹症和流感的爆发造成了个人悲剧和不愉快，但在现代时期，没有出现任何新的疾病，甚至接近安东瘟疫或黑死病的巨大政治影响。改善公共卫生，以及 42

近代时期的传染病，甚至接近于安东瘟疫或黑死病的巨大政治影响。公共卫生的改善，以及 42 种疫苗和解毒剂的出现，总体上降低了现代时期传染性微生物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了技术在设定权力行使边界方面的相对重要性。

最近出现的艾滋病和对外来病毒可能传播的警告都暗示，微生物的作用在未来可能不会像过去五百年那样完全是大政方针的良性发展。但何时或是否会有新的瘟疫感染世界是不可知的。微量寄生虫的爆发，如病毒大流行，而不是气候或地形的剧烈变化，将更有可能扰乱技术的大政治主导地位。

我们没有办法监测或预测地球上的生命性质与我们已知的生命性质的巨大差异。我们掰着手指，假设下一个千年的主要大政治变量将是技术而不是微生物。如果运气继续站在人类一边，技术将继续作为主要的大政治变量而日益突出。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正如对第一个伟大的大政治

变革，即农业革命的回顾所清楚表明的那样。

### 第三章 伊甸园之东

农业革命和暴力的复杂化'耶和华对该隐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我是我兄弟的看守人吗？他说："你做了什么？你兄弟的血的声音从地里向我喊叫。"《创世纪》4:9-10

五百代以前，人类社会组织的第一个阶段性变化开始了。1 我们在几个地区的祖先不情愿地拿起粗糙的工具、削尖的木桩和临时的锄头，开始工作。他们在播种第一批庄稼的同时，也为世界上的权力奠定了新的基础。农业革命是第一次伟大的经济和社会革命。它从被逐出伊甸园开始，进展非常缓慢，以至于在二十世纪开始时，农业还没有完全取代全球所有合适地区的狩猎和采集。专家们认为，即使在最早出现农业的近东地区，它也是在 "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 "中引入的，"可能花了五千年或更长时间"。

将一个绵延数千年的过程描述为一场 "革命 "似乎有些夸张。然而，这正是农耕的出现，一场通过改变暴力逻辑而改变人类生活的慢动作革命。

无论农耕在哪里扎根，暴力就会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更重要的特征。

善于操纵或控制暴力的等级制度开始主宰社会。

理解农业革命是理解信息革命的第一步。耕作和收割的引入提供了一个典范的例子，说明工作性质的明显简单转变可以彻底改变社会的组织。将这一过去的革命纳入视野，你就能更有力地预测历史可能如何展开，以应对微处理器引入的新的暴力逻辑。

要理解农业的革命性特征，你首先需要了解原始社会在农耕之前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在《大清算》中对此进行了调查，并在下文中作了进一步的简述。狩猎和采集社会是唯一的社会组织形式，经历了漫长的史前沉睡期，当时人类的生活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人类学家声称，自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以来，99%的时间里人类都是狩猎和采集者。狩猎和采集群体的长期成功和最终失败的关键是，他们必须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在一个非常广泛的区域内运作。

觅食者只有在人口密度低的地方才能生存。要知道为什么，想想更大的群体会带来的问题。首先，一千名猎人一起在风景区内游行，会引起骚动，从而吓跑他们想要捕猎的动物。更糟糕的是，如果一小群猎人偶尔能抓到一大群猎物，他们收获的食物，包括在野外发现的水果和可食用植物，不可能长期保持丰富。一大群觅食者会像三十年战争中的饥饿军队一样，通过过度采摘浪费农村。因此，为了尽量减少过度捕杀，狩猎队必须是小规模的。正如斯蒂芬·博伊登在《生物学视角下的西方文明》中写道："最常见的是，狩猎-采集者群体的人数在 25 至 50 人之间。"

今天，在温带气候下生活在一万英亩的土地上是一种奢侈，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能享受。一个狩猎采集者的家庭几乎不可能靠更少的东西生存。

他们通常每人需要数千英亩的土地，即使是最肥沃的觅食地区也是如此。这表明为什么在特别有利于耕作的时期，人类人口的增长可能为人口危机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由于养活一个人需要这么多的土地，狩猎和采集社会的人口密度必须非常稀疏。在农耕之前，人类的居住密度就像熊一样密集。

除了微小的差别，人类的饮食与熊相似。觅食社会依赖从开放的乡村或附近的水体中收集的食物。虽然有些采集者是渔民，但大多数是猎人，他们的食物有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是依靠大型哺乳动物的蛋白质。除了一些简单的工具和随身携带的物品外，狩猎采集者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可供他们使用。他们通常没有办法有效地储存大量的肉类或其他食物供以后使用。大多数食物在采集后不久就必须吃掉，或者任其变质。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些狩猎采集者不吃变质的食物。

正如博伊登报告的那样，爱斯基摩人 "据说特别喜欢腐烂的食物 "4。

他重复了专家们的意见，即爱斯基摩人 "把鱼头埋起来，让它们腐烂，直到骨头变得和鱼肉一样稠。然后他们把散发着恶臭的东西揉成糊状并吃掉"；他们还喜欢 "生吃驯鹿苍蝇的肥大蛆状幼虫.....鹿的粪便，像浆果一样咀嚼.....还有一年以上的骨髓，上面长满蛆虫 "5。

除了这些美味之外，觅食者几乎没有开发出多余的食物。正如人类学家格雷格所指

出的，"流动人口一般不储存食品，以应对资源供应的季节性或意外的低谷"。因此，觅食者没有什么可偷的。在无法储存剩余食物的情况下，包括使用暴力的专业化分工是不可行的。狩猎的逻辑也决定了狩猎和觅食群体之间的暴力不可能超过小规模，因为这些群体本身必须保持微小。

觅食队的小规模在另一个方面是有利的。这种小团体的成员会彼此熟悉，这是一个使他们更有效地合作的因素。随着人数的增加，决策变得更加困难。

狩猎和采集的队伍是否随和，还有待商榷。亨利-梅恩爵士提到了"原始人的普遍好战性"。用他的话说，"自然和原始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sup>6</sup> 他的观点在进化生物学家的工作中得到了强调。R. Paul Shaw 和 Yuwa Wong 评论说。["有强烈的迹象表明，在欧洲第四个和第四个冰川期前的澳洲人、直立人和智人的遗骸中，许多明显的伤害是由战斗造成的"。<sup>7</sup> 但其他人对此表示怀疑。像斯蒂芬-博伊登这样的专家认为，原始群体通常不喜欢战争，也不容易发生暴力。社会惯例的发展是为了减少内部的紧张关系，促进分享猎物。特别是在人类捕食大型猎物的地区，单个猎人很难猎获这些猎物，于是出现了宗教和社会学说，以方便重新分配任何与整个群体一起捕获的猎物。分享热量资源的首要任务是与其他猎手分享。必要性，而不是情感，是一种鞭策。对资源的第一要求是由经济上最有能力和军事上最强大的人提出的，而不是由病人和弱者提出。毋庸置疑，影响这种优先权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正值壮年的猎人在军事上也是小队中最有实力的成员。通过保证他们在狩猎中的优先权，该群体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潜在的致命的内部争吵。

只要人口密度保持在低水平，觅食者的神就不是好战的神，而是自然力量或他们狩猎的动物的化身。资本的匮乏和开放的边界使得战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必要的。除了自己的小家庭或部族之外，很少有邻居会构成威胁。由于觅食者倾向于漫无目的地寻找食物，超出最低限度的个人财产成为一种负担。那些财产不多的人必然会经历很少的财产犯罪。当冲突发生时，争执的各方往往满足于走开，因为他们任何特定的地方都没有什么投资。逃跑是解决个人恩怨或其他类型的过高要求的一个简单办法。这并不意味着早期人类是和平的。他们的暴力和不愉快可能达到了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程度。但是，如果他们使用暴力，那主要是出于个人原因，或者，更糟糕的是，出于运动。

狩猎采集者的生计取决于他们在小范围内的运作，除了按性别划分外，几乎没有分工的余地。

他们没有有组织的政府，通常没有永久的定居点，也没有积累财富的可能性。甚至像书面语言这样的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原始经济中也是未知的。没有书面语言，就不可能有正式的记录和历史。

## 过度杀戮

觅食的动力创造了非常不同的工作动机，与我们在农业出现后所习惯的动机不同。觅食者生活的资本需求是最小的。一些原始的工具和武器就够了。除了偶尔在采石场开采燧石或肥皂石外，没有任何投资渠道，甚至没有土地的私有财产。<sup>8</sup> 正如人类学家苏珊-阿林-格雷格在《觅食者和农

民》中写道："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群体共同拥有的"。9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居住在湖岸边的渔民，觅食者通常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由于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几乎不需要努力工作来获得财产或维护财产。他们没有抵押贷款或纳税，没有家具需要购买。他们为数不多的消费品是动物皮毛，以及由群体成员自己制作的个人装饰品。因为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所以没有什么动力去获取或积累任何可能被当作金钱的东西。在这样的条件下，牧民的储蓄可能不过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由于没有挣钱的理由，也几乎没有分工，勤奋工作作为一种美德的概念对狩猎和采集群体来说肯定是陌生的。除了在不寻常的困难时期，当需要长期努力寻找食物的时候，很少有人工作，因为需要的很少。除了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工作外，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得到的。对于典型的狩猎和采集队伍的成员来说，这意味着每周只工作 8 至 15 个小时。因为猎人的劳动并不能增加食物的供应，而只能减少食物的供应，一个人如果英勇地加班加点，杀死更多的动物或采摘更多的水果，在水果变质之前就能吃到，对繁荣没有任何贡献。相反，过度杀戮会减少未来寻找食物的前景，从而对群体的福祉产生不利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觅食者，如爱斯基摩人，会惩罚或排斥那些从事过度杀戮的成员。

爱斯基摩人惩罚过度杀戮的例子特别有说服力，因为他们远比其他入更有能力通过冷冻来储存肉类。

此外，为大型海洋动物的油类提供至少一些储存空间也是可行的。觅食者通常选择不这样做，这一事实反映了他们与自然界的互动更为被动。这也可能表明认知和心



理过程受文化影响的程度。在复杂的环境中，对学习和行为的限制使一些策略的采用远比看起来更困难。正如 R.Paul Shaw 和 Yuwa Wong 所写的那样，"由于壁龛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学习中的偏见也是如此。"

从这个角度来看，农业的出现不仅仅意味着饮食的改变；它还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的组织方面发起了一场巨大的革命，并改变了暴力的逻辑。农业创造了大规模的土地资本资产，有时也创造了灌溉系统。农民饲养的农作物和驯养的动物是有价值的资产。它们可以被储存、囤积和盗窃。由于农作物从种植到收获的整个生长季节都需要照料，因此远离威胁的迁移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特别是在干旱地区，种植农作物的机会被限制在有可靠水源的小块土地上。随着逃跑变得更加困难，有组织的抢劫和掠夺的机会也在增加。农民在收获季节会受到袭击，这逐渐提高了战争的规模。

这往往会增加社会的规模，因为暴力的竞争往往是由较大的群体获胜。随着对土地的竞争和对土地产出的控制变得更加激烈，社会变得更加固定。劳动分工变得更加明显。就业和奴隶制第一次出现了。农民和牧民专门生产食物。陶工生产储存食物的容器。祭司们祈求雨水和丰收。

暴力专家，政府的祖先，越来越多地致力于掠夺和保护自己免受掠夺。与祭司一起，他们成为历史上第一批富有的人。在农业社会的早期阶段，这些战士开始控制一部分年度作物，作为保护的代价。在威胁最小的地方，贵族农民有时能够保留相对较大的自主权。但是，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对食物的竞争加剧，特别是在沙漠周围的地区，生产性土地的价格很高，战士集团

可以拿走总产量的很大一部分。这些战士用这种抽成的收益建立了第一批国家，其收益高达粮食作物的 25% 和驯养动物群增长量的二分之一。因此，农业极大地提高了胁迫的重要性。能够被掠夺的资源的激增导致了掠夺的大量增加。

农业革命的全部逻辑花了几千年的时间才发挥出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温带地区稀疏的农民群体可能像他们的觅食祖先那样生活。在土地和降雨量充足的地方，农民在小范围内收获农作物，没有太多的暴力干扰。但随着几千年来人口的增加，即使是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农民也会受到不稳定的掠夺，有时他们肯定没有足够的种子来重新种植第二年的作物。竞争性的掠夺，或无政府状态，是一个极端的可能性，也是没有任何专门组织来垄断暴力的无保护的社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中固有的暴力逻辑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内实施。可以在没有政府掠夺的情况下继续耕种和放牧的地区退缩到少数真正的偏远地区。举个极端的例子，阿富汗的 Kafir 地区一直抵制政府的强加，直到 19 世纪的最后十年。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在几个世纪前就被改造成了一个相当好战的社会，按照亲属关系组织起来。这样的安排不能够大规模地集结力量。在英国人将现代武器带到该地区之前，卡菲尔人一直在他们偏远的巴什加尔和瓦加尔山谷中保持独立，因为他们的堡垒受到地形特征、高山和沙漠的保护，这些都是他们与外部征服者之间的障碍。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革命的基本逻辑在农业发展的社会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耕作

极大地提高了人类 48 个社区可以形成的范围。从大约一万年前开始，城市开始出现了。虽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城市很小，但它们是第一批 "文明 "的中心。"文明 "一词来自拉丁语中的 "公民权 "或 "城市居民"。由于农业创造了可供掠夺和保护的资产，它也创造了一个库存会计的要求。除非你能汇编记录和开具收据，否则你无法征税。会计师账簿中使用的符号成为了

社区可以形成。从大约一万年前开始，城市开始出现了。虽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城市很小，但它们是第一批 "文明 "的中心。"文明 "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 civit，意思是 "公民权 "或 "城市居民"。由于农业创造了可供掠夺和保护的资产，它也创造了一个库存会计的要求。除非你能汇编记录和开具收据，否则你无法征税。会计师账簿中使用的符号成为书面语言的雏形，这种创新在狩猎者和采集者中从未出现过。

耕作也扩大了人类必须解决问题的范围。

狩猎队生活在一个即时的时间范围内。他们很少进行超过几天的项目。但种植和收获庄稼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追求时间较长的项目的农民要把注意力放在星星上。

详细的天文观测是制定历法和日历的先决条件，以作为何时种植和收割的最佳指南。随着农业的出现，猎人们的视野也随之扩大。

物业

向定居农业社会的转变导致了私有财产的出现。显然，没有人会满足于通过整个生长季节的劳作来生产作物，而只是看到别人来收获他生产的东西。财产概念的出现是农业生产的必然结果。但是，私有财产概念的明确性被伴随着农耕的引入而出现的暴力逻辑所削弱。财产的出现被以下事实所迷惑：个人的巨大政治力量不再像在觅食社会中那样平等，在那里，每一个健康的成年男性都是一个猎人，和其他人一样装备精良。耕作引起了暴力的专业化。正因为它创造了一些可供偷窃的东西，耕作使得投资更好的武器装备变得有利可图。其结果是盗窃，其中大部分是高度有组织的盗窃。

有权势的人现在能够组织一种新的掠夺形式：对暴力的垄断，或政府。这使社会急剧分化，为那些从掠夺中获益的人和耕种田地的广大穷人创造了相当不同的环境。少数控制军事力量的人现在可以变得富有，还有那些得到他们青睐的人。神王和他们的盟友，即统治第一批近东国家的各种较小的地方势力，比在他们下面劳作的广大民众享有更接近现代形式的财产。

当然，在早期的农业社会中，认为私人和公共财富之间有区别是不合时宜的。执政的神王拥有国家的全部资源供其支配，其方式与庞大的庄园所有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与欧洲历史上的封建时期一样，所有的财产都受制于更高的权贵。在等级制度下的人发现他们的财产会因统治者的意愿而减少。

然而，说君主不受法律约束并不意味着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夺取任何东西。成本和报酬对法老的自由造成了影响，就像今天对

加拿大总理的影响一样。而且法老比当代领导人更受交通和通讯困难的限制。仅仅是将战利品从一个地方拖到另一个地方，特别是当战利品主要是以农产品的形式衡量时，就会因变质和偷窃而造成大量损失。官员们互相检查，减少了偷窃造成的损失，但增加了法老不得不承担的总的管理费用。

分散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优化了产出，也催生了更强大的地方势力，这些势力有时会发展成对王朝控制的全面挑战者。即使是东方的专制者也绝非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

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承认他们发现的原始力量的平衡。

虽然每个人，包括富人，都会被任意征用，但有些人还是能够积累自己的财产。和现在一样，国家将其大部分收入用于公共工程。灌溉系统、宗教纪念碑和国王的墓穴等项目为建筑师和工匠提供了赚取收入的机会。一些有条件的人能够积累大量的私人财产。事实上，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文明苏美尔现存的楔形文字片中，有很大一部分记录了各种贸易行为，其中大部分涉及财产所有权的转让。

早期的农业社会有私有财产，但在社会金字塔的底层很少有。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他们太穷了，无法积累很多财富。事实上，除了少数例外，直到现代，大多数农民都是如此贫穷，以至于在干旱、洪水或虫害降低作物产量时，他们随时都有被饿死的危险。因此，农民不得不以一种方式来组织他们的事务，以尽量减少坏年景下的风险。在整个社会的广泛而贫困的阶层中，获得了一种更原始的财产组织。它增加了

生存的机会，但却剥夺了大部分积累资本和在经济体系中崛起的机会。

## 农民保险

这种讨价还价的形式是采用人类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所描述的 "封闭的村庄"。在前现代时期，几乎每一个农民社会都有 "封闭的村庄" 作为其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

与更现代的经济组织形式不同的是，个人倾向于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与许多买家和卖家进行交易，而封闭式村庄的家庭联合起来，像一个非正式的公司或一个大家庭一样运作，不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而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村庄的所有经济交易倾向于与一个单一的垄断者--当地的地主，或他在村长中的代理人达成。整个村庄会与地主签订合同，通常是以实物形式支付高比例的庄稼，而不是固定的租金。按比例租金意味着地主吸收了歉收的部分负面风险。当然，地主也拿走了大部分的潜在利润。

房东通常也提供种子。

这一惯例也将饥饿的危险降到最低。它要求地主，而不是农民，从他的那部分收获中节省出不成比例的份额。

由于过去许多地区的农业产量低得惊人，每收割三粒种子就必须种下两粒种子。在这种情况下，收成不好就意味着大规模的饥饿。农民理性地倾向于一种要求地主为他们的生存投资的安排。以垄断价格购买、廉价销售和向地主提供实物劳动为代价，农民增加了他们的生存机会。类似的冲动

使封闭的乡村经济中的典型农民放弃了自由财产所有权的保障。通过将自己置于村长的摆布之下，一个农民家庭提高了从定期重新分配田地中获益的机会。村长经常会把最好的田地留给自己和他的宠儿。但这是农民必须忍受的风险，以便享受村里混乱的田地所有权提供的生存保险。在作物产量低得可怜的时候，相隔一百码的田地的生长条件不同，就会造成饥饿和生存之间的差异。农民们经常选择降低风险的安排，甚至以放弃任何增加繁荣的希望为代价。

一般来说，规避风险的行为在所有在生存边缘活动的群体中都很常见。在前现代社会，纯粹的生存挑战总是制约着穷人的行为。在《大清算》中探讨的这种风险规避的一个有趣的特点是，它减少了社会上允许个人采取的和平经济行为的范围。禁忌和社会约束限制了实验和创新行为，甚至以放弃对已确定的做事方式的潜在有利改进为明显的代价。"<sup>3</sup> 这是对实验增加结果的可变性这一事实的理性反映。

更大的变异性不仅意味着潜在的更大收益，而且对于那些处于生存边缘的人来说，更不祥的是潜在的破坏性损失。贫穷的农业社会的文化能量的很大一部分总是用于压制实验。这种压制，实际上是他们对保险政策的替代。如果他们有保险，或者有足够的储蓄来为他们的实验进行自我保险，就不需要如此强烈的社会禁忌来帮助确保生存。

文化不是品味的问题，而是适应特定环境的系统，在其他环境中可能被证明是不相关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

人类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我们所处的广泛的潜在壁龛需要行为的变化，这些变化太过复杂，不能由本能来决定。

因此，行为是由文化编程的。对于许多农业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文化为他们的生存进行了编程，但仅仅是在参与公开市场的奢侈品被保留给其他人的环境中生存。

个人能力和个人选择--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追求幸福"--被禁忌和社会限制所压制，这些禁忌和社会限制在穷人中一直是最强调的。这种限制只有在生产力有限的社会中才会被取代，而且非常困难。在农业生产力较高的地方，如古希腊，发生了小规模的政治革命。财产采取了更现代的形式。出现了 "Allod"，即自由产权的财产。

土地往往以固定费用出租，承租人吸收经济风险，以及在作物良好的情况下吸收更高的利润部分。较高的储蓄允许对风险较大的行为进行自我保险。在这种条件下，贵族农民可以超越农民的等级，有时甚至可以积累独立的财富。

随着社会摆脱贫困，更多类似市场的产权和关系在经济等级制度的顶端附近发展，或者在更少的情况下，在整个经济中发展，这种趋势是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历史上最常见的农业社会组织基本上是封建的，市场关系在顶层，封闭的村庄系统在底层。在几乎所有的前现代农业社会中，广大农民都被束缚在土地上。只要农业生产力仍然较低，或者较高的生产力取决于进入集中的水利系统，底层农民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仍然是最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封建形式的财



产普遍存在。土地是通过保有权而不是通过自由产权来持有的。通常情况下，出售、赠送和继承的权利受到限制。

各种形式的封建主义不仅是对无处不在的掠夺性暴力风险的一种回应。它也是对令人震惊的低生产率的一种反应。这两者在农业社会中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经常相互促进。当公共权力崩溃时，财产权和繁荣也会相应消退。崩溃的生产力也倾向于破坏权威。虽然不是每一次干旱或不利的气候变化都会导致公共权力的崩溃，但很多都是如此。

## 1000 年的封建革命

1000 年的变革就是如此，它启动了封建革命。<sup>14</sup> 当时，大政治和经济条件与我们所认为的中世纪的特点有很大不同。

在罗马灭亡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西欧的经济萎靡不振。在前罗马帝国领土上扎根的日耳曼王国承担了罗马国家的许多职能，但其水平要低得多。基础设施或多或少地被忽视了。几个世纪过去了，桥梁和水渠年久失修，变得无法使用。罗马硬币仍在使用，但它实际上已从流通中消失了。在罗马时代兴盛的土地市场或多或少地干涸了。作为罗马行政管理中心的城镇，几乎与国家的征税权一起消失了。几乎所有其他文明的附属品也是如此。

"黑暗时代"被如此命名是有原因的。识字率变得如此稀少，以至于任何拥有读写能力的人都可以期望对几乎所有的罪行免于起诉，包括谋杀。在罗马时代高度发展的艺术、科学和工程技能消失了。从道路

建设到葡萄和果树的嫁接，西欧停止使用许多曾经广为人知并达到高标准的技术。即使是像陶轮这样古老的设备也在许多地方消失了。采矿业萎缩了。冶金业退缩了。地中海地区的灌溉工程由于忽视而瓦解。15 正如历史学家乔治-杜比所指出的，"在六世纪末，欧洲是一个极不文明的地方"。16 尽管在 800 年左右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下，中央权力曾有过短暂的复兴，但在他死后，一切又很快陷入困境。

这种沉闷的景象的一个令人惊讶的推论是，罗马国家的崩溃可能提高了小农的生活水平达几个世纪之久。

在黑暗时代主宰西欧的日耳曼王国吸收了他们祖先部落常见的一些相对随和的社会特征，如自由民的法律平等。因此，黑暗时代的小农远比他们在封建世纪要自由得多。通过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他们更加繁荣。正如我们在上面探讨不同生产力条件下的财产形式逻辑时分析的那样，自由财产在历史上与小农的相对繁荣相伴而行。在小农谋生能力比较可疑的地方，往往会出现封闭的村庄和封建的财产形式。

可以肯定的是，黑暗时代商业的实际崩溃使小农失去了贸易的好处和更广泛市场的优势。城镇的消亡破坏了现金经济，但它也意味着农村人口不再被要求支持官僚机构的沉重负担。正如 Guy Bois 所写，罗马城镇是一个寄生社区，而不是一个生产中心。"在罗马时期，城市的主要功能是政治秩序。它主要是通过土地税的代理机构从其周围流入的收入而生存，.....。实际上，城市很少或根本没有为周围的农村生产任何东西"。17 罗马当局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使农村的农民摆脱了税收，税收

吸走了 "土地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还不算中小地主遭受的各种征收"。

17 罗马当局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使农村的农民摆脱了税收，税收 "吸走了土地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还没有算上中小地主的各种征收"。18 税收是如此繁重，有时是通过处决来执行的，以至于所有者遗弃财产的现象非常普遍。蛮族仁慈地允许这些税收失效。

### 农业沙漠之路 ( Agri Deserti

政府的负担因野蛮人的征服而大大减轻，从而为穷人获得自由财产和保持财产创造了机会。一些 agri deserti，即在罗马帝国最后几年因逃避掠夺性税收而被业主遗弃的荒废农场，被重新投入生产。尽管当时的环境恶劣，而且按现代标准，作物产量低得离谱，但黑暗时代对欧洲的小农来说是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事实上，他们的地位比他们在现代之前的地位还要高。首先，可用来耕种肥沃土地的人越来越少，大片土地已经不再耕种。瘟疫、战争和所有者的遗弃 53

由于当时的环境和作物产量按现代标准低得离谱，黑暗时代是欧洲小农户的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事实上，他们的地位比他们在现代之前的地位还要高。首先，可用来耕种肥沃土地的人越来越少，大片土地已经不再耕种。瘟疫、战争和逃离崩溃的罗马帝国的 53 位业主的遗弃，使以前耕种的地区人口大幅减少。小农户在黑暗时代享有的另一个优势是在六世纪采用了新的农业技术：通常安装在轮子上的重型犁。新技术与允许农民使用多头牛的改进型马

具一起使用，使得在北欧清除林地变得更加容易。19

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市场几乎收缩到消失的地步。仅仅通过开垦土地并与适当的地方当局分享每块新土地的一部分，就可以获得新的耕地。这个过程被称为 Assarting，在罗马灭亡后的几个世纪里为人口增长提供了一个舒适的出口。在 8 世纪气温升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之后，土地改革在人口稀少的北方地区变得特别有吸引力。

征服了前罗马领土的日耳曼部落的首领已将自己确立为大土地所有者。其余大多数人耕种小块土地，但其条件与后来的封建主义非常不同。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或主人约占人口的 7-10%。似乎在 1000 年之前，法国一个典型地区的三分之二的村民都是自由土地所有者。佃农（Coloni）不超过人口的 5%。奴隶制依然存在，但其规模比罗马时代小得多。

罗马的日耳曼继承王国在军事上由所有自由人保卫，他们在国王的地方代表--伯爵的号召下集合起来携带武器。

即使是 "中小业主 "也要联合起来，从他们中派一个人去和步兵作战。<sup>22</sup> 在《皮特尔敕令》中，查理-秃头下令所有有能力的人都要在马背上集结作战。教皇格雷戈里二世曾试图在一个世纪前推动这一军事需要，在 732 年禁止人类食用马肉。<sup>23</sup> 但自由人的步兵和骑兵之间在地位或法律上还没有什么区别。所有自由人都参加了当地的司法会议，并可以向伯爵提出解决争端的请求，这个职位从罗马时代后期就已经存在。不存在这样的贵族。

人口逐渐恢复，对土地的使用产生了更大的压力。

几个世纪以来，许多最肥沃的无主土地被投入生产，特别是在北欧的增长。相对于土地供应，农民人口的增加使得每个农民的劳动价值降低。大多数自由所有权通过继承被分解成越来越小的地块。在黑暗时代，孩子们倾向于平等地分享他们父母的财产。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再次导致土地溢价，并导致在 10 世纪中期重新出现活跃的土地市场。

在十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气温突然变冷，对农业产出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从 982 年到 984 年，连续三次作物歉收导致了严重的饥荒。在 994-95 年的另一次作物歉收后，饥荒再次袭来。然后，在 997 年，作物产量下降的问题因一场瘟疫而变得更加复杂，这场瘟疫对小规模的家庭财产造成了特别大的打击，因为小农户缺乏资源来替代失去的家庭成员所提供的劳动力。这些成群结队的作物歉收和灾难起初导致贵族农民陷入债务困境。当产量无法恢复时，他们就无法支付抵押贷款。

由于重装骑兵的重要性不断增加，权力关系逐渐变得不稳定。中世纪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吉斯描述了装甲骑兵向中世纪骑士的转变。

骑士最初是一个因其昂贵的马匹和盔甲而高于农民的平庸地位的人，慢慢地提高了他在社会中的地位，直到他成为贵族的一部分。尽管骑士仍然是上层阶级的最低等级，但骑士身份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荣誉，使骑士成为大贵族甚至皇室所珍视的一种

荣誉。这种魅力主要是教会将骑士身份基督教化的政策的产物，它使骑士的仪式神圣化，并赞助了一种被称为骑士精神的行为准则，这种准则也许被违反的次数多于被尊重的次数，但对后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无可争议的影响。26

正如我们在《大清算》中所叙述的那样，马镫的发明使马背上的武装骑士拥有了强大的攻击能力。他现在可以全速进攻，而且不会因为长矛击中目标的冲击力而被甩出马鞍。重型骑兵的军事价值因一项亚洲发明而得到进一步加强，这项发明在 10 世纪渗透到了西欧；钉铁马蹄铁。这进一步提高了马匹在道路上的耐用性。27 此外，使武装骑士的效率得到提高的，还有使其更容易挥舞重武器的轮廓马鞍、马刺以及使骑手在战斗时能够用一只手控制马匹的马鞍。28 这些明显的技术革新加在一起，极大地贬低了小农的军事重要性，因为他们无力维持战马和武装自己。专门为战争而饲养的马匹中比较便宜的是被称为 "destriers " 的大型冲锋马，价值四头牛或四十只羊。更昂贵的战马则需要 10 头牛或 100 只羊。盔甲的价格也是小户人家无法承受的，相当于 60 只羊的价格。

寒冷的天气、农作物歉收、饥荒和瘟疫发生在 1000 年之前，这一事实也对人们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许多人相信，世界末日或第二次降临就在眼前。虔诚的或受惊吓的大大小的土地所有者将他们的土地交给教会，为世界末日做准备。

"只有穷人才卖地"

十世纪末的不稳定状况为封建革命铺平了道路。成群的作物歉收和灾难导致贵族农民陷入债务。

当农作物产量未能恢复时，自由持有者面临着绝望的局面。市场总是把最大的压力放在最弱的持有人身上。事实上，这也是其优点的一部分。它们通过将资产从弱者手中移走来提高效率。但在十世纪末的欧洲，自给自足的农业几乎是唯一的职业。失去土地的家庭失去了他们唯一的生存手段。面对这种令人不快的前景，许多或大多数自由职业者决定在封建革命中放弃他们的田地。用 Guy Bois 的话说，"农民要想守住自己耕种的土地，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土地的所有权让给教会，这样他就可以保留土地的用益权。"<sup>30</sup> 其他人则将部分或全部土地割让给他们信任的富裕农民，他们或是友好的邻居或是亲戚。

这些财产转让的条件是，农民、他的家人和他的后代要继续在田间劳作。贫穷的农民还可以享受更多的持有人，即现在的 "贵族" 的相互支持，他们有能力购买马匹和盔甲，从而为扩大的庄园提供保护。从新农奴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交易可以看作是持续的经济所有权和取消赎回权之间的一个中途站。更多时候，这是一个他无法拒绝的交易。

生产力的下降不仅使贫穷的农民陷入了绝望的经济困境；它还激起了掠夺性暴力的激增，破坏了财产的安全。那些没有资源从现有的、不足的马匹和饲料供应中分一杯羹的人突然发现，他们和他们的财产不再安全。用当代的话来说，他们的困境就像今天你被迫用一种新型武器武装自己，但这样做的代价是 10 万美元。如果你不

能支付这个价格，你就会被那些能够支付的人所摆布。

在几年内，国王和法院执行秩序的能力就崩溃了。<sup>31</sup> 任何拥有盔甲和马匹的人现在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法律。

其结果是一个十世纪末的《银翼杀手》，一场战斗和掠夺的混战，宪政当局无力阻止。劫掠和武装骑士的攻击扰乱了乡村的秩序。然而，这并不明显，这种掠夺的所有受害者都是穷人。相反，大土地所有者中的老人、身体虚弱的人或准备不足的人成为更有吸引力的目标。他们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偷。

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它发生在天气变冷、饥荒和瘟疫对资源造成压力的时刻。有利于权力崩溃的大政治条件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

然而，它们改变社会权力关系的潜力，直到危机被触发时才被意识到。农作物歉收和饥荒似乎就是这样做的。虽然事件的确切顺序很难重建，但似乎抢劫是由绝望的条件所煽动的，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样。一旦暴力被释放出来，很明显没有人能够调动力量来阻止它。<sup>56</sup> 名武装薄弱的农民中的绝大多数人当然无能为力。即使是几十个步行的农民也会被一个骑马的武装骑士打败。自由保有的农民，就像宪法规定的当局，即国王与他们的伯爵一样，无力阻止当地土地被武装的战士夺取。

"上帝的和平"



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教会通过努力在暴力的农村谈判休战，帮助推出了封建主义。历史学家 Guy Bois 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政治当局无能为力，教会在被称为 "上帝的和平 "的运动中代替他们试图恢复秩序。"和平会议 "宣布了一系列禁令，这些禁令得到了圣谕的认可；庞大的 "和平大会 "接受了战士们的宣誓。这场运动起源于法国中部地区（989 年的夏尔鲁会议，990 年的纳邦会议），然后逐渐扩散....."32

教会达成的交易包括承认武装骑士在当地社区的霸主地位，以换取暴力和掠夺的停止或缓和。在 10 世纪末暴力事件激增之后，刻下的土地所有权突然出现了 "nobilis "或 "miles "的头衔，作为领主地位的标志。贵族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是由封建革命产生的。仅仅在几年前，记录在案的同一人的财产交易并没有列出这种区别。

鉴于生产力下降和小农的经济不安全，武装骑士的巨大政治力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封建使用权的财产占有。到 11 世纪第一季度末，贵族农民基本上已经消失了。他们的自由所有权已经缩减到以前的一小部分，现在只是在做兼职。小农或他们的后代是农奴，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封建领主（非宗教人士和教会人士）的庄园里劳动。

伴随着封建革命的秩序崩溃，导致了行为上的调整，加强了封建主义。其中包括城堡建设的热潮。城堡最早出现在欧洲西北部，是九世纪维京人袭击后的原始木结构。城堡最初是卡洛林王朝官员的指挥中心，封建革命后成为世袭财产。

这些早期的堡垒比后来的要原始得多，但它们还是很难被攻击。城堡一旦建立起来，就只能用最大的努力来铲除。随着它们开始遍布乡村，城堡使国王或他的伯爵能够有效地挑战当地领主的优势地位变得越来越不靠谱。

## 教会对生产力的贡献

封建主义是农业社会在生产力低下时对秩序崩溃的反应。在封建主义的早期阶段，教会在经济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教会的贡献中。1.

在一个军事力量分散的环境中，教会处于独特的地位，可以维护和平，制定超越分散的地方主权的秩序规则。这是一项任何世俗权力都无法胜任的工作。

伟大的宗教权威 A.R. Radcliffe-Brown 的意见在此直接相关。他指出，"一种宗教的社会功能与它的真假无关"。即使是那些 "荒谬和令人厌恶的宗教，如一些野蛮部落的宗教，也可能是社会机制的重要和有效的部分。"<sup>34</sup> 在封建主义的早期阶段，教会肯定是这种情况。它帮助制定了规则，只有宗教才能做到，使人们能够克服激励陷阱和行为困境。其中一些是所有人类生活中常见的道德困境。但也有一些是地方性的困境，在当时的大政治条件下是独一无二的。在 10 世纪的最后几年，中世纪教会在恢复农村秩序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通过向地方当局提供宗教和仪式上的支持，教会降低了建立至少是薄弱的地方暴力垄断的成本。通过以这种方式帮助建立秩序，教会为最终导致更稳定的权力配置创造了条件。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里，教会继续发挥着作用，缓和民间当局无法遏制的私人战争和过度暴力。教会相对于世俗当局的重要性体现在，到 11 世纪，西欧大部分地区的主要行政权力划分是教区，而不是从罗马时代到黑暗时代一直存在的旧的民事权力划分，即 ager 和 pagus（城镇）。

教会是保存和传播技术知识和信息的主要来源。教会赞助大学，提供中世纪社会所享有的最低限度的教育。教会还提供了一个复制书籍和手稿的机制，包括几乎所有关于农耕和畜牧业的当代信息。本笃会修道院的手稿可以被理解为印刷术的替代技术，当时还没有印刷术。

尽管剧本的成本高且效率低，但它们实际上是封建时期复制和保存书面知识的唯一机制。

部分原因是其农场经理是有文化的，教会在帮助提高欧洲农业的生产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封建主义的早期阶段。

在 13 世纪之前，非专业领主的农场经理几乎都是文盲，他们通过一套复杂的标记来保存记录。尽管他们可能是精明的农民，但他们无法从任何他们无法自己发明或亲眼看到的生产方式的改进中获益。因此，教会对于提高谷物、水果和种畜的质量至关重要。

由于其广泛的财产分布在欧洲大陆，教会可以将最有生产力的种子和种群送到产出落后的地区。

北欧对圣酒的需求导致僧侣们尝试使用能够在寒冷气候中生存的 58 种更耐寒的葡萄品种。教会还以其他方式帮助提高了中世纪农业的生产力。许多在封建革命期间捐给教会的不经济的小块土地被重新配置，使其更容易耕种。教会还提供小型农业社区所需的辅助服务。在许多地区，教会拥有的磨坊将谷物磨成面粉。

教会承担了许多今天被政府吸收的职能，包括提供公共基础设施。这是教会在一个权力分散的时代帮助克服经济学家所说的 "公共物品困境 "的部分方式。中世纪早期教会的特定宗教团体致力于应用工程任务，如开辟道路、重建倒塌的桥梁和修复破旧的罗马水渠。他们还开垦土地、建造水坝和排泄沼泽。一个新的修道会，即卡尔图斯会，在法国的阿图瓦挖出了第一口 "自流井"。

他们使用冲击钻，挖了一个足够深的小洞，创造了一个不需要水泵的水井。<sup>36</sup> 西斯托克教团在欧洲低地国家建造和维护危险的海堤和堤坝。农民将土地租给西多会的修道院，然后再租回来，而僧侣们则承担起维护和修理的全部责任。西多会还率先开发了以水为动力的机器，这些机器被广泛用于 "敲打、提升、研磨和压榨"<sup>37</sup>。克莱尔沃修道院从奥布河挖了一条两英里长的运河。主教们向那些修建或维修过河通道并为旅行者开设安养院的当地领主发放了赦免令。由圣贝内塞特建立的修士会，即 Freres Pontifes，或 "桥之兄弟"，建造了几座当时最长的桥梁，包括阿维尼翁桥，这是一座横跨罗纳河的巨大的 20 层结构，一端是小教堂和收费站的组合。甚至直到 19 世纪的伦敦桥，也是由一位牧师建造的，部分资金来自教皇遗嘱的 1000 马克捐款。

教会还帮助孵化了一个更复杂的市场。例如，大教堂的建造在种类上不同于公共基础设施，如桥梁和水渠。至少在原则上，教会建筑只用于宗教仪式，而不是作为商业的通道。然而，我们不应忘记，教堂和大教堂的建设有助于创造和深化许多工匠和工程技能的市场。就像冷战期间民族国家的军事开支无意中帮助孵化了互联网一样，中世纪大教堂的建设也导致了其他类型的衍生产品，即商业的孵化。教会是建筑行业 and 工匠的主要客户。教会购买用于圣餐仪式的银器、烛台和装饰教堂的艺术品，有助于创造一个奢侈品市场，否则就不会存在。

在许多方面，教会帮助缓和了武装骑士在"封建革命"期间和之后所释放的凶猛暴力。特别是在封建主义的早期几个世纪，教会为提高农业经济的生产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它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很适合黑暗时代结束时农业社会的需要。

## 易受暴力影响的程度

在"三四十年的暴力骚乱中，1000年的封建革命"，40像五个世纪前罗马的灭亡一样，是一个独特的事件，由复杂的影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然而在一个方面，mali ham ines（恶人）的胜利和他们造成的压迫完美地反映了农业社会对暴力的基本脆弱性。与人类生存的觅食阶段相比，农业在有组织的暴力和压迫方面有了质的飞跃。

从最早期开始，这就反映在农耕民族较为激进的文化中。早期农业社会的神是降雨和洪水之神，其功能反映了这些社会对决

定作物产量的因素的关注。雨水或水的发送者往往也是战争之神，最早的国王都会召唤战争之神，他们首先是军阀。<sup>41</sup> 农业和战争之间的密切联系反映在人们的宗教想象力中，他们的生活被农业革命的创新所改变。被逐出伊甸园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从觅食到耕作的转变，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从大自然的恩赐中获取食物的自由生活到艰苦的劳动生活的形象化描述。

## 失落的天堂

耕作使人类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第一批农民真正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从他们的劳作中产生了城市、军队、算术、天文学、地牢、葡萄酒和威士忌、文字、国王、奴隶制和战争。然而，尽管农耕为生活增添了许多戏剧性的内容，但从原始经济的转变似乎从最初就不受欢迎了。

见证了保存在《创世纪》中的记载，其中讲述了被驱逐出天堂的故事。圣经中关于伊甸园的比喻，是对荒野中的觅食者所享受的轻松生活的美好回忆。学者们指出，"伊甸园"这个词似乎来自苏美尔语中的"荒野"一词。

从自由而稀少的野外生活过渡到农耕村落的定居生活是一件令人深感遗憾的事情，这不仅表现在《圣经》中，也表现在人类对早晨起床和工作的持续怨恨中。正如斯蒂芬·博伊登在《生物学视角下的西方文明》中写道，伴随着农耕的新生活方式是"逃避"的。<sup>43</sup> 在农耕出现之前，成千上万的人类世代像亚当一样生活在伊甸园中，应造物主的邀请。"园中各样的树，你都可以随便吃"。猎人和采集者没有庄稼需要照料，没有牛群需要看管，没有税收需

要支付。像无业游民一样，觅食者在他们喜欢的地方漂流，很少工作，不对任何人负责。

随着农业的发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开始了，而且是在更加紧迫的条件下。

"荆棘和蒺藜也要给你生出来，你要吃六十地的草，你脸上流的汗也要吃饼。"耕种是艰苦的工作。人们对农耕之前的生活的记忆是失去的天堂。

农民创造了新的条件，极大地改变了暴力的逻辑，这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多。《创世记》将第一个杀人犯该隐称为 "耕地的人"，这不是一个巧合。事实上，《圣经》的故事被委托给牧羊人，这是《圣经》不可思议的预言能力的一部分，他们很容易理解耕作是如何给暴力提供杠杆的。在短短的几节经文中，《圣经》的叙述概括了几千年来的逻辑。耕作是争端的孵化器。耕作创造了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提高了暴力的回报率，大大增加了保护资产的挑战。耕作第一次使犯罪和政府都有了回报。

詹姆斯-戴尔-戴维森和威廉-里斯-莫格勋爵的 "主权个人"，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 1997 年版。

## 第四章 政治的最后日子

圣母教会的衰老衰落与保姆式国家之间的相似性 "我也相信--希望--政治和经济在未来将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当我们现在关于这些问题的大多数争论看起来像中世纪最敏锐的头脑耗费精力的神学辩论一样

微不足道或毫无意义的时候，时间就会到来。"亚瑟-C-克拉克

谈论政治即将消亡必然显得可笑或乐观，这取决于你的态度。然而，这正是信息革命可能带来的结果。对于在政治中成长起来的世纪的读者来说，没有政治的生活可以继续下去的想法可能看起来很虚幻，相当于声称一个人仅仅通过吸收空气中的营养就可以活下去。然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作为对控制国家权力并使之合理化的关注，主要是一种现代发明。我们相信，它将随着现代世界的到来而结束，就像中世纪人们所关注的封建责任和义务的纠葛随着中世纪的到来而结束一样。正如历史学家 Martin van Creveld 指出的那样，在封建时期，"政治并不存在（这个概念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只能追溯到 16 世纪）"。  
2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政治，在现代时期之前并不存在，这种想法似乎令人惊讶，特别是考虑到亚里士多德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就写过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但仔细看看。古代文本中使用的词语不一定是当代概念。亚里士多德也写过一篇题为《诡辩》的文章，这个词在今天就像《政治学》在中世纪一样毫无意义。这个词当时根本没有被使用。它第一次出现在英语中是在 1529 年。即使在那时，"政治"似乎也是一个贬义词，来自于一个旧法语单词 *politique*，用来描述 "机会主义者和临时工"4。

近两千年后，亚里士多德的潜在概念才出现了我们现在知道的含义。为什么呢？在现代世界能够将亚里士多德的词用于有意义的用途之前，需要有巨大的政治条件，这极大地提高了暴力的回报。我们在《伟大的 62》中分析过的火药革命。



清算，就是这样做的。它使暴力的回报率远远高于以往。这使得谁控制国家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从逻辑上讲，政治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控制急剧增加的权力战利品的斗争中。

政治在五个世纪前随着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开始。现在它正在消亡。对政治和政治家的广泛反感正在席卷全世界。

你在关于白水公司隐秘细节的新闻和猜测中看到了它，在文森特-福斯特被拙劣地掩盖的谋杀中看到了它。你在触及比尔-克林顿总统的众多其他丑闻中看到了它。你在其中看到了关于主要国会议员从众议院邮局挪用公款的报道。你在导致约翰-梅杰圈内人辞职的丑闻中看到了它，在法国也有类似的丑闻，涉及最近的两位总理爱德华-巴拉杜尔和阿兰-朱佩。意大利甚至出现了更大的丑闻，七届总理 Giulio Andreotti 被带到被告席上接受审判，罪名包括与黑手党的联系和下令谋杀调查记者 Mino Pecorelli。还有其他丑闻玷污了西班牙首相菲利普-冈萨雷斯的声誉。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前五年，腐败指控使四位日本首相失去了工作。加拿大司法部在给瑞士当局的信中指称，前总理布莱恩-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在向加拿大航空公司出售 18 亿加元的空中客车飞机时收受了回扣。5 北约秘书长威利-克莱斯（Willy Claes）在腐败指控的阴云下被迫辞职。甚至在瑞典，副首相和准首相 Mona Sahlin 也被迫辞职，因为她被指控使用政府信用卡购买尿布和其他家庭用品。几乎在任何地方，你

面对她用政府信用卡购买尿布和其他家庭用品的指控，她辞职了。在拥有成熟的福

利国家的国家中，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曾被认为是治理良好的国家，人们讨厌他们的政治领导人。

## 作为领先指标的不屑一顾

对腐败领导人的道德愤怒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变革的一个常见先兆。每当一个时代让位给另一个时代时，这种现象就会一再发生。每当技术变革使旧的形式脱离了新的经济运动力量，道德标准就会发生变化，人们就会开始越来越不屑于对待那些旧机构的指挥者。这种普遍的反感在人们形成一种新的、连贯的变革意识形态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在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人们对政治的明确拒绝。这将在以后出现。你们同时代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想到，没有政治的生活是可能的。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我们所拥有的是不明确的蔑视。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 15 世纪末，但当时正在缩减的是宗教而不是政治。尽管人们相信 "圣职的神圣性"，<sup>6</sup> 但高级和低级的神职人员都受到极大的蔑视，这与今天人们对政治家和官僚的态度不同。人们普遍认为，上层神职人员是腐败的、世俗的和腐败的。这并非没有道理。十五世纪的几位教皇<sup>63</sup> 公开拥有私生子。下层神职人员的地位甚至更低，他们在乡村和城市泛滥，乞讨施舍，并经常向任何愿意投入现金的人兜售上帝的恩典和罪孽的赦免。

在 "表面虔诚的外壳" 下，是一个腐败的、日益失灵的系统。早在有人敢于说它不起作用之前，许多人就对管理它的人失去了尊重。充满宗教的生活，不区分精神和世俗的生活，已经耗尽了它的可能性。早在

路德将他的 95 条论纲钉在维登堡的教堂门上之前，它的结局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 世俗的改革

我们认为，对饱和政治的反应也在遵循类似的路径。

苏联的死亡和对社会主义的否定是席卷世界的广泛的非政治化模式的一部分。这一点现在最明显地体现在人们对管理世界各国政府的人越来越蔑视。部分原因是人们认识到他们是腐败的，容易从政治困难中出售 "放纵"，以换取竞选捐款或在商品交易中的特殊帮助，从而为他们的个人财务提供资金。

对政治家的反应也是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花大价钱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徒劳的，就像在十五世纪末组织另一次忏悔者朝圣以在雪地上赤脚行进，或建立另一个修行僧团一样，对提高生产力或缓解生活水平的压力没有什么作用。

## 圣母教会的最后日子

在中世纪末，作为一个机构的铁板一块的教会已经变得衰老并产生了反作用，这与它在五个世纪前的积极经济贡献相比有明显的变化。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探讨的那样，教会在十世纪末在建立秩序和促进经济从黑暗时代结束时的无政府状态中恢复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当时，教会对于构成西欧大部分人口的大量小自由主和农奴的生存是不可或缺的。到了 15 世纪末，教会已经成为生产力的主要阻力。它强加给人们的负担使生活水平下降。

今天的民族国家也可以说是如此。它是对五个世纪前火药革命所创造的新的政治条件的必要适应。民族国家扩大了市场的范围，并取代了分散的地方当局，当时，更多的贸易区带来了巨大的回报。欧洲几乎所有地方的商人都自发地与中央的君主结盟，因为他要巩固权威，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早期形式的民族国家对商业是有利的。它有助于解除封建地主和地方豪强对商业的负担。

在一个暴力回报率高且不断上升的世界里，民族国家是一个有用的机构。但五个世纪后，随着这个千年的结束，大政治条件已经改变。暴力的回报率正在下降，而民族国家，就像中世纪末的教会一样，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东西，已经成为增长和生产力的阻力。

就像当时的教会一样，今天的民族国家已经用尽了它的可能性。它已经破产了，是一个成长到衰老的极端的机构。就像当年的教会一样，它作为社会组织的主导形式已经存在了五个世纪。在超越了使其存在的条件之后，它已经成熟，可以堕落了。而它也将倒下。技术正在催生一场行使权力的革命，它将摧毁民族国家，就像火药武器和印刷术摧毁中世纪教会的垄断一样肯定。

如果我们的推理是正确的，民族国家将被新的主权形式所取代，其中有些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有些让人想起前现代世界的城邦和中世纪的商业共和国。2000年之后，旧的东西将变成新的。难以想象的东西将成为普遍现象。随着技术规模的急剧下降，政府将发现他们必须像公司一样为收入而竞争，对他们的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不能超过他们对支付这些服务的人的价值。这种变化的全部影响都是无法想象的。

## 当时和现在

五百年前，在十五世纪之交，也可以说类似的话。当时和现在一样，西方文明站在了一个重大变革的门槛上。尽管几乎没有人知道，中世纪社会正在消亡。

它的死亡既没有被广泛预期，也没有被理解。然而，普遍的情绪是一种深深的忧郁。这在一个时代结束时是很常见的，因为传统的思想家感到事情正在崩溃，"猎鹰听不到猎鹰人的声音"。然而，他们的思维惯性往往太大，无法理解新出现的权力配置的含义。中世纪历史学家约翰-惠津加（Johan Huizinga）在谈到中世纪的衰落时写道："15 世纪的编年史家几乎都是对其时代的绝对误解的上当者，其中真正的运动力量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8

## 被背叛的神话

权力的基本动态的重大变化往往使传统思想家感到困惑，因为它们暴露了使旧秩序合理化但缺乏任何真正解释力的神话。在中世纪末，和现在一样，接受的神话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特别大的差距。正如 Huizinga 在谈到 15 世纪末的欧洲人时所说，"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被 65 骑士精神统治世界的虚构所渗透"。这在当代的假设中紧随其后，即由选票和人气竞赛来统治。这两个命题都经不起仔细的推敲。

事实上，认为历史的进程是由民主的愿望统计决定的想法，与中世纪认为历史是由

精心设计的礼仪规范（即骑士精神）决定的想法一样愚蠢。

这样说接近于异端邪说的事实表明，传统思维与对晚期工业社会中权力动态的现实把握有多大的差距。这是我们在本书中仔细研究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看来，投票是带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大政治条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大众民主和公民权的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而繁荣。它们将随着民族国家的衰落而衰落，在华盛顿引起的不安就像五百年前骑士精神在勃艮第公爵的宫廷里造成的侵蚀一样多。

## 骑士精神与公民身份的相似之处

如果你能理解骑士精神誓言的重要性是如何以及为什么随着社会向工业组织的过渡而逐渐消失的，你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公民身份是如何在信息时代逐渐消失的。两者都有类似的功能。它们在两套完全不同的大政治条件下促进了权力的行使。

封建誓言盛行的时候，防御性技术是最重要的，主权是分散的，私人和法人团体以自己的权利行使军事权力。在火药革命之前，战争通常是由小型武装人员组成的特遣队进行的。即使是最强大的君主也没有永久的军事力量，或常备军。他们从其附庸，即大领主那里获得军事支持，大领主又从其附庸，即小领主那里获得支持，小领主又从其附庸，即骑士那里获得支持。整个效忠链沿着等级制度向下延伸，直到

最卑微的社会地位的人被认为有资格携带武器。

统一性还是差异性？

与现代军队不同，公民权兴起之前的中世纪军队在战场上并没有穿上军装。相反，每个家臣或附庸，每个骑士、男爵或不同程度的领主都有自己独特的制服，反映了他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与其说是制服，不如说是强调了社会的垂直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个职位都是不同的。正如 Huizinga 所说，中世纪的战士是通过 "外在的标志..... "来区分的。

战争也不仅仅是由政府或国家进行的。正如马丁-范-克里夫德所指出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等战略家所塑造的现代战争概念，歪曲了前现代冲突的现实。范克里夫德写道：66

在罗马灭亡后的一千年里，不同类型的社会实体都发动了武装冲突。其中有野蛮人部落、教会、各种等级的封建男爵、自由城市，甚至私人。这一时期的 "军队 "也不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些军队；事实上，很难找到一个词来形容它们。战争是由一群身穿军装、跟随领主的家臣发动的。

11

在这种情况下，对领主来说，他的家臣真正 "穿上军装，跟在后面 "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骑士精神的誓言受到了高度重视。

中世纪骑士的荣誉和应征士兵的义务具有平行的功能。中世纪的人被对个人和教会

的誓言所约束，就像现代人被对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所约束一样。违反誓言就相当于中世纪的叛国罪。中世纪晚期的人们为了避免违反誓言而走极端，就像现代的数百万公民在世界大战中走极端一样，为了履行公民的义务而冲进机枪窝。

骑士精神和公民意识为简单的计算增加了一个维度，否则，未受教育的人就会被阻止上战场，并在情况恶劣时留在那里。骑士精神和公民意识都引导人们去杀人，去冒死。只有被领导机构大力强化的苛刻而夸张的价值观才能发挥这种功能。

## 规避成本-效益分析

任何制度的成功和生存都取决于其在冲突和危机时期调动军事力量的能力。显然，中世纪的骑士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壕里的士兵决定在战斗中冒生命危险，不可能是经过冷静的成本效益计算的。很少有战争是那么容易打的，也很少有那些首当其冲的人的回报远远超过了可能的成本，以至于可以招募一支经济优化人员的军队赶赴战场。几乎每一场战争，事实上，大多数战斗都有可能在瞬间扭转局势。

研究军事历史的学生都很清楚，失败和胜利之间的区别往往是由个别士兵执行任务时的英勇、勇敢和凶猛来决定的。如果打仗的人不愿意为一块一旦停止战斗就一文不值的土地而牺牲，那么他们很可能无法战胜势均力敌的敌人。

这具有重要的意义。主权国家在限制叛逃和鼓励军事努力方面越是有效，就越有可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



在战争中，最有用的价值体系会诱导人们采取短期理性计算所不允许的行为方式。如果被派往战场的人能够自由地计算自己的最佳优势在哪里，并相应地加入战斗或逃跑，那么任何组织都无法有效地调动军事力量。如果是这样，他们几乎就不会战斗。只有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或者在最绝望的情况下，理性的人才会根据短期的成本效益分析来参与一场可能致命的战斗。也许经济人可能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战斗，那时他一方的力量是压倒性的，敌人是弱小的，而战斗的潜在回报是诱人的。也许吧。如果被掠夺性的食人族逼到墙角，他也可能战斗。

但这些都是极端情况。那么，更常见的战争情况呢？这些情况既没有吸引力，无法通过成本效益分析的审查，也没有绝望，没有出路。正是在这里，像骑士精神和公民意识这样的概念是成功使用军事力量的重要促成因素。早在战斗开始之前，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必须说服个人，坚持对领主或民族国家的某些义务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社会为鼓励在战场上冒险而采用的神话和合理化，是其军事力量的一个关键部分。

为了有效，这些神话必须根据当时的大政治条件进行调整。骑士精神统治世界的虚构在今天毫无意义，尤其是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但它是封建主义所珍视的神话。它证明了义务关系的合理性，这种关系将每个人都束缚在教会和好战贵族的统治之下。在一个贪婪的私人战争司空见惯的时代，权力的行使和个人的生存取决于其他人是否愿意在胁迫的条件下履行他们的兵役承诺。显然，这些承诺是可靠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 国籍之前

与今天不同的是，在中世纪，国籍的概念在确立主权方面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君主，以及一些教会的王子和有权势的领主，通过私人权利拥有领土。以一种现代无法比拟的方式，这些领主可以通过转让或婚姻以及征服的方式出售或赠送领土或获得新的领土。今天，你很难想象美国会因为一位不讲英语的葡萄牙总统碰巧娶了美国前总统的女儿而落入他的主权范围。然而，类似的事情在中世纪的欧洲是很常见的。权力通过世袭血统传递。城市和国家像古董更换主人那样更换主权者。

在许多情况下，君主并不是其财产所在地区的本地人。

有时他们不会说当地的语言，或者说得很差，口音很重。

但是，无论西班牙人是雅典的国王，还是奥地利人是西班牙的国王，对个人义务的联系都没有什么区别。

## 企业主权

主权也由圣殿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等宗教团体行使。这些混合机构在现代没有对应的机构。他们将宗教、社会、司法和金融活动与对地方的主权结合起来。<sup>3</sup> 虽然他们行使领土管辖权，但他们几乎与今天的 "国家 "相反。

他们没有现代的对应用。他们将宗教、社会、司法和金融活动与对地方的主权结合

起来。"3 虽然他们行使领土管辖权，但他们几乎与今天的政府相反，因为国籍在动员他们的支持或他们的治理计划中没有发挥作用。这些宗教团体的成员和官员来自基督教欧洲的所有地区，或被称为 "基督教世界"。

没有人认为统治者从当地人口中抽调是适当的或必要的。在支离破碎的中世纪治理方案中，动员支持并不像现代那样取决于民族身份或对国家的责任，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忠诚和习惯联系，这些都是必须作为个人荣誉来维护的问题。这些誓言可以由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宣誓，只要他在生活中的地位被认为是值得的。

## 誓言

骑士精神的誓言将人与人之间联系在一起，并且是以当事人的荣誉而宣誓的。正如惠钦加所写的那样，"在立下誓言时，人们会对自己施加一些困难，作为对完成他们所承诺的行动的一种刺激"。人们如此重视遵守誓言，以至于人们经常冒着死亡的危险或遭受严重的后果，以避免违背他们的誓言。通常情况下，誓言本身将个人作为荣誉事项进行约束，而这些行为在你和本书的大多数读者看来可能是可笑的。

例如，星辰骑士团发过誓，"从战场上退下来的面积不超过四英亩，不久之后，他们中的九十多人因这项规定而丧生"。15 作为一项军事战略，禁止甚至是战术性的撤退是不合理的。但这是骑士精神誓言的一个共同要求。在阿金库尔战役之前，英国国王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巡逻的骑士们脱掉盔甲，理由是如果他们穿着大衣盔甲，从敌方阵地撤退是不符合荣誉的。碰

巧，国王本人迷路了，经过了军队先锋队的夜宿村庄。由于他穿着盔甲，他的骑士荣誉感禁止他在发现自己的错误时转身返回村庄。他在一个暴露的位置上过了一夜。

虽然这个例子看起来很傻，但亨利国王可能没有计算错误，他认为自己通过撤退侵犯了自己的荣誉，从而为整个军队树立了一个打击士气的榜样，这比他在敌后睡觉的风险更大。

中世纪的历史充满了杰出人士履行承诺的例子，这些承诺在我们看来是荒谬的。在许多情况下，所提出的行动与任何利益没有任何客观联系，只是生动地展示了承诺者对誓言本身的重视。常见的誓言包括：闭上一只眼睛，只在站立时吃喝，以及通过加入一个人的链子团伙而成为一个自残的人。当时有一个普遍的习俗，即 69 人戴着痛苦脚镣。如果今天你看到有人戴着沉重的脚镣在街上挣扎，你可能会认为他疯了，而不是认为他是一个有伟大品德的人。然而，在骑士精神的背景下，心甘情愿地戴上这种装置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还有许多类似的习俗，在今天看来也同样可笑。正如 Huizinga 所描述的那样，许多人发誓 "周六不睡床，周五不吃动物食物，等等。一个禁欲主义的行为堆积在另一个禁欲主义的行为上：一个贵族承诺不穿盔甲，每周有一天不喝酒，不睡床，不坐着吃饭，穿毛衣"。16

大斋节作为这种自我限制的不适的一个温和版本而存在。

许多热衷于誓言的人组成了一些骑士团，对他们的成员施加特别困难的限制，作为

对荣誉的考验。例如，Clalois 和 Galoises 骑士团在夏季穿着 "毛皮和毛皮衬里的头巾，并在壁炉中点火，而在冬季，他们只被允许穿一件没有毛皮的简单外套；既不穿斗篷，也不戴帽子和手套，只有非常轻的床上用品。"正如 Huizinga 所报告的那样，"大量成员死于寒冷并不令人惊讶"。

"中世纪的自我鞭答是一种严酷的折磨，人们对自己施加这种折磨，希望能促使审判和惩罚的上帝收起他的棍子，宽恕他们的罪过，使他们免受更大的惩罚，否则他们在今世和来世将受到更大的惩罚。"诺曼

ÄÄÄ

鞭刑，过去和现在

从强加危险和匮乏的誓言到磨难、朝圣、折磨、不适，甚至是故意自残，这只是短短的一步。在中世纪时期，这些都可以被看作是非常有益和值得赞扬的。它们是宣誓时的严肃姿态，这种逻辑即使在今天对兄弟会或联谊会的入会仪式也不完全陌生。

夏天闷热，冬天冰冷，或者在雪地里赤脚朝圣，与自我鞭答的 "严酷折磨 "相比，这些都是相对温和的。这是一种特别的中世纪忏悔形式，几乎正好是在封建主义开始的同时出现的。它最早是 "在十一世纪初被卡马尔多利和丰特阿维拉纳修道院的隐士们采用"。

鞭答者并不只是在寒冷的天气里赤脚行走，而是组织游行，日夜不停地从一个城镇游行到另一个城镇。"每当他们来到一个城

镇，就会在教堂前成群结队，连续鞭打自己几个小时。

我们相信，未来的人们在回顾民族国家的时代时，会发现二十世纪以公民身份的名义所做的一些事业，就像我们认为是自我鞭挞一样可笑。从信息社会的角度来看，现代时期的士兵为了忠于民族国家而绕过半个地球去迎接死亡的场面将被视为怪诞和愚蠢的。这似乎与封建时期一些非同寻常和夸张的骑士精神仪式相差无几，比如戴着脚镣走来走去，否则理智的人以做这些事情为荣。

## 骑士精神屈服于公民身份

骑士精神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公民身份，当时大政治条件发生了变化，向领主宣誓的军事目的已经过时了。在火药武器和工业化军队的世界里，打仗的人和他们的指挥官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同。公民权的出现是在暴力的回报率很高且不断上升的时候，而且国家拥有比中世纪时期发动战争的社会实体更多的资源。由于其强大的力量和财富，民族国家可以直接与身着其制服作战的广大普通士兵进行讨价还价。

事实证明，这种讨价还价对国家来说要便宜得多，而且比试图通过与有权势的领主和地方名流谈判来集结军队要省事得多，因为每个人都有能力抵制违背其利益的要求，而民族国家的个别公民是无法想象的。

由于我们稍后深入探讨的原因，公民权关键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任何个人或小团体在政治上有能力独立行使军事权力。随着信息技术改变了战斗的逻辑，它将使

公民权的神话过时，就像火药使中世纪的骑士精神过时一样肯定。

## 马背上的地狱天使

主宰西欧数个世纪的骑兵贵族很难像他们的后代那样成为绅士。他们是粗暴和暴力的。用今天的话说，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他们相当于中世纪的摩托车帮派。

骑士精神的礼仪规则和伪装更多的是用来约束他们的过度行为，而不是描述他们真正的行为方式。即使是对骑士精神的规则和义务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描述，也不会揭示出贵族权力的基础。

## 完美是疲惫的代名词

十五世纪末，有效的火药武器的出现在他们的脚下引爆了一股强大的爆炸力--正如武装骑士们前所未有地完善了他们的艺术。那时，精心培育的战马终于有了 16 只手的高度，这匹骏马的身材可以舒适地驮着一个身穿全副盔甲的骑士。然而，正如诺斯科特-帕金森（C. Northcote Parkinson）精明地指出的那样，"只有处于崩溃边缘的机构才能实现完美。"21 就在新战马得到完善的同时，新武器也被部署到战场上，将战马和骑士轰走。这些新的火药武器可以由普通人发射。它们的使用不需要什么技巧，但采购数量却很昂贵。与作为封建经济基础的农业相比，这些武器的扩散稳定地提高了商业的重要性。

## 更大规模的战争

火药武器是如何促成这种转变的？首先，它们提高了战斗的规模，这意味着发动战争的代价很快就比中世纪时期要大得多。在火药革命之前，战争通常是由很小的团体进行的，以至于他们可以在一个小而贫穷的领土上征收。火药为更大规模的战斗提供了新的优势。在新的条件下，只有那些对富有的臣民有要求的领导人才有能力派出有效的部队。那些最能适应商业发展的领导人，通常是那些与城市商人结盟的君主，发现他们在战场上享有竞争优势。用范克里夫德的话说，"部分归功于他们掌握的优越的财政资源，他们可以比别人购买更多的大炮，把对手炸成碎片。"22

尽管火药武器的全部逻辑在法国大革命的公民军队中释放出来还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但火药对战争的改造的早期暗示是文艺复兴时期对军服的采用。军装恰当地象征了战士和民族国家之间的新关系，这种关系与从骑士精神到公民身份的转变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新的民族国家将与它的公民达成 "统一 "的交易，而不像封建主义下君主或教皇与一长串诸侯达成的特殊、不同的交易。在旧制度下，每个人在建筑等级制度中都有一个不同的位置。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交易，就像他的纹章和他悬挂的彩色旗帜一样。

降低财富的机会成本 火药武器以另一种方式彻底改变了社会的性质。

他们将权力的行使与体力分开，从而降低了商业活动的机会成本。富裕的商人不再需要依靠自己的技巧和力量来进行徒手搏斗，或者依靠忠诚度不确定的雇佣兵来保护自己。他们可以希望得到大君主的新的、更大的军队的保护。正如威廉-普莱菲尔（William Playfair）在谈到中世纪时所说：



"虽然人力是一种力量，但在敌对的情况下，人们会被激怒，……。[当时，长期富裕和强大是不可能的"。23 当火药出现后，不可能不富裕就有力量。

## 状态和静态理解

与今天大多数人没有准备好预测信息社会的新动态一样，中世纪社会的主要思想家们也无法预测或理解商业的兴起，而商业在塑造现代社会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五个世纪前的大多数人都以静态的眼光看待他们不断变化的社会。正如 Huizinga 所说："在现代意义上，很少有财产是流动的，而权力还不是主要与金钱联系在一起的；它仍然是与生俱来的，取决于他所激发的某种宗教敬畏；它通过华丽的外表或无数忠实的追随者来体现。封建或等级制度的思想通过可见的标志来表达宏伟的理念。"24 由于中世纪晚期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地位，他们没有准备好理解商人可能对王国的生活做出任何重要的贡献。几乎毫无例外，商人都是平民。他们处于三种财产的底层，低于贵族和神职人员。

即使是中世纪晚期社会更有洞察力的思想家，也没有认识到商业和农业以外的其他形式的企业对于积累财富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贫穷是一种使徒式的美德。他们对富有的银行家和乞丐不加区分。用 Huizinga 的话说，"在第三产业中，原则上没有富人和穷人的区别，也没有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的区别。

这种对生活的经济层面的盲目性被教会人士所强化，他们是中世纪生活的意识形态守护者。他们对商业的重要性知之甚少，以至于一个广受赞誉的 15 世纪改革方案

提出，要求所有非贵族身份的人都要专门从事手工业或农场劳动。没有考虑到商业的任何作用。26

"1492 年这一日期被习惯性地用来区分中世纪和现代历史，它和其他任何分界点一样，因为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哥伦布的航行象征着西欧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新关系的开始"27。

Frederic C. Lane

## 工业时代的诞生

十五世纪许多最敏锐的头脑完全忽略了历史上一个更重要的发展，一个在他们眼中开始的发展。封建主义的消亡标志着西方主导地位的伟大现代阶段的开始。这是一个暴力回报率上升和企业规模扩大的时期。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里，现代经济为世界上享受其最大利益的那部分人带来了生活水平的空前提高。这些变化的催化剂是新技术，从火药武器到印刷术，它们以很少有人能够掌握的方式改变了生活的界限。

到了 15 世纪的最后十年，像哥伦布这样的探险家刚刚开始打开通往广大未知大陆的通道。在人类存在的漫长岁月中，第一次囊括了整个世界。大帆船是在地中海大帆船基础上的新的高桅帆船，它环绕地球，绘制了成为贸易路线以及疾病和征服的通道。征服者们在海上和岸上挥舞着他们新的青铜大炮，开辟了新的视野。他们发现了黄金和香料的财富，播下了从烟草到土豆的新经济作物的种子，并为他们的牛群划出了新的牧场。

## 第一个工业技术

正如大炮开辟了新的经济领域一样，印刷术也开辟了新的知识领域。它是第一台大规模生产的机器，是标志着工业主义开始的标志性技术。说到这里，我们赞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观点，即工业革命早在他写作之前就已经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它还没有达到成熟阶段，但大规模生产和工厂系统的原则已经确立。他所举的著名的大头针制造商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史密斯解释了如何采用十八个独立的操作来生产销子。由于专门的技术和劳动分工，每个员工在一天内可以制造4800倍于一个人所能制造的大头针。

斯密的例子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业革命的开始比历史学家传统上认为的早几个世纪。大多数教科书将其起源于18世纪中期。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起飞阶段的日期，这并不是不合理的。但是，封建主义和工业主义之间的实际大政治过渡开始得更早，在15世纪末。它的影响几乎立即体现在主导机构的转变上，特别是中世纪教会的消亡。

那些把工业革命放在后面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是在衡量另一件事，即由发动机驱动的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飞跃。这提高了非熟练劳动力的价值，导致各种消费品的价格下降。事实上，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在不同时期开始急剧上升，这一事实提示我们，正在衡量的不是大政治转型，而是其他东西。《剑桥欧洲经济史》以复数形式谈到了“工业革命”，明确地将其与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联系起来。<sup>29</sup>在日本和俄国，这种收入激增被推迟到19世纪末。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一些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是 20 世纪的现象。在非洲的一些地区，持续增长至今仍是一个梦想。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没有生活在现代。

## 转型期的收入下降

收入的增长并不等同于工业主义的出现。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事件，不能直接用收入统计来衡量。事实上，大多数欧洲人的实际收入在工业时代的前两个世纪都在下降。他们只是在 18 世纪初的某个时候才开始上升，直到 1750 年左右才恢复到 1250 年的水平。我们把工业时代的启动时间放在 15 世纪末。正是早期现代技术的工业特征，包括以化学为动力的武器和印刷机，促使了封建主义的崩溃。

## 降低知识的成本

大规模生产书籍的能力对中世纪的体制具有难以置信的颠覆性，就像微观技术将被证明对现代民族国家具有颠覆性一样。

印刷术迅速破坏了教会对上帝之言的垄断，甚至为异端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与封闭的封建社会相抵触的思想迅速传播，到 15 世纪的最后十年，共出版了 1000 万本书。

由于教会试图压制印刷业，大多数新书都是在欧洲那些既定权威的法令最薄弱的地区出版的。这可能被证明是与今天美国政府试图压制加密技术的做法相类似的。教会发现，审查制度并没有抑制颠覆性技术的传播；它只是确保它被用于最具颠覆性的用途。

## 寺院贬值

印刷机的许多明显无害的用途因其内容而具有颠覆性。仅仅是传播关于无畏的冒险家和商人可以赚取的财富的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溶剂，可以溶解封建义务的束缚。新市场的诱惑，以及大规模资助军队和海军的需要和机会，使货币具有了在封建时代所缺乏的价值。这些新的投资渠道，再加上提高暴力回报率的强大武器，使得内陆的领主或城市的商人向教会捐献资本的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在土地所有权之外创造的投资机会本身就破坏了封建制度的稳定，削弱了其意识形态。

印刷机的另一个颠覆性后果是它极大地降低了复制信息的成本。在中世纪，识字率和经济进步如此之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手工复制手稿的成本太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罗马沦陷后，教会承担的主要生产职能之一就是在本笃会的修道院里复制书籍和手稿。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作。印刷术带来的一个戏剧性后果是贬值，修士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劳作，制作手稿，而这些手稿可以在数小时内由印刷机复制。新技术使本笃会的手稿室成为过时的、昂贵的知识复制手段。这反过来又使维持抄写员的宗教团体和教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降低。

书籍的大规模生产结束了教会对圣经以及其他形式的信息的垄断。书籍的广泛供应降低了识字成本，从而使有能力就重要课题，特别是神学课题提出自己意见的思想家数量成倍增加。正如神学历史学家尤安-卡梅伦（Euan Cameron）所说，16世纪前20年的“一系列出版里程碑”为“现代文本批评在经文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30 这 "威胁到了 "教会的 "垄断地位"，因为它对被用来支持传统教条的文本的腐败解读提出了质疑。"31 这种新知识鼓励了竞争性的新教教派的出现，他们试图对圣经做出自己的解释。书籍的大量生产降低了异端的成本，并使异端有了大量的读者。

出版也有助于摧毁中世纪的世界观。信息的更大可得性和更低的成本导致了对由象征主义而非因果关系联系起来的世界观的转变。"象征主义的世界形象是以无懈可击的秩序、建筑结构、等级从属关系为特征的。因为每一种象征性的联系都意味着等级或神圣性的不同。...核桃象征着基督；甜美的内核是他的神性，绿色和多浆的外皮是他的人性，中间的木壳是十字架。因此，所有的东西都将思想提升到永恒..... "32

符号化的思维模式不仅是对社会等级结构的补充；它也适合文盲。由木刻的符号所传达的思想可以为文盲所接受。相比之下，现代印刷术的出现导致了因果关系的发展，采用了科学的方法，为识字的人口所接受。

## 今天的平行

中世纪社会在 15 世纪中叶似乎是如此稳定和安全的信仰，但很快就被改变了。其主要机构，即教会，看到它的垄断受到挑战并被打破。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不受质疑的权力突然出现了争议。比今天任何公民对一个民族国家的约束更神圣的信仰和忠诚，在短短几年内被重新考虑和放弃，这一切都是因为 15 世纪最后十年出现的一场技术革命。

我们相信，像五百年前那样巨大的变化将再次发生。信息革命将摧毁民族国家的权力垄断，就像火药革命摧毁教会的垄断一样肯定。十五世纪末的情况与今天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时的生活已经完全被有组织的宗教所淹没，而今天的世界已经被政治所淹没。当时的教会和今天的民族国家都是机构发展到衰老的极端的例子。和中世纪晚期的教会一样，20 世纪末的民族国家也是一个负债累累的机构，再也无法支付自己的生活。它的运作越来越不相关，甚至对那些不久前还可能是它最坚定的支持者的繁荣起到了反作用。

"穷困潦倒、贪得无厌、挥霍无度"

就像今天的政府为其收取的钱财提供了很差的价值一样，15 世纪末的教会也是如此。正如教会历史学家尤安-卡梅伦（Euan Cameron）所说："一个贫穷的地方牧师似乎为它所要求的钱提供了糟糕的服务；所征收的大部分钱实际上'消失'在封闭的修道院或高等教育或管理的神秘领域中。尽管教会的某些部门得到了大量的馈赠，但整个机构却同时显得贫穷、贪婪和奢侈。"<sup>33</sup> 很难否认与二十世纪末的政府有相似之处。

十五世纪末的宗教仪式就像今天福利国家的项目一样不断增加。不仅是特殊的祝福，以及圣人和圣人骨头的供应无止境地增加，而且每年都有更多的教堂、更多的修道院、更多的修会、更多的忏悔者（常驻家庭牧师）、更多的传教士、更多的大教堂分会、更多的捐赠圣堂、更多的遗物崇拜、更多的宗教联合团体、更多的宗教节日和新的圣日。仪式越来越长。祈祷和赞美诗变得更加复杂。一个又一个新的修行者出现，

乞求施舍。其结果是制度上的超载，类似于今天严重政治化的社会的特点。

宗教节日和节庆日在各方面激增。宗教仪式越来越多，为纪念马利亚、她的姐妹和耶稣家谱中的所有圣人而举行的特别节日。<sup>34</sup> 对信徒来说，履行宗教义务的成本和负担越来越重，就像今天留在法律范围内的成本越来越高一样。

## 无辜者付费

当时和现在一样，生产者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收入再分配的负担。

由于资本使用的转变，这些成本的上升比任何有权力的人所认识到的都要急剧。与货币资本相比，持有土地的相对优势正在下降。然而，中世纪的人们仍然在思考一个有地位的社会，社会地位是由你的身份决定的，而不是由你有效部署资本的技能决定的。人们很少或根本没有考虑到举行夸张的宗教仪式的机会成本上升的问题。这些成本最严重地落在了更有野心、更勤劳的农民、市镇居民和贵族农民身上，他们比贵族更依赖有效地部署他们的资本。

他们不得不承担在 77 个无休止的节庆和圣日（假日）上布置餐桌的不成比例的费用，以及支付支持一个奢侈的教会官僚机构。

## 适得其反的监管

在 15 世纪末，教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后来由政府承担的监管权力。教会主导着



重要的法律领域，记录契约、登记婚姻、遗嘱认证、许可贸易、土地所有权，以及规定商业条款和条件。教会法对生活细节的规范几乎和今天的官僚机构一样彻底，而且目的也大致相同。正如今天的政治法规变得充满了混乱和矛盾，500年前的教会法也是如此。这些法规经常压制商业并使其复杂化，这表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离监管者的想法很远。

例如，在一整年中，无论最近的12月28日是哪一天，都禁止在这一天做生意。因此，如果是星期二，就不能在星期二进行合法的商业活动，这是为了纪念"屠杀无辜者"而必须表达的虔诚。在12月28日落在周日以外的任何一天的年份，这一禁令阻碍了许多类型的商业潜力，通过延迟交易或完全阻止交易来增加成本。

## 垄断定价

教规法也被强加于人，以加强垄断价格。教会通过销售从其在意大利托尔法的财产中开采的明矾获得了大量收入。

当纺织业的一些客户表现出对从土耳其进口的廉价明矾的偏好时，梵蒂冈试图通过教规法维持其垄断定价，宣布使用成本较低的明矾是有罪的。坚持购买便宜的土耳其产品的商人被逐出教会。著名的禁止在星期五吃肉的禁令也是源于这种精神。教会不仅是最大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它还拥有主要的渔业。教父们发现虔诚的教徒有吃鱼的神学需要，这在当时交通和卫生条件不鼓励吃鱼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对其产品的需求。

就像今天的民族国家一样，中世纪晚期的教会不仅对特定行业进行监管，以直接支持其自身的利益；它还充分利用其监管权力，以其他方式为自己争取收入。教士们不厌其烦地颁布难以遵守的法规和法令。例如，乱伦的定义非常广泛，因此，即使是远房表亲和只有婚姻关系的人也需要教会的特别许可才能结婚。由于在现代旅行时代之前，这几乎包括了许多欧洲小村庄的每个人，为乱伦婚姻出售豁免书成为教会收入的一个繁荣来源。即使是婚姻中的性行为本身也被教会的规定严格限制。夫妻之间的性关系在周日、周三和周五是非法的，在复活节和圣诞节前的 40 天内也是如此。此外，夫妻在接受圣餐前三天要禁欲。换句话说，已婚夫妇在一年中至少有 55% 的日子里被禁止享受性生活，而没有得到放纵。在《主教的妓院》一书中，历史学家 E.J.Burford 认为这些 "白痴 "的做法是对的。

在复活节和圣诞节前的四十天内。此外，夫妻在接受圣餐前三天要禁欲。换句话说，已婚夫妇在一年中至少有 55% 的日子里被禁止享受性生活而不被放纵。在《主教的妓院》中，历史学家 E.J.Burford 提出，这些 "愚蠢的 "婚姻规定帮助刺激了中世纪卖淫业的发展，而教会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此外，教会从卖淫中获取暴利绝不仅仅是英国本地的事情。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约 1471 年）据称从他的众多情妇中的一个染上了梅毒，成为第一位向妓女发放许可证并对其收入征税的教皇，大大增加了教皇的收入。

在他的众多情妇中的一个，成为第一个向妓女发放许可证并对她们的收入征税的教皇，在这个过程中大大增加了教皇的收入。

事实上，罗马教廷通过这种税收和出售许可证的方式为圣彼得教堂的建设提供了部分资金。他的继任者，教皇利奥十世，据说通过出售许可证赚取了大约 2.2 万金币，是他在德国出售赎罪券所得的四倍。

即使是对牧师实行的著名的独身主义规则，也是中世纪教会的一个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正如伯福德报告的那样，教会对 "同居的牧师 "征收 "被称为 cullagium 的费用"。37 这被证明是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法国和德国的主教对所有牧师统一征收，尽管拉特兰会议在 1215 年谴责了 "这种可耻的交易，这些主教经常出售犯罪许可"。38 这只是出售违反教规和法规的许可证的许多有利可图的市场之一，这种交易的动机与促使贪婪的政治家寻求对商业的任意监管权的逻辑相同。

## 放纵

任意监管的权力也是出售豁免这种监管可能造成的伤害的权力。教会出售许可证，或称 "赦免令"，授权从减轻商业上的琐碎负担到允许在大斋期吃乳制品等一切。这些 "宽恕令 "不仅以高价出售给贵族和富有的乡民。它们还被包装成彩票的奖品，就像今天政府经营的彩票一样，以吸引穷人的钱财。39 随着教会的支出超过收入，纵容的交易也在增加。这使许多人推断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制度化的教会正在利用其权力来提高收入。正如一位当代批评家所说："制定教会法完全是为了赚大钱；任何想成为基督徒的人都必须购买其规定。"40

## 官僚主义的超负荷工作

在 15 世纪末，支持制度化宗教的成本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极端，就像今天支持政府的成本已经达到了一个衰老的极端。生活中的宗教越是饱和，教会就越是昂贵和官僚化。用卡梅伦的话说，"在中世纪末，要找到人填补大量增加的教会职位，比找到钱来支付这些职位要容易得多。"41 正如今天破产的政府以适得其反的方式搜刮收入，五百年前的教会也是如此。事实上，教会人士使用的一些掠夺性伎俩与今天政客们掌握的相同。

五百年前的中世纪教会，就像今天的民族国家一样，消耗了比以前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且以后也不会有。当时的教会，就像今天的国家，似乎无法靠创纪录的收入来运作和维持自己。就像国家已经开始主导后期工业经济，在一些西欧国家，国家的支出占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一样，教会也主导着后期的封建经济，耗费资源，阻碍增长。

## 十五世纪的赤字支出

教会采取了一切可以想象的权宜之计，从它的账户中挤出更多的钱来养活它过度膨胀的官僚机构。直接受教会统治的地区被要求支付越来越高的税款。在教会没有直接征税权的省份和王国，梵蒂冈征收 "年金"，由当地君主支付，以代替教会的直接税收。

教会，就像今天的国家一样，也搜刮自己的国库，将指定用于特定用途的慈善资金转用于支付一般的管理费用。

慈善机构和腐败的宗教职务被公开出售，十一税的收入流也是如此。实际上，什一税的利益相当于现代政府为资助其长期赤字而发行的债券。

虽然教会在意识形态上是封建主义的捍卫者，是商业和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但就像今天的民族国家一样，它利用一切可用的营销技术来优化自己的收入。教会在销售圣物方面生意兴隆，包括献祭的蜡烛、棕榈主日祝福的手掌、"圣母升天节祝福的草药，特别是各种圣水"。42

就像今天的政客威胁选民，如果他们拒绝支付更高的税款，就会减少垃圾收集和其他侮辱性的做法一样，15 世纪的宗教当局也很容易切断宗教服务，以勒索 80 名教徒支付任意的罚金。罚款往往是针对几个人的轻微违法行为，而这些人甚至不一定是有关教区的成员。例如，1436 年，雅克-杜-沙特利埃（Jacques Du Chatelier）主教，"一个非常浮夸、贪婪的人"，将巴黎的无罪者教堂关闭了 22 天，停止了所有的宗教活动，等待两个乞丐支付一笔不可能的巨额罚款。这两个人在教堂里争吵，流了几滴血，主教声称这使教堂失去了神圣性。他不允许任何人使用教堂举行婚礼、葬礼或正常的圣礼，直到他的罚款付清为止。

意大利管家（为了让教皇高兴）在一年内支付了两万块钱。

此外，他们给一个牧师（修改他的费用）一个妓女，或两个或三个....。

我想，一定是有神灵的人，才会与斯图尔特人有这样的关系。

## 十五世纪英国民谣

### 对教会领袖的憎恨

难怪 15 世纪末的普遍观点鄙视高级和低级神职人员，就像今天高度政治化社会的普遍观点鄙视官僚机构和政治家一样。正如 Johan Huizinga 所说："在这种情况下，仇恨是一个正确的词，因为仇恨是潜在的，但却是普遍和持久的。人们从不厌烦听人指责神职人员的恶行。"<sup>45</sup> 人们之所以普遍相信教会 "贪婪和奢侈"，部分原因在于这是事实。"高级神职人员的世俗和低级神职人员的堕落 "<sup>46</sup>，太明显了，不能错过。从教区牧师到教皇本人，神职人员似乎都很腐败，因为只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机构的人员才会腐败。

五百年前，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甚至让吉奥-安德烈奥蒂和比尔-克林顿看起来都是诚信的典范。亚历山大六世因其疯狂的聚会而闻名。作为锡耶纳的红衣主教，他举办了一场著名的狂欢，只有 "锡耶纳最美丽的年轻女子被邀请参加，但她们的'丈夫、父亲和兄弟'被排除在外。"<sup>47</sup> 锡耶纳的狂欢很有名，但后来证明，与亚历山大成为教皇后举办的那些狂欢相比，它是温顺的。也许其中最淫荡的是所谓的 "栗子芭蕾"，它涉及到罗马 "50 个最美丽的妓女 "与教父和其他重要的罗马人进行交配竞赛。正如威廉-曼彻斯特所描述的那样，"仆人们对每个人的高潮进行记录，因为教皇非常欣赏阳刚之气.....在每个人都筋疲力尽之后，教皇陛下分发奖品--斗篷、靴子、帽

子和精美的丝质外衣。日记作者写道，获胜者是那些与这些宫女做爱次数最多的人。

亚历山大至少有七个甚至八个私生子。他的一个明显的儿子乔瓦尼是所谓的 *Infans Romanus*，是亚历山大的私生女卢克蕾齐娅-博尔吉亚在 18 岁时所生。在一份秘密的教皇诏书中，亚历山大承认是乔瓦尼的父亲。如果他不是父亲，他肯定是双方的祖父。教皇与卢克蕾齐娅发生了三段乱伦关系，卢克蕾齐娅也是亚历山大最年长的私生子甘迪亚公爵胡安的情妇，以及另一个私生子红衣主教切萨雷-博尔基亚的情妇。切萨雷是教会的王子，他是尼科洛-马基雅弗利《王子》的灵感来源。切萨雷是个杀手，教皇也是如此，据说他曾策划过几起谋杀案。他们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人显然嫉妒胡安，胡安的尸体于 497 年 6 月 15 日被从台伯河中捞出，没有生命。

中世纪晚期教会的领导层与今天民族国家的领导层一样腐败。

"今天我已经两次成为父亲，上帝对它的祝福。"50。

RODOLPH ACRICOLA，听说他的小妾在他被选为住持的那天生了一个儿子。

## HYPOCRISY

在 "表面的虔诚" 之下，中世纪后期的社会是非常褻渎、不敬和放蕩的。教堂是年轻男女最喜欢的约会场所，也是妓女和淫秽画商经常聚集的地方。历史学家报告说，"日常宗教活动的不敬几乎是无止境的"。受雇为死者的灵魂诵经的唱诗员通常在弥

撒中用褻瀆的词语代替。守夜和游行在中世纪的宗教活动中发挥了比今天大得多的作用，但还是被 "粗俗、嘲弄和饮酒所玷污"。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主要神学权威，卡尔图斯人丹尼斯如是说。52

虽然这样的报告可以被质疑为僵硬的道德家的抱怨，但它只是描绘同一画面的许多描述中的一个。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中世纪的生活中，放蕩不羈的行为和神圣的事物经常是亲密无间的伙伴。

例如，朝圣活动经常演变成骚乱和放蕩，以至于思想高尚的改革者争辩说要制止这种活动，但没有成功。当地的宗教游行也为暴民提供了经常性的机会，使他们能够破坏、抢劫，并普遍沉溺于他们所喜欢的任何醉酒的滑稽行为中。即使人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弥撒，也常常不是一种清醒的体验。在教堂里，特别是在节日的夜晚，人们喝了大量的酒。斯特拉斯堡议会的记录显示，那些在圣阿道夫之夜 "在祈祷中守望 "的人喝下了议会为纪念圣人而提供的 1100 升葡萄酒。

十五世纪著名的神学家让-格森报告说，"最神圣的节日，甚至是圣诞之夜，"都是在 "放蕩不羈、打牌、发誓 82 和褻瀆中度过"。当 "对这些失误进行告诫时，老百姓 "以贵族和神职人员为榜样，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行事而不受惩罚 "53。

## 虔诚与慈悲

在中世纪晚期，有组织的宗教使社会趋于饱和，这种虔诚与今天为政治统治生活辩护的 "同情心 "的目的是一样的。出售赎



罪券以满足人们对没有道德的虔诚的渴望，这与奢侈的福利支出以满足没有慈善的同情心的幌子是一样的。接受的做法的实际效果是否提高了道德品质或拯救了灵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重要的，正如一个福利项目是否真正改善了它所针对的人的生活一样。"虔诚"，像"同情"一样，几乎是一种迷信的召唤。

在一个几乎不了解因果关系的时代，教会的仪式和圣事渗透到生活的每个阶段。

"...一次旅行，一项任务，一次访问，都同样伴随着无数的手续：祝祷、仪式、公式"。54

刻在羊皮纸上的祈祷词像项链一样串在发烧患者身上。营养不良的女孩将她们的头发垂在圣母像前。

城市，以防止进一步脱发。纳瓦拉的农民在圣彼得像后面列队游行，以便在干旱时求得雨水。55 人们热衷于采用这些和其他"在没有有效技术的情况下缓解焦虑的无效技术"。56

## 两种错误构成一个仪式

人们对圣人遗物的神奇品质深信不疑，以至于任何值得注意的虔诚者的死亡都会引起人们疯狂地分尸。托马斯-阿奎那在福萨努瓦修道院去世后，那里的修士将他的尸体斩首并煮沸，以确保对其骨头的控制。

当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躺在床上时，"一群崇拜者来到这里，把包裹在她脸上的亚麻布剪掉或撕掉；他们剪掉头发、指甲，甚至乳头"。57

## 无德的虔诚

中世纪的人们把圣人和他们的遗物看作是信仰武器库的一部分，在一个冬天更冷、夜晚更黑、面对疾病更绝望的世界里，本书的任何读者都可能知道。与现代人相比，中世纪的人们更加相信恶魔是真实存在的，上帝积极干预世界，祈祷、忏悔和朝圣可以获得神的青睐。

仅仅说人们相信上帝，既不能表达他们的信仰强度，也不能表达中世纪的虔诚似乎很容易与罪恶同归于尽。对仪式、典礼和圣事的效力的信仰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它也许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以良性方式行事的紧迫性。对于任何罪行或精神缺陷，都有一种补救措施，一种可以洗刷污点的忏悔，这就是所谓的 "救赎数学"。<sup>58</sup> 宗教变得如此无孔不入，其真诚度必然开始下降。正如 Huizinga 所说，"宗教渗透到生活中的所有关系，意味着圣洁和非圣洁的思想领域不断融合。神圣的东西会变得太过普通，以至于无法深入感受。"<sup>59</sup> 事实也是如此。

## 缩减教会规模

到 15 世纪末，教会不仅像今天的民族国家一样腐败，而且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教会以非生产性的方式吸纳了大量的资本，施加了限制社会产出和压制商业的负担。这些负担，就像今天的民族国家所强加的那些负担一样，是很多的。我们知道在火药革命之后，有组织的宗教发生了什么：它创造了强烈的动机来缩小宗教机构并降低其成本。当传统教会拒绝这样做时，新教教派抓住了竞争的机会。在此过

程中，他们采用了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手段来降低虔诚生活的成本。- 他们建造空闲的新教堂，有时还拆除旧教堂的祭坛，以腾出资金用于其他用途。

- 他们以降低费用的方式修订基督教教义，强调信仰而非善行是得救的关键。他们制定了新的简明礼仪，缩减或取消了节庆日，并废除了许多圣礼。

贫穷从使徒的美德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往往值得指责的社会问题。

要理解缩小教会规模是如何解放生产力的，你必须回顾教会在其垄断被打破之前阻碍增长的许多方式。就像今天的民族国家一样，教会在 15 世纪末强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超额成本负担。

什一税、税金和费用等直接成本为过度膨胀的教会官僚机构提供了资金。十一税在取代中世纪 "圣母教堂" 的新教教堂中也很常见，但在城市地区往往无法收取。实际上，教会垄断的结束导致商业最发达地区的边际税率不断下降。

宗教教义使储蓄变得困难。中世纪教会的大坏蛋是 "守财奴"，即不惜牺牲自己的灵魂来保存黄金的人。要求信徒为 "善行" 提供资金，需要向教会提供昂贵的捐款。"满足 "的教义迫使那些关心救赎的人捐赠弥撒或 "圣歌"，以避免炼狱。路德在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中的第八条和第十三条直接攻击了这一点。他写道："垂死的人将通过他们的死亡来偿还所有的债务"。61 换言之，新教信徒的资本可以传给他的继承人。根据新教教义，不需要捐赠圣

堂来重复做弥撒，通常是三十年，有时对非常富有的人来说，是永久的。

中世纪教会的意识形态也鼓励将资本转用于购置遗物。众多的圣物崇拜被赋予了巨大的太阳，以获得与基督或各种圣人有关的实物。非常富有的人甚至收集了个人的圣物收藏。例如，萨克森的选帝侯弗雷德里克积累了一万九千件遗物，其中一些是在 1493 年去耶路撒冷朝圣时获得的。他的收藏包括他认为是 "圣洁的身体、玛丽的乳汁和来自耶稣诞生地马厩的稻草"。

62 据推测，投资于这些遗物的资本回报率很低。向强调信仰和选民概念的转变，降低了购买基督教生活的装饰品作为护身符的重要性，并鼓励资金寻找更有成效的渠道，以获得君主可以利用的回报。

新教教派的出现打破了中世纪教会的经济垄断，并导致了监管的大幅削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教规法经常被扭曲以支持教会的垄断和商业利益。

由于新教派需要保护和促进的经济利益较少，他们的宗教教义版本倾向于形成一个更自由的体系，对商业的抑制较少。

新教革命废除了中世纪教会的许多仪式和典礼，这些仪式和典礼给信徒们的时间带来了负担。到 15 世纪末，仪式、圣事和圣日已经被精心设计，几乎占据了整个日历。这种超负荷的仪式是教会坚持的合理结果，".....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增加祈祷或敬拜的行为，并从中获得好处。"63

他们确实在繁殖。生产力因更长、更复杂的仪式、忏悔时背诵重复的祈祷词的义务，

以及不能工作的圣徒节日的增多而受到影响。众多的规章制度和仪式在一天和一个季节中穿插进行，大大减少了可用于生产任务的时间。这可能对中断中世纪农业的节奏没有什么作用，因为 90%或更多的人都在从事农业生产。在四季中，有许多时期不需要每天进行田间劳动。在中世纪的条件下，农作物的产量可能更多的是随着天气和不可控制的虫害节奏而变化，而不是因为教会日历所容纳的最低限度之外的任何边际劳动的增加。

生产力损失这一更大的问题并没有像其他领域那样发生在农业上。教会对时间的要求与手工业、制造业、运输业、商业或其他任何可能由用于任务的时间量来决定生产力和利润的事业远不相容。

十五世纪末的大转型发生在土地租金上涨和农民实际工资下降的时候，这可能不是一个巧合。人口压力的增加减少了公共土地的产量，这些土地通常位于河流和溪流周围，农民依靠这些土地来放牧，在某些情况下，也依靠这些土地来获取鱼和柴火。生活水平的下降给农民带来了越来越紧迫的压力，他们需要寻找其他收入来源。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向小规模的市场制造，首先是纺织业，这个过程被称为'淘汰'或'原工业化'。"64 教会强加的时间负担阻碍了更有雄心的农民通过手工艺工作补充农业收入的努力，因为它们确实抑制了在新经济方向上的任何重新部署。

新教教派对生产力做出的一个更明显的贡献是取消了四十个节庆日。这不仅节省了举办节日的大量费用，包括为村里的餐桌配备食物和饮料；还释放了大量的宝贵时间。隐含的意思是，每一个停止尊重四十个被禁止的节日的人可以在他的年度生产

力中增加三百个工时或更多。简而言之，在中世纪教会中取消仪式性的超负荷工作，仅仅通过释放本来会损失在商业上的时间，就为产量的显著增加开辟了道路。

教会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后，大量的资产在教会的管理下收益很低--这种情况与 20 世纪末的国有资产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到目前为止，教会是最大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在当今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教会对土地的控制力与国家不相上下--在一些欧洲国家，如波西米亚，超过了土地总量的 50%。

根据教规法，一旦财产被教会控制，就不能转让。因此，随着教会从信徒那里得到越来越多的遗赠，用于资助各种社会福利服务、唱诗班和其他活动，教会的土地持有量趋于稳步上升。

虽然很难精确地衡量教会财产的相对生产力，但在中世纪末，它肯定比该时代的早期要低得多。到了 14 世纪，人们越来越重视市场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的农业，这使得大多数非专业的领主从文盲头目转向职业经理人，以优化他们的土地产出。

他们的激励措施可能导致他们迅速超过了教会财产的产出，而理论上，这些财产通常不会累积到任何人的私人利益上。毫无疑问，一些比较世俗的王子主教管理他们财产的方式与普通领主的方式没有区别。然而，其他教会财产的生产力肯定会受到一个巨大的、分散的机构的冷漠管理的影响，其弊端与今天国家和社区所有权的弊端相似。同样明显的是，在印刷术出现后，对修道院的查封重新安排了不再需要用于复制书籍和手稿的资源。

正如我们在《伟大的计算》中所详述的那样，一些新教教派立即对火药革命作出反应，以鼓励商业的方式改变他们的教义，如取消禁止高利贷的禁令，或以 86% 的利息放贷。中世纪教会在意识形态上对资本主义的反对是对增长的拖累。教会教义的主要意识形态主旨是加强封建主义，而教会作为最大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在其中有很大的利益。无论是否自觉，教会都倾向于把自己的经济利益作为宗教美德，同时反对制造业和独立商业财富的发展，因为这注定会破坏封建制度的稳定。例如，禁止 "avance " 的禁令主要适用于商业交易，而不是封建征收，也从未适用于出售赎罪券。臭名昭著的

兴趣。中世纪教会在意识形态上对资本主义的反对是对增长的拖累。教会教义的主要意识形态主旨是加强封建主义，而教会作为最大的封建土地拥有者，在其中有很大的利益。无论是否自觉，教会都倾向于把自己的经济利益作为宗教美德，同时反对制造业和独立商业财富的发展，因为这注定会破坏封建制度的稳定。例如，禁止 "avance " 的禁令主要适用于商业交易，而不是封建征收，也从未适用于出售赎罪券。教会为商业项目确定一个 "公正的价格 " 的臭名昭著的尝试，往往会压制那些教会本身不是生产者的产品和服务的经济回报。

对 "高利贷 " 的禁令是教会抵制商业创新的一个信号。银行和信贷对大规模商业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通过限制信贷的供应，教会阻碍了增长。

更为微妙的是，新教派对《圣经》这一文本的关注有助于拆毁中世纪教会的思维模

式和意识形态。两者都在成长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中世纪晚期的文化编程鼓励人们用象征性的模拟而不是因果关系来看待世界。这导致了推理的短路。它也指向了对生活的重商主义概念。用象征性的等价物来思考，不容易转化为用市场价值来思考。"三个庄园代表圣女的品质。帝国的七个选举人象征着美德；阿图瓦和海诺的五个城镇，在 1477 年仍然忠于勃艮第家族，是五个聪明的处女。...

同样，鞋子意味着小心和勤奋，长筒袜意味着毅力，吊袜带意味着决心，等等。

"65 正如这个引自杰出的中世纪历史学家约翰-惠津加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思维被教条、僵硬的符号和寓言所支配，它们将生活的各个方面按等级从属关系联系起来。每一种职业、每一个部分、每一种颜色、每一个数字，甚至每一个语法元素都被捆绑在一个宏大的宗教概念体系中。

因此，生活中平凡的点点滴滴不是以其因果关系来解释，而是以静态符号和寓言来解释。有时将美德和恶习人格化，每件东西都代表着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又代表着另一种东西，其方式往往阻碍了而不是澄清了因果关系。

为了进一步混淆视听，各种关系往往被任意地捆绑在数字系统中。七位数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有七种美德，七种致命的罪，主祷文的七种祈求，圣灵的七种恩赐，激情的七个时刻，七种节庆，以及七种圣礼，"由七种动物代表，后面是七种疾病"。

66

十五世纪的新闻业



十五世纪的新闻故事，如果写出来的话，除了通过寓言式的 87 种拟人手法间接地回答了报道事实的任何经典问题。请看这篇在私人日记中关于十五世纪巴黎的勃艮第人谋杀案的报道。

然后，住在邪恶顾问塔里的不和女神出现了，她唤醒了愤怒，这个疯女人，还有贪婪、愤怒和复仇，他们拿起各种武器，把理性、正义、对上帝的怀念和节制最可耻地赶走了。然后，疯狂的他们被激怒了，谋杀和屠杀杀戮，砍伐，诛杀，屠杀所有他们在监狱里发现的。

摆脱中世纪范式的转变有助于人们做好准备，用 "现代 "术语思考因果关系，而不是用象征性的联系和寓言式的人格化。不需要争论中世纪晚期教会的教义和思维模式是不真诚的，就可以看出它们往往与农业封建主义的需要紧密结合，而很少允许商业存在，更不用说工业发展。相反，教会作为一个主导机构，在道德、文化和法律方面的约束是与封建主义的要求紧密结合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们不适合工业社会的需要，就像现代民族国家的道德、文化和法律约束不适合促进信息时代的商业一样。我们相信，国家将被革命化，就像教会一样，以促进新潜力的实现。

新教教义认为，天堂可以只靠信仰来获得，而且不需要为死者祈祷的好处，这被当作一个神学问题。然而，它是适应新时代经济现实的神学。它满足了一个明显的需求，即在一个将额外的资金投入 to 臃肿的教会官僚机构的机会成本突然上升的时候，需要一个更有成本效益的救赎之路，人们不介意在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把钱交给教会。但是，当他们突然看到有机会为前往东方的香料航行提供 100 倍的资金，或

者为国王的一个营提供 40% 的年薪，获得较少但仍有希望的资金时，他们可以理解为在自己的利益所在寻求上帝的恩典。

许多商人和其他平民很快就变得比他们的祖先在封建制度下富裕得多。近代早期商人和小制造商生活水平的急剧提高，在那些收入和生活方式因封建主义而崩溃的人中普遍不受欢迎。教会垄断的削弱和富人的巨额政治权力的增加，导致收入再分配的急剧减少。没有成为新制度直接受益者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对那些受益者充满了嫉妒。

Huizinga 描述了当时的普遍态度，这很可能是与信息革命的一个重要平行。"对富人，尤其是对当时数量众多的新富人的憎恨是普遍的。"68

一个同样惊人的平行现象出现在犯罪的巨大激增中。如果不是我们在上一章探讨的封建革命的彻底无政府状态，旧秩序的瓦解几乎总是会释放出犯罪的激增。在中世纪末，随着旧的社会控制体系的瓦解，犯罪率也急剧上升。用 Huizinga 的话说，"犯罪开始被视为对秩序和社会的威胁。"69 它在未来也可能同样具有威胁性。

现代世界在新技术、新观念和黑火药的臭味中诞生。火药武器和改进的航运破坏了封建主义的军事基础，甚至新的通信技术也破坏了其意识形态。新的印刷技术帮助揭示的因素包括教会的腐败，教会的等级制度和官兵已经被一个矛盾地将宗教置于一切中心的社会看得很低。

这是一个悖论，在一个将政治置于一切中心的社会中，对政治家和官僚的幻灭是一个明显的当代平行。

十五世纪末是一个幻灭、混乱、悲观和绝望的时代。一个很像现在的时代。

##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生命与健康

民主和民族主义作为暴力时代的资源战略  
"最重要的是，战争的成功取决于有足够的资金来提供企业所需要的任何东西。"<sup>1</sup>  
罗伯特-德-巴尔萨克，1502 年

### 历史的废墟

1989 年 11 月 9 日和 10 日，电视向全世界播放了兴高采烈的东柏林人用大锤子拆除柏林墙的场景。人群中初出茅庐的企业家们捡起了墙的碎片，这些碎片后来被作为纪念品的镇纸卖给了远近的资本家。此后多年来，这些遗物的生意非常火爆。即使在我们写作的时候，人们仍然可以在小杂志上偶尔看到广告，以高级银矿的价格出售东德的旧混凝土碎片。我们认为，那些购买柏林墙镇纸的人不应该急于出售。他们持有的纪念品比共产主义的崩溃更重要。我们相信，自 1495 年 2 月圣乔瓦尼的城墙被炸成碎片以来，柏林墙成为最重要的一堆历史废墟。

法国国王查理八世铲平圣乔万尼是火药革命的第一声炮响。它标志着历史上封建阶段的结束和工业主义的到来，正如我们前面所概述的那样。柏林墙的摧毁标志着另一个历史分水岭，即工业时代和新信息时代之间的通道。从未出现过如此巨大的效

率战胜权力的象征性胜利。当圣乔瓦尼的围墙倒下时，它鲜明地表明，世界上暴力的经济回报已经急剧上升。柏林墙的倒塌说明了一些不同的情况，即暴力的回报现在正在下降。这一点甚至很少有人开始认识到，但它将产生戏剧性的后果。

由于我们在本章中探讨的原因，事实证明，柏林墙对整个工业民族国家时代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当晚在柏林的人群中或从远处观看的数百万人的理解。柏林墙的建造目的与圣乔瓦尼的墙截然不同--防止里面的人逃跑，而不是防止外面的掠夺者进入。仅仅这一事实就说明了从 15 世纪到 20 世纪国家权力的上升。而且不止在一个方面。

几个世纪以来，民族国家使所有对外的围墙成为多余和不必要的。国家在其最初占领的地区对强制力的垄断程度使其在内部更加和平，在军事上比世界上任何主权国家都更加强大。国家利用从基本解除武装的人口中提取的资源来压制小规模掠夺者。民族国家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夺取资源的工具。它的成功是基于其从公民身上攫取财富的卓越能力。

"在从民族国家过渡到信息时代的新主权国家之前，最大和最强大的西方民族国家的许多居民，就像他们 1989 年在东柏林的同行一样，将谋划着寻找他们的出路。美国总统在 1995 年提议颁布出境税，即"资本的柏林墙"，这将要求富有的美国人支付巨额赎金才能带着他们的部分资金逃跑，这是未来事情的一个暗示。

克林顿的赎金不仅让人联想到东德后期的国家将其公民视为资产的政策；它还让人

联想到为支撑衰落中的罗马帝国的财政状况而采取的越来越严厉的措施。《剑桥古代史》中的这段话讲述了这个故事。

因此，国家开始了激烈的努力，将人口压榨到最后一滴。由于经济资源不能满足需要，强者们以暴力和不择手段的方式为自己争取主要份额，这与当权者的出身和习惯于掠夺的士兵是一致的。法律的严厉性在民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士兵们充当法警，或作为秘密警察在土地上游荡。当然，受害最深的是有产阶级。对他们的财产下手相对容易，而且在紧急情况下，他们是可以最频繁、最迅速地勒索到东西的阶层。

当失败的制度有能力这样做的时候，它们往往会对那些寻求逃脱的人施加刑事负担。我们再次引用《剑桥古代史》。"如果有产阶级把钱埋起来，或牺牲三分之二的财产来逃避地方官，或为了摆脱域租而不惜放弃全部财产，而非有产阶级则逃跑，国家的回答是增加压力。"在你提前计划时，这一点值得记住。过去国家制度的黄昏很少是一个礼貌的、有序的过程。我们在第二章提到了罗马征税人的讨厌的习惯。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大量的 *agri deserti*，即废弃的农场，只反映了一个更广泛问题的一小部分。事实上，在高卢和包括今天的卢森堡和德国在内的边境地区，征税往往相对温和。在罗马最肥沃的地区--埃及，由于有灌溉设施，那里的农业产量更高，主人的遗弃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否尝试逃跑的问题，也就是拉丁语中所说的 "最后的避难所" (*ultimum refugium*)，几乎成了所有拥有财产的人的头等难题。记录显示，"在埃及，曾经向神谕提出的常见问题中有三种标准类型。'我将成为一个乞丐吗？' '我应该逃跑吗？' 和 '我的飞行将被阻止吗？'"<sup>4</sup> 克林顿的提议说是。这

是一个早期版本的逃亡障碍，随着民族国家财政资源的滑落，这个障碍可能会变得更加繁重。当然，美国第一个版本的出境障碍比埃里希-昂纳克的混凝土和有刺铁丝网更加良性。它还涉及到更大的价格敏感性，负担只落在应税财产超过 60 万美元的 "亿万富翁" 身上。

然而，它的理由与昂纳克曾经为已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著名的公共工程项目辩护时提出的论点相似。昂纳克声称，东德国家对未来的难民有大量投资。他指出，允许他们自由离开会给国家带来经济上的不利，而国家需要他们在东德的努力。

如果你接受人民是或应该是国家的资产这一前提，昂纳克的墙是有意义的。没有墙的柏林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漏洞，就像逃离美国的税收管辖权对克林顿的国税局来说是一个漏洞。克林顿关于逃离亿万富翁的论点，除了显示出一个政治家对数字完整性的惯常漠视之外，与昂纳克的论点有相似之处，但在某种程度上不太符合逻辑，因为事实上，美国政府对可能寻求逃离的富裕公民并没有大量的经济投资。这不是一个由国家出资教育他们并想溜走到其他地方从事法律工作的问题。

绝大多数适用退出税的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财富，尽管有美国政府，而不是因为有美国政府。

现在美国最高的 1% 的纳税人支付的所得税占总所得税的 28.7%，这并不是富人无法偿还国家对他们的教育或经济繁荣可能作出的任何真正投资的问题。恰恰相反。那些支付大部分账单的人所支付的费用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获得的任何利益的价值。

平均每年的纳税额超过 125,000 美元，税收对美国最高 1% 的纳税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现在的认识。假设他们在四十年的时间里能从每人支付的超额税款中获得哪怕是 10% 的回报，每年每多支付 5000 美元的税款就会使他们的净资产减少 220 万美元。在 20% 的回报率下，每 5,000 美元的超额税款会使净资产减少 4400 万美元。

随着千禧年的到来，信息时代新的大政治条件将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从工业时代继承下来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掠夺性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似乎不再是繁荣的助推器，而更像一个障碍，一个个人想要逃离的障碍。绝望的政府将不愿意允许这种逃避。西方福利国家的稳定甚至生存，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继续抽取世界总产出的很大一部分，重新分配给经合组织国家的一部分选民。这就要求对目前富国最具生产力的公民征收的税款以超级垄断的价格定价，比政府提供的服务的实际成本高几百甚至几千倍。

## 民族国家的生与死

柏林墙的倒塌不仅仅是共产主义死亡的一个明显象征。它是整个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一次失败，是效率和市场的胜利。历史上的权力支点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认为，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将民族国家的时代推向了高潮，这是一个特殊的两百年历史阶段，始于法国大革命。国家已经存在了六千年之久。但在 19 世纪之前，它们只占世界主权国家的一小部分。他们的地位在革命中开始也在革命中结束。

1789 年的伟大事件使欧洲走上了真正的国家政府的道路。1989 年的伟大事件标志着共产主义的死亡和市场力量对大众力量的控制。这两场革命相隔整整 200 年，定义了民族国家在大国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大国反过来主宰了世界，甚至在最偏远的部落飞地上传播或强加国家制度。

国家作为世界上组织暴力的主要工具所取得的胜利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它是由暴力的冷酷逻辑所决定的。正如我们喜欢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事件，与其说是由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愿望决定的，甚至也不是由将军们的操纵决定的，不如说是由隐藏的暴力杠杆决定的，它以阿基米德梦想的方式推动了历史。在现代时期的过去两百年里，国家一直是常态。但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国家一直是罕见的。

它们的生存能力一直依赖于特殊的大政治条件。在现代时期之前，大多数国家都是".....东方专制主义"，沙漠中的农业社会依赖对灌溉系统的控制而生存。即使是罗马帝国，通过对埃及和北非的控制，也间接地是一个水利社会。但这并不足以使其生存。罗马，像大多数前现代国家一样，最终缺乏迫使人们遵守暴力垄断的能力。

沙漠中的农业社会依赖对灌溉系统的控制而生存。即使是罗马帝国，通过对埃及和北非的控制，也间接地是一个水力社会。但这并不足以使其生存。罗马，像大多数前现代国家一样，最终缺乏迫使人们遵守暴力垄断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饿死人的。非洲以外的罗马国家不可能通过拒绝不顺从的人进入灌溉系统来切断种植作物的水。这种水利系统比古代经济中的任何其他巨型政治配置都能提供更多的暴力杠杆。在这些社会中，谁控制了水，谁就能以几乎



与现代民族国家吸收的总产出的百分比相当的水平提取战利品。

幅度大于效率

火药使国家能够更容易地在稻田和干旱河谷的范围之外扩张。火药武器的性质和工业经济的特点在战争中创造了巨大的规模优势。这导致了暴力的高回报率和上升。

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所说，"拥有最大强制手段的国家往往能赢得战争；效率（产出与投入之比）次于效益（总产出）。"<sup>6</sup> 由于政府大多是大规模组织，即使是少数幸存的小国，如摩纳哥或安道尔，也需要得到大国的承认以确保其独立性。只有拥有越来越多的资源的大政府才能在战场上竞争。

伟大的未回答的问题

这把我们带到了现代史上一个巨大的未解之谜：为什么在大国体系结束时出现的冷战中，共产主义独裁国家与福利国家民主国家成为其最后的竞争者。这个问题很少被研究，以至于当国务院分析员弗朗西斯-福山在柏林墙倒塌后宣称 "历史的终结 " 时，许多人似乎都觉得很有道理。他的工作所引起的热情的听众认为太多理所当然了。

显然，作者和其他许多人没有费心去问一个基本问题。国家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民主政体的什么共同特征导致它们成为世界统治的最终竞争者？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毕竟，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几十种争夺主权的制度来来往往，包括绝对君主制、部落飞地、王子主教制、教皇直接统治、苏丹国、城邦和再洗礼派殖民地。今天，大多数人都会惊讶地发现，一个拥有自己武装力量的医院管理公司可以统治一个国家长达几个世纪。然而，非常类似的事情发生了。1228 年后的三百年间，耶路撒冷圣玛丽医院的条顿骑士团，后来与利沃尼亚之剑骑士团联合起来，统治了东普鲁士和东欧的各个领土，包括立陶宛和波兰的部分地区。然后是火药革命。在几十年内，条顿骑士团被逐出其所有领土的主权，他们的大团长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不亚于国际象棋冠军。为什么？为什么在工业时代结束时，在争夺世界权力的伟大斗争中，大众民主制度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一字排开，而其他许多主权制度却渐渐变得无足轻重？

## 不受阻碍的控制

如果我们的大政治理论是正确的，答案是很容易的。这就好比问为什么相扑运动员往往是胖子。答案是，一个瘦小的相扑运动员，无论他的力量与体重的比例多么惊人，都无法与另一个巨大的摔跤手竞争。正如蒂利所建议的，重要的问题是 "有效性（总产出）"，而不是 "效率（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在一个日益暴力的世界中，在五个世纪的竞争中占主导地位的系统必然是那些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获得大规模战争所需资源的系统。

这是怎么做到的？在共产主义的情况下，答案是明显的。在共产主义下，那些控制国家的人几乎控制了一切。如果你在冷战期间是苏联的公民，克格勃可以拿走你的

牙刷，如果他们认为这样做对他们的目的有用的话。他们可以拿走你的牙齿。根据 1992 年开放前苏联档案后变得更加可信的估计，秘密警察和已故苏联国家的其他特工在 74 年中夺走了 5 千万人的生命。

在冷战期间，如果你是苏联公民，克格勃可以拿走你的牙刷，如果他们认为这样做对他们的目的有用。他们可以拿走你的牙齿。根据 1992 年开放前苏联档案后变得更加可信的估计，秘密警察和已故苏联国家的其他代理人在七十四年的统治中夺走了五千万人的生命。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有能力调动其境内存在的任何东西用于军事，生活在那里的人几乎不可能反驳。

就西方民主国家而言，这个故事不那么明显，部分原因是我们习惯于将民主与共产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来思考。就工业时代而言，这两种制度确实是巨大的对立面。但从信息时代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制度的共同点比你想象的要多。两者都有利于政府不受阻碍地控制资源。不同的是，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相比，民主福利国家将更多的资源掌握在国家手中。

这是一个罕见现象的明显例子，少即是多。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国家拥有一切的理论为前提的。相比之下，民主的福利国家提出了更适度的要求，并因此采用了更好的激励措施来动员更大的产出。西方国家的政府不是一开始就要求拥有一切，而是允许个人拥有财产和积累财富。然后，在财富积累之后，西方民族国家对其中的一大部分征税。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相比，高水平的财产税、所得税和遗产税为民主福利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源。

与共产主义相比，福利国家确实是一个效率高得多的系统。但与其他积累财富的制度相比，如香港这样真正的自由放任的飞地，福利国家是没有效率的。同样，少即是多。恰恰是这种低效率使福利国家在工业时代的大政治条件下变得至高无上。

当你明白了原因，你就更接近于认识到柏林墙的倒塌和共产主义的死亡真正意味着什么。这远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保证民主福利国家将是一个胜利的系统，这更像是看到一个兄弟姐妹已经老死。杀死共产主义的大政治革命也有可能破坏和摧毁我们在 20 世纪所知的民主福利国家。

谁控制了政府？

这个非正统的结论的关键在于认识到民主政府的控制权在哪里。这个问题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简单。在现代社会，谁控制政府的问题几乎总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被提出。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但几乎都是涉及到确定在某一特定时刻主宰某一国家控制权的政党、团体或派别。你已经听说过由 95 个资本家控制的政府。由劳工控制的政府。由天主教徒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控制的政府。由部落和种族团体控制的政府；由胡图人控制的政府和由白人控制的政府。你们也听说过由职业群体控制的政府，如律师或银行家。你们听说过由农村利益集团、大城市机器和住在郊区的人控制的政府。

而且你肯定听说过由政党控制的政府，由民主党、保守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激进党、共和党和社会主义者控制。

但你可能没怎么听说过一个由顾客控制的政府。经济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莱恩在他前面讨论的关于暴力的经济后果的一些清晰的文章中，为理解政府的控制权所在奠定了基础。将政府视为出售保护的经济单位，使莱恩从经济而非政治的角度分析了政府的控制。在这种观点中，在对政府的控制中，有三种基本的选择，每一种都需要一套根本不同的激励机制：业主、雇员和客户。

## 业主

在极少数情况下，甚至在今天，政府有时会被一个业主控制，通常是一个世袭的领导人，他在所有的意图和目的上都拥有这个国家。例如，文莱苏丹对待文莱政府的态度有点像东家。这在中世纪的领主中比较常见，他们把自己的封地当作东家，以优化他们的收入。

莱恩对 "生产-生产企业的所有者 "的动机描述如下。对利润最大化的兴趣会导致他在维持价格的同时，努力降低他的成本。他将像英国的亨利七世或法国的路易十一一样，使用廉价的手段，至少是尽可能廉价的手段，以确认他的合法性，维持国内秩序，并分散邻近的王子的注意力，以便他自己的军事开支会很低。从降低的成本中，或从他的垄断的坚定性所带来的增加的征收中，或从一个组合中，他积累了一个盈余。由业主控制的政府有强烈的动机来降低在特定地区提供保护或垄断暴力的成本。但是，只要他们的统治是安全的，他们就没有什么动机将他们向顾客收取的价格（税收）降低到低于优化收入的比率。垄断者可以收取的价格越高，而他的实际成本越低，他的利润就越大。

对于一个由经营者控制的政府来说，理想的财政政策是巨额盈余。当政府可以保持高收入但削减成本时，这对资源的使用有很大影响。

劳动力和其他有价值的投入，否则将被浪费在提供不必要的昂贵的保护上，而可用于投资和其他目的。君主通过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幅度越大，释放的资源就越多。当这些资源被用于投资时，它们就会对增长产生刺激作用。

但是，即使它们被用于显眼的消费，它们也有助于创造和提供新的市场，如果资源被浪费在生产低效的 "保护 "上，这些市场就不会存在。雇员很容易确定由雇员控制的政府的激励机制的特点。它们在其他雇员控制的组织中也是类似的激励。首先，雇员控制的组织倾向于赞成任何增加就业的政策，反对减少就业的措施。正如莱恩所说："当雇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控制时，他们对最大限度地减少保护费没有兴趣，对最大限度地减少由劳动力成本和他们自己的工资所代表的成本的大部分没有兴趣。规模最大化也更符合他们的口味。"一个由雇员控制的政府，很少有动力去降低政府的成本或向客户收取的价格。然而，如果条件对价格有强烈的抵制，以反对提高税收的形式，由雇员控制的政府将更有可能让他们的收入低于他们的支出，而不是削减他们的支出。换句话说，他们的激励措施意味着他们可能倾向于长期赤字，因为由业主控制的政府不会是客户。有由客户控制的政府的例子吗？有。

莱恩从威尼斯等中世纪商业共和国的例子中受到启发，从经济角度分析了政府的控制。在那里，一群需要保护的批发商人在几个世纪里有效地控制了政府。

他们是政府提供的保护服务的真正客户，而不是业主。他们为这种服务付费。他们并没有试图从控制政府的暴力垄断中获利。如果有些人这样做，他们也会被其他顾客长期阻止这样做。其他由顾客控制的政府的例子包括民主国家和有限的特许权的共和国，如古代的民主国家，或建国时期的美国共和国。当时，只有那些为政府付费的人，约占人口的 10%，才被允许投票。

由客户控制的政府，就像经营者的政府一样，有动力尽可能地降低其运营成本。

但与由业主或雇员控制的政府不同，由客户实际控制的政府有动力压低他们的价格。在顾客统治的地方，政府是精干的，一般不引人注目，有低的运营成本，最小的就业和低的税收。一个由顾客控制的政府在制定税率时，不是为了优化政府可以收取的金额，而是为了优化顾客可以保留的金额。

像竞争性市场中的典型企业一样，即使是由其客户控制的垄断企业也会被迫向效率方向发展。它将不能以税收的形式收取超过成本的价格，而仅仅是最低限度的利润。

民主的作用：选民是雇员和顾客

莱恩以传统的方式对待民主，认为它使使用暴力和生产暴力的企业 "越来越受其客户的控制。" q 这当然是政治上正确的结论。但这是真的吗？我们认为不是。仔细看看现代民主国家如何运作。

首先，它们几乎没有那些竞争性行业的特征，在这些行业中，贸易条件明显由其客户控制。首先，民主政府通常只将其总支出的一小部分用于保护服务，而这正是其核心活动。例如，在美国，州和地方政府仅将其总支出的 3.5% 用于提供警察、法院和监狱。加上军事开支，用于保护的收入比例仍然只有 10% 左右。另一个揭示大众民主不受其客户控制的暗示是，从工业时代继承下来的当代政治文化认为，如果在关键问题上的政策实际上是由支付账单的人的利益来决定的，那就太离谱了。想象一下，如果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提议让支付大部分税款的公民群体来决定政府的哪些项目应该继续，哪些雇员群体应该被解雇，会引起多大的反响。这将深深地触犯人们对政府应该如何运作的期望，而允许政府雇员决定谁应该加税的方式则不会。

然而，当你想一想，当客户真正处于主导地位时，他们不应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将被认为是很过分的。如果你去一家商店买家具，销售人员收了你的钱，却不理会你的要求，而是向其他人咨询如何花你的钱，你会很有理由感到不安。如果商店的员工争辩说你真的不配拥有这些家具，而应该把它们运给他们认为更有价值的人，你就不会认为这是正常的或有道理的。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类似的事情发生了，这表明政府的 "客户 "实际拥有的控制权是多么少。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民主政府的成本都已经激增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与客户的偏好迫使供应商提高效率的典型情况不同。



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有长期赤字。这是由雇员控制的财政政策特点。政府似乎对降低其运营成本有明显的抵触。

世界各地对当代政府的一个几乎普遍的抱怨是，政治项目一旦建立起来，只有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才能被遏制。炒掉一个政府雇员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原国有职能部门的私有化带来的主要好处之一是，私人控制通常更容易剔除不必要的就业。从英国到阿根廷，新的私人管理者将原来的国家雇员减少 50%-95%的情况并不少见。

也要想想政府保护服务的财政条款是以什么为基础定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会徒劳地寻找关于政府服务定价所依据的税率的竞争影响的暗示。

即使是近年来偶尔打断正常政治讨论的关于降税的辩论，也暴露了民主政府通常离我们有多远 98

民主政府通常 98 是由其客户控制的。主张降低税收的人有时认为，政府的收入实际上会增加，因为以前的税率定得太高，以至于阻碍了经济活动。

他们通常想强调的权衡不是司法管辖区之间的竞争，而是更惊人的东西。他们并没有争辩说，因为香港的税率只有 15%，所以美国或德国的税率一定不会高于 15%。恰恰相反。税收辩论通常假定，纳税人所面临的权衡不是在一个司法管辖区做生意还是在另一个司法管辖区做生意，而是在以惩罚性税率做生意还是放假。有

人告诉你，如果不减轻他们的税收负担，受到掠夺性征税的有产者会离开他们的收件箱，去打高尔夫球。

这种争论甚至可以出现，这表明民主福利国家所强加的保护成本与竞争基础相去甚远。

在 20 世纪的每一个民主福利国家中出现的累进所得税的条款，与顾客所喜欢的定价条款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可以通过比较为支持垄断性保护而征收的税款与电话服务的收费标准而轻易看出，直到最近，电话服务在大多数地方都是垄断的。如果电话公司试图在征收所得税的基础上收取电话费，顾客会大喊大叫。假设电话公司为打往伦敦的电话寄来一张 50,000 美元的账单，只是因为你在谈话中碰巧达成了一笔价值 125,000 美元的交易。无论是你还是任何其他头脑正常的客户都不会支付这笔费用。但这正是每个民主福利国家评估所得税的基础。

当你仔细思考工业民主国家的运作条件时，把它们当作一种由其雇员控制的政府形式是比较合理的。将大众民主视为由其雇员控制的政府有助于解释改变政府政策的困难。政府在许多方面似乎都是为了雇员的利益而运作的。例如，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政府学校似乎长期处于故障状态，而且没有补救措施。如果顾客真的在驾驶座上，他们会发现更容易制定新的政策方向。

那些为民主政府付费的人很少设定政府支出的条件。相反，政府作为一个合作机构，既不受所有权控制，又作为一个自然垄断机构运作。价格与成本几乎没有关系。与私营企业相比，服务质量普遍较低。客户

的不满情绪很难得到纠正。简而言之，大众民主导致政府被其 "雇员 "控制。但是，等等。你可能会说，在大多数司法管辖区，选民比政府工资单上的人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雇员怎么可能占主导地位？福利国家的出现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难题。由于没有足够的雇员来创造一个工作的大多数，越来越多的选民被有效地放在工资单上，接受各种形式的转移支付。实际上，接受转移支付和补贴的人成了假的政府雇员，他们可以省去每天上班的麻烦。

这是由工业时代的大政治逻辑所决定的结果。

当强制力的规模比资源的有效配置更重要时，就像 1989 年之前的情况一样，大多数政府几乎不可能被其客户控制。正如苏联后期的例子所说明的那样，直到几年前，国家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行使巨大的权力，甚至在大规模浪费资源的同时。当暴力的回报率很高且不断上升时，规模比效率更有意义。较大的实体往往比较小的实体更有优势。那些在调动军事资源方面更有效的政府，即使以浪费许多资源为代价，也倾向于战胜那些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的政府。

那些为民主政府买单的人对他们的钱是怎么花的几乎没有发言权。相反，它的功能是作为一个合作社，既不受所有权控制，又作为一个自然垄断机构运作。

价格与成本关系不大。与私营企业相比，服务质量普遍较低。顾客的不满很难得到补救。简而言之，大众民主导致政府被其 "雇员 "控制。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它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当规模比效率更重要时，

由顾客控制的政府就不能胜出，而且往往不能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上最有效的实体是那些征用最多资源用于战争的实体。但是，那些真正由支付账单的客户控制的政府，不太可能有全权委托，将手伸向每个人的口袋来提取资源。

顾客通常希望看到他们为任何产品或服务（包括保护）支付的价格降低，并保持在控制之下。如果西方民主国家在冷战期间处于顾客控制之下，仅这一事实就会使它们在军事上成为较弱的竞争者，因为它几乎肯定会削减流入政府的资源。记住，在顾客统治的地方，价格和成本都应该受到严格控制。但这几乎没有发生。

福利国家显然是冷战期间支出竞赛的赢家。各路评论家都把他们的有能力把苏联花到破产作为他们胜利的因素。

恰恰是这一事实，凸显了民主的低效率如何在暴力回报率上升的时期使其在大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大规模的军费开支，及其所有的浪费，代表了一种明显的为私人利益而进行的次优资本部署。我们在前面提出，虽然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相比，福利国家在经济上是有效的，但它们在创造财富方面的效率远远低于自由放任的飞地，比如香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民主福利国家的这种低效率，与更无约束的自由市场体系相比，使得它在工业主义的大政治条件下获得了成功。

在暴力时代，民主所助长的低效率如何成为其成功的一个因素？解开这个明显的悖论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两点。1.一个主权国家在现代时期的成功不在于创造财富，而在于建立一支能够对任何其他国家部署强有力的暴力的军队。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金钱，但金钱本身并不能赢得一场战斗。挑战不是建立一个经济效率最高或增长速度最快的系统，而是建立一个能够提取更多资源并将其用于军事的系统。就其性质而言，军事支出是一个财政回报本身很低或不存在的领域。

2.获得许可将资金投资于几乎没有直接经济回报的活动，如缴税，最简单的方法是向资金被觊觎的人以外的人征求许可。荷兰人能够用价值二十三美元的珠子购买曼哈顿的方法之一是，他们向其提出报价的特定印第安人并不是正确拥有它的人。正如营销人员所说，在这些条件下，"达成协议"要容易得多。例如，假设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们希望你支付的不是封面价格，而是你年收入的 40%来购买一本。如果我们问别人，而不是问你，我们就更有可能得到这样做的许可。事实上，如果我们能依靠几个你甚至不认识的人的同意，我们会更有说服力。我们可以举行一次临时选举，就像门肯（H.L.Mencken）所描述的那样，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夸张，是"一次先进的赃物拍卖"。为了使这个例子更加现实，我们将同意与这些匿名的旁观者分享我们从你那里收取的一些钱，以换取他们的支持。

这就是现代民主福利国家演化出的作用。在工业时代，它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系统，因为它在关键的地方既有效又无效率。它将私有制的效率和创造财富的激励机制与一个基本上不受限制地获得这些财富的机制结合起来。民主使财富生产者的口袋保

持开放。在世界暴力回报率上升的高发期，它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正是因为它使客户难以有效地限制政府征收的税收或其他为军事资源支出提供资金的方式，如通货膨胀。

## 为什么客户不能占主导地位

在现代时期，那些为 "保护 "付费的国家没有能力成功地拒绝向主权国家提供资源，即使是集体行动，因为这样做只会使他们被其他可能更有敌意的国家所压制。这在冷战时期是一个明显的考虑。在领先的西方工业国中，承担了过多政府成本的客户或纳税人没有能力拒绝支付高额的税收。其结果是使自己面临苏联或其他有能力组织暴力的侵略集团的全面没收。

## 工业主义与民主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大众民主可能会被证明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东西，不会在工业时代结束后长期存在。当然，大众民主和民族国家是在 18 世纪末随着法国大革命一起出现的，可能是对实际收入激增的一种回应。1750 年左右，西欧的收入开始大幅上升，部分原因是天气变暖。这与技术革新时期相吻合，技术革新用非熟练工人，甚至妇女和儿童都能操作的设备取代了工匠的熟练工作。

这种新的工业设备提高了非技术工人的收入，使收入分配更加平等。

革命的关键触发点可能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人们在条件改善时倾向于造反这一反常的想法。更重要的可能是，当

收入上升到一定水平时，早期现代国家终于可以绕过以前与之讨价还价的私人中介和权贵，转而采用 "直接统治 "的制度，由国家政府直接与公民个人打交道，以越来越高的税率向他们征税，并要求以低报酬的军事服务作为提供各种福利的交换。

由于新兴的中产阶级很快就有足够的钱来征税，统治者不再像以前那样必须与强大的地主或大商人谈判，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所写的那样，他们 "有能力防止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夺取他们的资产并压制他们的交易"。"不难看出，当政府与数百万公民单独打交道时，而不是与相对少数的领主、公爵、伯爵、主教、合同雇佣兵、自由城市和其他半主权实体打交道时，政府在攫取资源方面更加成功，因为在 18 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国家的统治者不得不与这些实体进行谈判。

实际收入的增加使政府能够采取一种战略，将更多的资源置于其控制之下。从数以百万计的人身上征收的小额税款比少数有权势的人支付的大额税款可以产生更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许多人比少数人更容易对付，因为少数人一般不愿意把他们的钱送出去，而且更有能力抵制。

毕竟，与国家本身相比，典型的农民、小商人或工人拥有的资源少得可怜。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西欧的典型个人根本不可能与国家有效地讨价还价，以降低他的税率，或对威胁其利益的政府计划 and 政策进行有效抵抗。

但这恰恰是几个世纪以来强大的私人巨头们所做的，并将继续这样做。他们有效地

抵制并与统治者讨价还价，限制了他们征用资源的能力。

"开战加速了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进程。几乎所有发动战争的国家都会发现，它无法用其积累的储备和当前的收入来支付这一努力。

几乎所有参加战争的国家都广泛借款，增加税收，并从对资源有其他用途的不情愿的公民手中夺取作战手段--包括人员。"  
查尔斯

缙丽

十八世纪中期的波兰的例子完美地说明了这一点。1760 年，波兰国家军队由一万八千名士兵组成。与邻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的统治者所指挥的军队相比，这是一支微不足道的部队，他们中最小的也能控制一支 10 万名士兵的常备军。事实上，1760 年的波兰国家军队甚至与波兰境内的其他武装单位相比也是很小的。波兰贵族的联合部队有三万人。

如果波兰国王能够直接与数以百万计的波兰人互动，并直接向他们征税，而不是局限于通过强大的波兰巨头的贡献来间接提取资源，那么毫无疑问，波兰中央政府将能够筹集到更多的收入，从而支付更大的军队。

对付那些无法与其他数百万普通人一致行动的普通人，中央当局在任何地方都被证明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但波兰国王在 1760 年没有选择直接向其公民征税。他不得不通过领主、富商和其他知名人士进



行交易，这些人是一个小型的、有凝聚力的团体。他们可以而且确实采取了一致行动，以防止国王未经他们同意就征用他们的资源。鉴于波兰贵族拥有的军队比他多得多，国王没有资格坚持。

事实证明，在暴力时代，未能绕过富人和强人收集资源的军事劣势是决定性的。在几年内，波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复存在。它被来自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入侵所征服，这三个国家的军队都比波兰的小部队大很多倍。在这些国家中，统治者都找到了规避富商和贵族限制征用其资源的能力的途径。

## 法国大革命后

法国大革命导致了军队规模的进一步激增，这一事实表明了暴力回报率上升时民主战略的力量。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政府达成的交易是为普通人的生活提供前所未有的参与度，以换取他们代替雇佣兵参与战争，并从他们不断增加的收入中支付越来越多的税收负担。

正如蒂利所说，国家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它的军事核心，它的公民开始在保护、裁决、生产和分配方面向它提出要求，范围非常广泛。随着国家立法机构将自己的范围扩大到批准征税之外，它们成为所有国家已经或可能影响其利益的有组织的团体的要求的目标。直接统治和大规模的国家政治一起成长，并极大地加强了彼此的关系。十八世纪的逻辑也是如此，直到 1989 年柏林墙倒塌时依然如此。随着工业时代的发展，非技术性工作的收入持续上升，使大众民主成为优化资源开采的更有效方法。

因此，政府不断发展壮大，在二十世纪，一般工业国家的年收入总债权增加了约 0.5%。

在 1989 年之前的工业时代，民主作为最有效的政府形式出现，正是因为民主使得对国家征用资源的行为难以或不可能施加有效的限制。

向所有人提供慷慨的福利，使大多数选民实际上成为政府的雇员。这成为所有主要工业国家的主要政治特征，因为选民作为保护服务的客户，在有效控制政府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他们不仅面临着共产主义制度的咄咄逼人的威胁，由于国家控制了整个经济，可以产生大量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但由于另一个原因，真正的纳税人对政府的控制也是不切实际的。

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公民无法有效地合作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合作的障碍很高，而且任何个人成功捍卫群体的共同利益的回报都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数百万普通公民在从政府手中扣留资产方面不会像拥有更有利的激励措施的小团体那样成功。

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你会期望在一个大众民主制度下，政府征用的总资源的比例高于寡头政治，或者在一个分散的主权体系中，大人物掌握着军事权力，并拥有自己的军队，正如他们在 18 世纪之前的早期现代欧洲的所有地方一样。

因此，西方世界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很少有人研究，就是在暴力回报率上升的时候，谈判成本的相对重要性。从少数人那里获取资源总是比从多数人那里获取资源成本更高。

一个相对较小的精英富人群体比一大群公民代表着一个更一致和有效的机构。这个小团体有更强的激励机制来共同工作。它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比大众群体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5 而且，即使该群体的大多数成员选择不配合任何共同行动，少数富有的人可能有能力部署足够的资源来完成工作。

有了民主决策，民族国家可以对数百万人更彻底地行使权力，而这些人不容易合作为自己的利益采取集体行动，与之相比，它可以与人数少得多的人打交道，这些人更容易克服组织上的困难，维护他们集中的利益。

民主还有一个更令人信服的优势，那就是创造了一个合法化的决策规则，使国家能够利用富人的资源，而不必直接讨价还价获得他们的许可。简而言之，民主作为一种决策机制，很适合工业时代的大政治条件。它与民族国家相辅相成，因为它有助于将军事力量集中在管理国家的人手中，而此时，武力的大小比调动武力的效率更重要。

这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决定性的证明，它提高了战场上军事力量的规模。此后，其他有竞争力的民族国家除了向类似的组织靠拢外别无选择，其合法性最终与民主决策相联系。

总而言之，民主民族国家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的成功是由于这些隐藏的原因。

暴力的回报率不断上升，这使得武力的大小比作为管理原则的效率更重要。

收入的提高足以超过生存水平，国家有可能收集大量的总资源，而不必与有能力抵抗的强大的巨头进行谈判。

事实证明，民主与自由市场的运作充分兼容，有利于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

民主有利于政府被其 "雇员 "所支配，从而确保难以削减开支，包括军事开支。

民主作为一种决策规则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解毒剂，可以防止富人采取一致行动，限制民族国家征税或以其他方式保护其资产免受入侵的能力。

民主成为军事上的制胜法宝，因为它有利于将更多资源聚集到国家手中。与其他依赖于其他原则的合法性的主权方式相比，如封建征收、国王的神圣权利、公司的宗教义务或富人的自愿捐款，大众民主在军事上成为最有力的方式，因为它是在工业经济中收集资源的最可靠方式。

"国家作为一个文化上的共同体，是现代性的最高象征价值；它被赋予了一种准神圣的特性，只有宗教可以与之媲美。事实上，这种准神圣的特性来自于宗教。在实践中，国家要么成为宗教的现代、世俗的替代品，要么成为其最强大的盟友。在现

代，国家产生的社区情感被高度重视，并被作为群体忠诚的基础而受到追捧。.

##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它成为大众民主的必然结果。能够运用民族主义的国家发现，他们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动员更大的军队。民族主义是一项发明，它使一个国家能够扩大它在军事上的有效规模。就像政治本身一样，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现代发明。正如社会学家 Joseph Llobera 在他关于民族主义兴起的记录丰富的书中所表明的，民族是一个想象中的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法国大革命期间动员国家权力的一种方式而出现的。正如他所说，"在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上，民族

以较小的代价建立军队。民族主义是一项发明，它使一个国家能够扩大它在军事上的有效规模。与政治本身一样，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现代发明。正如社会学家 Joseph Llobera 在他关于民族主义兴起的记录丰富的书中所表明的，国家是一个想象中的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法国大革命期间动员国家权力的一种方式而出现的。正如他所说，"在现代意义上，民族意识只存在于法国大革命之后，从 1789 年制宪会议将法国人民等同于法兰西民族的时候开始"。民族主义使动员权力和控制大量的人变得更加容易。民族国家是通过强调人们的共同特征，特别是口语而形成的。这有利于在没有中间人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统治。它简化了官僚机构的任务。与那些必须翻译成各种语言的法令相比，只需要用一种语言颁布的法令可以更快、更少的混乱地发出。因此，民族主义倾向于降低控制较大地区的成本。在民族主义之前，早期现代国家需要领主、公爵、伯

爵、主教、自由城市以及其他企业和民族中介的帮助，从税收 "农民 "到军事合同商和雇佣兵，以收取收入、养兵和执行其他政府职能。

民族主义还通过鼓励团体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决定性地降低了动员军事人员的成本。在利用群体情感为国家利益服务方面有如此大的优势，以至于大多数国家，甚至是所谓的国际主义的苏联，都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补充意识形态。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与国家本身一样是一种反常现象。

正如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 William McNeill ）所记录的那样，多民族的主权在过去是一种常态。用麦克尼尔的话说，"一个政府理应只统治一个民族的公民，这种想法在中世纪末开始在西欧发展起来。"一个早期的民族主义实体是普鲁士联盟（ Preussicher Bund ），它成立于 1440 年，反对条顿教团的统治。该教团的一些特点在前面已经强调过了，它是一个不同于民族国家的主权的极好例子。

条顿骑士团是一种特许公司，其成员几乎没有一个是普鲁士本地人。它的总部在不同时期从不来梅和吕贝克转移到耶路撒冷、阿克里和威尼斯，再转移到维斯瓦河畔的马里安贝格。它曾一度统治过的地区有

特兰西瓦尼亚的 Burzenland。一个与国家如此不同的主权国家会成为动员民族感情作为组织权力的一个早期尝试的对象，这并不令人惊讶。然而，作为早期的民族主义与后来的民族主义有多大区别的一个

标志，普鲁士联盟的德语贵族向波兰国王请愿，要求将普鲁士置于波兰的统治之下，这主要是因为即使在当时，波兰国王也是一个相对软弱的君主，人们不期望他像条顿骑士团那样严格地进行统治。

民族主义，在其早期的化身中，在火药革命之前就开始发挥作用。它随着早期现代国家的发展而继续发展，在法国大革命时的重要性有了质的飞跃。我们认为，106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武力思想已经开始消退了。它可能随着伍德罗-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试图赋予欧洲每个民族以自己的国家而达到了全盛时期。它现在是一种反动的力量，在像塞尔维亚这样收入下降、前景暗淡的地方被煽动起来。

正如我们在后面探讨的那样，我们预计随着西方民主国家的福利国家的崩溃，民族主义将成为低技能者怀念强迫性的主要集会主题。你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对于西方的大多数人来说，共产主义的死亡所带来的影响似乎是相对温和的。你们已经看到军事开支的下降，铝价的暴跌，以及国家冰球联盟的冰球运动员的新来源。这是个好消息。这是大多数在二十世纪长大的人都可以鼓掌的消息，特别是如果他们是冰球爱好者。大多数注定不那么受欢迎的消息还在后面。

随着工业时代的过去，民主所满足的大政治条件正在迅速地不复存在。因此，大众民主和福利国家能否在信息时代的新的政治条件下长期生存下去是值得怀疑的。

"国会不是民主的殿堂，它是一个以物易物的法律市场。"

ALBERTO FUJIMORI，秘鲁总统

事实上，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报告说，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一场后现代政变--1993年秘鲁国会挂上了引人注目的锁。这一事件在主要的工业民主国家中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好的注意。但它的意义可能比传统分析家所认为的更大。少数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倾向于把它看作是拉丁美洲历史上已经变得令人沮丧的那种权力掠夺。但我们认为这也许是使一种治理形式失去合法性的第一步，因为随着向信息时代的过渡，这种治理形式存在的直接大政理由已经开始消失。藤森关闭国会是政治承诺最终贬值的一个征兆。当其他立法机构的信用被耗尽时，类似的命运也可能在等待着他们。

正在侵蚀工业主义的技术转变，使许多国家的政府不再工作。或者是工作不力。

尤其是立法机构，似乎越来越不正常。他们制定的法律在五十年前可能只是愚蠢的，但在今天却很危险。

这一点在秘鲁非常明显，到1993年，秘鲁的国家内部主权几乎已经崩溃。

"袭击、绑架、强奸和谋杀与日益激进的驾驶习惯和不安全的街道相吻合。警察已经逐渐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已经卷入丑闻，成为经验丰富的罪犯.....。

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了在法律之外生活。盗窃、非法扣押和工厂接管已经成为日常现象。"费南多-德-索托



## 废墟中的秘鲁

从某种意义上说，秘鲁在 1993 年已不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仍然有一面旗帜和一支军队，但它的大部分机构都成了废墟。甚至监狱也被囚犯们接管了。这种解体可以追溯到一些原因，但大多数专家试图解释它，却忽略了真正的问题。秘鲁是技术变革的早期牺牲品，这种变革正在使封闭的经济失去功能，并破坏各地的中央权力。这些巨大的政治压力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像秘鲁国会这样的决策机构受困于不正当的激励，将他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汇总起来。

秘鲁的代议制民主就像一对上了膛的骰子。作为一个扩大国家的决策机制，它是无可比拟的。但是，当新的形势要求下放权力时，在旧的大政治条件下使民主如此有用的内在偏见使它越来越不能发挥作用。国会通过的法律正在迅速摧毁任何价值基础或对法律的尊重。

正如德-索托在《另一条道路》中所说："小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争斗，造成破产，牵连到政府官员。政府派发特权。法律被用来给予和拿走的东西远远超过道德所允许的范围"。21 像秘鲁这样的国会，完全受制于特殊利益集团，其道德地位就像一帮拍卖赃物的栅栏。它使自由市场成为非法的，因此也使法律变得荒谬。正如德-索托在谈到藤森之前的时期时所写的那样。对目的和手段的彻底颠覆使秘鲁社会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有些行为虽然是正式的犯罪行为，却不再受到集体意识的谴责。走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每个人，从贵族小姐到最卑微的人，都获得了走私货物。没有人对此有所顾忌；相

反，它被视为对个人聪明才智的一种挑战或对国家的报复。

在暴力和犯罪行为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同时，贫困和匮乏也日益严重。总的来说，秘鲁人的实际平均收入在过去十年中不断下降，现在已经达到了二十年前的水平。四面八方的垃圾堆积成山。日日夜夜，乞丐、洗车工和拾荒者军团围攻路人，向他们要钱。精神病患者赤身裸体地涌上街头，浑身散发着尿骚味。儿童、单身母亲和瘸子在每个角落乞求施舍。

事实证明，我们社会的传统中央集权主义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转型期国家的多方面需求。22 德-索托将藤森挂锁国会之前正在进行的放弃怪诞的法律经济而转向黑市的做法描述为 "一场无形的革命"。我们对自由市场的好处持肯定态度，但对一个法律和金钱一样堕落的社会的承诺则不那么肯定。德索托在 1993 年之前在秘鲁描述的世界是一个 "发条橙" 的世界，过度集中和功能失调的政府机构实际上正在摧毁公民社会。

这正是藤森着手要改变的。他通过关闭印刷厂来削减通货膨胀。他还设法解雇了五万名政府雇员，并削减了一些补贴。他在平衡预算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开始。他的改革计划包括建立自由市场和工业私有化的全面计划。但是，就像在前苏联一样，藤森改革的大部分重要内容在 1993 年还没有被采纳，包括对国有银行、矿业公司和公用事业进行第一轮大规模的私有化。秘鲁国会没有颁布这些必要的提案，而是像在莫斯科挑战叶利钦改革的俄罗斯国会一样，试图向后退。他们的计划是：从空荡荡的国库中恢复补贴，增加工资，保护所

有的既得利益，尤其是官僚机构--这正是你对一个由雇员控制的政府的期望。

藤森声称，秘鲁国会犹豫不决、腐败不堪，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一事实。他进一步声称，国会的犹豫不决和腐败使其无法改革秘鲁正在崩溃的经济，也无法打击毒品恐怖分子和虚无主义的光辉道路游击队的暴力袭击。

## 70%的解决方案

因此，藤森关闭了国会，这一行为可能表明他和许多早期的拉美领导人一样是独裁者。但我们认为，而且当时也这么说，藤森正确地发现了改革的一个根本障碍。美国社论作者和国务院官员对秘鲁国会的奢侈的官方颂扬并没有得到秘鲁人民的认同。当北美人把秘鲁国会当作自由和文明的化身时，秘鲁人民却在欢呼。当藤森总统把国会送回家时，他的支持率飙升至 70% 以上。后来他又以压倒性优势连任。大多数公民显然认为他们的立法机构更像是他们福祉的障碍，而不是他们权利的体现。

1994 年，秘鲁的实际经济增长达到 12.9%，是全球最高的。

## 政治承诺的通货紧缩

我们认为秘鲁的动荡与其说是回到了过去的独裁统治，不如说是更广泛的转型危机的早期阶段。你可以预见，随着政治承诺的破灭和政府信用的耗尽，许多国家都会出现政府失误的危机。

最终，必须出现新的制度形式，能够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维护自由，同时使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得到表达和生活。

很少有人开始思考工业政府的一些机构与后工业社会的大政治之间的不相容性。

然而，无论这些矛盾是否被明确承认，随着世界各地政治失败的例子越来越多，它们的 109 个后果将变得越来越明显。现代时期出现的政府机构反映了一个或多个世纪前的大政治状况。信息时代将需要新的

随着世界范围内政治失败的例子越来越多，后果也会越来越明显。现代时期出现的政府机构反映了一个或多个世纪前的大政治状况。信息时代将需要新的代表机制来避免长期的功能失调甚至社会崩溃。

当 1989 年柏林墙倒塌时，它不仅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它也是世界权力基础无声地震的外部标志。这是对暴力的长期回归的结束。我们在 1987 年的《血流成河》以及更早的《战略投资》月刊中预测，共产主义的垮台不仅仅是对一种意识形态的摒弃。它是过去五个世纪以来暴力史上最重要发展的外在标志。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社会的组织必然会发生变化，以反映在使用暴力方面日益增长的规模不经济性。未来必须存在的边界已经被重新划定。

## 第六章 信息的大政治学

年龄

## 效率对权力的胜利

1936 年 12 月 30 日，渴望更高薪的汽车工人强行占领了通用汽车公司在密歇根州弗林特的两个主要工厂。他们让机器空转，关闭了装配线，并把自己当成了家。受雇于工厂的工人在这场持续数周的工业对抗中坐下来。这是一场由暴力骚乱和警察、密歇根州民兵以及各级政府的政治人物的忠诚度的波动所引发的戏剧。由于在强制要求方面没有什么进展，工会于 1937 年 2 月 1 日再次罢工。

工会积极分子强行占领了通用汽车在弗林特的雪佛兰工厂。通过占领和关闭通用汽车的主要工厂，工人们有效地瘫痪了该公司的生产能力。在第三家工厂被占领后的 10 天里，通用汽车在美国只生产了 153 辆汽车。

我们重温一下六十年前的这则新闻，以便更清楚地了解现在正在进行的大政治条件下的革命。通用汽车公司的静坐罢工发生在本书的一些读者的一生中。然而，我们相信，在信息时代，静坐罢工将被证明是不合时宜的，就像奴隶们拖着巨大的石头穿越沙漠为法老竖起葬礼金字塔一样。虽然工会和他们的恐吓策略在工业时期变得如此熟悉，以至于成为社会景观的一个不容置疑的部分，但他们依赖于特殊的大政治条件，而这些条件正在迅速消失。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不会有雪佛兰汽车和美国工会的罢工。

政府的命运将跟随其对应方--工会--的命运而衰退。在 20 世纪社会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那种制度化的胁迫将不再可能了。技

术正在促使敲诈和保护的逻辑发生深刻的变化。

"没有特权，没有支配权，没有我和你的区别；只有每个人都能得到的东西，"只要他能保持它。霍布斯（THOMAS HOBBS

## 敲诈和保护

纵观历史，暴力一直是指向经济核心的一把匕首。正如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精明地指出的那样，"伤害的力量--摧毁某人所珍视的东西，造成痛苦和悲伤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力量，不容易使用，但经常使用。在黑社会，它是勒索、敲诈和绑架的基础，在商业世界，它是抵制、罢工和停工的基础。...它往往是纪律的基础，无论是平民还是军队；上帝用它来执行纪律"。3 一个政府对自己征税的能力取决于与私人勒索和敲诈相同的弱点。尽管我们往往不会从这些方面来认识它，但通过犯罪和政府来控制 and 强制使用的资产比例，提供了敲诈和保护之间的大政治平衡的粗略衡量。如果技术使资产的保护变得困难，犯罪将趋于广泛，工会活动也将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保护就会产生溢价。税收会很高。

在税收较低、工作场所的工资率由市场力量决定而不是通过政治干预或胁迫的地方，技术的天平向保护倾斜。敲诈和保护之间的技术失衡在二十世纪第三季度末达到了一个极端。

在一些先进的西方社会中，超过大多数的资源都被政府征用了。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收入要么是由法律规定的，要么是在胁迫

的影响下决定的，比如说通过罢工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威胁。福利国家和工会都是技术的产物，在二十世纪分享了权力战胜效率的战利品。如果没有军事和民用技术，它们不可能存在，这些技术在工业时代提高了暴力的回报。

创造资产的能力总是意味着对敲诈的某种脆弱性。

创造或拥有的资产越多，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要么你买通了每一个获得暴力敲诈杠杆的人，要么你买通了能够用蛮力击败任何勒索企图的军事力量。

"在你的地里不再有暴力的声音，在你的境内不再有枯萎和毁灭..."-《以赛亚书》60:1

## 保护的数学

现在，暴力的匕首可能很快就会被钝化。信息技术有望极大地改变保护和敲诈之间的平衡，在许多情况下使资产的保护更加容易，而敲诈则更加困难。信息时代的技术使我们有可能创造出许多形式的胁迫所不能及的资产。这种保护和敲诈之间的新的不对称性是基于数学的一个基本真理。乘法比除法更容易。然而，尽管这一真理很基本，但在微处理器出现之前，其深远的后果被掩盖了。在过去十年中，高速计算机促进了数十亿倍的计算，比世界上所有历史上的计算都多。

计算方面的这一飞跃使我们第一次能够摸索出复杂性的一些普遍特征。计算机所显

示的是，复杂的系统只有从下往上才能被建立和理解。素数相乘很简单。但通过试图分解大质数的乘积来分解复杂性是完全不可能的。连线》杂志的编辑凯文·凯利（Kevin Kelly）这样说。"将几个质数乘以一个更大的乘积很容易；任何小学生都能做到。但是，世界上的超级计算机在试图将一个乘积分解成简单的素数时却陷入了困境"。

## 复杂系统的逻辑

网络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被这个深刻的数学真理所塑造。

它已经在强大的加密算法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正如我们在本章后面所探讨的那样，这些算法将允许创建一个新的、受保护的、网络商业领域，其中暴力的杠杆作用将被大大降低。敲诈和保护之间的平衡将向保护的方向大幅倾斜。这将促进经济的出现，它更多地依赖于自发的适应机制，而较少地依赖于有意识的决策和通过官僚机构的资源分配。以保护为主导的新体系将与工业时期强制力占主导地位所产生的体系截然不同。

## 指挥和控制系统是原始的

我们在《大清算》中写道，计算机使我们能够"看到"一系列系统中固有的、以前看不见的复杂性。\* 先进的计算能力不仅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复杂系统的动态；它还使我们能够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利用这些复杂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经济要超越僵化的中央控制的发展阶段，这甚至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不可避免。这样



一个依赖于线性关系的系统从根本上说是原始的。政府对资源的占有不可避免地将资源从高价值的复杂用途拖到低价值的原始用途。

这是一个受限于同样的数学不对称性的过程，这种不对称性阻碍了大素数乘积的解开。

划分战利品永远只能是原始的。见《大算盘》第8章“非线性世界中的线性期望：望远镜如何引导我们计算；计算机如何帮助我们观察”。一切都变得更加复杂 在宇宙中的每一个地方，你都会看到系统随着它们的演变而获得更大的复杂性。这在天体物理学中是真的。在一个水坑中也是如此。让雨水单独留在低洼处，它就会变得更加复杂。每种类型的先进系统都是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没有一个主管部门。自然界中的每一个复杂系统，其中市场经济是最明显的社会表现，都取决于分散的能力。在最广泛的条件下最有效地工作的系统，其复原力取决于容纳新的可能性的自发秩序。生命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数以亿计的潜在基因组合产生了一个人类个体。对它们进行分类会使任何官僚机构感到困惑。

二十五年前，这只能是一种直觉。今天，它是可以证明的。计算机使我们越接近于理解人工生命的数学，我们就越能理解真实生命的数学，也就是那些生物的复杂性。

这些复杂的秘密，通过信息技术的驾驭，正允许经济被重新配置成更复杂的形式。正如凯文-凯利在《失控》中所说，互联网和万维网已经具有了有机系统的特征。《机器、社会系统和经济世界的新生物学》

中提出。用他的话说，大自然是 "一个思想工厂。重要的、后工业化的范式隐藏在每一个丛林的蚁丘中。...将生物性的东西大量转移到机器中，应该让我们充满敬畏。当 "生 "与 "造 "的结合完成后，我们的产品将学习、适应、自愈和进化。这是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力量。"

事实上，"将生物全盘转入机器 "的后果必然是深远的。社会系统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趋势，即模仿流行技术的特点。这一点，马克思说得很对。巨大的工厂与大政府的时代相吻合。微处理技术正在使机构小型化。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信息时代的技术将最终创造一个更适合利用复杂性优势的经济。

然而，人们对这种变化的巨大政治层面了解甚少，甚至那些认识到其数学重要性的大多数人也是以一种不合时宜的方式进行的。要完全掌握和内化未来几年的技术变革将使现代世界的大多数政治形式和概念过时的可能性，简直是难上加难。例如，已故物理学家海因茨-帕格尔斯在其高瞻远瞩的著作《理性的梦想》中写道："我相信，掌握复杂度这门新科学的国家和人民将成为下个世纪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超级大国"。7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预测。但我们相信它必然是错误的，不是因为它被误解，而恰恰是因为它将被证明比博士更正确。

帕格尔斯敢于表达。重新配置自己以成为更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社会确实会繁荣。但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不太可能成为国家，更不可能成为 "政治超级大国"。更有可能成为社会系统复杂性增加的直接受益者的，将是新千年的主权个体。

就帕格斯的预测而言，它相当于 500 年前一个狩猎队的萨满在他们蹲在篝火旁时告诉他的手下："~我相信，第一个掌握灌溉种植新科学的狩猎队将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来讲故事，甚至比湖边那些钓到大鱼的人还多。"尽管他对复杂性的重要性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帕格斯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当暴力的逻辑发生变化时，社会也会发生变化。

## 暴力的逻辑

要想知道如何以及为什么，有必要关注很少引起大家注意的大政治的几个方面。这些问题是由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C-莱恩（Frederic C. Lane）探讨的，他关于暴力和战争的经济意义的工作在本卷其他地方讨论。当莱恩在本世纪中叶写作时，Information Society 还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认为，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世界上使用暴力的竞争已经达到了最后阶段。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预见到了微处理，或者认为在网络空间，一个没有物理存在的领域创造资产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莱恩对大量商业可以完全不受暴力影响的可能性的影响没有说什么。

虽然莱恩没有预见到现在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但他对过去暴力垄断的各个阶段的洞察力是如此清晰，以至于它们明显适用于正在出现的信息革命。莱恩对中世纪暴力世界的研究吸引了他对传统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倾向于忽视的问题的注意。他看到，暴力的组织和控制方式在决定稀缺资源的使用方面起着很大作用。

莱恩还认识到，虽然暴力的生产通常不被认为是经济产出的一部分，但对暴力的控制对经济至关重要。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对暴力的保护。正如他所说，每一个经济企业都需要并支付保护费，保护其资本不被破坏或被武装夺取，保护其劳动不被强行中断。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生产这种效用，即保护，是一个称为政府的特殊协会或企业的职能之一。事实上，政府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试图通过自己使用武力和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他人使用武力来创造法律和秩序”。这一点显然太过基本，没有出现在教科书中，也没有构成公民讨论的一部分，而公民讨论大概决定了政治的走向。但是，如果你想了解正在发生的信息革命，也不能忽视这一点。保护生命和财产确实是一个关键需求，它困扰着每一个曾经存在的社会。

如何抵御暴力侵略是历史的核心难题。尽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供保护，但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

## 一个时代的结束

在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信息时代的巨大政治后果才开始被感受到。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变化是从制造业的首要地位到信息和计算的首要地位，从机器动力到微处理，从工厂到工作站，从大规模生产到小团队，甚至到个人单独工作。随着企业规模的缩小，工作场所中的破坏和勒索的可能性也在降低。规模较小的企业更难被工会组织起来。

微观技术使企业能够成为更小、更自由的目标。许多公司经营的服务或产品的自然资源含量可忽略不计。原则上，这些业务

几乎可以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进行。它们并不被困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如一个矿场或港口。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更不容易被工会或政治家征税。一个古老的中国民间智慧认为，"在所有三十六种摆脱困境的方法中，最好的方法是离开"。在信息时代，这一东方智慧将很容易被应用。

如果在一个地方因需求过大而使经营变得不舒服，那么转移就会容易得多。事实上，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所探讨的，在信息时代将有可能创建虚拟公司，其在任何司法管辖区的住所将完全取决于现货市场。政府或其他方面的勒索程度一夜之间增加，可能会导致虚拟公司的活动和资产以光速逃离该地区。

微观技术与工业流程的日益融合意味着，即使那些仍在经营具有巨大规模经济的制成品的公司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受到暴力的影响。说明这一点的一个例子是有限的汽车工人工会对卡特彼勒的长期罢工的崩溃，该罢工在将近两年后的 1995 年的最后几天被取消。与 1930 年代的装配线不同，今天的卡特彼勒工厂雇用了更多的技术工人。在外国竞争的压力下，卡特彼勒将许多低技能的工作外包出去，关闭了效率低下的工厂，并花费近 20 亿美元将机床电脑化和安装组装机器人。甚至罢工本身也有助于促进节省劳动力的效率。该公司现在声称需要的员工比罢工开始时少了两千人。"生产过程中的大政方针已经发生了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还不明显，部分原因是在大政治条件的革命和它不可避免地引发的制度变化之间总是有一个滞后期。此外，微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意味着产品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其大政治的后果甚至在它们出现之前就可以预见。

他们将使世界变得大不相同。

## 工人对资本家的剥削

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技术的特点使得强行夺取工厂或静坐罢工成为业主或经理们难以应对的策略。正如历史学家 Robert S. McElvaine 所说，静坐罢工 "使雇主很难在不对自己的设备采取同样措施的情况下破坏罢工"。12 实际上，工人们用肉体挟持了业主的资本，使之成为赎金。由于我们在下面探讨的原因，大型工业公司被证明比小型公司更容易成为工会利用的目标。1937 年，通用汽车公司可能是世界上领先的工业公司。

它的工厂是有史以来最大和最昂贵的机械集合体之一，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工人。

通用汽车工厂被迫闲置的每一小时、每一天都会给公司带来一笔小财富。像 1936 年至 1937 年冬季那样，持续数周的罢工没有得到解决，意味着损失迅速膨胀。

## 藐视供求关系

在第三家工厂被查封后，通用汽车无法生产汽车，很快就向工会屈服了。这几乎不是一个基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经济决定。远非如此。当通用汽车同意工会的要求时，美国有九百万人失业，占劳动力的 14%。大多数没有工作的人都很乐意在通用汽车接受工作。他们当然有填补装配线工作的技能，尽管你可能不会从大多数当代的描述中知道这一点。在工业化时期，一种微

妙的礼节笼罩着对劳资关系的直接分析。它的一个借口是认为工厂的工作，特别是在 20 世纪中期，是熟练的工作。这是不真实的。大多数工厂的工作几乎可以由任何能够按时出现的人完成。它们几乎不需要培训，甚至不需要读写能力。就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通用汽车公司的大部分员工要么是文盲，要么是不识字，或者两者都是。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通用汽车的典型装配线工人在装配线上就任前只接受了一天的指导。一个你可以在一天内学会的工作不是熟练的工作。

然而，在 1937 年，非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都在排队乞讨工作，通用汽车工厂的工人能够胁迫他们的雇主增加工资。他们的成功更多的是与暴力的动力有关，而不是与劳动力的供需有关。1937 年 3 月，也就是通用汽车对峙事件解决后的一个月，美国又发生了 17 次静坐罢工。大多数都是成功的。

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每个工业化国家。工人们简单地夺取了工厂，并将其赎回给业主。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策略，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参与的人来说是有利可图和有趣的。一位静坐罢工者写道："我有一个伟大的时间，一些新的东西，一些不同的东西，很多食物和音乐。"1936-37 年的通用汽车静坐罢工和当时的其他强行夺取工厂的行为，是我们在《中国经济周刊》中描述的一种现象的例子。

《血流成河》是 "工人对资本家的剥削"。这并不是皮特-西格在他的悲伤歌曲中所设定的观点。但是，除非你打算在蓝领社区从事民谣歌手的职业，否则重要的是要关注的不是流行的 117 种解释，而是潜在的现实。无论你在哪里看历史，通常都

有一层合理化和虚构的东西，掩盖了任何系统性敲诈的真正的大政治基础。如果你把这些合理化的东西当作表面的东西，你就不可能掌握真正发生的事情。

## 破译敲诈的逻辑

要认识到当前向信息时代转变的巨大政治影响，你必须剥去伪装，专注于社会中暴力的真正逻辑。

这就像剥去一个过熟的洋葱的层次。它可能会让你泪流满面，但不要看走眼。我们首先研究工作场所的敲诈逻辑，然后将分析延伸到涉及资产创造和保护的更广泛问题，以及现代政府的性质。在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大程度上，政府的繁荣，就像工会的繁荣，与可用于敲诈的杠杆直接相关。这种杠杆作用在 19 世纪比在 20 世纪要低得多。在下一个千年，它几乎会下降到消失点。

政府的整个逻辑和权力的特征已经被微处理所改变。当你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时，这可能看起来很夸张。但仔细看看。在二十世纪，政府的繁荣与工会的繁荣并驾齐驱。在本世纪之前，大多数政府征用的资源远远少于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激进的福利国家。同样，在本世纪之前，工会在经济生活中也是很小的或不重要的因素。工人胁迫他们的雇主支付高于市场的工资的能力，取决于同样的大政治条件，这些条件使政府能够抽取经济产出的 40% 或更多的税收。

## 二十世纪前的工作场所勒索行为



工会对资本家敲诈的兴衰，可以很容易地用生产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大政治来解释。1776 年，当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时，工作场所的敲诈条件非常不利，工人 "提高劳动价格" 的 "联合" 很少能够成立。大多数制造业公司都是小规模和家庭经营的。

大规模的工业活动刚刚开始出现。这并不排除暴力的机会，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影响。事实上，在斯密的时代和 19 世纪，工会在英国、美国和其他英美法系国家通常被认为是非法组合。

亚当-斯密用这样的措辞描述了罢工企图。"他们通常的借口有时是食品价格高，有时是他们的主人通过他们的工作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他们总是诉诸于最大声的喧哗，有时诉诸于最令人震惊的暴力和暴行"。4 尽管如此，工人们 "很少从这些骚乱的组合中得到任何好处，"除了 "惩罚或毁掉带头人"。'

十九世纪，工业的规模经济和公司规模都在增长。

然而，大多数人继续作为农民或小业主为自己工作，而工会组织工作，就像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样，继续 "通常以失败告终"。17

工会的法律和政治地位只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改变。第一批成功组织起来的工会是由高技术工人组成的手工业工会，他们通常在没有广泛暴力的情况下组织起来。他们倾向于解决工资增长问题，使之与替换他们的边际成本相匹配。非技术工人的

工会则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倾向于利用向大型企业的转变，专门挑选那些特别容易受到胁迫的行业进行组织，因为这些行业的经营规模较大，或者经营的特点使其所有者面临人身破坏。这种模式从纽卡斯尔到阿根廷都得到了证实。

美国暴力劳工运动的一个早期例子是 1834 年对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的一次袭击。与大多数十九世纪早期的企业不同，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不是一个封闭的和容易保护的行动。按照最初的计划，它将绵延 342 英里，从波托马克河下游到上游有 3000 英尺高。

18 挖掘这样一条沟渠是一项大工程，从未完全完成。尽管如此，仍有大量工人受雇于此，其中一些人很快就认识到，运河可能很容易失去能力。

事实上，如果没有定期的维护，它可能会被钻在拖车道下的麝鼠破坏。在运行中，运河的船闸和渠道可能仅仅因为不小心使用、大雨造成的洪水或无人驾驶的船只的撞击而毁坏。罢工者用沉船或其他杂物封锁航道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1834 年初，在 C&O 上的爱尔兰工人的敌对团伙之间的暴动，导致他们试图发挥这种潜力，夺取运河。然而，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从麦克亨利堡派出联邦军队驱散工人后，这次努力失败了，造成 5 人死亡。

矿山和铁路也是美国工会活动的早期选择目标。与 C&O 运河一样，它们也非常容易遭到破坏。例如，矿场可以被淹没，或在入口处被封锁。仅仅杀死将矿车拖出地下矿井的骡子，就会给矿主带来困难和不愉快的局面。同样地，铁路轨床绵延数英

里，只能艰难地进行守卫。工会的暴徒比较容易袭击矿场和铁路，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试图组织有效工会的过程中，这种攻击变得很常见。这些努力通常在实际工资因通货紧缩而上升的时期最为激烈。当业主试图调整名义工资时，这往往会引发导致暴力的抗议。这类事件在 1873 年恐慌之后的大萧条中很普遍。

1874 年 12 月，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无烟煤田爆发了公开战争。工会组织了一支暴力罢工队伍，以一个名为 "古代希伯尼安" 的秘密社团为掩护。这个团体也被称为 "莫利-马奎尔" (Molly Maguires)，是以恐吓煤田和阻止那些希望工作的矿工而闻名。破坏和毁坏财产，119 次公然谋杀和暗杀，都是对其成员的指控"。铁路员工中也经常发生暴力事件。例如，1877 年 7 月发生了旨在破坏宾夕法尼亚和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的财产的严重事件。

工人们占领了开关，撕毁了铁轨，封锁了车场，破坏了机车，破坏了火车，然后抢劫了火车，甚至更糟糕。在匹兹堡，宾夕法尼亚铁路的圆房被烧毁，里面有数百人。数十人被杀，两千辆火车车厢被烧毁和抢劫，机械车间被毁，还有一个谷物升降机和 125 台机车。联邦军队进行了干预，以恢复秩序。虽然这些早期的罢工被社会主义和工会活动家们同情地解释，但他们几乎没有激发公众的支持。

尽管矿山和铁路等行业存在固有的脆弱性，但总体的大政治条件还不利于工人对资本家的剥削。企业的规模太小，无法促进系统性的敲诈。虽然有脆弱的行业，但它们雇用的人口比例太小，无法广泛分享胁迫雇主的好处。如果没有这种支持，这些行业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业主可以依赖政府

的保护。虽然工会有时试图通过恐吓来阻止地方官员执行禁令，但这些努力也很少成功。即使是最暴力的罢工，也通常在几天或几周内被军事手段镇压。

## 轻松敲诈

当公司规模较小时，工会试图使工资高于市场结算水平的努力很少成功，这对信息时代来说是一个教训。即使是那些明显容易受到破坏的行业，如运河、铁路、有轨电车和矿井，也不容易受到控制。

这并不是因为工会对使用暴力退缩了。恰恰相反。

暴力被大量使用，有时是针对高知名度的个人。例如，在美国劳工运动中被誉为 "矿工复仇" 的案例中，爱达荷州州长弗兰克-斯泰纳伯格曾反对矿工封锁科德莱恩财产的企图，他被工会雇佣的合同杀手投掷的炸弹暗杀了。<sup>21</sup> 但在二十世纪大规模工厂和大规模生产企业出现之前，即使是谋杀和谋杀威胁通常也不足以获得工会的认可。

要理解为什么工会的情况在二十世纪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你必须看一下生产技术的

特点。

随着二十世纪早期几十年蓝领工人就业率的迅速上升，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一变化使处于经济前沿的企业特别容易受到敲诈勒索。事实上，工业技术的物理特性几乎邀请工人采用胁迫手段来摇动资本家。

考虑一下。1.大多数工业产品中都有很高的自然资源含量。这倾向于将生产固定在有限的地点，几乎就像矿场必须位于矿体所在的地方一样。靠近交通中心的工厂，可以方便地接触到零部件供应商和原材料，具有明显的经营优势。这使得像政府和工会这样的强制性组织更容易为自己获取这些优势。

例如，显著的规模经济往往与长的产品周期相伴而行。长的产品周期使市场更加稳定。这反过来又会吸引企业的掠夺性目标，因为它意味着有更长期的利益可供获取。

攻击五家公司比攻击五千家公司要简单得多。工业的集中本身就是一个有利于敲诈的因素。这种优势是自我强化的，因为被胁迫支付垄断工资的公司不太可能面临来自其他公司的激烈竞争，而这些公司并没有被高于市场的劳动力成本所困扰。

因此，工会可以消耗这些公司的相当一部分利润，而不会使它们立即破产。显然，如果雇主在被迫支付高于市场的工资时经常破产，那么工人通过胁迫他们这样做就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他们没有什么选择，只能依靠职业经理人，而这些职业经理人很少持有超过公司流通股中勉强的化学痕迹。对下属经理的依赖削弱了公司对敲诈的抵抗力。经理们缺乏强烈的动机去冒生命危险保护公司的财产。

他们的努力很少与酒类商店和其他小企业的业主在其财产受到威胁时常见的那种好斗精神相匹配。

5.公司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与过去任何时候相比，更多的总劳动力受雇于更少的公司。在某些情况下，数以万计的工人在一家公司找到工作。从军事角度看，业主和经理 121 的人数明显多于受雇于下属职位的人。30 比 1 或更低的比例是很常见的。这种劣势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因为大量的工人聚集在一起，更容易以匿名的方式使用暴力。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不可能与工厂的所有者有任何有意义的接触或关系。这些关系的匿名性无疑使工人更容易忽视业主产权的重要性。

6.在少数公司的大规模就业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与 19 世纪的美国相比，这进一步增强了工会享有的巨大政治优势，当时大多数人都是自营职业者或在小公司工作。1940 年，6% 的美国劳动力从事蓝领工作。<sup>22</sup> 因此，对使用敲诈手段提高工资的支持在大量想象自己可能从中受益的人中蔓延。1938 年至 1939 年对俄亥俄州阿克伦市 1700 人对公司财产的看法的研究就说明了这一点。调查发现，68% 的 CIO 橡胶工人对公司财产的概念很少或没有同情心，'而只有 1% 的人被发现在强烈支持公司产权的分类中。"<sup>23</sup> 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商人，即使是小业主，也属于同样的 "强烈反对公司财产；94% 的人得到的评价是对财产权的极高支持"。

对俄亥俄州阿克伦市 1700 人对公司财产的看法的研究。调查发现，68% 的 CIO 橡胶工人对公司财产的概念很少或没有同情心，'而只有 1% 的人被发现属于强烈支持公司产权的分类"。<sup>23</sup> 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商人，即使是小业主，也属于 "强烈反对公司财产；94% 的人得到的评价是对财产权的极高支持。"<sup>27</sup> 装配线技术是固有的顺序性。整个生产过程取决于零

件按固定顺序的移动和组装，这就造成了更多的破坏性的漏洞。

实际上，装配线就像工厂墙内的一条铁路。如果轨道被阻断，或者一个零件的供应被切断，整个生产过程就会停止。

装配线上的非熟练工人可以和更有能力的人生产同样的产品，这一事实使每个人的经济贡献看起来是平等的，从而促进了平等主义的议程。创业技能和精神努力似乎不那么重要。

现代生产的魅力似乎在于机器本身。如果它们实际上不可能由每个人设计的，但它们似乎在智力上几乎可以为每个人所用。这使得非技术工人被工厂主 "剥削 "的说法更加可信，而工厂主可以把他们从等式中剔除，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任何损失。"我们了解到我们可以拿下工厂，"122 名通用汽车公司的前线人员如是说。"我们已经知道如何经营它们了。如果通用汽车公司不小心，我们就会把二和二放在一起"。2

工业技术的这些特点一致导致了工会的建立，以利用对敲诈的脆弱性，并导致了更大的政府，以对大规模工业设施征收的高额税款来充饥。

这种情况不是一次或两次，它发生在大规模工业扎根的地方。

一次又一次，工会的出现是为了使用暴力来实现大大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工业工厂往往是昂贵的、显眼的、不流动的和昂贵的。

它们几乎不可能被隐藏。它们不能被移动。它们每停工一次，就意味着它们惊人的成本没有得到摊销。

所有这些都使他们成为胁迫性敲诈的活靶子，这一事实在工会的历史上远比二十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让你相信的更明显。著名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在 1944 年提出了这个问题。没有强大的胁迫和恐吓能力的劳工组织是一个不真实的抽象概念。工会现在有这样的权力；只要它们以目前的形式存在，它们一直都有，也将一直有。在权力小或不安全的地方，它必须公开和广泛地行使；大而无当，它就像政府的权力一样，自信地持有，尊重地看待，而很少显眼地展示”。<sup>2</sup>

然而，尽管西蒙斯的分析很精确，但他在一个关键点上是错误的。

他假定工会 "将永远拥有 "他所描述的 "巨大的胁迫和恐吓权力"。事实上，工会正在逐渐消失，不仅是在美国和英国，而且在其他成熟的工业社会。他们正在消退的原因，也是西蒙斯所忽略的，甚至是许多工会组织者所不理解的，是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已经以关键的方式改变了大政治条件，大大增加了财产的安全性。微技术已经开始证明对支持福利国家的勒索的颠覆，因为即使在商业领域，它也创造了与工业时期非常不同的激励。

1. 信息技术的自然资源含量可以忽略不计。它几乎没有任何固有的地点优势。大多数信息技术是高度便携的。因为它可以不受地点的限制，信息技术增加了思想、人员和资本的流动性。通用汽车公司不可能把它在密歇根州弗林特的三条装配线打包后



飞走。一家软件公司却可以。业主们可以把他们的算法下载到便携式电脑中，然后乘下一班飞机离开。这类公司还有一个额外的诱因，可以逃避高额税收或工会要求的垄断工资。较小的公司往往有更多的竞争对手。如果你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竞争者在诱惑你的客户，你就没有能力向政治家或你的雇员支付比他们实际价值高得多的报酬。如果你一个人试图这样做，你的成本会比你的竞争对手高，你会破产。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没有明显的经营优势，意味着像政府和工会这样的胁迫性组织在试图为自己获取一些优势时，不可避免地会减少利用的杠杆。

在信息时代，那些希望通过敲诈来提高工资的工人，将缺乏在工厂内使他们更加可怕的压倒性人数的军事优势。任何公司雇用的人数越少，匿名暴力的机会就越少。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一万名工人被分到五百家公司，对这些公司的财产构成的威胁将小于一家公司的一万名工人，即使工人与业主/经理的比例完全相同。

3.企业规模的缩小也意味着确保高于市场工资的努力不太可能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就像它们在工业时期那样。试图撼动雇主的工会更有可能发现自己处于 19 世纪的运河工人、铁路雇员和矿工的状况。即使少数具有大规模经济的公司作为工业时代的遗留物仍然存在，它们也将在小公司广泛分散就业的背景下进行。小公司和小农户的优势表明，即使重新分配收入的愿望没有改变，社会对产权的支持也更大。

以牺牲自己的工作为代价来争取暂时的高工资，就像为了让房子暖和几度而烧掉自己的家具。

与流水线不同，信息技术可以同时容纳多个过程。它将活动分散在网络上，允许工作站之间的冗余和替换，这些工作站的数量可能达到数千甚至 1.24 亿，并且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在越来越多的活动中，人们有可能在没有任何物理接触的情况下进行合作。由于虚拟现实和视频会议

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在越来越多的活动中，人们有可能在没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下进行合作。随着虚拟现实和视频会议变得更加先进，职能分散和远程办公的趋势将加速。这相当于信息时代的 "放出去"，它打破了中世纪行会的权力。

越来越少的人将在乌烟瘴气的工厂里一起工作，这一事实不仅剥夺了工人以前在工程上对资本家进行敲诈的重要优势；它还使人们甚至越来越难以将工作场所中可以接受的敲诈类型与敲诈区分开来。

迄今为止，只有那些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一起工作并受雇于一家公司的人，才被允许使用暴力来试图提高他们的收入。但是，如果 "工作场所 "不作为一个中心地点存在，而且大部分职能分散给分包商和远程办公人员，那么他们向客户或 "雇主 "勒索钱财的努力就很难与敲诈勒索区分开。例如，一个在威胁要用病毒感染公司电脑的情况下要求获得额外现金的远程办公人员是罢工的工人吗？还是互联网敲诈者？事实证明，他是一个还是另一个将是一个没有区别的区别。在任何情况下，目标公司的反应都可能是一样的。

信息破坏的技术解决方案，如改进的加密和网络安全，可以解决外部黑客的危险，

也应该使心怀不满的雇员或分包商对与他经常或零星打交道的各方造成损害的能力失去意义。

当然，有人可能会建议，工人或远程办公人员可以随时到办公室报到，在那里进行更传统的罢工。但在信息时代，即使这样做也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信息技术超越地域和分散经济功能的能力，意味着雇员和雇主第一次不需要居住在同一管辖区。在这里，我们谈论的不是在梅费尔区和佩克汉姆区之间的区别，而是在百慕大的雇主和在新德里的远程办公人员。

此外，如果印度人被 1936-37 年通用汽车公司大罢工的报道所迷惑，决心前往百慕大进行抗议，他们到达时可能发现根本没有实体办公室。Chiat/Day，一家大型广告公司，已经开始着手拆除其总部。其员工或分包商通过电话转接和互联网保持联系。当有必要召集人才团队来协调客户项目的工作时，他们会租用酒店的会议室。当项目结束时，他们会退房。

微处理有助于将生产过程从流水线的固定顺序中解放出来并分散开来，这一事实大大降低了工会和政府等强制性机构以前所享有的杠杆作用。如果说流水线就像工厂围墙内的铁路，很容易被静止的罢工所占领，那么网络空间则是一个没有实体存在的无限制的领域。

它不能被武力占领或被勒索。在信息时代，希望使用暴力作为杠杆来获取更高的收入的雇员的地位将比 1936-37 年通用汽车公司的静坐罢工者要弱得多。

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在产出不同的地方，收入也不同。在技能不同的领域，大部分的价值往往是由少数人创造的。这是竞争最激烈的市场的一个共同特点。例如，这在体育领域是非常明显的。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踢各种版本的足球。但花在观看足球比赛上的 99% 的钱都是为了看总人数中一小部分球员的表演。

同样地，世界上有很多有抱负的演员和女演员。然而，只有相对较少的人成为明星。同样地，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书籍出版。

但大部分版税都支付给了少数真正能够娱乐读者的畅销书作者。不幸的是，我们并不在其中。

使用相同设备的人之间产出的巨大差异给敲诈带来了另一个障碍。它造成了一个关于如何分享回报的重大谈判问题。当参与某项活动中相对较少的一部分创造了大部分价值时，从数学上讲，他们不可能因为平均收入的胁迫结果而得到更好的待遇。一个软件程序员可能设计出一种控制机器人的算法，而这种算法被证明是价值数百万的。

另一个人用同样的设备工作，可能写出一个毫无价值的程序。生产力更强的程序员不可能希望他的收入与他的同胞的收入挂钩，就像汤姆-克兰西不可能同意将他的图书版税与我们的版税平均。

即使是信息革命的早期阶段，也使得技能和精神能力是经济产出的关键变量这一点比 1975 年时要明显得多。这已经使工业时期盛行的工人敲诈资本家的曾经的合理

性烟消云散。幻想非技术工人实际上创造了似乎被资本家和企业家长不成比例地收入囊中的价值，这已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说法。就信息技术而言，它甚至不是一个可信的虚构。当程序员坐下来写代码时，他的技能和他的产品之间的归属关系太直接了，不允许对谁负责有什么错误。很明显，一个文盲或半文盲是不可能为计算机编程的，这是无可争议的。因此，同样明显的是，由他人编制的程序中的任何价值都不可能是从他那里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主要在看门人中听到工人 "剥削 "的呼声。

信息技术使人明白，低技能者面临的问题不是他们的生产能力被不公平地利用；而是担心他们可能缺乏做出真正经济贡献的能力。正如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所说，信息时代的 "新贵 "汽车公司可能是 "十几个人 "的杰作，他们将大部分零件外包，但仍然生产出比底特律或东京的任何汽车都更精心定制和符合买家意愿的汽车。"汽车，每一辆都是客户定制的，由客户网络订购，并在完成后立即装运。车身的模具由计算机引导的激光器快速成型，并通过客户的反应和目标营销生成设计。一条灵活的机器人生产线负责组装汽车。

机器人的维修和改进是外包给机器人公司的。"2

## "有声音的工具"

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非技术性工作可以由自动化机器、机器人和计算系统（如数字助理）完成。当亚里士多德将奴隶描述为 "有声音的工具 "时，他说的是人类。

在不远的将来，"有声音的工具"，就像寓言中的精灵一样，将能够说话和遵循指令，甚至处理复杂的任务。快速增长的计算能力已经带来了一些语音识别的原始应用，如免提电话和根据口头指令进行数学计算的计算机。在我们写作的时候，将语音转换为文本的计算机在 1996 年底就已经上市了。随着模式识别能力的提高，与语音合成器相连接的计算机将通过网络运行，执行许多以前由人类承担的功能，如电话接线员、秘书、旅行社、行政助理、国际象棋冠军、索赔处理员、作曲家、债券交易员、网络战争专家、武器分析员，甚至是接听 900 电话的街头聪明的调情者。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迈克尔-莫尔丁

（Michael Mauldin）设计了一个名为朱莉娅的人工人格，她几乎能够愚弄与她在互联网上对话的任何人。据媒体报道，朱莉娅是一个聪明的贵妇人，她在互联网上的一个角色扮演游戏中度过她的生活。她很聪明，很有趣，喜欢调情。她还有点像曲棍球高手，能够在一瞬间想出完美的讽刺性评论。然而，朱莉娅不是女士。她是一个机器人，一个只存在于互联网上的人工智能。"28 在人工智能和数字仆人的编程方面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毫无疑问，许多实际应用还在后面。这具有重大的大政治后果。

作为一个整体的个人

为多种应用开发 "有声音的工具" 创造了将个人分散到多种同时进行的活动中的可能性。个人将不再是单一的，而可能是通过智能代理进行的几十甚至几千种活动的集合体。这不仅将极大地提高最有天赋的个人的生产能力；它还将使主权个人在军事上可能比以前的个人更加强大。

一个人不仅能够通过雇用基本上无限数量的智能代理来明显地增加他的活动。他或她甚至能够在死后采取行动。这是第一次，一个人将有能力执行精心设计的任务，即使他在生物学上已经死亡。无论是战争中的敌人还是罪犯，都不可能再通过杀死一个人而完全消灭他的报复能力。这是整个历史上暴力逻辑中更具革命性的创新之一。

## 对信息时代的洞察力

生活中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无人关注的变量上。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认为那些几个世纪甚至几百代以来波动很小的变量是理所当然的。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如果不是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护和敲诈之间的平衡一直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波动，敲诈总是占据上风。信息技术正在为决定诉诸暴力的成本和回报的因素的根本转变奠定基础。智能代理将可以调查并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报复那些发起暴力的人，这一事实仅仅是保护方面新前景的一个暗示。二十五年前，以下声明不过是一个怪人的咆哮："如果你杀了我，我就把你银行账户里的钱扫出来，交给尼泊尔的慈善机构。"在千年之交后，它可能不是。它是否会被证明是一种实际的威胁，将由时间和地点的因素决定。然而，即使潜在的不法分子的账户被证明是不可渗透的，也肯定会有其他代价高昂的恶作剧，而这些恶作剧是一支智能代理军队为报复犯罪而实施的。想一想吧。

## 保护方面的新选择

这只是信息时代的技术所开辟的许多加强保护的方法之一，其中大多数都倾向于破坏政府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对保护和敲诈的几乎垄断。即使没有新技术的炫目，也一直有其他的保护方式，而不是所有的保护方式都倾向于由政府垄断。

感到受到威胁的人可能会直接逃跑。当世界还很年轻，视野还很开阔的时候，人们通常会选择逃离。当人们担心因盗窃或破坏造成的损失时，他们可能会选择购买保险来赔偿这种风险。

诅咒和咒语，虽然是弱的保护形式，但也拯救了生命，抵御了盗窃行为。在掠夺者迷信的社会中，它们有时会发挥作用。贵重物品也可以通过隐藏来保护。在可以采用的情况下，这有时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资产可以被埋藏起来。用锁锁住。

放在高墙后面。并安装了警报器和电子监控装置。但隐藏人身和财产并不总是实用的。

就历史上采用的各种保护手段而言，有一种方法主导了所有其他方法--以暴制暴的能力，调用更大的力量来压倒任何攻击你或偷你财产的人。问题是你到哪里去寻求这种服务，以及你如何激励任何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你与可能对你发动武力的暴徒作战。

有时，近亲也会响应号召。

有时，以部落和宗族为基础的团体充当了非官方的警察，针对其任何成员的血腥暴力作出反应。有时雇佣兵或私人卫队被



雇用来抵御攻击，但并不总是像你希望的那样有用。信息时代的新智能代理，尽管他们的活动将主要局限于网络空间，但增加了一个新的选择。他们的忠诚度，与那些雇佣兵、私人卫兵，甚至是远房表亲不同，将是无可争议的。

## 权力的悖论

使用暴力来保护免受暴力侵害充满了悖论。在迄今存在的条件下，任何你能雇用的团体或机构，如果能成功地保护你的生命和财富不受攻击，也必然有能力夺取这两者。这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缺点。

通常情况下，你可以指望通过竞争来防止经济服务的提供者无视其客户的愿望。但在涉及暴力的地方，直接竞争往往会产生不正常的结果。在过去，它通常会导致暴力的增加。当两个可能的保护机构派出他们的力量来逮捕对方时，其结果更像是内战而不是保护。当你寻求免受暴力的保护时，你通常不希望增加暴力的产出，而是希望压制它。而且，压制暴力的条件是不允许掠夺首先为保护服务付费的客户。

## 垄断与无政府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状态，或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很少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状态。在使用暴力方面的地方竞争通常意味着为保护付出更高的成本，并享受更少的保护。偶尔，自由思想的市场爱好者提出，仅靠市场机制就足以提供产权的维护和生命的保护，<sup>129</sup>而不需要任何主权。<sup>29</sup>有些分析很有道理，但事实是，在工业化的大政治条件下，自

由市场提供警察和司法服务并不可行。只有那些行为高度定型、人口极少且单一的原始社会，才能够在没有政府通过暴力提供地方垄断性保护服务的情况下生存。

超过狩猎和采集部落水平的无政府社会的例子很少而且很古老。它们都属于最简单的孤立的雨水农民的经济。穆斯林之前的阿富汗的卡菲尔人。黑暗时代的一些爱尔兰部落。

巴西、委内瑞拉和巴拉圭的一些印第安人部落。世界上零星地区的其他原住民。他们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组织保护的方法，只有极端案例的行家才知道。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他们，我们在注释中引用了几本包含更多细节的书。<sup>30</sup> 原始群体能够在没有专门从事暴力的独特组织的情况下运作，只是因为他们是小型的、封闭的社会。而且他们是孤立的。

他们可以利用紧密的亲属关系，在有限的范围内抵御大多数暴力威胁，这也是他们唯一可能遇到的威胁。当他们遇到由国家组织的更大的威胁时，他们就会被压倒，并受到外部团体的垄断统治。这种情况一再发生。无论在哪里，只要社会的规模超过乐队和部落，特别是在贸易路线使不同民族接触的地方，暴力专家总是出现，以掠夺更和平的人们所能产生的任何剩余。当技术条件提高了暴力的回报率时，它们注定了那些没有组织起来将大量资源用于战争的社会。

"哪些王子在为警察提供服务？哪些是勒索者甚至是掠夺者？

一个掠夺者只要将他的'获取'规范化，使之与支付能力相适应，以维护他对其他掠夺者的保护，并将他的领土垄断维持足够长的时间，或使之合法化，就可以成为实际上的警察局长。"3 FREDERIC C. LANE

## 政府作为保护的卖方

正如我们在一些地方所说，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为生命和财产提供保护。

然而，政府往往像有组织的犯罪一样运作，从其业务范围内的人那里榨取资源作为贡品或掠夺。

政府不仅是一种保护服务；它也是一种保护性的敲诈。虽然政府提供保护，防止源自他人的暴力，但就像保护费一样，它也向客户收取保护费，以防止它自己强加的伤害。第一个行为是一种经济服务。第二种则是敲诈。

在实践中，这两种形式的 "保护 "可能很难区分。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指出的那样，政府也许最好被理解为 "我们最大的有组织犯罪的例子"。3

即使是最好的政府，其活动也通常涉及保护的经济服务与勒索的某种混合。从历史上看，如果政府能够在其运作的领土上几乎垄断胁迫，那么这两种追求都能得到优化。在一个单一的武装团体能够在使用暴力方面确立优势的情况下，它所提供的保护服务的质量通常远远优于在同一领土上被投入战斗的几个竞争性保护机构中的一个。

## 对土地的自然垄断

实现对胁迫的地方性垄断，不仅使政府能够更有效地保护其潜在客户免受他人的暴力侵害，而且还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运营成本。正如莱恩所说，"使用暴力、控制暴力的行业是一种自然垄断，至少在土地上是这样。在领土范围内，它所提供的服务可以通过垄断来更便宜地生产。"<sup>33</sup>

因此，"在一个毗连的领土内使用武力的垄断权使生产保护的企业能够改进其产品并降低其成本"。"这样一个管理组织如果不必不断地采取军事行动来抵御试图从其客户那里获取保护费的竞争集团，就可以用较少的费用提供更多的保护。

## 垄断与掠夺

当地对强制力的垄断程度直接影响到未来的政府是有更强的动机来保护其掌握的人民还是掠夺他们。当争斗的团体在不安的平衡中搏斗和操纵时，使用掠夺性暴力的动机就会增加。掠夺变得更有吸引力。由于权力不那么稳定，地方上对强制力的垄断也不那么安全，那些有能力使用暴力的人的时间范围就会缩小。"山大王"可能会站在这样一个滑坡上，他不可能期望存活足够长的时间，以实现从遏制暴力的最终结果中分得大量收益。

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什么能阻止那些指挥政府的人利用他们的权力来恐吓和掠夺社会。

因此，武力的逻辑告诉你，在任何领土上活动的竞争性武装团体越多，他们诉诸掠夺性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没有一个压倒性的力量来压制自由的暴力，它往往会扩散，而许多经济和社会合作的成果也会化为乌有。

20 世纪 20 年代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的命运表明，在无政府状态下，暴力得到充分释放，可能会产生破坏。这是我们在《大清相国》中讲述的一个故事。相互竞争的军阀在没有单一的、压倒性的力量来控制他们的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类似的故事说明了类似的观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新闻人员冒着索马里摩加迪沙街头的危险，以活色生香的方式向世界播放了 131 个故事。索马里军阀的武装力量，绰号 "技术派"，在美国领导大规模军事干预以遏制他们之前，给这个悲惨的国家带来了无政府状态。当美国军队的指挥力量撤走后，技术派又拿出了他们的武器，无政府状态再次出现。《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指出。[装有高射炮的卡车再次在尘土飞扬、瓦砾遍地的街道上行驶。穿着 T 恤衫、肩上扛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大摇大摆的年轻人也回来了，他们在临时设置的路障上向过往车辆和公共汽车勒索钱财。

这里有一个民兵控制的街区，武装力量非常强大，当地人把它称为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今天，在这个城市的卑鄙街道上旅行，令人惊讶地想起 1992 年的日子，当时敌对的民兵之间的混乱战争使索马里陷入无政府状态和饥荒，促使美国领导的军事干预。再一次，为了穿越摩加迪沙，旅行者必须雇用一车的武装打手，希

望他们能以每天 100 美元的价格提供保护，外加午餐时间。3

索马里、卢旺达以及你很快会在电视上看到的其他国家的例子提供了一个技术性的证据，即为控制领土而进行的暴力竞争并不像其他形式的竞争那样产生直接的经济收益。恰恰相反。在无政府状态下竞争的游荡的土匪和掠夺者甚至缺乏保护生产活动的微弱激励，而这种激励有时甚至会在独裁者的统治安全时减轻他们的重手。

"我们所称的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在西方，首先是某种程度的垄断。个人被剥夺了自由使用军事武器的权利，而被保留给任何形式的中央当局，同样，对个人财产或收入的征税也集中在一个中央社会当局手中。两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优先于对方；它们是同一垄断的两个方面。如果一个消失了，另一个也会自动随之消失；垄断规则有时会在一方比另一方受到更强烈的动摇。

## 诺贝尔-布里亚斯：保护的演变

莱恩提出了一个论点，我们在想象信息时代如何发展的过程中误用了这个论点。他认为，自黑暗时代以来的西方经济史可以用暴力组织中的竞争和垄断的四个阶段来解释。虽然莱恩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认为影响政府运作规模的大政治因素保持沉默，但他对暴力经济学的探索与我们在《血流成河》和《大清算》中阐述的论点以及本卷中的其他部分密切吻合。

我们已经分析了在罗马灭亡后西方社会的演变中发挥作用的一些大政治因素。

莱恩也研究了这一时期，重点是那种垄断暴力的竞争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他辨析了过去一千年中经济运行的四个重要阶段，每个阶段都涉及暴力组织的不同阶段。<sup>\*</sup>

走出黑暗时代 第一个阶段是 "无政府状态和掠夺"，标志着一千年前的封建革命。虽然莱恩没有具体说明他的任何一个总结时期的日期，但算术上很清楚地确定了他的第一个时期的边界，他对 "无政府和掠夺" 阶段的描述似乎符合从黑暗时代过渡期间的条件，当时暴力的使用 "高度竞争，甚至在陆地上。"<sup>37</sup> 他没有说原因，但当暴力是 "高度竞争" 时，这通常意味着在任何距离上投射权力有重大障碍。在军事方面，防守比进攻更重要。

由于我们在第三章中解释的原因，这一阶段的 "无政府和掠夺" 恰好与不利的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生产力下降相吻合。由于当时的技术几乎没有提供有效的规模经济来帮助确保对暴力的垄断，可能的统治者之间的竞争很普遍。经济活动被扼杀了。

经济的疲软使建立稳定秩序的问题更加严重。要建立一个地方性的暴力垄断，与经济周转的微薄价值相比，军事活动的成本太高。由于没有能力对经济上可行的地区实行有效的垄断，马背上的武装骑士们在为他们的顾客提供 "保护" 的同时，也进行了恐吓和掠夺。

## 封建主义

"第二阶段是在小型地区或省级垄断机构建立后开始的。农业生产随之上升，大部分的盈余被最近建立的暴力垄断者收集"。<sup>38</sup> 尽管如此，在这个第二阶段，即我们认定的中世纪早期，盈余还是相对微薄。

由于在组织暴力方面没有规模优势，经济增长受到抑制，这使得执行地方垄断的军事成本居高不下。但是，虽然成本仍然很高，但由于无政府状态受到限制，经济活动就会扩大，因此，小国可以收取的保护价格也会上升。

在第二阶段的后期，许多进贡者通过对农业和商业企业的特别优惠吸引顾客。他们以低价为那些将新土地投入耕种的人提供保护，并提供特殊的治安服务以鼓励贸易，如香槟区的伯爵们为前来参加他们的集市的 133 名商人组织的"服务"。39 换句话说，当他们能够建立起对领土的足够控制以进行可信的谈判时，地方军阀就像地方商人在需要增加市场份额时所做的那样：他们对服务进行打折以吸引顾客。后来，军阀们利用额外经济活动带来的额外资源，巩固了他们对更大领土的控制。一旦这种控制牢固确立，他们开始享受更多的垄断优势。他们维持治安的军事成本趋于下降，他们也可以提高收费价格，而不必担心这使他们的服务对顾客的吸引力下降。

在西方历史的这一复杂阶段，那些使用暴力的人，即中世纪的领主和君主，拿走了高于生存的大部分剩余。商人很少。最成功的是那些最能逃避或尽量减少那些要求"保护服务"费用的人所征收的税、费和其他费用的人。

早期现代时期 当那些不擅长暴力的商人和地主"比封地所有者和君主获得更多的经济盈余"时，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在这第三阶段，专门使用暴力的企业比向政府购买保护的企业得到的剩余要少。"40 由于成功的商人更有可能将他们的利润再投资而不是消费，所以在这一历史阶段，商人的高利润导致了自我强化的增长。



## 工厂时代

莱恩认为，从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技术和工业创新的出现是赚取利润的更重要因素，而不是降低保护的成本。通过这一点，莱恩似乎指的是 1750 年以来的时期。

从那时起，技术的特点开始在地区的繁荣中发挥明显的主导作用。举个极端的例子，即使是完全没有政府存在的地区，例如 1840 年之前新西兰的一些地区，也不可能仅仅因为不交税而变得高度繁荣。在那个历史时期，工业技术的创新对于实现利润来说，比通过降低保护成本，甚至是降低到零来获得的任何节约都更加重要。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最初由政府为军事行动筹集资源而开创的信贷和融资机制，也可用于资助更大规模的商业企业。

虽然莱恩没有这样说，但技术优势集中在某一地区，减少了各辖区之间的竞争，使"专门使用暴力的企业"或政府能够收取更高的价格。当一个辖区的竞争者与另一个辖区的竞争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技术差距时，就像工业时代那样，拥有最佳技术的辖区的企业家往往能赚更多的钱，尽管他们可能要向政府支付更高的税收和其他费用。

## 微笑的掠夺

工业时代的政府享有令人愉快的垄断权，可以利用。

相对于他们收取的价格（税收），他们提供生命和肢体保护的 actual 成本微乎其微。

然而，他们确实处于一个竞争如此不正常的领域，以至于他们从事的掠夺业务远多于保护业务，而这一事实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是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时刻。

在工业化的大政治条件下，无政府状态的弊端使得在同一地区的保护服务竞争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在这些条件下，实现有效保护的唯一途径是掌握更多的暴力能力。因此，用莱恩的话说，试图更好地区分税收中 "作为提供服务的报酬 " 的部分和 " 另一部分，人们很想称之为掠夺 " 的部分，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但由于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支付税款，因此除了满足病态的好奇心外，充分开发它也没有什么好处。正如莱恩所说，无论税收的哪一部分是掠夺，它们都是人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以避免更严重的损失。"4

## 工业主义下收入的增加

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民族国家统治中，这种困境可以被容忍的部分原因是，收入正在急剧上升，特别是在大多数工业发展所处的管辖区。那些管理经合组织政府的人几乎每年都从收入中获取更高的比例。

但是，掠夺的增加却伴随着更大的繁荣，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财富的更大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对税收激增的反对意见不可避免地是边缘化的，不足以使事件偏离其逻辑进程。事实上，由于前几章阐述的原因，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军事生存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能对其公民的资源要求施加有效的限制。

在每一个工业国家，政策都或多或少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徘徊。

在二战后工业化的高潮时期，边际所得税率达到 90%或更高。这是对国家开采资源的权利的一种更积极的主张，甚至比早期水力文明的东方专制者容易做出的主张还要积极。然而，工业版的掠夺遵循其自身的逻辑。其中大部分是由我们前面描述的 20 世纪上半叶的工业技术的特点决定的。

这种技术使得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没收和重新分配很大一部分收入，而大部分掠夺的负担落在一小部分资本家身上。大多数工业流程都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因此与资源所在的地点紧密相连。一家钢铁厂、一个矿场或一个港口只有在花费巨大的情况下才能移动，或者根本就不能移动。因此，这些设施是固定的目标，很容易被征税。本世纪以来，财产税、公司税和分割税急剧增长。所得税也是如此，首先是对资本家，但最终是对工人本身。大规模工业就业的出现使广泛的所得税成为现实。工资可以从源头上被扣押，税务机关与工业企业的会计部门协调征收。今天，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工厂门口征收所得税，比在乡下从数以百万计的独立工匠和农民身上榨取部分利润要简单得多。

简而言之，与许多早期时期的税收相比，工业技术往往使税收更加常规化，更加可预测，而且个人危险性更小。

尽管如此，它所提取的社会资源的比例比以前任何形式的主权都要高。

保护什么？

社会可以变得更富有，而税收所吸收的总收入比例却大幅上升，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政府为工业经济提供的保护的特点。他们在保护什么？我们的答案是：主要是资本成本高、极易受到攻击的工业设施。大规模工业公司的存在，在一个有更多竞争性暴力的无序环境中是不可能的，即使竞争的结果是缩小了政府在产出中的总体份额。

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密集型业务在美国的贫民窟以及第三世界的社会中是不经济的，因为那里的临时性暴力很普遍。工业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继续发展，因为某种秩序已经建立并维持。企业受到定期的、可预测的洗劫，而不是无规律的暴力。

即使在工业化的高峰期，说政府采用 "武力垄断 "也总是夸大其词。所有政府都试图维持这种垄断，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业公司的雇员通常发现，他们能够对他们的雇主使用暴力。只要普通民众能够获得任何武器，或者无序的人群还保留着掀翻公共汽车或向警察投掷石块の体能，那些控制政府的人就没有完全垄断武力。他们只是控制了主导性的武力，其主导程度使大多数人在现有条件下与他们竞争变得不经济。

信息时代

信息时代正在为西方使用暴力的竞争演变带来第五个阶段。这个阶段是莱恩没有预料到的。

第五阶段涉及网络空间的竞争，这是一个不被任何 "使用暴力的企业 "所垄断的领域。它不受垄断的影响，因为它不是一个领土。

尽管莱恩的论点包含了战后关于民族国家不可避免的传统假设，但他认识到了一个对理解未来比四五十年前看起来更关键的问题。这就是政府从未在公海上建立稳定的胁迫性垄断的事实。

想一想吧。没有任何政府的法律是专门适用于那里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可以理解当经济迁移到根本没有实体存在的网络空间时，暴力和保护的组织将如何演变。正如莱恩在观察没有政府能够垄断海上的暴力时指出的原因一样，一个政府更不可能成功地垄断一个没有物理边界的无限领域。

没有无政府主义的竞争

在过去，当条件使任何一个挥舞暴力的实体难以建立垄断时，其结果是无政府状态和掠夺。然而，信息时代已经改变了组织暴力的技术条件，并且以一种深刻的方式改变了这种条件。与过去不同的是，当时无法垄断一个地区的保护意味着更高的军事成本和更低的经济回报，而政府无法垄断网络空间的事实实际上意味着更低的军事成本和更高的经济回报。

这是因为信息技术在保护方面创造了一个新的层面。

有史以来第一次，信息技术允许创造和保护完全不属于任何个别政府对暴力的领土垄断领域的资产。

"政治权力和治理单位是多元的，并且缺乏一个中央的、稳定的、不受质疑的管辖权和权力的监督来源的国家，必须制定自己的工作方案来处理这种边界引起的问题。"  
4 REES DAVIES

## 与边疆的比喻

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空间相当于中世纪时存在于边境地区的那种受技术保护的行军区域。在过去，当领主和国王的影响力很弱，一个或多个领主的要求在边境地区重叠时，类似于竞争性政府的东西就存在了。看看行军地区是如何运作的，就能了解行军法或类似的东西如何迁移到网络空间。

安道尔作为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种化石式行军区而存在，这是一种大政治条件的产物，使任何一个王国都难以在比利牛斯山脉 190 平方英里的寒冷和几乎无法进入的地区支配对方。1278 年，达成了一项协议，将安道尔的宗主权划分给当地的法国和西班牙封建主，即法国的福瓦伯爵和西班牙的乌尔格尔主教。双方各自任命了两名 "维基尔 "中的一名，他们很少行使最低限度的权利。

达成了一项协议，将安道尔的宗主权划分给当地的法国和西班牙封建领主，即法国

的福瓦伯爵和西班牙的乌格尔主教。他们各自任命了两名 "维基尔 "中的一名，在安道尔很少行使政府的最低限度的 137 项权力，主要是指指挥小小的安道尔民兵，现在是一支警察部队。

伯爵的角色早就被历史所取代了。现在，法国政府在巴黎为他站台。它的职责之一是接受安道尔每年缴纳的一半的贡品，这个数额还不到一个跳蚤公寓的一个月的租金。乌尔格尔的主教继续接受他的那份贡品，就像他的前辈在中世纪所做的那样。

正如分裂的贡品所暗示的，在安道尔有两个 "监督管辖权和权力 "的来源，而不是一个。对安道尔民事诉讼的上诉，传统上是向乌尔格尔主教学院或巴黎的最高上诉法院提出。

安道尔立场模糊的一个后果是，几乎没有颁布任何法律。七百多年来，安道尔一直享有极小的政府和无税的待遇。今天，这使它作为一个避税天堂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但在一代人之前，安道尔是著名的穷国。这里曾经树木茂盛，几个世纪以来，居民们为了在严冬中保持温暖而砍伐了森林。每年 11 月至次年 4 月，整个地方都被大雪封住。即使在夏天，安道尔也非常寒冷，农作物只能在南坡生长。如果我们的描述使它看起来不讨人喜欢，那么你刚刚知道它成功的秘密。在民族国家时代，安道尔作为一块封建飞地得以生存，因为它地处偏远，土地贫瘠。

曾几何时，有许多中世纪的边疆或 "行军 "地区，主权国家在那里融合在一起。这些暴力的边境地区在欧洲的边境地区持续了几十年，有时甚至几个世纪。大多数都

很贫穷。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在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和英国人控制的地区之间，在威尔士和英格兰、苏格兰和英格兰、意大利和法国、法国和西班牙、德国和中欧的斯拉夫人边境之间，以及在英国和德国之间，都存在着游行。

西班牙的基督教王国和格拉纳达的伊斯兰王国。像安道尔一样，这些行进中的地区发展了独特的制度和法律形式，我们有可能在下一个千年再次看到这种形式。

由于两个权力机构的竞争地位，各自都很弱小，统治者有时甚至会在其臣民中征集志愿者到行军地区定居，以扩大其权力的影响。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臣民们被诱使在行军地区定居，因为他们可以免于纳税。鉴于他们竞争的微妙利润，如果一个行军区的任何一个当局试图征税，他将使他的追随者更难维持生计，同时也给每个人提供了与他的竞争对手结盟的理由。因此，游行队伍中的居民通常有一个选择，即决定服从谁的法律。这种选择是基于相互竞争的当局的弱点；这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姿态。

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一些必须解决的实际困难。

在封建制度下，在名义上的边界两边拥有财产的地主面临着严重的义务冲突。例如，位于苏格兰和英格兰边境的领主，如果在两个王国都拥有财产，理论上在发生战争时，可能对两个王国都负有兵役。为了解决这种矛盾的义务，几乎所有封建等级制度的上上下下都可以通过一种叫做 "宣誓" 的法律程序来选择遵守谁的法律。



信息技术将为定居经济活动的竞争性选择创造同等机会，但也有重要的区别。其一是，与中世纪的边疆社会不同，网络空间可能在适当的时候成为最丰富的经济领域。因此，它将倾向于成为一个不断增长而不是消退的边疆。

在中世纪社会的核心地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诱因，通常包括宗教需要，很少有人愿意迁往边境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往往是暴力和贫穷的。因此，他们并不像磁铁一样吸引资源脱离当局的控制。网络空间会。

其次，新的边界不会是双重垄断，这就会招致两个当局之间的勾结，就其边界主张进行妥协。在中世纪时期，这种妥协往往不会有效，原因有二：敌对当局之间经常存在尖锐的文化差距；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强行谈判解决的实际能力，在当地的军事力量不足。在民族国家时代，当国家当局确实开始行使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强行解决问题时，大多数游行地区和模糊的边界都消失了。边界的固定成为常态。如果暴力的双重垄断者面临着对毗连区域划分权力的前景，这就是一个稳定的解决方案。但是，网络经济中的住所交易的竞争将不是在两个当局之间，而是在全球数百个当局之间。

领土所属国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卡特尔来保持高税率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与在有数百个竞争者的市场上串通起来享受垄断价格的做法不可行的原因相同。

作为证据，请看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国塞舌尔颁布的新投资法，美国政府官员将其称为 "欢迎罪犯" 法案。根据该法律，任何在塞舌尔投资 1000 万美元的人不仅将被

保证不被引渡，而且还将获得一本外交护照。然而，与美国政府的断言相反，预期的受益者不是毒贩，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通常都受到更重要的政府的保护，而是那些已经成为政治不正确的独立企业家。塞舌尔法律的第一个潜在受益者是一位南非白人，他通过规避对前种族隔离政权的经济制裁而变得富有。现在他面临着被新的南非政府进行经济报复的危险，并愿意向塞舌尔支付保护费。

无论任何个案的优点是什么，这个例子表明，为什么政府试图维持一个卡特尔来进行实地保护的做法注定要失败。

与中世纪的边界不同，当时的竞争只在两个当局之间进行，而网络商务的边界将在数百个司法管辖区之间进行，其数量可能迅速上升到数千个。

在虚拟公司时代，个人会选择将其赚取收入的活动安置在一个能以最低成本提供最佳服务的管辖区。

换言之，主权将被商业化。与中世纪的边疆社会不同，网络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贫穷和暴力的，但这两者都不是。信息技术促使政府参与的 139 项竞争不是军事方面的竞争，而是经济服务的质量和价格方面的竞争--真正的保护。简而言之，政府将不得不为客户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

## 暴力的效用减弱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会放弃使用暴力。远非如此。相反，我们要说的是，暴力正在失去其很大的影响力。政府方面的一个

可能的反应是在当地加强使用暴力，以弥补其不断下降的全球重要性。然而，无论政府做什么，他们都无法像在现代世界中用暴力使其垄断的领土饱和那样，用暴力使网络空间饱和。无论有多少政府试图进入网络空间，他们在这个领域都不会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和力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族国家试图发动 "信息战争" 来支配或阻挠对网络空间的访问，可能只会加速其自身的消亡。由于规模经济的衰落和将分裂的社会群体维系在一起的成本上升，大型系统下放的趋势已经很强大。信息战争的讽刺意味在于，它们对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脆弱系统的冲击，很可能比对新兴的信息经济本身的冲击更大。

只要基本的信息技术继续发挥作用，网络商务就可以与信息战争的斗争同步进行，而这种情况在领土战争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你无法想象在二十世纪的一场战争中，数百万的商业交易在前线发生。但虚拟战争可能不会耗尽网络空间承载多种活动的任何能力。而且由于虚拟现实不存在，几乎不会有接近的危险，也几乎不会被爆炸的虚拟弹片击中。

## 大规模系统的易损性

信息战的危险将主要是对中央指挥和控制下运作的大规模工业系统的危险。

美国和其他主要民族国家的军事当局都在计划和担心信息破坏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对大型系统的瘫痪产生严重后果。网络战

行为可以关闭一个电话交换站，扰乱空中交通管制，或破坏一个调节城市水流的泵系统。一个编程的病毒甚至可以关闭常规或核发电机，关闭部分电网。所谓的逻辑炸弹可以扰乱大量的信息，其中最敏感的是操作脆弱的、从 140 年代继承下来的大规模系统的中央控制系统。

工业时代。如果没有大规模和全面破坏所有的信息技术，这将使世界经济真正停止，网络商务和虚拟现实将仍然是任何政府无法扼杀的，更不用说垄断了。

即使是信息技术的信号缺点之一，即信息存储系统明显容易腐烂和破坏，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新的档案技术所解决。一个被称为 "高密度只读存储器 "或 "HD-ROM" 的新系统，采用了类似于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中使用的离子磨，在真空中创建档案。现在的存储容量已高达每平方英寸 25,000 兆字节。与早期的系统不同，HD-ROM 中存储的数据容易受到早期衰减和冲击的破坏，而 HD-ROM 中存储的数据则有望长期存在下去。HD-ROM 的开发者之一布鲁斯-拉马丁说："它几乎不受时间、热和机械冲击或对其他存储介质具有破坏性的电磁场的破坏。"<sup>45</sup> 即使是核恐怖分子引爆的爆炸也不一定会扰乱或破坏重要的信息，如数字货币的密码，电子经济的顺利运作将依赖于此。

"现代军队是如此依赖信息，以至于有可能使他们失明和失聪，以便在不进行常规意义上的战斗的情况下取得胜利。"<sup>4</sup>

COL.阿兰-坎彭，美国空军（退役）。

## 虚拟战争的超级大国

随着信息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增加，民族国家在战争中的假设将越来越没有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它没有物理存在，网络空间并不是一个我们在物理世界中所知道的量级具有任何指挥意义的领域。有多少程序员参与规定一连串的命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程序是否能发挥作用。主权个人在网络空间中的重要性可能真的不亚于一个民族国家，它在联合国有自己的席位，有自己的旗帜，有部署在地面的军队。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一些主权个人已经拥有每年数亿的可投资收入，其数额超过了一些破产的民族国家的可支配支出能力。

但这还不是全部。在通过操纵信息发动的虚拟战争方面，一些个人可能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一样大，甚至更大。一个怪异的天才，与数字仆人一起工作，理论上可以在网络战争中取得与一个民族国家相同的影响。比尔-盖茨当然可以。

在这个意义上，主权个人的时代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一个黑客，或一小群数学家，更不用说像微软这样的公司，或几乎所有的计算机软件公司，原则上都可以做五角大楼的网络战争工作组袖子里的任何或所有事情。在硅谷和其他地方有数百家公司已经拥有比 90% 的现有民族国家更强的发动网络战争的能力。

假设政府将继续垄断当地的生活，因为替代性的保护途径在四面八方开放，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想法。一个更有可能的结果是，民族国家将不得不再被重新配置，以减少其对计算机病毒、逻辑炸弹、受感染的

电线以及可被美国国家安全局或一些青少年黑客监控的陷阱程序的脆弱性。

网络空间的巨大政治逻辑表明，目前主宰世界大规模基础设施的中央指挥和控制系统将不得不被具有分布式能力的多中心安全模式所取代，因此它们不能轻易被计算机病毒捕获或封锁。新类型的软件，即所谓的 agoric 开放系统，将取代从工业时代继承下来的指挥和控制软件。旧的软件根据僵硬的优先次序分配计算能力，就像前苏联 Gosplan 的中央规划师根据僵硬的规则将货物分配到箱型车一样。新的系统由模拟市场机制的算法控制，通过模仿大脑中的竞争过程的内部投标过程，更有效地分配资源。在新的千年里，巨大的计算机垄断者不再进行重要的指挥和控制功能，而是分散的。

没有比数字设备公司在其帕洛阿尔托研究实验室提供的例子更能说明分布式网络与指挥和控制系统相比具有的弹性。一位工程师打开了放置该公司自己的计算机网络的壁橱的门。正如凯文-凯利所叙述的那样，这位工程师戏剧性地 "从内脏中拽出了一条电缆。网络绕过了这个漏洞，没有丝毫的动摇。

信息时代不仅会促进网络空间的竞争，而不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重新设计工业主义留下的重要系统。这种重新配置对于使它们不那么容易受到可能来自任何人或任何地方的恶作剧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工业时代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中世纪时期遗留下来的机构的重新配置，如学校和大学，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机构也可能以微型的形式，以反映微观技术逻辑的方式下放。

为了防止信息高速公路上的盗贼，需要广泛采用公钥-私钥加密算法。这些算法已经允许个人电脑的任何用户对任何信息进行编码，比五角大楼仅在一代人之前就能封存其发射密码还要安全。

这些强大的、牢不可破的加密形式将是确保金融交易不受黑客和盗贼侵害的必要条件。

它们也将因另一个原因而成为必要。当私人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意识到美国政府--它可能不是唯一的--有能力穿透目前的银行软件和计算机系统，使一个国家真正破产，或扫除几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的银行账户时，他们将采用不可破解的加密算法。任何个人或国家都没有技术理由将其金融存款或交易置于美国的摆布之下。

国家安全局或克格勃的继承者，或任何类似的组织，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

政府无法穿透的加密算法并不是白日梦。

它们已经可以在互联网上以共享软件的形式提供。当低轨道卫星系统完全可以运行时，使用先进的个人电脑和不比便携式电话大的天线的个人将能够在全球任何地方进行通信，甚至不需要与电话系统接触。政府将不可能垄断网络空间，一个完全没有物理存在的领域，就像中世纪的骑士骑着重型充电器控制工业时期的交易一样。

隐形保护

信息社会将把巨大的资源置于掠夺的领域之外。

当网络空间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交易和其他商业形式的场所时，那里所使用的资源将或多或少地对普通的敲诈和盗窃行为具有免疫力。因此，掠夺者将无法像今天和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那样掌握大量的资源。

因此，不可避免的是，政府对世界财富的很大一部分的保护将是多余的。政府在保护网络空间的银行余额方面不会比你更好。由于政府的必要性降低，其相对价格可能会下降，仅仅是这个原因。还有其他原因。

在新的千年里，随着金融交易在网络空间的份额越来越大，个人将可以选择在哪些司法管辖区进行交易。这将创造激烈的竞争，在非垄断的基础上为政府的服务（它收取的税）定价。这是革命性的。正如乔治-梅卢安在《华尔街日报》上所说，最成功地抵御全球竞争力量的机构是福利国家。"沃顿商学院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讨论了即将到来的对收入转移的力量。杰弗里-加勒特和德博拉-米切尔的结论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市场一体化的增加给他们最基本的福利项目带来了下行压力。相反，他们写道，"政府总是通过增加收入转移来应对与国际市场的进一步融合。网络经济的出现最终将使福利国家最终暴露在真正的竞争中。它将改变主权的性质并改变经济，因为保护和勒索之间的平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摆在保护一边。



## 第7章 输送地方性

### 网络经济的兴起

"真正的问题是控制。互联网的范围太广，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轻易控制。通过创造一个无缝的全球经济区，反主权和不可监管，互联网对民族国家的想法提出了质疑。约翰-佩里-巴洛

信息高速公路已经成为数字时代早期比较熟悉的隐喻之一。它不仅因为其普遍性而引人注目，而且还因为它揭示了对网络经济的普遍误解。高速公路毕竟是人行道的工业版本，是人员和货物的实际运输网络。信息经济并不像高速公路、铁路或管道。它不像横贯加拿大的高速公路将重型卡车从艾伯塔省运到新不伦瑞克省那样，将信息从一个点运到另一个点。世界上所谓的"信息高速公路"不仅仅是一个运输环节。它是目的地。

### 网络空间超越了地域性

它所涉及的内容不外乎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能即时分享数据。新兴的信息经济是建立在连接和重新连接数以百万计的计算机用户的互连上的。它的本质在于这些连接所产生的新的可能性。正如约翰-佩里-巴洛所说："网络提供的是一个新的社会空间的承诺，是全球性的和反主权的，在这个空间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其他人类表达他或她的想法。在这些新媒体中，预示着知识和经济的自由，它可能推翻地球上所有的专制权力"。

网络空间，就像荷马诸神的想象领域一样，是一个与熟悉的农场和工厂的陆地世界不同的领域。然而，它的后果将不是想象的，而是真实的。在比许多人现在所理解的更大程度上，信息的即时共享将像溶剂一样溶解大型机构。它不仅会改变暴力的逻辑，正如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它还会从根本上改变决定企业如何组织和经济运作方式的信息和交易成本。我们预计微处理将改变世界的经济组织。

"今天，比起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一个公司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利用任何地方的资源来生产可以在任何地方销售的产品。"米尔顿-弗里德曼

## 地方的暴政

逐渐消失的工业时代在构想信息经济时的第一个尝试是将其视为一个巨大的公共工程项目，这一事实告诉你，我们的思维是如何立足于过去的范式的。这就像在十八世纪末听到农民把工厂描述为 "一个有屋顶的农场"。然而，"超级公路 "的比喻比这更能说明问题。它还暴露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的暴政。即使技术使我们能够超越地方，我们的解脱工具也被赋予了一个绰号，描述它是一条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路线。

就像大马哈鱼的归巢本能一样，我们的意识仍然被地方性的概念深深地刻住。在整个历史上，直到现在，经济一直被拴在当地的地理区域上。大多数生活在 20 世纪之前的人都像被软禁的囚犯一样度过他们的日子，很少从他们出生的地方走出去超过几天的时间。任何距离的旅行都是几代

人的工作。只有在偶尔的危机中，战争、瘟疫、气候的不利变化才会刺激大规模的迁移。要把人从一个悲惨的村庄迁出，需要一些壮观和紧迫的事情。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刺激人们捆起他们的财物，去寻找更好的生活了。

直到最近，少数人在他们自己的地方以外寻找机会，往往会成名。想想看，马可-波罗至今仍因穿越欧亚大陆访问大汗的宫廷而闻名。在他的时代，他是个例外。

在前现代时期，很少有其他游记存世。在更广泛的阅读中，曼德维尔的《游记》于1357年用法语写成，值得注意的是它是由一个可能从未离开过欧洲的人创作的。曼德维尔传达了关于全球各地生活的令人愉快的、经常令人遐想的细节，包括许多埃塞俄比亚人只有一只脚的说法。["他的脚非常大，以至于当他们躺下休息时，整个身体都会被太阳照到"。3 很明显，很少有

曼德维尔的同时代人在阅读他的流行故事时，很可能已经知道他的埃塞俄比亚 "大脚 "并不存在。

直到15世纪末，现代的探索之旅开始，各大洲之间才有了持续的接触。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这样无畏的船长，为了捕捉香料贸易而出发，他们的不凡足以让每个有文化的家庭在五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记住他们。从农耕时代开始，直到最近几代，生活的特点是不动声色。今天，这一点几乎被遗忘了，特别是在 "新世界 "的欧洲定居殖民地，那里的移动更加流畅，每个人都倾向于从移民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北美小学教育的一个

主题是，殖民者从欧洲来寻求自由和机会，这是事实。然而，很少有人告诉我们，大多数人是多么不愿意去旅行，甚至在面对国内的贫困时也不愿意。为数不多的移民为了自立而遭受了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磨难。只有最有进取心的人或最绝望的穷人才会来。十七世纪中叶，被关在伦敦臭名昭著的教养院 Bridewell 的囚犯们造反，以示 "他们不愿意去弗吉尼亚"。4 1720 年，巴黎街头发生了暴动，以释放预定被驱逐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流浪汉、小偷和杀人犯。

## 狭窄的地平线

沟通和运输方面的实际困难，在大多数时间和地点因语言技能有限而变得更加复杂，使人类行动的重点变得狭窄和局部。

就在二十世纪初，即使在沿海地区，相距仅五英里的中国村庄说着相互无法理解的方言是很常见的。几乎所有经济体的地方组织都带来了市场狭窄和机会丧失的惩罚。由于竞争有限，要素成本一直很高。获得专门技能的机会很少。由于收入太低，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且无法获得外部资本或有效的保险市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小农都陷入了贫困之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封闭的乡村生活给农民带来的一些困难。即使是现在，在我们写作的时候，至少有 10 亿人，主要是在亚洲和非洲，在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情况下挣扎求生。

"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

在比人们普遍意识到的更大程度上，人和他们的资产的不可移动性已经影响了我们

看待世界的方式。即使是那些似乎最愿意同意在 20 世纪结束时地球是一个小地方的人，也继续用陈旧的工业政治概念来思考。20 世纪 80 年代在环保主义者中流行的一句口号就强调了这一点。"全球思考，本地行动"。这个口号反映了政治的逻辑，这个逻辑一直是以地方权力优势为基础的。地方性的思维习惯是由过去所有社会的大政治所决定的。所有作为行使权力的障碍或促进因素的地形特征都是地方性的。每条河、每座山、每座岛都是本地的。气候是地方性的。温度、降雨量和生长条件随着你爬上和越过一座山而变化。每一种流通的微生物都在某个地方流通，而不是在其他地方。难怪地方的暴政渗透到我们关于社会必须如何组织和运作的概念中。让一个群体或另一个群体在当地垄断暴力的权力优势，迄今为止总是起源于某个地方，并在划定边界的大政治边缘消逝。这就是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存在的原因。虽然地方对权力行使的重要性很少被明确指出，但早在 1930 年代，一些主张用强制手段重新分配人类行动回报的人就开始感觉到地方的影响力在下降。他们在现代交通中看到了社会空间在高收入者和贫困者之间的划分。约翰-多斯-帕索斯 ( John Dos Passos ) 在《大钱》中捕捉到了这种恐惧。"'流浪汉'坐在高速公路的边缘，破败，饥饿。头顶上，飞着一架横跨大陆的飞机，上面坐满了高薪的管理人员。上层阶级乘坐飞机，下层阶级乘坐公路：他们之间不再有任何联系，他们是两个国家。"

"5 这是另一种说法，交通的改善减少了敲诈勒索的杠杆，只是因为

早在 1930 年代。他们在现代交通中看到了高收入者和穷人之间的社会空间划分。这种恐惧被约翰-多斯-帕索斯在《大钱》中捕捉到了。"'流浪汉'坐在高速公路的边缘，破碎，饥饿。头顶上，飞着一架横跨

大陆的飞机，上面坐满了高薪的管理人员。上层阶级乘坐飞机，下层阶级乘坐公路：他们之间不再有任何联系，他们是两个国家。"5 这是另一种说法，交通的改善仅仅通过增加成功人士可能选择的地方来减少勒索的杠杆。当然，下面道路上的流浪者没有资格向头顶上的飞行者要求施舍。多斯-帕索斯在 60 年前观察到的这种趋势现在变得更加明显。

## 大众交通

1995 年，每天有一百万人在世界某个地方跨越边界。

这代表了与过去相比的一个惊人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之前，旅行是如此的不频繁，以至于大多数边界只是边界，而不是过境的障碍。护照是未知的。远洋轮船、火车和其他改进的交通形式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流动。但是，这种流动变得更加受到国家的严格监管，而交通和通信的改进也增加了国家的权力，使平民旅行变得更加便宜和容易。电影，尤其是电视的出现，也极大地开阔了视野，刺激了旅行和移民。然而，直到现在，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基本假设仍然固定在地方上。

## 澄清最小期望值的错误

对想象力的地理束缚仍然如此之紧，以至于一些专家在 1995 年研究互联网时认为，除了作为聊天的电子媒介和色情制品的出口外，它几乎没有任何商业潜力和意义。

许多怀疑网络空间经济重要性的人是信息时代的 Blimps 上校。他们的自满情绪可

与 20 世纪 30 年代面临帝国衰落的英国机构相媲美。每当精英们发现自己受到威胁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否认。这表现在对互联网的美好希望永远不会达到什么程度，有时还得到应该更了解情况的当局的认可。我们之前提到了大卫-克莱恩和丹尼尔-伯斯坦的作品《公路勇士》。沿着信息高速公路的梦想和噩梦。

他们对网络经济潜力的否定再次证明，在技术上消息灵通并不等同于理解技术的后果。一个英国议会委员会在 1878 年召开会议，审议托马斯-爱迪生的白炽灯的前景，报告说爱迪生的想法 "对我们的跨大西洋朋友来说足够好，.....但不值得实用或科学人士关注"。

托马斯-爱迪生本人是一个具有伟大远见的人，但他认为他发明的留声机将主要被商人用于听写。就在莱特兄弟证明飞机会飞之前不久，杰出的美国天文学家西蒙-纽科姆权威地证明了为什么比空气重的飞行是不可能的。他总结道。"作者认为，已知的物质、已知的机械形式和已知的力的形式，没有任何可能的组合可以结合在一个实用的机器中，使人可以在空中飞行很远的距离，这似乎是对任何物理事实的证明，是最完整的。"在飞机开始飞行后不久，另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威廉-H。

皮克林，向公众解释了为什么商业旅行永远不会起步。"在大众的心目中，巨大的飞行器经常在大西洋上飞驰，以类似于我们现代蒸汽船的方式搭载无数的乘客。...[很明显，以我们目前的设备，没有希望与我们的火车头或汽车竞争速度"。

我们曾回顾过另一个关于新技术潜力的极不准确的预言--二十世纪初，梅赛德斯的制造商预测全世界的汽车数量永远不会超过一百万辆。同样，他们对汽车的了解几乎比任何人都多，但他们在估计汽车对社会的影响方面错得不能再错。鉴于这种毫无头绪的误解的传统，许多观察家对新的信息技术的最重要的影响掌握得很慢也就不足为奇了--它超越了地方的暴政。新技术第一次为经济活动创造了一个无限的、非地球的领域。它为探索网络经济的新领域，为 "全球思考，全球行动 "提供了选择。本章解释了原因。

## 超越地域

信息的处理和使用正在迅速取代和修改实物产品，成为最重要的利润来源。这产生了重大的后果。

信息技术使赚取收入的潜力与居住在任何特定的地理位置相分离。由于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有越来越大的部分是通过在产品中加入创意和知识来创造的，因此，在地方管辖范围内的增值部分将越来越小，可以被捕获。思想可以在任何地方形成，并以光速在全球传播。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信息经济将与工厂时代的经济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承认批评者的观点，即在 1996 年你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任务的叙述可能看起来很平凡。毕竟，在网上阅读一篇关于园艺的文章，或者远距离购买一箱葡萄酒，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革命性。然而，网络经济的潜力不能仅仅根据其早期的开始来判断，就像汽车改变社会的潜力可以通过你在 1900 年看到的東西来判断一样。我们预计网络经济将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



信息时代最原始的表现是，网络只是作为一种信息媒介来促进普通工业时代的交易。在这一点上，网络不过是一个奇特的目录传递系统。例如，虚拟葡萄园（Virtual Vineyards）是最早的网络商人之一，它只是在万维网上的一个网页上销售葡萄酒。这种交易还没有直接颠覆旧的机构。他们使用工业货币，并在可识别的管辖范围内进行。互联网的这些用途几乎没有这种巨大的政治影响。

互联网商务的中间阶段将以工业时代不可能实现的方式运用信息技术，如远程会计或医疗诊断。这些先进计算能力的新应用的更多例子将在下文详述。网络商业的第二阶段仍将在旧的制度框架内运作，使用国家货币并服从于民族国家的管辖。利用网络进行销售的商人还不会利用它来储存他们的利润，只是为了赚取收入。这些通过互联网交易获得的利润仍将被征税。

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将标志着向真正的网络商务的过渡。交易不仅会在网络上发生，而且会转移到民族国家的管辖范围之外。付款将以网络货币的形式进行。利润将被记入网络银行。投资将在网络经纪公司进行。许多交易将不会被征税。在这个阶段，网络商务将开始产生我们已经概述过的那种重大的大政治后果。政府对传统经济领域的权力将被网络的新逻辑所改变。域外监管权力将崩溃。公司的结构将发生变化，工作和就业的性质也将发生变化，这些对信息革命阶段的概述只是对可能是最深远的经济转型事件的最简单的描述。

商业的全球化

在信息时代，大多数目前的司法优势将被技术迅速侵蚀。新类型的优势将出现。通信成本的下降已经降低了对作为做生意的必要条件的邻近性的需求。1946 年，伦敦的投资者向纽约的经纪人下订单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只有最大和最有说服力的交易才有理由这样做：纽约和伦敦之间三分钟的电话费为 650 美元。今天，它的价格是 0.91 美元。半个世纪以来，一个洲际电话的价格已经下降了 99% 以上。

## 融合性沟通

很快，洲际聊天和本地电话之间的区别可能就很小了。同样，你的电话、电脑和电视之间的区别也可能是如此。所有这些都将是互动的通信设备，从人体工程学的角度而不是功能的角度更容易区分。你将能够使用你的个人电脑上的麦克风和扬声器在互联网上进行语音对话。或者看一部电影。你将能够与你的电视对话，并通过电视娱乐媒体提供的网络交流大量的数据。随着工业时代对各种通信形式的区分的打破和成本的骤降，越来越多的服务将按使用时间而不是按信息的目的地收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对话或数据传输都将比 1985 年大多数地区的本地电话费用高得多。

## 未联网的互联网

低轨道卫星和其他无线技术方法将直接向你口袋里的呼叫器、便携式电脑或工作站来回传输信息，根本不需要与当地的电话运营或电视电缆系统打交道。简而言之，互联网将是不联网的。由于早期无线媒体的数据传输速度相对较慢，以及难以 "听到 "来自用户设备的微弱信号，其中一些

设备将是移动和电池供电的，因此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必然会停滞不前。尽管如此，这些技术问题将得到处理和解决。

## 商业无国界

计算能力的持续扩展将导致更好的压缩技术，加速数据流动。现有的公钥：私钥加密算法的广泛采用将使供应商，如卫星系统，将计费功能纳入服务，降低成本。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供应商将能够以法国电信在巴黎电话亭中使用的 "智能卡 "的方式，从个人计算机上加载的账户中扣款。

## 电话成为银行

不同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你将能够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易为你的账户赚取积分，并随身携带你的电话盒。你的个人电脑将成为你的银行和全球货币经纪公司的分支机构，以及相当于你购买匿名电话卡的巴黎小卖部。而像 150

将是你的银行和全球货币经纪公司的分支机构，以及相当于你购买匿名电话卡的巴黎小卖部。就像 150 个智能卡付费电话，如果用撬棍撬开，对小偷来说是没有用的，你的电脑只能被有能力破解或操纵复杂的电脑代码的人突袭。这将排除很多有能力操纵撬棍的流氓。有了适当的加密，你的电脑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破译或滥用。到千年之交，你将能够在南极洲以北的几乎任何地方进行交易。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有线或数字蜂窝电话。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交互式有线电视系统。

任何有卫星在头顶或有其他无线传输系统的地方。

你将能够随意地通过虚拟现实说话、传输数据和旅行，跨越国界和边界。通过区号识别说话人所在地的电话号码可能会被通用接入号码所取代，这些号码可以到达地球上任何地方与你想沟通的一方。

## 了解中文

你将不仅能够交谈和发送传真。假以时日，你将能够缩短多年的学习过程，用中文与上海的一个工厂工头交谈。你不会说他的语言或方言将不再那么重要。

他的话可能是中文，但你会听到这些话被粗略地翻译成英文的 Transcending Locality I 8。他将听到你的中文对话。随着时间的推移，采用即时翻译的能力将大大增加在那些语言和习语障碍严重的地区的竞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中国政府可能不希望电话被打出去，这一点将不重要或根本不重要。

## 定制的媒体

随着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机会来定制你在其中的特殊位置。甚至你定期从媒体收到的信息也将是你选择的信息。大众媒体将成为个性化的媒体。如果你对国际象棋感兴趣，或者是一个敏锐的 ca 爱好者，你将能够为你的晚间新闻广播编程，以介绍对你来说重要的关于猫或国际象棋的信息。你将不再受丹-拉瑟或英国广播公司

(BBC)的摆布，以获得你的新闻。你将能够选择根据你的指示编排和编辑的新闻。

## 从大规模生产到定制化生产

如果消息不畅，你可以在万维网上访问虚拟目录。

如果你看到一条你几乎喜欢的裤子，你可以在下订单时调整袖口的宽度。它将由马来西亚的 151 个机器人根据扫描到你的电脑并通过网络传输的照片进行定制剪裁，以适合你的身体。

## 网络经纪

你将能够使用网络货币进行投资，以及支付服务和产品的费用。如果你生活在像美国这样的司法管辖区，对你的投资选择有严格的监管，你可以选择在一个允许自由追求全方位投资选择的司法管辖区注册你的活动。

无论你住在克利夫兰还是贝洛奥里藏特，你都可以在百慕大、开曼群岛、里约热内卢或布宜诺斯艾利斯做你的投资业务。无论你在哪里，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数字资源的使用将越来越广泛。你将能够使用专家系统来帮助选择你的投资，并使用网络会计师和簿记员来实时监控你所持有的资产的进展。

## 虚拟文化

当你不审查损益数据时，你可以对卢浮宫进行一次虚拟参观。你的旅行可能需要你向比尔-盖茨或购买了参观博物馆的虚拟现实权利的有同样远见的人支付相当于三分之一的版权费。当你在想蒙娜丽莎的牙齿是否有问题时，你的电脑可能正在下载 S. I. Hsiung 的《西厢记》译本。在你选择的时间，你的个人通信系统会像古代的吟游诗人一样大声朗读这段文字。多任务程序将允许你同时执行许多功能。

## 在网上选购司法管辖区

如果你受到了经典作品的启发，你可以组织一个虚拟公司，推销著名文学作品的戏剧性作品，通过三维视网膜显示器观看。这些图像不是被投射到空中，而是通过每秒波动 5 万次的低能量激光直接投射到观众的视网膜上。这项技术已经由华盛顿州西雅图的 MicroVision 公司开发，将使许多法定盲人能够看到。在进行这个项目之前，你可以指示你的数字助理对马来西亚、中国、秘鲁、巴西和捷克共和国的生产设施的现行保护合同进行拉拢。当你选定一个地点时，你将能够在一小时内巴哈马注册成立公司，由圣乔治信托公司提供。你的指示将把公司的所有流动资产放在一个同时注册在纽芬兰、开曼群岛、乌拉圭、阿根廷和列支敦士登的网络银行的网络账户中。如果任何一个司法管辖区试图撤销 152 个经营权或扣押存款人的资产，这些资产将以光速自动转移到另一个司法管辖区。

## 质的进步

你很快就能在网络空间进行的许多交易，在工业时代是不可能的，而且不仅仅是因

为它们跨越了语言障碍。让你的数字助理去寻找在匈牙利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未经翻译的文章，与与图书管理员交谈有本质的不同。在五千英里以外的地方旁听牛津大学的教程，与你在卡福克斯六英里范围内睡觉时参加教程是不一样的。而在蒙特卡洛的巴黎酒店玩轮盘，当你可以在乌拉圭埃斯特角的一个派对上通过虚拟现实来玩轮盘时，是一种新颖的体验。

## 对网络医生的网络访问

在短时间内，比许多专家现在认为可能的速度更快，活动将迁移到网络经济中，以新颖的方式结合技术，超越地方的暴政和工业经济的陈旧机构。不久的一天，如果你有胃痛，你将能够咨询一个数字医生，一个对症状、疾病和解药有着百科全书式知识的专家系统。它将以加密的形式访问你的病史，询问你的疼痛是发生在饭后还是饭前。它是尖锐的还是钝的，是持续的还是偶发的。无论医生问什么问题，数字医生都会问。它可能确定你喝了太多的酒，或者喝得不够。你可能会被转到一个网络专家那里。如果你需要做手术，百慕大的网络医生可能会借助进行微创手术的专业设备进行远程手术。

## 生与死的信息处理

这可能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但网络手术的许多组成部分已经到位。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其他的部件也将发挥作用。通用电气公司已将一种新的磁共振治疗机

（MRT）引入世界各地的 15 家医院。该机器预计有三年的研究和开发阶段，但在这之后，它可能会迅速蔓延，成为许多类型手术的规范。这是一个例子，但也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技术正在改变社会。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磁共振成像（MRI）机，其中磁共振技术被用来为医生提供软组织图像用于诊断。它们提供比 X 射线或超声波更好的软组织图像，并已成为现代诊断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癌症方面。然而，它们有两个 153

一，技术正在改变社会的方式。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磁共振成像（MRI）机，其中磁共振技术被用来为医生提供用于诊断的软组织图像。它们提供比 X 射线或超声波更好的软组织图像，并已成为现代诊断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癌症方面。然而，它们目前有两个 153 的重大限制。管子不允许自由接触病人；机器的功率有限。

## 网络外科

通用电气公司已经重新设计了磁共振仪，以便它们可以用于治疗和诊断。功率已经提高了五倍。管子实际上已被切成两半，因此病人将躺在两个甜甜圈形状的单元之间，而不是完全被封闭起来。外科医生将能够在手术过程中看到他正在做的事情，而不是拍摄图像，然后根据该图像进行手术。MRT 将与使用微技术的无创或少创手术相结合。外科医生不必用手术刀做大的切口，而是用探针做微小的切口，并能在操作时看到探针所显示的内容。他将根据图像进行手术，而不是直接观察身体。原则上，探针将可以从远处进行操作。他们将能够用激光或低温加热或冷冻--非常精确的设备来摧毁肿瘤。

这将允许现在不可能进行的手术，特别是在神经外科，肿瘤往往非常接近大脑的重



要部位。它还将允许重复手术，因为传统外科手术的创伤不能在不可接受的损害的情况下重复进行。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到 2010 年，用于软组织手术的刀可能会被视为一种过时的遗物。如果这是真的，许多恐惧和许多余震将从手术中消除。很明显，这对病人来说是个好消息。现在需要数小时才能完成的手术，以及随后必须在医院住院数天或数周的手术，将只需要半小时，而且可能根本不需要住院。事实上，外科医生和病人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是，这将对医院和外科医生产生什么影响？

## 更少的显微外科医生做更多的事

外科手术将有一场革命。在培训中，三分之一的年轻外科医生未能获得显微外科手术所需的技能。三分之一的人只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三分之一的人成为优秀。在高级外科医生的转换课程中也有类似的比例。更少的外科医生将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更多的手术。医疗保险机构和寻求手术的个人可能会坚持要求每个外科医生的结果统计，这将有相当大的差异。病人会想去找那些能产生最佳效果的外科医生，特别是在他们的病情危及生命的情况下。

在某些情况下，最好的外科医生可能会进行远距离手术。他们可能从另一个司法管辖区进行整个手术，那里的税率较低，而且法院不接受高昂的渎职索赔。

## 数字律师

在同意进行手术之前，熟练的外科医生可能会请数字律师起草一份即时合同，根据

磁共振机显示的图像所显示的肿瘤的大小和特征来指定和限制责任。数字律师将是自动选择合同条款的信息检索系统，采用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程序来定制私人合同以满足跨国法律条件。

大多数高价值或重要交易的参与者不仅会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来开展业务；他们也会为其交易选择合适的住所。

## 紧急咨询

继续以网络外科为例，信息时代的技术将对外科的最高技能给予重视，正如它在几乎所有的工作中一样。

只要有刀子，病人就愿意支付这样的溢价。

但是，信息的局限性和在任何特定地区的紧急情况下寻找外科医生的困难使外科手术市场变得非常不完善。在信息时代，它的不完善程度会有所降低。一个需要在 24 小时内，甚至 45 分钟内进行手术的病人，可以委托数字助理找到全球十大可远程执行此类任务的外科医生，审查他们在类似病例中的成功率，并从相应的数字仆人那里寻求对其特定病例的报价。所有这些都可以在瞬间完成。

因此，最受欢迎的 10% 的外科医生将在全球手术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份额。MRT 机器，加上显微外科技术，将提高他们工作的溢价。技术较差的外科医生将专注于残留的本地市场。这个生死攸关的例子有助于说明将经济从地方的暴政中解放出来的一些革命性后果。有人可能会反对说，

通用电气的 MRT 机器并不是为了远距离使用的。

也许，但这错过了重点。它或一些类似的设备很快就会成为现实。当外科医生看着屏幕而不是直接看着病人进行手术时，外科医生和他的屏幕在哪里就没有我们现在想象的那么重要了。越来越多的服务注定要被重新配置，以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即信息技术允许全球任何地方的人进行互动，即使是像手术这样微妙的事情。在那些需要不那么精确的设备和涉及较低的失败风险的活动中，网络经济将更加迅速地发展。

"福利国家的财政政策要求财富拥有者没有办法保护自己。"阿兰-格林斯潘

## 强迫性的贬值

在几乎每一个竞争领域，包括世界上大多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投资活动中，交易向网络空间的迁移将受到一种几乎是水压的驱动--避免掠夺性税收的动力，包括通货膨胀对每个以国家货币持有财富的人征收的税。

## 逃出保护圈

你不需要长时间思考信息时代的大政治，就会意识到，最富有的工业国家作为权利问题强加给其公民的那种掠夺性税收和通货膨胀，在网络空间的新领域将是荒谬的没有竞争力的。千禧年过后不久，任何按照目前的税率缴纳所得税的人都将是出于选择。正如弗雷德里克-C。

莱恩指出，历史表明，在 "边境和公海上，没有人能够持久地垄断暴力的使用，商人们避免支付如此高的费用，因为通过其他手段可以更便宜地获得保护。" 网络经济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选择。没有政府能够垄断它。它所包含的信息技术将为金融资产提供比大多数政府有理由提供的更便宜和更有效的保护。

## 复利的黑魔法

请记住，假设你能实现 10% 的资本回报率，四十年来每年支付的每 5,000 美元的税款使你的净资产减少 220 万美元。如果有 20% 的回报率，复合损失就会膨胀到约 4400 万美元。

对于高税率国家的高收入者来说，一生中因掠夺性征税而造成的累积损失是惊人的。大多数人将失去比他们曾经拥有的更多。这听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数学上是清楚的。这是一个你可以用口袋里的计算器自己确认的事情。美国最高 1% 的纳税人每年平均支付超过 125,000 美元的联邦所得税。只要付出这个数字的一小部分，即每年 45,000 美元，就可以根据私人税收条约在瑞士生活，并享受由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诚实的警察和司法系统提供的法律和秩序。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这个慷慨的水平之上，每年额外支付的 80,000 美元所得税很可能被归类为贡品或掠夺。考虑到警察保护是一种公共产品，4.5 万美元肯定是对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大量支付。理论上，公共产品可以在边际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扩展到其他用户。瑞士人很高兴让你每年支付 45,000 美元（50,000 瑞士法郎）的协商

固定税款，因为他们从每个签约的百万富翁身上每年都能赚到 45,000 美元。

与瑞士的选择相比，对于一个平均收益率能达到 20% 的投资者来说，按美国税率缴纳联邦所得税的终生损失将是 7.05 亿美元。但请记住，这是以每年缴税 45,000 美元为前提的。

与百慕大这样的避税天堂相比，那里的所得税为零，按美国税率缴税，一生的损失约为 11 亿美元。你可能会反对，20% 的年回报率是一个高回报率。毫无疑问，你会是对的。但考虑到近几十年来亚洲惊人的增长，世界上许多投资者已经取得了这个成绩，甚至更好。自 1950 年以来，香港房地产的复合回报率每年都超过 20%。

即使是一些不那么广为人知的经济增长，也提供了容易获得高额利润的机会。在过去三十年里，你可以在巴拉圭银行的美元存款中获得平均每年超过 30% 的实际回报。高投资回报在一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实现，但熟练的投资者肯定可以在好的年份实现 20% 或更多的利润，即使他们不能始终与乔治·索罗斯或沃伦·巴菲特的表现相媲美。

显然，你的资本可以获得的回报率越高，掠夺性收入和资本利得税所带来的机会成本就越大。但是，损失巨大，确实大于你可能积累的财富总额的结论，并不取决于你能取得离奇的回报率。在美国经营的一些共同基金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平均年收益超过 10%。如果你不能做得更好，而且你是美国收入最高的 1%，那么你的净资产仅因你每年支付的超过 45,000 美元的所得税就减少了 3300 多万美元。与一

个没有所得税的司法管辖区相比，损失是 5500 万美元。

如果经济学家的利润最大化假设是正确的，正如我们认为的那样，你可以做出的一个更确定的预测是，如果可以的话，大多数人会采取行动挽回 5500 万美元。这就是我们的预测。当复利的黑魔法在高税率国家的成功人士的头脑中变得更加清晰时，他们将开始认真地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之间购物，就像他们现在购买汽车或比较保险单的费率一样。如果你怀疑这一点，只需在纽约或多伦多的街道上随机拦下一些人，问他们是否愿意为 5500 万美元搬到百慕大。

这个问题自己回答。它所提出的难题让人想起马克-吐温在决定是选择与莉莲-拉塞尔赤身裸体过夜，还是选择与穿着全套军装的格兰特将军过夜时所想象到的情况。他并没有考虑很久。

成熟的福利国家的居民，特别是美国的居民，可能接受得比较慢，但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意识到。你或任何被改善生活的愿望所驱使的人都会看到减少你因掠夺性征税而遭受的损失吸引力。你只需要把你的交易放在网络空间里。

当然，这在许多司法管辖区都是非法的。但旧的法律很少能抵制新技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美国发送传真信息是非法的。美国邮局认为传真是头等舱邮件，在此基础上再加上 157 美元。

美国邮局宣称拥有古老的垄断权。为此颁布了一项法令，重申要求所有的传真传输都要转到最近的邮局，与普通邮件一起送达。数以亿计的传真信息之后，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人遵守过这一法律。如果有，遵守也是转瞬即逝。在新兴的网络经济中运作的优势比在发送传真时避开邮局更有说服力。

公钥/私钥加密技术的广泛采用，将很快使许多经济活动在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完成。正如《战略投资》的技术编辑 James Bennet 所写的那样。法律的执行，特别是税法的执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通信和交易的监控。一旦采取了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离岸银行地点提供了使用从公钥系统中得出的账号在硬 RSA 加密的电子邮件中进行通信的服务，金融交易将几乎不可能在银行或通信中被监控。即使税务机关在离岸银行安插内鬼，或者盗窃银行记录，他们也无法识别储户'。2

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个人将能够决定他们的经济活动在哪里定居，以及他们愿意支付多少所得税。信息时代的许多交易将根本不需要在任何领土主权上注册。那些需要的交易将越来越多地在百慕大、开曼群岛、乌拉圭或类似的司法管辖区进行，这些地方不对商业征收所得税或其他昂贵的交易负担。

## 从垄断到竞争

政府已经习惯于强加 "保护服务"，用弗雷德里克-C-莱恩的话说，就是 "质量差，价格高得离谱"。这种收费远远超过政府服务实际价值的习惯是通过几个世纪的垄断形成的。税收被无情地加在任何看起来

有能力支付的人身上--正是因为政府垄断了或几乎垄断了强制力。这种垄断的传统将与网络商务的新的巨大政治可能性发生深刻的冲突。加密将使保护网络空间的交易变得容易。一个有效的加密软件程序的成本，如 PGP，比一个提供全面服务的经纪人对 100 股交易收取的佣金还要少。

然而，它将使几乎所有的交易都不可见，并且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不被政府和盗贼发现。信息时代的新技术将以极小的成本有效地保护网络资产。只要花 55 美元而不是 5500 万美元，网络经济的参与者将享受到比工业时代或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好的实际资产保护。

易于使用的加密算法和在地面住所之间进行交易的能力将提供有效的保护，以防止最大的掠夺来源--民族国家本身。

这并不是说，领土政府将完全被打败。

他们仍将能够利用个人伤害的弱点，以提取人头税，甚至可能直接勒索富人的赎金。他们也将能够强制征收消费税。然而，作为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服务，保护将被放在一个更接近竞争的基础上。生产者为了保护而支付的费用将被政治当局攫取和重新分配。技术创新将把世界财富的很大一部分和越来越大的一部分置于政府的范围之外。这将减少贸易的风险，用历史学家珍妮特-阿布-卢戈德的话说，"所有成本的比例"将急剧下降，否则将不得不"分配给过境税、贡品或简单的敲诈"。

在历史上，真正受制于竞争政府并不多见。



在少数几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时，政府是软弱无力的，各司法管辖区之间的技术是相似的。正如莱恩所言，在这种情况下，影响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往往是不同企业家所支付的保护费用的差异。中世纪的商人必须支付 20 个过路费才能把货物运到市场，他无法与只需支付 4 个过路费就能把同样的货物送到客户手中的商人竞争。类似的情况注定会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而重新出现。盈利能力将再次由技术优势决定，而不是由你为保护而被迫支付的成本最小化的成功决定。

这种新的经济动态直接违背了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政府对其保护服务实行垄断定价的愿望。但是，不管你愿不愿意，在信息时代新的竞争环境中，旧的系统将是不可行的。任何政府如果坚持向其公民征收竞争者不支付的重税，就只能保证利润和财富转移到其他地方。因此，成熟的福利国家在长期削减税收方面的失败将是自我纠正的。税收过高的政府只会使其权力范围内的任何地方的住宅成为破产的责任。

来自英国法院的裁决，1604 年

## 税收的死亡

政府不仅会失去对许多形式的收入和资本征税的权力；它们也注定会失去对货币的强制力。在过去，大政治过渡与货币性质的变化有关。

虽然罗马的硬币继续流通，但货币的数量却随着贸易的减少而不断减少，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螺旋式下降。（封建革命恰好

与货币、硬币、汇票和其他商业交易结算装置的重新引入相吻合。特别是，来自德国拉梅尔斯堡新矿的欧洲白银产量激增，促进了硬币流通的增加，帮助润滑了商业。)在信息时代之前，货币方面最大的革命是随着工业化的到来。现代早期的国家在火药革命中巩固了其权力。

随着控制力的增强，国家宣称其对货币的权力，并开始严重依赖工业主义的标志性技术--印刷机。印刷机是大规模生产的第一个工具，在现代时期被政府广泛用于大规模生产纸币。纸币是一种明显的工业产品。在印刷术之前，要复制成为纸币的收据或证书是不切实际的。当然，梵蒂冈的僧侣们不会把他们的时间花在画 50 磅的纸币上。

纸币也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的权力，不仅通过货币贬值产生利润，而且使国家对谁能积累财富具有影响力。正如 Abu-Lughod 所说，"当由国家支持的纸币成为被批准的货币时，反对或独立于国家机器而积累资本的机会就变得很困难了。"16

## 淘宝网

现在，信息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货币性质的另一场革命。随着网络商务的开始，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网络货币的出现。

这种新的货币形式将重新设定赔率，减少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决定谁成为主权个人的能力。这种变化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信息技术将财富持有者从通货膨胀的征用中解放出来的效果。不久之后，你将在网上或万维网上为几乎任何交易付款，同时使用

网络现金。这种新的数字货币形式注定要在网络贸易中发挥关键作用。它将由数百位质数的加密序列组成。这种钱是唯一的、匿名的和可验证的，它将容纳最大的交易。它也将被分割成最微小的价值部分。它将在一个没有边界的数百万美元的批发市场中通过按键进行交易。

## 拨号无美元

不可避免的是，这种新的网络货币将被非国有化。当主权个人可以在一个没有物理现实的领域中进行跨国界交易时，他们将不再需要容忍政府通过通货膨胀贬低其货币价值的长期演练做法。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对货币的控制将从权力的大厅转移到全球市场上。任何能够进入 160 个网络空间的个人或公司将能够轻易地从任何出现贬值危险的货币中转移出来，与今天不同，将没有必要以法定货币进行交易。事实上，如果交易横跨全球，那么每笔交易中至少有一方会发现自己使用的货币对他来说不是法定货币。

## 易货贸易的缺点 减少了

在网络经济中，你将可以用任何你想要的媒介进行交易。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E-A-哈耶克认为，“货币和非货币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他写道：“尽管我们通常认为在什么是货币和什么不是货币之间有一条鲜明的界限，而且法律一般都试图做出这样的区分，但就货币事件的因果效应而言，并没有这样明确的区别。我们发现的是一个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具有不同程度流动性的物体，或者具有可以独立波动的价值，在它们作为货币发挥作用的程度上相互影响。

全球计算机网络上的数字货币将使哈耶克的流动性连续体上的每一个物体都更具流动性--除了政府文件。一个后果是，易货贸易将变得更加实用。越来越多的物品和服务将被提供给其他物品和服务进行具体的竞价。这些潜在的交易将在网络上被广泛宣传，这将使它们的流动性大大增加。

以物易物的主要缺点之一——一直是很难将一个有具体需求的人与另一个有具体需求的人相匹配，而后者正是想为自己获得第一个人提议交易的东西。原始的易货贸易在使希望在当地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双方完全匹配的令人生畏的不可能性中蹒跚而行。现金超越了易货贸易的限制，它的优势在大多数交易中仍然是引人注目的。但计算能力的大幅提高和网络空间商业的全球化也减少了易货贸易的缺点。当你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即时分类，而不是仅仅依靠你可能在当地遇到的人时，找到与你的愿望完全对等的人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 不受造假影响

虽然纸币无疑将作为穷人和不懂电脑的人的剩余交换媒介继续流通，但用于高价值交易的货币将被私有化。网络货币将不再像工业时期的纸币那样只以国家单位计价。它可能会被定义为黄金的克数或盎司，就像黄金本身一样可以精细分割。

即使在使用不同的定价措施，或某些交易继续以国家货币计价的情况下，网络货币将比国家化货币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迅速发展的计算能力将使调整价格与各种交换媒介的困难减少到消失的地步。每笔交易都将涉及加密的数百位数字序列的转移。

与金本位时代政府发行的纸币收据不同，这些收据可以随意复制，而新的数字金本位或其易货等价物将几乎不可能被伪造，其基本数学原因是，要解开多位素数的乘积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收据都将是可核查的唯一。

传统货币的名称，如 "英镑 "和 "比索"，反映了它们起源于对特定数量的贵金属的重量衡量。

英镑曾经是一磅的纯银。西方的纸币开始是贵金属数量的仓库或保险箱收据。

发行这些收据的政府很快发现，他们可以印制的收据数量远远超过他们从金银供应中实际赎回的数量。

这很容易。没有一个持有黄金或白银证书的人能够从他的收据中分辨出任何有关贵金属实际供应的信息。

除了序列号之外，所有的收据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这一事实吸引了造假者以及试图从货币供应量的膨胀中获利的政治家和银行家。网络货币几乎不可能以这种方式造假，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

数字收据的可验证性排除了这种通过通货膨胀征用财富的经典权宜之计。信息时代的新数字货币将把对交易媒介的控制权还给希望保留财富的所有者，而不是给希望把它带走的民族国家。

自由 "货币的交易成本

使用这种新的网络货币将使你大大摆脱国家的权力。早些时候，我们引用了世界各国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维持其货币价值的沉闷记录。自二战以来，没有哪种货币因通货膨胀而遭受的损失比德国马克小。然而即便如此，在 1949 年 1 月 1 日至 1995 年 6 月底期间，其价值的 71% 消失了。在此期间的世界储备货币，美元，损失了 84% 的价值。

这是对政府通过利用其对法定货币的领土垄断而征用的财富的一种衡量。请注意，货币贬值或名义生活费用每年上升并无内在的必要性。恰恰相反。

保持储蓄的购买力的技术挑战是微不足道的。你只需看一下黄金的长期购买力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从 1949 年 1 月 1 日到 1995 年 6 月底，当最好的国家化货币失去了几乎四分之三的价值时，黄金的购买力实际上却在上升。正如罗伊-W-贾斯特罗姆教授在他的《黄金常数》一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在有可靠的价格记录的情况下，黄金一直保持着它的购买力，波动不大，就英国而言，一直到 1560 年。

与黄金挂钩的国家货币在军事需求不迫切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其购买力。在相对和平的 19 世纪，英国英镑的价值不降反升，尽管它与黄金的联系很弱。信息时代的新的政治条件使得像金本位那样的弱联系变得可行，而是一种强有力的联系，消费者手中的信息和计算资源首次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 货币私有化

哈耶克在 1976 年认为，使用竞争性的私人货币将消除通货膨胀。<sup>20</sup> 哈耶克认为，如果没有法定货币要求，迫使一个司法管辖区接受通货膨胀的货币，市场竞争将迫使货币的私人发行者保持其交换媒介的价值。任何不能保持其价值的私人货币发行者将很快失去其客户。加密网络货币的发展将使哈耶克的逻辑生动地展现出来。

所谓的 "自由银行 "理论，并不仅仅是一种假设性的学术推测。从 18 世纪初到 1844 年，私人竞争性货币在苏格兰流通。在这一时期，苏格兰没有中央银行。对进入银行业务的规定或限制很少。私人银行吸收存款并发行他们自己的私人货币，由金条支持。正如劳伦斯-怀特教授所记录的那样，这个系统运作良好。它更稳定，与同一时期英格兰采用的监管更严格和政治化的银行和货币体系相比，通货膨胀更少。

《金融时报》的 Michael Prowse 总结了苏格兰的自由银行经验。"几乎没有欺诈行为。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过度发行纸币的情况。银行通常不会持有过多或不足的准备金。银行挤兑的情况很少，也不具有传染性。自由银行得到了公民的尊重，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英格兰。"<sup>22</sup>

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技术条件下行之有效的东西，在二十一世纪的技术条件下会更加有效。你很快就能从一家私人公司进行数字货币交易，其发行方式与美国运通公司发行旅行者支票作为现金收据一样。一

个比任何政府都更有声望的机构，如领先的矿业公司或瑞士银行公司，可以为黄金的数量甚至为独特的金条创建加密的收据，通过分子签名识别，甚至可能刻有全息图。

然后这些收据将作为货币进行交易，几乎没有被伪造或膨胀的可能。新的数字黄金将克服许多实际的 163 问题，这些问题在过去阻碍了黄金作为货币的直接使用。处理大量的黄金将不再是不方便的、麻烦的或危险的。数字收据将不会太重而难以携带。事实上，它们唯一的物理存在将是作为计算机代码的精心设计的模式。也不难将数字收据分成足够小的单位，以支付甚至是微型价值的购买。一块小到足以支付一块巧克力的实物黄金很快就会丢失或与一块小到足以支付两块巧克力的黄金混淆。但是，对于计算机来说，区分这些数字货币的恶魔就像区分花栗鼠和犀牛的大小一样容易。

数字货币提供小额支付的能力将促进以前不可能存在的新型企业的出现，它们专门组织低价值信息的分配。这些信息的供应商现在将通过直接借记版税计划得到补偿，这些计划克服了以前令人生畏的交易成本。当计费的成本超过交易的价值时，它可能就不会发生。网络货币的使用促进了成本非常低的同步计费，在这种情况下，账户随使用而被扣除。我们在上面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想象你可能向比尔-盖茨或拥有参观卢浮宫的虚拟现实权利的人支付相当于 1/3 便士的版税。

这一点以千倍的方式来计算。虚拟现实将创造出几乎无限的授权机会，但却只能获得小额的版权费。



有一天，你将能够重放 1969 年世界大赛的第三场比赛，并向球员支付小额酬金，他们的图像被用来使你的虚拟现实看起来真实。

## 根除通货膨胀

尽管有这些可能性，但新的数字货币最重要的后果肯定是通货膨胀的结束和金融系统的去杠杆化。其经济影响是深远的。正如我们在《血流成河》和《大清算》中所论述的那样，20 世纪通货膨胀的兴起与世界权力的平衡密切相关。暴力收益的增加决定了军事开支的急剧增加，这反过来又要求更加积极地征用财富。

政府发现，他们可以有效地对所有持有本国货币余额的人征收年度财富税。这种对货币持有者征收的年度财富税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交易费用，因为它允许货币使用者以发行者提供的一种方便的形式来维持他们的财富。在工业时代，我们已经习惯于将货币的提供视为一种不需要直接付费的服务，以至于很容易忘记美元、比索、英镑和法郎的发行者，即政府，确实要求我们付费，而且是通过通货膨胀付费。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种通货膨胀的货币交易费率各不相同，从德国马克每年 2.7% 的低水平，到接近 100% 的危险比率。例如，在 1960 年至 1991 年期间，当梅内姆总统推出 164

阿根廷的货币局改革，通货膨胀将阿根廷货币的连续版本打掉了 17 个零。如果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在 1960 年被兑换成阿

根廷比索并埋藏起来，那么到 1991 年就不值得再去铲除它了。

阿根廷的例子是下一个千年期的一个领先指标。货币将不会被膨胀，因为其他民族国家将不再能够逃脱，就像阿根廷不再能够一样。在工业时期，当价格和工资向下不灵活的时候，通货膨胀还有另一个诱惑力。适度的通货膨胀通过降低实际工资来增加产出，而价格可以通过从其他国家输入的信贷收缩来损害。由于竞争压力的存在，私人货币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死亡将带走通货膨胀以前传达给那些垄断性的货币发行者的变相利润。如果发行货币的所有变相利润都被消灭了，那么就需要一种新的支付方式来直接补偿货币发行者。因此，使用新的货币体系将可能涉及更明确的交易成本，也许是每年 1% 左右的费用。与民族国家施加的每年 2.7% 到 99% 的通货膨胀惩罚相比，这将是一个很小的代价。更重要的是，随着垄断的削弱和世界范围内竞争的加剧，未来总体价格有可能下降。

## 签约杠杆

数字货币的出现不仅会一劳永逸地打败通货膨胀；它还会收缩世界银行系统的杠杆。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绕过监管机构，直接通过互联网转移他们的资金，这是市场全球化的一个完全前所未有的后果。它将超出任何政府的监管能力。当政府不能再通过印钞机使货币贬值，或通过受制于人的银行系统随意扩大信贷来欺骗储蓄者时，他们将失去其征用资源的间接能力的主要部分。

## 更高的利率

这将给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带来一个明显的困境。他们将面临税收收入的急剧下降和货币体系中杠杆作用的实际消除。同时，他们将保留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无准备金债务和对社会支出的夸大预期。可以预期的结果是一场激烈的财政危机，并带来许多令人不快的社会副作用，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考虑。这种转型危机的经济后果可能包括实际利率的一次性飙升。

债务人将受到挤压，因为在旧制度下签订的长期负债被清算，而优惠信贷也会枯竭。

## 因竞争而改变

各国政府在面临本国货币垄断的严重竞争时，可能会通过收紧信贷和向储蓄者提供更高的本国货币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来寻求降低收费网络货币的价格。一些政府甚至可能寻求将黄金再货币化，作为应对私人货币竞争的另一个权宜之计。他们很可能认为，与允许本国货币完全被商业网络货币取代的情况相比，他们可以从控制宽松的 19 世纪金本位制中获得更高的税收利润。

但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那些计算机使用率和网络参与度较低的地区可能会在网络经济的早期阶段选择老式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不会使这些政府获得富人的现金余额，但它会从那些没有多少财富或没有机会进入网络经济的人身上榨取资源。然而，使用这种策略的政府可能会在国际上借入网络货币。

还有一些政府可能会适应信息经济创造的机会，并促进当地的网络货币交易。那些首先承认数字签名的有效性并为不支付网络债务的人提供当地法院强制执行收回权的司法管辖区，将从长期资本贷款的过度激增中受益。显然，在当地法院施加惩罚或允许债务人违约而不追索的地区，将没有网络资金可用于长期信贷。

## 产量差距

信贷危机、国家货币当局的竞争性调整以及网络货币借贷的早期过渡性障碍的结合，将导致在信息经济的早期阶段出现收益差距。网络货币将支付比国家货币更低的利率，并且可能还带有明确的交易成本。

抵消这些以数字货币持有余额的明显缺点，将加强对掠夺性税收和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的保护。由于它可能与黄金挂钩，网络货币也将从黄金的升值中受益。

相对于其他商品，黄金的价格可能会大幅上涨，无论哪种替代的政府政策占主导地位。为什么呢？黄金的实际价格几乎总是在通货紧缩中上升。毕竟，通货紧缩反映了流动性的短缺。

黄金是流动资金的最终形式。

## 工业时代的通货紧缩

较高的实际利率将刺激高成本、非生产性活动的清算，并暂时减少消费。我们在《血流成河》和《大清算》中探讨了信贷周期的逻辑和它的解套，所以我们不会在

这里重述这些论点。我只想说，通货紧缩的环境可能会拖上一段时间，在北美和西欧的高成本工业经济体中产生的不利后果要比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低成本经济体中产生的后果更严重。

## 长期较低的利率

虽然网络经济出现的早期后果可能包括更高的利率，但长期的后果将正好相反。

随着资源脱离政府的控制，储蓄者的税后收益将急剧增加。资源使用效率的大幅提高，以及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高回报的解放，应迅速弥补转型危机初期的产出损失。

## 投资者对资本的控制

传统的思想家在这一点上回顾我们的论点，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民族国家的收入再分配的崩溃将使世界陷入经济崩溃。请不要相信。我们并不否认过渡期危机会发生的事实。但认为国家通过大规模重新分配资源来改善经济运行的观点是不合时宜的，这种信仰条款大致相当于中世纪末普遍存在的迷信，即禁食和鞭打对社会有益。

不应忘记，政府大规模地浪费资源。

浪费资源使人贫穷。当历来由政府垄断的收入转而由真正有才能的人控制时，资源的使用效率将得到极大的改善。数百亿，然后最终数千亿美元将由数十万，然后数百万的主权个人控制。

事实证明，这些世界财富的新管家在利用资源和部署投资方面可能远比政治家更有能力。有史以来第一次，大政治条件将允许最能干的投资者和企业家而不是暴力专家最终控制资本。预计这种分散的、由市场驱动的投资的回报率可能是民族国家时代由政治驱动的预算分配的微薄回报的两倍或三倍，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找到政府投资为负数的例子。我们在 1992 年 11 月的《大清算》修订版中引用了俄罗斯的官方统计数据，表明俄罗斯的整个经济 "只值 300 亿美元，还不到其原材料投入价值的三分之一。意思是说，俄罗斯的经济产出将增加三倍以上。

亿，还不到其原材料投入价值的三分之一。言下之意，如果国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完全关闭，俄罗斯经济的产出将增加三倍以上的价值。它们不是在贡献价值，而是在减损价值"。23

诚然，共产主义瓦解后的俄罗斯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减少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往往会提高经济效率。《经济学人》引用的增长率表明，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最自由的国家的增长率最快。信息时代的网络经济将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商业领域更加自由。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网络经济将迅速成为新千年最重要的新经济。它的成功将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新参与者，就像传真机的广泛使用使电话复印对非用户越来越有吸引力一样。

但更重要的是，免于掠夺性暴力的自由将允许网络经济以远高于民族国家主导的传

统经济的复合增长率增长。这也许是在预测政府的垄断性征税和通货膨胀能力可能崩溃的经济影响时要提出的最重要一点。抛开可能持续数十年的过渡期困难，全球经济的长期前景应该是高度看好的。

每当情况允许人们减少保护费用，并尽量减少向控制有组织暴力的人支付的贡品时，经济通常会急剧增长。正如莱恩所说，"我想说的是，在大多数增长时期，如果有任何一个因素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用于战争和警察的资源比例的减少。"24

减少用于捕食的资源 and 靠捕食的战利品生活，可以产生巨大的效率收益。如果将保护的定价放在竞争的基础上，由地方垄断企业在价格和质量的基础上争夺客户，就有可能产生巨大的效率收益。可以预期的结果是税率大大降低，政治活动中的资源和精力损失减少，而政治活动将不再有以前的巨大红利。

选民们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已经习惯了的政治暴利吗？这是我们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的一个问题。但一个简单的答案是，我们可能没有选择。现在没有人反对下雨天或吃水，不管它在经济上有多大的损害或不愉快。没有人，不管他有多大的犯罪倾向，会挟持一个贫民，要求以死亡为代价支付巨款。如果政治家不可能获得资源进行再分配，公众可能会以理性的方式作出反应，并忘记政治，就像中世纪结束后，善意的人们不再组织忏悔者的游行一样。

## 第八章 平等主义经济学的终结

在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里，收入能力的革命 "神是不欺负人的，因为人所种的，也必收得。加拉太书》6:7

生产或防御的主导形式的巨大变化改变了社会的结构，以及不同群体的财富和权力的比例。信息时代不仅仅意味着越来越多地使用强大的计算机。它意味着生活方式、机构和资源分配的革命。由于隐蔽的暴力在控制资源方面的作用将急剧减少，一种新的财富配置将发展起来，没有政府的强制调解，而这正是 20 世纪的特点。由于在信息社会中，地点的意义将大大降低，所有在地理边界内而不是在地理边界外运作的组织在未来的作用将被削弱。政治家、工会、受管制的职业、游说者和政府本身都将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从政府那里争取到的好处和贸易限制将不那么有价值，为促进或抵制游说而浪费的资源也将减少。

那些利用强制力和地方优势来重新分配收入的人注定会失去很多权力。这将改变对资源的支配。

迄今为止被民族国家征用的私人创造的财富将由那些赚取财富的人保留。越来越多的财富将落入全世界最优秀的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家手中。

全球化，加上信息经济的其他特点，将倾向于增加每个领域中最有才华的人的收入。由于卓越的表现所产生的边际价值将是如此巨大，整个全球经济的收入能力分布将呈现出与现在竞技和歌剧等表演行业相同的形态。

超越帕累托法则的量级



帕累托法则说，80%的利益将取决于或归于 20%的参与人。这可能大约是真的，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美国 1%的人口支付了 28.7%的所得税，这表明，随着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他们将经历比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在上世纪末观察到的更加倾斜的收入和能力分配。人们已经相当习惯于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在 1828 年，4%的纽约人被认为拥有该市所有财富的 62%。

到 1845 年，在纽约市的所有公司和非公司的财富中，前 4%的人拥有约 81%。更广泛地说，在 1860 年，前 10%的人口拥有整个美国约 40%的财富。到 1890 年，记录显示，当时最富有的 12%的人拥有美国约 86%的财富。

1890 年的数字接近于帕累托的想法。它们与他的 80-20%的比例不同，主要是因为 19 世纪末，大量身无分文的移民涌入了美国。移民在总财富中的份额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他们的到来自动使财富的总持有量更加不平等。事实上，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说明任何真正的机会激增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至少短暂的不平等激增。到 1890 年，移民约占美国总人口的 15%，但在东北部的一些州超过了 40%，而大部分收入和财富都是在那里产生的。

信息时代已经改变了财富的分配，尤其是在美国，这也是现代美国政治的痛苦的原因之一，我们将在下一章进一步探讨。信息时代的经济成功需要相当高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一个庞大的美国。

教育部的调查 "美国的成人识字率 "显示，多达 9000 万 15 岁以上的美国人是非常无能的。或者用美国侨民比尔-布莱森（ Bill Bryson ）更多的描述，"他们像猪一样愚蠢。"3 具体来说，9000 万美国成年人被判定为不能写信，不能理解公共汽车时刻表，或者加减法，即使有计算器的帮助。那些连普通公交车时刻表都看不懂的人，不太可能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大展身手。从这三分之一没有准备好加入电子信息世界的美国人中，正在招募一个愤怒的下层社会。在社会的顶层是一小群，也许是 5%，受过高等教育的信息工人或资本所有者，他们是信息时代相当于封建时代的土地贵族--关键的区别是信息时代的精英是生产专家，而不是暴力专家。

## 创新的大政治学

由于没有很好的理由，大多数二十世纪的社会学家都认为，技术进步会自然地倾向于产生越来越多的平等主义社会。

在大约 1750 年之前，情况并非如此。大约从那时开始，创新的新工业技术开始为非技术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并扩大企业的规模。工厂的新技术不仅提高了穷人的实际收入，而不需要他们付出任何努力；它还倾向于增加政治制度的力量，使它们更有能力重新分配收入，并更有能力抵御动乱。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内在的理由可以认为技术总是倾向于掩盖而不是突出人类天赋和动机的差异。有些技术是相对平等的，需要许多独立的工人做出大致相同的贡献；其他技术则将权力或财富交到少数主人手中，而大多数人不过是农奴而已。历史和技术都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了不同的国家。

工厂时代产生了一种形态，而信息时代正在产生另一种形态，不那么暴力，因此比它所取代的形态更加精英化和不平等。

## 阿蒙的特尼普

十九世纪末，一些经济学家，其中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是英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开始发展数学经济学。最早将概率理论应用于重大社会问题的是德国经济学家奥托-阿蒙，他的著作在 1899 年《政治经济学杂志》上被卡洛斯-C-克洛森首次翻译成英文。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概率学说的一些社会应用"<sup>4</sup>。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一篇文章现在纯粹是古人的兴趣。事实上，这篇文章涉及的是一个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以一种令人振奋的方式处理的。

奥托-阿蒙认为，这种投掷骰子的随机分布与人类能力的分布相匹配。他是在智力测试和智商发展之前写的，并依靠弗朗西斯-高尔顿早期的智力工作。阿蒙并不认为社会效用或生活的成功仅仅取决于智力。他列举了 "三组心理特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对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三组是 1 .

智力特征；其中我包括所有属于人力的理性方面的快速理解力、记忆力、判断力、发明力，以及任何属于这一领域的东西。

道德特征；即自我控制、意志力、工业、毅力、节制、重视家庭义务、诚实等。

经济特质；如商业能力、组织才能、技术能力、谨慎、巧妙的计算、远见、节俭等等。

除了这些心理特征，他还补充说：4.

身体特征；工作能力、耐力、承受压力和抵制各种刺激的能力、活力、健康等。

在奥托-阿蒙看来，智力、性格、才能和身体等这些品质的可能分布与骰子上的分数相似。他更进一步认为，事实上，存在着四个以上的变量，而且这些变量的变化程度超过六度。如果一个人不扔四颗骰子，而是扔八颗，那么就有不少于 1,679,616 次可能的投掷，然而最高分，即 48 分，仍然只能预期出现一次。在决定人生地位的所有因素中得分很高的男人或女人，比 171 次扔四个六的概率要少得多；也许和扔八个六一样少。然而，阿蒙指出，在这些人类素质方面的高分和低分的混合可能会产生 "天赋不平衡、不和谐的人，尽管他们有一些出色的素质，但不能成功地迎接生活的考验。"

"像一座孤独的山峰，或者说像一座大教堂的尖顶，高才生和天才的人在广大的平庸者之上崛起……。极具天赋的人的数量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不可能有'许多'这样的人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完整而被挡在低级阶段。"奥托-阿蒙

特质和收入

阿蒙接着谈到了收入的分配问题。当然，19 世纪 90 年代的统计数据远不如现在充分，但德国的官僚机构已经很发达，奥托

-阿蒙在萨克森、普鲁士、巴登和德国其他州发现了他认为类似的收入曲线，既与他所认为的人类能力分布有关，也与骰子的概率有关。他在查尔斯-布斯的《伦敦人民的生活与劳动》（1892）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数字。事实上，布斯的社会分布确实很像人们从阿蒙的概率理论中预期的那样。

布斯在伦敦发现，25%的人是穷人或更糟，51.5%的人是舒适的，15%的人是富裕的或更好的；如果把布斯的两个最低的类别拿出来，他们就达到了9.5%。在二十世纪的福利国家出现之前，人们通常把那些最不富裕的人称为“被淹没的十分之一”。布斯的两个最高类别达到了7%。

从这一切中，奥托-阿蒙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他认为，从广义上讲，人们的能力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 and 他们的收入。

他认为，高超的能力自然会使人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上升。“就像一座孤独的山峰，或者说，‘就像大教堂的尖顶，高才生和天才的人在广大的平庸者之上崛起……’他还认为，‘所谓社会金字塔的真正形式是一个有点扁平的洋葱或萝卜。’这种萝卜上面有一个狭窄的茎，下面有一个狭窄的根。与社会金字塔相比，这样的社会萝卜更适合作为一种隐喻，因为与现代工业社会一样，它的质量在中间，而金字塔的质量在底部。

萝卜的形状

现代工业社会确实都是芜杂的，顶端是小规模的富裕和上层职业阶级，较大的中产阶级，底部是少数贫困阶级。相对于中间阶层，两个极端都很小。在现代伦敦，如果不是在华盛顿，百万富翁肯定比无家可归者多。

所有这些都耐人寻味，但阿蒙的工作的直接兴趣在于我们正在经历的高层和中层之间的关系（金融和政治）的重大长期转变。无可否认，正在过去的工厂时代所需要的技能与信息时代所需要的技能是不同的。大多数 172

在金融和政治方面，在高层和中层之间。不可否认，正在过去的工厂时代所需要的技能与信息时代所要求的技能是不同的。大多数 172 人可以掌握 20 世纪中期操作机器所需的技能，但这些工作现在已经被智能机器所取代，这些机器实际上可以控制自己。整个中低技能的就业领域已经消失了。如果我们是正确的，这将是大多数就业的消失和现货市场工作重新配置的前奏。

谢尔曼 人少事多

我们可以把人类能力的简单四骰子分布，假设人们在工厂时代的得分可以达到  $4 \times 2$  或以上。这将意味着 95% 以上的人都在查尔斯-布斯所说的 "积极社会效益的最低限度" 以上。事实上，3% 被设定为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充分就业标准。假设在信息时代，要求的分数上升到  $4 \times 3$ ，要求的最低分数从 8 分上升到 12 分。这将意味着近 24% 的人将低于这个 "社会有用性" 的极限。

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规模的高端。在工厂时代，所需的高能力水平可能是 4X4；假设在信息时代，它已经上升到 4X5。在这种情况下，有资格从事顶级工作的人的比例将从 34% 下降到 5%。

这些数字纯粹是假设性的。显然，我们不知道技能要求的转变会是什么--或者已经是什么--但肯定已经有了上升。由于萝卜的形状，最低技能要求的一个相当小的上升会使大量的人处于重要的经济角色之外。同样，较高技能要求的小幅提高会使有资格从事较高工作的人的数量急剧减少。一些转变正在发生：我们还不知道它将有多大。

确实不乏社会和政治证据表明，这种转变正在所有先进的工业社会中发生，其速度正在加快，而且这种运动已经是一个大运动。对稀有技能的奖励已经并正在增加。传统的思想家们已经不满地注意到这一点。例如，考虑到罗伯特-H-弗兰克和菲利普-J-库克的《赢家通吃的社会》。同样，中等技能的机会也在减少；大量低技能的人现在已经超出了可以获得舒适生活的范围，尽管他们仍然可以在小规模的服务中找到一席之地。

如果信息时代对高端和低端的技能都有更高的要求，那么除了最高的 5% 以外，其他所有人都将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但最高的 5% 将获得巨大的收益。他们将获得更高的收入份额，并保留更多的收入份额。同时，他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承担世界上的工作。许多人将成为有主权的个人。在 173 年

信息时代，收入分配的芜杂情况将更像 1750 年的情况，而不是 1950 年的情况。

那些被灌输了期望收入平等和高消费水平的低技能或中等技能人员的社会将面临动力不足和不安全。

随着更多国家的经济更深入地吸收信息技术，它们将看到出现--在北美已经很明显--一个或多或少的失业的下层阶级。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将导致带有民族主义和反技术偏见的反应，我们将在下一章详述。

工厂时代可能被证明是一个独特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半傻的机器为不熟练的人留下了一个高利润的位置。现在，机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信息时代正在把它的礼物倾注到奥托-阿蒙的前 5%的萝卜上。信息时代对前 10%的人，即所谓的认知精英来说，已经显得好得多了。然而，对前 10%的人来说，它将是最好的，也就是认知上的双顶。在封建时代，一百个半熟练的农民才能养活一个骑马的高技能军阀（或骑士）。信息经济时代的"主权个人"将不是军阀，而是专门技能的大师，包括创业和投资。然而，封建的百比一比例似乎又要回来了。无论是好是坏，

百分比，即所谓的认知型精英。然而，对于前 10%的人来说，这将是最好的，即认知上的双顶。在封建时代，一百个半熟练的农民才能养活一个骑马的高技能军阀（或骑士）。信息经济时代的"主权个人"将不是军阀，而是专门技能的大师，包括创业和投资。然而，封建的百比一比例似乎又要回来了。无论好坏，21 世纪的



社会都可能比我们在 20 世纪生活的社会更加不平等。

大多数人将从政治的死亡中获益

平等主义经济和它所支持的国家不可能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消失。虽然根据定义，危机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但我们还是可以想象，国家灭亡的创伤可能会回荡多年。

在不忽视这种创伤的情况下，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在全球许多地区，向信息经济的过渡将导致产出的激增，使人们的收入全面提高。事实上，在那些从未充分分享过工业化好处但现在向自由市场开放的地区，所有阶层的人的收入都在增加或将增加。

作为经济生活特征的强制力的消减，将使生产者能够保留迄今已被没收和重新分配的资产。重新分配通常意味着资产被拖入低价值的用途，从而降低了资本的生产力。从最善于投资资源的人那里获得的财富被政治家们重新分配给那些不善于投资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重新分配的收入被用于低层次的经济活动。将资源从系统的强制力中解放出来的效果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会有很大不同。这种冻结资源的做法将使福利国家破产，并增强规模不经济性，这种不经济性正在破坏大政府和所有由大政府补贴的机构。

另一方面，向网络经济的转变将减少传统上因无法大规模组织的地区在主权下运作的人们所遭受的经济弊端。

如果世界作为一个大市场运作，每个雇员都会与世界上任何地方能够做同样工作

的每个人竞争。他们有很多人，而且很多人都很饿。"8

安德鲁-S-格鲁夫，英特尔公司总裁。

## 地点优势的转移

因为暴力的回报率将不再上升，生活在一个可以捕获它们的政府之下将没有任何好处。曾经能干的政府将不再是财富积累的朋友，而是他们的敌人。

高税收、繁重的监管成本和对收入再分配的雄心勃勃的承诺将使他们控制的领土成为不受欢迎的商业环境。

那些生活在工业化时期仍然贫穷或不发达的管辖区的人，在经济从地理限制中解放出来后获益最大。这与你将听到的情况相反。围绕着信息经济的到来和主权个人的崛起，主要的争议将集中在所谓政治的死亡对 "公平 "的不利影响上。当然，全球信息经济的出现将给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带来致命的打击，这是事实。在工业时代，收入再分配的主要受益者是富裕地区的居民，他们的消费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 20 倍。只有在经合组织国家，收入再分配在提高非技术工人的收入方面有明显的效果。

在各管辖区之间观察到了最大的收入不平等。

收入再分配对缓解这些问题没有什么作用。事实上，我们认为，外国援助和国际发展计划通过补贴不称职的政府，产生了降低

穷国穷人实际收入的反作用。这是我们在分析信息革命对道德的影响时更深入考虑的一个问题。

## 收入不平等上升的一个世纪

在工业时期，决定普通人一生收入的最大因素是他碰巧居住的政治管辖区。与今天富裕经济体的普遍印象相反，收入不平等在工业时期迅速上升。世界银行引用的一项估计表明，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从 1870 年的 11 倍猛增到 1985 年的 52 倍。虽然不平等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急剧增加，但对于居住在富裕工业国家的那部分人来说，它往往显得不那么重要。收入不平等在各管辖区之间而不是在各管辖区内部上升。

由于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原因，工业技术本身的特点有助于确保收入差距将在半途而废的 175 个有能力的政府掌握大规模行使权力的辖区内缩小。当暴力的回报率上升时，就像工业时代那样，大规模运作的政府往往被其雇员所控制。这使得实际上不可能对这些政府对资源的要求施加控制。

只要权力的大小高于使用的效率，他们对资源不受约束的控制就能带来重要的军事优势。政府由其雇员控制的一个并非偶然的必然结果是收入再分配的急剧加速。几乎每个社会都有一些收入再分配的规定，至少在特殊情况下是临时的。

然而，仔细阅读向穷人提供援助的历史就会发现，当贫穷程度最低时，"福利"往往更加慷慨。当大批人的收入减弱时，收入再分配就更有可能被削减。

二十世纪后半叶，富裕的工业社会的条件对于重新分配收入几乎是完美的。这导致了在这些有利的管辖范围内，非技术性工作得到了更高的回报。在适当的时候，它甚至为那些根本不工作的人提供了高水平的消费。

## 工业财富的悖论

讽刺的是，也正是在这些司法管辖区，更多的人变得富有。一旦你理解了前几章所探讨的巨型政治的动态，这个明显的悖论就非常合理了。工业经济的主要部门需要大规模地维持秩序，以实现最佳运作。这使得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工会和政府的勒索，他们渴望最大限度地增加受其支配的人数。然而，广泛的收入再分配并没有完全扼杀工业经济的运作能力。因此，任何有幸在工业化高潮时期出生在西欧、前英国定居殖民地或日本的人，都可能比在南美、东欧、苏联后期、非洲和亚洲陆地上具有同等技能的人要富有得多。信息技术的有益影响将包括帮助克服许多发展的障碍，这些障碍在现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阻碍了世界上大多数人享受自由市场的许多好处。

"穷国的本土特征明显不适合有效的大规模组织，特别是不适合必须在大面积地域内运作（如政府）的大规模组织。

"MANCUR OLSON

## 规模不经济和增长迟缓

正如曼库尔-奥尔森所证明的那样，二十世纪的落后并不是因为缺乏资本或专门技能本身。在 1987 年发表的《规模和发展

的不经济性》一文中，即在柏林墙倒塌的两年前，176

奥尔森写道："如果资本在穷国实际上是稀缺的，那么它的'边际生产力'和使用资本的利润率就应该比繁荣国家的要高。许多接受了不可忽略的外国援助的国家的低增长率，以及在穷国建立的一些现代工厂的低生产率，进一步降低了对不发达的'资本稀缺'解释的可信度。"这一定是对的。如果资本或技能的稀缺是主要的缺陷，那么在贫穷的管辖区，两者所获得的回报会比发达国家高。技术人员和资本都会涌入这些地区，直到收益趋于平缓。事实上，情况往往相反。有大量受过教育的人从落后的地区迁出。少数幸运的人设法在这些地方积累了资本，并尽可能快地将其出口到瑞士和其他先进国家。

## 不可能有更好的政府

奥尔森认为，我们也同意，落后国家发展的真正障碍是不能轻易从国外借入或进口的一个生产要素，即政府。这是一个随着二十世纪的展开而恶化的问题。1900年，英国和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都在向本土势力无法大规模有效运作的地区输出合格的政府。但20世纪大政治条件的变化提高了这项活动的成本，降低了回报。殖民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就像它不太被人喜欢的那样，不再是一个付费的提议。技术的转变提高了将权力从中心投射到外围的成本，降低了有效抵抗的军事成本。

因此，帝国主义列强纷纷退出，或仅在百慕大或开曼群岛等极小的飞地留守。

"如果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为进步的桎梏，正如非洲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在 1980 年代末似乎同意的那样，主要原因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不管国家的宣传如何，它并没有解放和保护其公民；相反，它的总效果是限制和剥削，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有在任何社会意义上运作。2 巴斯尔

戴维森

在没有欧洲人定居的国家，取代殖民统治的本土政府，其领导人和行政人员都来自于在管理任何类型的大规模企业方面没有经验或技能的人群。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非洲，从离开的殖民国家继承的基础设施被迅速掠夺、破坏，或任其失修。电话线被拾荒者拆毁，并被敲打成手镯。道路不再得到维护。

由于路基崩塌和机车故障，铁路线变得毫无用处。在扎伊尔，由比利时人安装的精心设计的交通基础设施到 1990 年几乎完全消失了。只有几艘吱吱作响的河船继续运行，其中一艘被独裁者接管，成为一种浮动的宫殿。

不可靠的通信和运输反映了落后的民族国家在维持秩序方面的无能。它们使价格居高不下，使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机会降到最低。正如奥尔森所强调的。首先，糟糕的交通和通讯往往迫使企业主要依赖当地的生产要素。当一个公司的规模扩大时，它将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去获得生产要素，而运输和通信系统越差，这些要素成本将随着产出的扩大而快速上升。糟糕的交通和通讯系统不利于有效的大规模企业的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们使有效协调这些企业变得更加困难"。

## 减轻不良政府的负担

世界上雄心勃勃的穷人比任何人都更能受益，因为信息技术使他们的收入能力与他们居住的地方脱钩。新技术，如数字蜂窝电话，允许通信独立于当地警察保护辖区内每根电线杆不被盗铜的能力。随着无线传真和互联网连接的普及，穷得叮当响的邮政员工是否会为了偷邮票而偷窃邮件，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

在许多情况下，有效的通信甚至取代了对货物和服务的实际运输的需要。更好的通信和大大增加的计算能力不仅使复杂活动的协调变得更便宜和更有效；它们还降低了规模经济，解散了大型组织。这些变化都倾向于减少落后国家的人因生活在无能的政府下而遭受的惩罚。信息革命将使政府是否能够胜任工作变得不再重要。因此，生活在传统贫困国家的人将更容易克服他们的政府在经济增长道路上所设置的障碍。

## 信息时代的平等机会

在信息时代，熟悉的地点优势将迅速被技术所改变。具有类似技能的人的收入能力将变得更加平等，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个管辖区。这已经开始发生了。

因为那些利用强制力和地方优势来重新分配收入的机构正在失去权力，各辖区内的收入不平等将上升。全球竞争也将倾向于增加每个领域中最有才华的人的收入，无论他们住在哪里，就像现在的职业体育一样。在全球市场上，卓越表现所产生的边际价值将是巨大的。

虽然公众辩论将集中在经合组织国家日益增长的 "不平等 "上，但世界各地的个人将享有更多几乎平等的机会。他们将不再需要生活在一个大规模运作良好的管辖区才能取得成功。先天的能力和发展这些能力的意愿将在一个比以往更平等的竞争环境中得到衡量。在工业时期导致富人和穷人经济之间不平等扩大的管辖优势将发生巨大变化。

## 贫困地区的回报率更高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贫困地区的政府在自由市场运作中设置的障碍将大大减少。因此，供不应求的资本和技能实际上将在许多目前的贫困地区获得更高的回报，就像 20 世纪 50 年代的发展理论家假设的那样。而且，资本和技能都将更容易进口。新兴经济体将不再需要像工业时代那样依赖当地的生产要素。他们在远距离利用资本和专业知识的能力增强，将导致更高的增长率。无论无能的政府是否变得更诚实或更有能力保护产权，这都会发生。由于缺乏对网络空间的控制权，坏政府将无法阻止其管辖范围内的人们从经济自由中获益。

## 正面强化

在新的网络经济中，信息技术的几乎完全可移植性将禁止囤积许多在工业时代出现的司法优势。越来越多的司法管辖区之间的竞争将转向新类型的地方优势。主权将被商业化，而不是掠夺性。竞争的力量将迫使政府制定政策，以吸引那些对经济福祉做出最大贡献的客户，而不是那些贡献很小或经济贡献为负的客户。



这将代表着与 20 世纪的普遍做法相比的巨大变化。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补贴不理想的结果和惩罚理想的结果来积极地调节生活。贫穷是不可取的；因此，穷人得到了补贴。成为富人是可取的；因此，对富人征收惩罚性税收，使生活更加 "公平"。因为这整个政策方法植根于一个巨大的政治基础，经得起所有的呼吁，所以补贴功能障碍的不正当后果是什么，并不重要。

也没有对赚取被重新分配的财富的技能、辛勤工作或聪明才智进行多少说明。结果是以 179 项权利来衡量的。二十世纪的政治观点认为，为了使结果 "公平"，它们必须是平等的。

## 新范式

二十一世纪新的大政治条件将允许市场检验来调节以前由政治主导的领域的结果。市场范式的前提是，通过奖励理想的结果和惩罚不理想的结果，可以更好地调节结果。贫穷是不可取的，而致富是可取的。

因此，激励措施应该奖励财富的创造，鼓励人们为他们所消费的资源付费。当人们可以保留更多的收入时，生活就会更加 "公平"。

这种观点在新的千年里将比现在结束的世纪里更经常地听到。此外，它将前所未有地引人注目，因为它将是大政治的基础。在信息时代，资本的流动性越来越大。赚取高收入的能力不再与居住在特定地点相联系，就像大多数财富是通过操纵自然资

源创造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容易利用高度可移动的信息技术来创造资产，这些资产比以往任何形式的财富都更容易受到暴力的影响。

任意的政治法规，在没有创造抵消的市场利益的情况下施加成本，很快就会不可行。强大的竞争力量正趋向于在全球范围内平衡商品、服务、劳动力和资本的价格。政府强加任意政策的自由度将比他们习惯于享受的要少。任何政府如果试图对某项活动施加比其他主权国家更繁琐的规定，就会把这项活动赶走。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赶走不需要的活动会让市场高兴，并使这些司法管辖区更受欢迎和繁荣。在这个意义上，某些法规可以被比作连锁酒店经营者的家规。如果他们禁止人们赤脚走路或在大堂吸烟，他们无疑会失去某些顾客。但是，拒绝这些顾客可能不会使该辖区的整体顾客流失，甚至不会减少其总收入。穿戴整齐的非吸烟者可能会支付更多费用，这正是因为赤脚吸烟者被排除在外。同样，那些使在某一辖区内经营处理厂的成本很高或不可能的规定，可能会使处理厂转移到其他地方，而不会剥夺整个辖区的收入。

这些例子表明，在少数情况下，法规可能具有积极而非消极的市场价值，特别是在一个司法管辖区数量迅速增加的世界中。在许多地方，维护公共卫生、清洁空气和清洁水的高标准的规则将被高度重视。其他的，有时更奇特的规定和契约也是如此，这些规定和契约可能是由房地产开发商或酒店为迎合某些市场细分而强加的。

网络空间中没有海关大楼

我们预计，主权的商业化将迅速导致许多大型领土主权的移交。信息技术不能受制于那种仍然可以阻碍制造业和农产品贸易的边界控制，这一事实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护主义将不再有效，因为信息贸易在创造财富方面取代了实物产品。这也意味着，较小的地区将越来越少地依赖维持广泛的政治管辖，以确保进入他们可以获得收入的市场。

信息技术使在以前受保护的服务部门工作的人面临外国竞争。二十年前，如果多伦多的一家公司希望雇用一名簿记员，这个人必须实际位于多伦多，或者位于通勤距离内的附近社区。而在今天

信息时代，一个在布达佩斯或印度班加罗尔的簿记员可以做这项工作，并通过互联网以加密的形式下载所有需要的材料。通过卫星连接的即时通信使得世界上任何地方只需通过调制解调器和传真就能到达。需要股票分析师的人可以用华尔街一个人的价格在印度雇佣 27 个分析师。随着信息技术每 18 个月提高一个量级或更多（摩尔定律），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工人将面临价格竞争，这基本上是政治家无法阻止的。这种竞争最终将完全适用于学识渊博的职业，就像簿记员一样。数字律师和网络医生将在信息经济时代大量涌现。

## 民族国家的死亡观察

随着以前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获得的经济利益逐渐消失，民族国家本身最终会在其沉重的责任下崩溃。但是，所有民族国家都在死亡线上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注定要在同一时刻消亡。远非如此。在大多数人的收入停滞不前或下降的大型政治实体

中，权力下放的压力往往最为强烈。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的管辖区可能会持续几代人，或者直到那里的终身收入前景与以前富裕的工业国家相当。到那时，将不再有容易替代成本的收益，增长的政治将变得更具挑战性。

我们还怀疑，拥有一个大都市的民族国家将比拥有几个大城市的民族国家保持更长时间的一致性，后者意味着有多个利益中心及其各种腹地。

另一个刺激权力下放的因素将是中央政府的高额债务。

相对债务最高的三个富裕工业国家--加拿大、比利时和意大利--并非巧合地是分离主义运动发达的国家。

这三个国家都有长期的预算赤字，现在的国债都超过了 GDI 的 100%：随着每个国家的国债增加，181 分离主义运动的吸引力也在增加。在意大利，北方联盟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受欢迎的地区政治运动。它的纲领是基于一个简单的数学观察：如果意大利北部，即 "Padoni a"，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不被抽走以补贴罗马和较穷的南部，那么它将比瑞士更富有。北方联盟提出了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从意大利分离，从而摆脱复利的一些可怕后果。

同样，在比利时，国债超过了 GDP 的 130%，弗拉芒人和瓦隆人正在像离婚前的一对敌对夫妇一样进行周旋。弗拉芒人中越来越多的少数人认为，他们对瓦隆人的补贴是不公平的，并且可以通过将比利时一分为二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

加拿大的情况与之不同的是，现在鼓动分离主义的主要地区--法裔加拿大，在历史上一直得到英裔加拿大的补贴。但是，随着联邦债务和赤字的增加，魁北克正在意识到这种收入再分配的形式将会减少。因此，魁北克集团正在调侃它十年前缺乏的吸引力--承诺通过取消支付加拿大联邦税来提高税后收入。分离主义领导人还建议，魁北克应该离开加拿大而不承担相应的联邦债务负担。

英裔加拿大人抵制这种说法，并倾向于反感其影响，因为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多年来向魁北克省进行的大量转移。尽管如此，魁北克党的号召力很强，而分离公投解散加拿大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当其他民族国家的财政状况恶化时，类似的命运也在等待着它们。

另一个不利于加拿大长期生存的因素是，它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有庞大的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需要维护。向信息时代的过渡不可避免地使物理基础设施贬值。随着远程办公人员取代工厂员工和办公室工作人员，高速公路和其他交通要道是否得到重建和良好的维护将变得不再重要。随着财政危机的全面爆发，加拿大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派别将退回到亚当-斯密所倡导的十八世纪排斥性的公共产品融资观点。他在《国富论》中写道。如果伦敦的街道是由[国家]财政出资来照明和铺设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像现在这样照明和铺设得这么好，或者甚至以这么小的代价。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这笔费用不是通过对伦敦每条特定街道、教区或地区的居民征收地方税来筹集的，而是从国家的一般收入中支付的，因此将通过对王国的所有居民征税来筹集，而这些居民中的大多数人并没

有从伦敦街道的照明和铺设中得到任何好处。14

对于伦敦来说，用多伦多代替，你就进入了一个将在阿尔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许多人头脑中运行的方程式。权力下放的逻辑将被证明具有感染力。

当加拿大解体时，这将导致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分离主义活动明显增加。阿拉斯加、华盛顿、俄勒冈、爱达荷和蒙大拿的居民将发现自己在与阿尔伯塔和不列颠哥伦比亚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

## 民族国家之后

在民族国家的位置上，你会看到，首先是省一级的小管辖区，最终是更小的主权国家，各种飞地，就像中世纪的城邦被其腹地包围。尽管在被灌输了政治重要性的人们看来很奇怪，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新的小国的政策将更多地被企业家的定位而不是政治争斗所左右。

这些新的、分散的主权国家将迎合不同的口味，就像酒店和餐馆所做的那样，在其公共空间内执行具体的规定，以吸引他们的顾客的市场细分。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游牧的基础上组织保护就没有特殊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些问题。

"城镇空气带来自由"。地中海时代

非苍生的公民

尽管有这些困难，人类的聪明才智通常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创建机构，以抓住有利可图的机会，即使是在需求来自于支付能力低下的人的情况下。当潜在客户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时，这种趋势应该更加突出。当过时的产品、组织、甚至政府失去吸引力，并且似乎没有立即改善的前景时，退出或 "用脚投票 "始终是一种选择。例如，考虑到中世纪城镇的发展，它们作为逃避封建奴役的农奴的安全避难所。它们的作用可能被证明类似于新的司法管辖区在容纳即将到来的民族国家的退出方面的作用。接受逃离某些领主的外国人作为 "苍生"，违背了封建法律和圣公会权威的普遍惯例。但尽管如此，对于那些采用这种方法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普遍成功的选择，对削弱封建主义的控制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中世纪历史学家弗里茨-罗里格所说，世俗领主的农奴 "在一年零一天后将成为该镇的自由布尔格"。'我们有理由期待新的制度庇护所在 "新的法律原则 "下出现，为国家公民提供财政庇护，就像中世纪城镇为生活在其墙壁阴影下的封建臣民提供庇护一样。

经济学家 Albert O. Hirschman 在 1969 年首次出版的《退出、声音和忠诚》中探讨了 "用脚投票 "的理论微妙之处，他预见到技术进步将增加退出的可能性，作为处理衰退国家的策略。他写道："只有当各国因为通信和全面现代化的进步而开始相互相似时，才会出现过早和过度退出的危险....."

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信息技术正在迅速减少各司法管辖区之间的许多差异，使退出成为一个更具吸引力的选择。当然，赫希曼词汇中的 "过早和过度的退出 "是从被抛弃的国家的最佳角度来理解的。毫无疑问，中世纪欧洲的领主们认为，他们

的农奴 "过早和过多地退出 "到他们获得自由的城镇，使他们深受其害。

回到我们前面的例子，假设会有一些小国为逃离垂死的民族国家的流亡者提供庇护，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牵强。这些主权国家将在流亡的条款和条件上竞争。

有些地方，也许在北美的西海岸，很可能迎合不吸烟的人，不容忍吸烟的人的二手烟。很明显，这种制度不会受到吸烟者的欢迎。对许多吸烟者来说，禁止他们的习惯的规则似乎是一种任意的强加。

在大众政治的工业时代，这种意见分歧是在政治运动中进行的，最终迫使一个群体或另一个群体遵守更强大的愿望。但是，关于相互排斥的选择的争论决不是必须以需要压制大量人的偏好的方式来解决的。

有些人喜欢吃鹅肝，有些人喜欢吃热狗，有些人还吃豆腐。他们通常不必为自己的饮食偏好而争论，因为他们的烹饪选择并不绑定在一起。没有人强迫所有人食用同一种膳食。

然而，大政治条件确实迫使人们共同消费工业时代政府提供的许多种集体甚至私人物品。为什么呢？

因为通过大规模的运作，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将无垠的管辖区划分为飞地，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方式，甚至在重要项目上也是如此，这是不现实的。当管辖区的数量增加十倍甚至百倍时，亚当-斯密所主张的提供公共产品的排他性方法可以更容易被接受。在信息时代，



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将是小飞地，而不是大陆帝国。有些可能是北美的印第安人部落，他们将要求对他们的保留地和保留地拥有税收管辖权，就像他们现在要求有权经营赌博赌场或无视限制地捕鱼。

由于信息技术消除了下放贸易区的许多弊端，新的主权国家将更多地按照俱乐部或亲和团体的原则运作，而不是那些管理领土民族国家的原则，这将是切实可行的。

正如每个潜在客户对衣服有相同的品味，或观看相同的电视节目并不重要一样，每个人都同意界定零散主权国家的管理风格的亲和点，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

广泛分散的品味将导致风格迥异的零散主权，就像服装风格或电视广播的选择越来越广泛一样。一些微型国家甚至可能像特许经营的酒店集团一样联系在一起，或者184个国家一起运作，以实现警察职能和政府其他剩余服务的优势。那些喜欢干净的街道和反感在桌面下发现口香糖的人，会发现新加坡很讨人喜欢。比维斯的粉丝们

共同运作，在警察职能和政府的其他剩余服务方面取得优势。那些喜欢干净的街道和反感在桌面下发现口香糖的人，会发现新加坡很好。比维斯和布特海德的粉丝们则不会。那些喜欢狂野的夜生活的人，会选择澳门或巴拿马，或一些类似的地方。对某一管辖区的风俗习惯感到不舒服的顾客，在其他地方会受到欢迎。盐湖城可能是无烟的，而哈瓦那的新城市国家，也许会改名为基督山，可能会笼罩在雪茄烟云中。

"这意味着工业社会的所有垄断和等级制度、金字塔和电网都将在这种将智能分配到所有网络的边缘的持续压力面前解体。最重要的是，摩尔定律将推翻关键的集中，当今美国权力的关键物理集合体：大城市--那一大批工业城市，现在每年依靠我们所有人的直接补贴生活，大约 3600 亿。大城市是工业时代留下的包袱。

微观主权或 "城市国家 "重新出现的一个特殊的讽刺是，它可能与许多城市的空洞化相吻合。大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工业主义的产物。它是随着工厂系统的出现而出现的，目的是在制造自然资源含量高的产品时获取规模经济。

当十九世纪开启时，超过 10 万的城市被认为是巨大的，在亚洲以外的地方，由于人口统计数字值得怀疑，没有超过一百万人的城市。1800 年，美国最大的城市是费城，人口为 69,403。纽约只有 60,489 人。巴尔的摩是美国第三大城市，有 26,114 名居民。大多数后来成为欧洲大都市的城市，其人口以 20 世纪的标准来看是很小的。伦敦的人口为 864,845 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巴黎有 547,756 人，是 1801 年欧洲唯一——一个居民超过 50 万的城市。里斯本的人口为 350,000 人。维也纳的人口为 25.2 万。柏林到 1819 年才勉强超过 20 万。马德里有 156,670 人。1802 年，布鲁塞尔的人口为 66,297 人。布达佩斯的人口只有 61,000 人。

有一个明显的诱惑，就是认为大城市的发展是人口增长的直接函数。但这并不一定如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挤在德克萨斯州，每个家庭都住在自己的独立屋里，有一个院子，并且仍然有一些德克萨斯州

的剩余。正如阿德纳-韦伯在经典研究报告《十九世纪的城市发展》中所说，仅凭人口增长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生活在城市环境中而不是分散在农村。1890年，孟加拉的人口密度与英国差不多。然而，孟加拉的城市人口仅占4.8%，而英国的城市人口则占61.7%。

在历史上，城市与农村之间有围墙，以防止掠夺者和下层阶级进入。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工业就业的增长创造了大城市。现在，随着工业主义开始消退，大城市已经变得非常容易崩溃。这种发展的完美标志是底特律，二十世纪中期的主要工业城市。曾几何时，世界工业产出的很大一部分都经过了底特律。现在，它是一个被掏空的185号外壳，充满了犯罪和混乱。在底特律市中心的许多街区，一座或多座废弃的建筑被烧毁或拆毁，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座城市在二战轰炸机的一系列空袭中幸存。

底特律提醒我们，许多工业城市已经不再可行。随着信息和思想成为传递价值的重要因素，而不是从自然资源中制造，它们将崩溃。在许多情况下，大城市已经变得太大，无法支撑其自身的重量。要保持一个大都市的运作，需要大量的支持系统有效地大规模运作。数以百万计的人挤在一起，意味着对犯罪、破坏和随机暴力的脆弱性有了巨大的跳跃。在工业时代，防范这些风险的代价是由大规模的生产经济来偿还的。

在信息时代，只有那些通过提供高质量的生活来偿还其维持费用的城市才能保持活力。远处的人将不再有义务去补贴他们。衡量城市生存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标志是，生活在城市核心区的人是否比城市外围的人更富有。布宜诺斯艾利斯、伦敦和巴黎

在南本德、路易斯维尔和费城的最后一家好餐馆关闭后，仍将是吸引人的生活和商业场所。

## 国家

一些城邦可能被证明只是没有城市的飞地。

也许它们被认为是村落国家或乡村国家更好。自然资源禀赋的价值也将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体现。当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做生意时，你很可能选择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做生意，在那里你可以深呼吸而不会吸入太多的致癌污染。

尽量减少语言障碍的通信技术将使人们更容易居住在环境有吸引力的几乎任何地方。人口稀少、气候温和、每人拥有大量可耕地的地区，如新西兰和阿根廷，也将享有比较优势，因为它们享有高标准的公共卫生，是低成本的食品和可再生产品的生产者。随着东亚和拉丁美洲数十亿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产品将受益于需求的增加。

## 不等价定理

经济学家关于行为的许多假设都植根于地方的暴政。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李嘉图的 "等价定理"，该定理表明，在一个有巨额赤字的国家，公民会调整他们的预期，以期待未来需要更高的税率来偿还债务。在这个意义上，通过税收和债务为支出融资之间存在着 "等价 "关系。至少在 19 世纪初李嘉图写作时，存在着这种等价关系。然而，在信息时代，理性的人不会通过提高储蓄率来应对为赤字提供资金的更高税收的前景；他将转移他的住所，或将他的

186 个交易放在其他地方。由于生产者在供应商中寻找最低成本的同样原因，他们甚至会更加

他的交易在其他地方进行。与生产者在供应商中寻找最低成本的原因相同，他们将更有动力去寻找其他保护供应商。这样做的好处将使转向一个新的塑料管供应商而实现的利润相形见绌。可以预期的结果是，主权个人和其他理性的人将逃离有大量无准备金债务的管辖区。

负债少、对客户成本低的廉价政府将成为信息时代创造财富的首选之地。这意味着在负债率低、政府已经重组的地区，如新西兰、阿根廷、智利、秘鲁、新加坡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做生意的前景更具吸引力。与北美和西欧的未改革的高成本经济体相比，这些地区也将是做生意的优越平台。

## 当地价格反常的侵蚀

大大降低的信息成本将使大多数本地定价优势消失。

买家不仅能够扫描大量的销售点，寻找可交易商品的最低价格；他们还能够使用远程服务，跨越管辖区进行购物。这将使人们能够更容易地比较像保险这样难以分析的产品的特点。而且，它将绕过当地许可程序对贸易的限制。因此，在任何地方的价格异常可以被额外的信息和竞争所侵蚀的领域，利润率可能会下降。

## 新的组织要求

网络经济在其参与者的互动方式上将与传统工业经济有很大不同。信息技术将使企业因高交易和信息成本而产生的许多长期组织优势消失。信息时代将是 "虚拟公司 " 的时代。许多比我们更了解信息技术的分析家完全没有看到，它注定要改变经济组织的逻辑。新技术不仅超越了边界和障碍；它还彻底改变了计算的 "内部 " 成本。即使是那些不会因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改进而受到更大的跨境竞争影响的少数企业，也将面临新的组织要件。迅速下降的信息和交易成本将决定性地降低规模经济，使在工业时期产生长寿公司和职业就业的许多激励措施失效。

为什么是公司？

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对企业规模的问题几乎保持沉默。他们没有讨论什么会影响企业的最佳规模，为什么企业会采取这样的形式，或者甚至为什么企业会存在。为什么企业家要雇用员工，而不是将每一项需要做的工作在拍卖市场上的独立承包商之间进行竞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通过提出其中一些重要问题，帮助开创了经济学的新方向。他帮助制定的答案暗示了信息技术对商业结构的革命性影响。科斯认为，公司是克服信息不足和高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径。

信息和交易成本

要想知道为什么，请考虑一下在没有单一公司协调其活动的情况下，你在试图操作工业时代的装配线时会面临哪些障碍。原则上，如果没有单一公司的集中生产，也

可以生产一辆汽车。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 ( Oliver Williamson ) 与科斯一起，是发展公司理论的另一个先驱。威廉姆森定义了六种不同的经营和控制方法。其中包括 "企业家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每个工作站都由专家拥有和经营。"27 另一种是威廉姆森所说的 "联合工作站"，在这种模式下，"中间产品由每个工人跨阶段转移。"28 没有任何实际理由表明，成千上万的雇员不能被一群独立的承包商所取代，每个人都租用工厂车间的空间，竞标零件，并提供组装车桥或将挡泥板焊接到底盘上。然而，你会徒劳地寻找一个工业时代的汽车工厂由独立承包商组织和经营的例子。

## 协调问题

在没有通过单一公司进行协调的情况下经营工业设施，会使大规模经营所能实现的大部分经济效益消失殆尽。在协调一个由小公司组成的拼凑的被子方面存在大量的交易问题，这将有效地使装配线失灵。这样一个系统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在各个承包商之间进行不停的谈判。

众多的承包商或企业家将不得不把时间和精力转移到确定部件的价格和制定他们自己不断变化的互动条款上，而不是专注于生产。简单地监测生产将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 行动的权力

有这样一组独立的组织在努力组装一辆汽车，模型的创建和重新设计将是一场噩梦。你只需想象一下设计者在试图说服数百个

独立承包商为推出新车型所需的变化时所面临的困难。在实践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同意。

可以想象设计者在试图说服数以百计的独立承包商为引进一个新模式所需的变化时所面临的困难。在实践中，几乎需要全体一致的同意。任何坚持或反对改变产品规格的人都可能有效地扼杀模型的改进，或提高引进模型的成本，从而进一步危及大规模运营的收益。

## 不必要的谈判

由独立承包商租用（或单独拥有）的装配线，如果在一个单一的公司内运作，就会受到许多漏洞的影响。

在需要数千人合作在一个屋檐下制造单一产品的业务中，个别承包商的死亡、疾病或财务失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拍卖市场肯定能够取代这些承包商。但是，每一个人的继任都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比如由继任者买断前任经营者。它还需要达成一项关于承担工厂空间租金的协议，也许还需要对焊接机或用于冲压尾灯插座的压力机进行重新租赁。所有这些都会很复杂。

## 激励性的陷阱

在工业时代的条件下，由独立承包商组成的装配线的另一个关键困难是，各个承包商的资本需求会有很大的不同。例如，生产仪表板开关所需的塑料模具可能相对便宜，而铸造发动机组或冲压出挡泥板所需的设备可能需要数百万美元。装配线生产的高资源含量和顺序性使得高资本成本所



带来的问题不可避免，原因在上一章已经分析过。承担资本密集型任务的承包商基本上要依赖其他人的合作来摊销他们的投资。资本要求较高的承包商能否筹集资金并实现盈利，将取决于他们能否获得资本成本低得多的其他参与者的合作。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不会得到这种合作。

小的会有很大的动力去剥削大的。

那些需要较少资金来运作他们在装配线上的特殊功能的人，会因为在关键时刻不合作而获益。就像罢工的工人一样，他们可以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关闭装配线，对他们自己造成的损失不大，但对那些拥有较大资本投资的人来说却很痛苦。生产过程会受到不断的博弈，小规模承包商通过阻挠产出的能力使那些拥有较高资本成本的人面临赎金。

较小的承包商为从大的承包商那里获取附带报酬而进行的操纵，会降低系统的效率。

## 坚定的解决方案

简而言之，在工业时代，如果生产被分给众多的个体承包商，那么通过大规模的装配线所取得的许多经济效益就会被消散。单一的大公司是克服这些缺点的有效方法，尽管它有其他的限制。

大企业是官僚主义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度正是工业时代所需要的。行政和管理团队监督和协调生产，众多的中层管理人员将命令向下传递，其他信息则向上传递。公司的官僚体系还提供了簿记和会计控制，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

委托代理问题，即雇员未能以雇佣他们的公司的最佳利益行事。要在工业时代的条件下实现复杂的会计，需要许多人的工作。建立这样一个行政官僚机构的成本很高。无论生产是否活跃，它都必须支付。由于这些行政人员掌握着经营企业所需的关键知识，他们的报酬通常高于他们的技能在现货市场上的价格。

## "组织懈怠"

大量的职业经理人和行政人员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倾向于 "占领 "公司，以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股东的利益来经营公司。例如，在工业时代，公司在办公室家具、俱乐部会员资格和其他可以由管理层享受但可能不会给投资者带来直接回报的福利上花费巨大是很常见的。在一个复杂的企业中，不可能轻易地从外部监督哪些间接开支是必要的，哪些是对员工的放纵。也很难防止有时相当一部分企业员工的推诿行为。由于在技术上很难监测业绩，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庞大的中间管理层，同时也很难监测监测者。

这些情况都导致了所谓的 "组织松弛"，这个词是理查德-赛特和詹姆斯-马奇于 1963 年在《公司的行为理论》中创造的。29 仔细的研究表明，许多真实的公司的表现大大低于它们的潜力。

"无论你是否产生结果，报酬都是一样的。  
"无论你是否努力工作，报酬都是一样的。  
"无论你是否关心，报酬都是一样的。"

30 CHRIS DRAY 190

"这不是我的工作"

作为一个渴望长期存在的实体，大型工业公司有一个我们已经探讨过的缺点，那就是容易受到工会的敲诈。它也有一些官僚主义的特征，在政府办公室中以更夸张的形式出现。命令从高处流下。任务被定型化和分门别类。这些任务往往被严格定义。工作类别之间出现了界限，类似于那些由管理学术界的卡特尔执行的界限。

在工业时代，期望一个簿记员为他桌上的灯换一个烧坏的灯泡，对许多人来说，就像要求一个律师帮助你治疗感冒一样奇怪。人们既不期望，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允许雇员跨越严格定义的职能之间的分割界限。

"那不是我的工作"是一句广为流传的口号，强调了工业时代的"组织松弛"。每个人的工作都被精确地定义为陈规定型的任务，无论怎样提高生产力，都不能侵犯。公司官僚机构中的每个雇员都是根据被认为有可能预测其具体职能表现的"资格"来聘用的。除了少数例外，每个人的工资都是基于工作分类，整个组织或多或少都有统一的工资。因为在大企业的行政等级制度中，具体的业绩往往是不被衡量的，就像在国家官僚机构中一样，工作以一种轻松的速度进行。因此，尽管公司确实获得了大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但它是以其其他低效率为代价的。

"在市场中，你不会因为有人告诉你要做什么，或者因为它被列在战略计划的第30页而去做。市场是没有工作界限的。...没有命令，没有来自高层的信号翻译，没有人把工作分成包裹。在市场上，人们有客户，而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非组织性的，因为它是在两个独立的实体之间。

## 新任务

信息时代的新的政治条件将大大改变商业组织的逻辑。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信息技术不做其他事情，它将大大降低处理、计算和分析信息的成本。这种技术的一个效果是减少了雇佣大量中层管理人员来监控生产过程的必要性。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先进的计算能力所带来的自动化机器工具正在取代小时工。而在生产过程继续有人的地方，控制和协调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自动化。装有微处理器的设备可以比管理人员更有效地监控装配线的进度。新设备不仅可以测量人们工作的速度和准确度，还可以自动编制账目，以及 191 名员工。

在许多情况下，先进的计算能力所带来的自动化机器工具正在取代小时工。而在生产过程继续有人操作的地方，控制和协调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自动化。装有微处理器的设备可以比管理人员更有效地监控装配线的进展。新设备不仅可以测量人们工作的速度和准确性，还可以自动编制账目，并在部件从库存中取出的瞬间对其进行重新订购。最小的企业现在可以负担得起财务控制程序，这些程序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复杂的方式对其财务进行核算，甚至比几十年前最大的公司通过其生产等级制度所能实现的还要快。

正如我们已经探讨过的那样，信息技术允许分散的、非连续的产品输出，减少了自然资源的含量，这极大地减少了对赌博和敲诈的脆弱性。然而，这些并不是信息技术的唯一特点，这些特点使得以前由雇员完成的职能的外包更具吸引力。资本成本更低。产品周期更短。独立承包商本身，

包括一个人的公司，拥有更复杂的信息网络供他们使用。很快，他们将能够依靠一系列的数字仆人来执行各种办公室功能，从接电话到秘书服务。数字仆人将是秘书、广告代理人、旅行社、银行出纳员和官僚。

## 好工作的消失

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有能力创造重要经济价值的个人将能够为自己保留他们创造的大部分价值。以前吸收了企业中主要收入创造者所创造的大部分收入的支持人员，将被低成本的自动化代理和信息系统所取代。这意味着一个组织将更有能力通过外包来保证其最高的服务质量，而不是将该功能保留在公司内部，因为在公司内部相对来说更难奖励完成任务的个人。一个虚拟公司将通过消除组织来消除大部分 "组织松弛"。

"好工作 "将成为过去。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 Orly Ashenfelter 所说，"好工作 "是一份报酬超过你价值的工作。"<sup>3</sup> 在工业时代，许多 "好工作 "的存在是因为信息和交易成本高。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内部功能越来越多，因为这样做可以获得规模经济。公司的膨胀也得到了税法的补贴。在工业时代晚期占主导地位的高税收，人为地放大了组建长寿公司和雇用长期雇员的优点。在大多数国家，税法和法规大大增加了在项目基础上成立和解散公司的成本。它们还倾向于迫使企业家将独立承包商归入雇员行列。法律上的干预进一步暂时扩大了 "好工作 "的供应，使解雇雇员的成本和难度增加，不管他对公司的生产力贡献有多大。

在工业时代，企业组织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合乎逻辑地保证了那些在组织中创造了不成比例的增值份额的最高技能和最有才华的人所得到的报酬比他们的贡献的价值要低得多。这种情况在信息时代将会改变。

微处理革命正在急剧增加信息的可用性并降低交易成本。这就使公司的职能下放。取而代之的是永久性的官僚机构，活动将围绕着项目进行，就像电影公司已经在运作的方式一样。公司以前的大部分 "内部" 职能将被外包给独立承包商。那些在工业时代拥有 "好工作"，但贡献不大，并依靠其他工人 "掩护 "的雇员，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在现货市场上竞标合同。许多忠诚、勤奋的员工也将如此。"好工作 "将不合时宜，因为一般的工作将不合时宜。

在日本大公司的极端情况下，员工期望有一份终身的工作。即使他们没有生产任务，他们也会被保留下来，有时只是出现在 "工厂角落里的一张光秃秃的桌子前"。现在，即使在日本，臃肿的白领劳动力正在被裁减。国际先驱导报》的一篇报道的标题讲述了这个故事。"离别是如此酸楚的悲伤。日本以工作换生活的文化痛苦地消亡了"。33 在后工业时代，工作将是你做的任务，而不是你 "拥有 "的东西。在工业时代之前，永久就业几乎是未知的。正如威廉-布里奇斯所说："在 1800 年之前，在许多情况下，在 1800 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工作总是指一些特定的任务或工作，而不是指一个组织中的角色或职位。...在 1700 年至 1890 年间，《牛津英语词典》发现了许多术语的使用，如 job-coachman、job-doctor 和 job-gardener，它们都是指一次性雇用的人。Jobwork（另一个经常使用的术语）是偶尔的工作，而不是定期的就业"。34 在信息时代，以前作为减少信息和交易成本的

权宜之计而在公司内部捕获的大多数任务将迁移回现货市场。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时"库存控制 and 外包都是可行的。它们是走向工作死亡的步骤。

目前，像 AT&T 这样的大公司已经取消了所有长期工作类别。

该大公司的职位现在是临时性的。用布里奇斯的话说，"就业又变成了临时性和情景性的，类别正在失去它们的界限"35。

在新的网络经济中，"独立承包商"将在各大洲进行远程办公，在信息时代相当于流水线的地方筑巢。

## 好莱坞接管

新的信息经济的示范商业组织可能是一个电影制作公司。这类企业可能非常复杂，预算高达数亿美元。虽然它们通常是大型企业，但它们也是临时性的。一个电影公司制作一部 1 亿美元的电影，可能在一起一年，然后解散。虽然从事制作的人很有才华，但他们并不期望在项目中找到工作就等于拥有一份"永久的工作"。当项目结束时，灯光师、摄影师、音响工程师和衣橱专家将各奔东西。他们可能会在另一个项目中重聚，也可能不会。

随着规模经济的下降，以及许多类型的信息密集型活动的资本要求同时下降，企业将有强烈的动机来解散。商业运作将更加临时化和暂时化。企业将更趋于短命。为特定目的集结人才的虚拟公司将比长期存在的公司更有效率。随着加密技术的普及和资本税因竞争而被迫降低，维持"永久

"公司存在的人工规模经济将逐渐消失。不管是快速还是缓慢地减税，这都会发生。如果迅速，以项目为基础运作的人为成本将更快消失。如果减得慢，支付不合时宜的高税收的主要负担将落在现有的公司身上，而新的企业将以虚拟公司的形式运作，使它们能够更好地逃避垂死的民族国家所带来的昂贵的负担。

虽然在信息经济中，特殊的技能和才能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大多数职业之间的人为界限将被消解。

先进的信息和检索存储技术将使任何人都能获得法律、医学和会计等行业的商业秘密和专业信息。记忆作为一种技能的经济价值将下降，而信息的综合和创造性应用的重要性将上升。

这一变化的全部影响将被过时的监管所延缓。但从长远来看，政府监管网络经济的权力将萎缩到消失的地步。任何对专业垄断企业的人为监管，在没有市场价值的情况下提高成本，最终都会被忽视。

向信息经济的转变还有其他影响。- 施加较高成本的地方法规将被转化为市场的立足点。

- 大宗商品将被征收重税并在当地运输，就像中世纪那样，而奢侈品将被征收轻税并被运往远方。

- 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将从国家手中转移到具有卓越技能和智慧的人手中，因为通过在产品中添加知识来创造财富变得越来越容易。



在暴力回报率不断上升的时代成长起来的政治体系，必须经历痛苦的调整。现在，相对于一个系统所掌控的权力大小而言，效率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小型、高效的主权国家，以较低的成本为其客户提供更多的保护，将越来越具有可持续性。

与中世纪时期一样，在组织暴力方面再次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规模不经济。这已经反映在自共产主义垮台以来，主权实体的数量不断增加。我们预计，随着信息时代的逻辑被经验所证实，世界上的主权国家的数量将迅速增加。

权力将再次在小范围内被行使。领土和省份甚至可能发现，在向其主权服务的 "客户" 提供有竞争力的条件方面，它们比跨越各大洲的国家有很大的优势。这将与迅速消亡的现代时期截然不同，在现代时期，除非能够控制足以控制一个王国的军事力量，否则任何实体都无法生存。在过去，当行使权力存在规模不经济时，那些从保护中获益最多的人，如中世纪后期城邦的富商，确实控制了政府。在我们看来，你可以再次寻找这样的东西。掠夺性负担的降低和对资源的更有效处置，应该导致在客户确实对当地主权行使控制权的地区的快速增长。

正如我们接下来所探讨的那样，面对众多失败者的反对，这些发展是否能够或应该继续下去，将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信息时代的重要争论。195

第 9 章 民族主义、反动和新的

吕迪特 ( LUDDITES

"当然，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荒谬的。为什么作为美国人、阿尔巴尼亚人、苏格兰人或斐济岛民的幸运或不幸的出生，要把主宰个人生活和构建社会的忠诚度强加于人，以便使其与他人发生正式冲突？

过去有对地方、宗族和部落的忠诚，对领主或地主的义务，王朝或领土战争，但主要的忠诚是对宗教、上帝或神王，可能是对皇帝和这样的文明。这里没有国家。有对祖国的依恋，或爱国主义，但在现代之前谈论民族主义是不合时宜的"。-威廉-普法夫

-William Pfaff <http://www.ibm.com>

说 "世界正在变小 "是一个有信息量的说法，被像 IBM 的广告公司这样有声望的权威所强化。他们为互联网制作的 "小星球的解决方案 "的多文化广告提醒那些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体育迷，分散在各地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条件已经被技术改变。我们参考杰出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 ( William McNeill ) 对这一影响的一个有用的脚注。他写道："通信和运输的不断加强，非但没有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反而开始在相反的意义上发挥作用，因为其范围超越了现有的政治和种族界限。"2 随着世界的 "变小 "和通信的改善，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偶然和 "内在的荒谬 "的主张必然会被削弱。

大变革

这种合理期望的麻烦在于，所有以往的历史都表明，它不可能以合理的方式得到满足。它所意味着的过渡将涉及一场危机。它需要一种根本性的新思维方式，一种超越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对社区的新想象。正如 Michael Billig 所强调的，"我们关于民族身份的信念，以及关于属于一个国家的自然性的信念，"是 "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3 这个时代，即现代时代，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它的主要机构--民族国家--仍然存在，但它们在一個被侵蚀的基础上不稳定地生存。当另一只鞋掉下来，民族国家崩溃时，我们预计会有讨厌的反应，特别是在富裕的国家，"国民经济 "在二十世纪给非技术性工作带来了高收入。我们相信，当一切都结束时，信息技术的出现所引起的大政治条件的变化 196 将导致彻底的制度变革。本书的论点是，民族国家的大规模权力注定要被私有化和商业化。像所有真正激进的制度变革一样，主权的私有化和商业化将涉及对理解世界的方式的 "常识 "的革命。这种变化很少以渐进的、线性的方式发生。

恰恰相反。事实上，由于我们在《大清算》中所探讨的原因，它实际上是被排除的。我们预计信息时代将带来不连续性--与过去的机构和意识截然不同。以下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由于微处理的影响，经济组织发生了前几章所述的那种变化。

所有在地理边界内而不是在地理边界外运作的组织，其重要性或多或少地迅速下降。政府、工会、有执照的职业和游说者在信息时代的重要性将不如工业时代。因为从政府那里争取到的好处和贸易限制将不再有用，在游说中浪费的资源也将减少。

更广泛地认识到，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导致全球许多地方出现广泛的分离运动。

传统精英的地位和权力下降，以及给予民族国家的象征和信仰的尊重也在下降。

当他们认为自己的 "普通生活 "被政治权力下放和新的市场安排打乱时，以那些失去地位、收入和权力的人为中心，出现了激烈甚至是暴力的民族主义反应。这种反应的特点包括：a.

对全球化、自由贸易、"外国 "所有权和对当地经济的渗透表示怀疑和反对。

所有权和对当地经济的渗透；b.

敌视移民，特别是明显不同于原民族群体的群体；c.

民众对信息精英、富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憎恨，以及对资本外流和工作岗位消失的抱怨；d.

由于信息技术显然有助于主权个体摆脱国家权力的束缚，对强制力崩溃的反应也将包括对这些新技术和使用这些技术的人的新鲁德主义攻击。

民族主义-鲁德主义的反应在各地区和人口群体中不会是一致的：a.在快速增长的197个经济体中，反应将不那么强烈，这些经济体在工业时代的人均收入很低，市场的深化提高了所有技能群体的收入。

在目前的富裕国家中，特别是在以前享有高收入的价值贫乏者和技能贫乏者比例较高的社区，反动情绪将最为强烈。

尽管有 Unabomber 事件，新卢德分子将吸引他们的大部分追随者，即那些在主要民族国家人口中收入能力最低的三分之二的人。

然而，民族主义和卢德主义的反应最强烈的不是非常贫穷的人，而是具有中等技能的人，这些人在工业时代已经成年，面临着向下流动。\*

劳伦斯-E-哈里森 ( Lawrence E. Harrison ) 在《谁在繁荣》 ( Who Prospers ) 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技能和价值观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经济成功。文化价值如何塑造经济和政治的成功》 ( 纽约：Basic Books , 1992 ) 中详细介绍了这种关系。随着新的大政治条件产生新的身份意识，以及新的、互补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民族主义的旧的必要性将失去吸引力。

民族主义反应将在新千年的早期几十年达到顶峰，然后随着分散的主权国家的效率被证明优于民族国家的大规模力量而消退。我们怀疑，民族国家对替代性管辖的先天欺凌，如俄罗斯对车臣的入侵，将使国家和民族主义狂热者失去在信息时代的大政治条件下成熟的新一代的同情心。

民族国家最终将在财政危机中崩溃。系统性危机通常出现在失败的机构遭受不断上升的费用和不断下降的收入时--这种情况在 21 世纪初随着退休福利和医疗支出的

膨胀，必然会困扰主要的民族国家。就当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英国和美国都背负着数百万美元的无准备金的养老金负债（按人均计算是相当的），而这两个国家都不可能驯服。其他主要民族国家也面临类似的破产负担。

## 与文艺复兴的相似之处

我们曾概述过这样的理由：保姆式国家的崩溃将产生与五个世纪前圣母教会机构垄断的崩溃密切相关的后果。与今天的民族国家不一样，当时的教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在某些方面，教会的地位甚至比五百年后的国家更加稳固。长久以来，教会一直声称自己是“基督教社会之首的普遍权威”。<sup>5</sup> 这是中世纪知识分子历史学家约翰-B-莫拉爾的描述。然而，在1490年代的技术革命之前，很少有欧洲人会对教会在基督教世界的至高无上地位提出异议，但教会在其传统角色中勉强又生存了一代。

## 良心的私有化

到15世纪20年代初，数百万善良的欧洲人拒绝了天主教會的普遍权威，而就在几十年前，这种异端行为还可受到酷刑和死亡的惩罚。事实上，许多中世纪的欧洲大教堂和教堂都装饰着异教徒被恶魔撕掉舌头的指示性雕刻。

这些酷刑所传达的教训一定给许多不识字的教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可以通过惩罚来识别受害者是异教徒。图案是毫不含糊的：异教徒是那些舌头被割断的人。然而，尽管这种惩罚很严厉，但它只是为

异端的最终惩罚--火刑柱上的死亡--做热身。然而，令教会失望的是，这一教训并不具有足够的威慑力。印刷术的出现极大地增加了异端论点的供应，甚至连可怕的惩罚前景也不再能阻止潜在的异端分子。事实上，在现代早期的欧洲，确实有不少不幸的宗教自由先驱者为他们的精神独立主张付出了代价，被割掉了舌头。其他人则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宗教裁判所里的反动分子，因为说出了我们认为是普通的良心表达，就真的把人烧死了。总而言之，宗教改革和它所激发的反应使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仅在三十年战争的最后半年，战场上的死亡人数就达 151 万。还有更多的人死于饥荒、疾病，以及死于宗教裁判所和其他当局的手中。绝非所有的暴力都是由天主教当局实施的。在伦敦塔中发现了一千多名被认为是被亨利八世国王残忍杀害的英国主要天主教徒的尸骨。一些人，包括托马斯-莫尔爵士和圣约翰-费舍尔主教，因拒绝放弃旧信仰而被公开处决。<sup>8</sup> 另一方面，亨利八世国王的天主教女儿玛丽王后因遗传自其父亲的梅毒而精神失常，在其统治的最后两年将 300 名新教异端分子烧死在木桩上。

当不同信仰的个人坚持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长期被剥夺的选择他们所支持的教会权利时，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如此。从我们 20 世纪末的角度来看，这些个人信仰的表达完全在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应该保护的范围之内。但在十六世纪初，既没有宗教自由也没有言论自由。当时的当局仍然从日渐式微的中世纪世界观中汲取他们的方向。在他们眼里，个人自主反对权威的姿态，尤其是教皇的 plenitudo potestatis（权力的充实），是无耻的，是明显的颠覆。正如神学历史学家尤安-卡梅伦所说，像马丁-路德这样的宗教改革者所采取的观点，"意味着与旧教会的

制度和精神连续性进行了刻意的、决定性的决裂 "9。

## 异端和叛国

本着这种精神，我们预计将与民族国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连续性 "刻意和决定性地决裂"。到下个世纪的第一季度末，数百万正直的个人将犯下相当于十六世纪异端的世俗罪行--一种低级叛国罪。他们将从摇摇欲坠的民族国家撤回效忠，以维护他们自己的主权，他们的权利不是选择他们的主教或礼拜堂，而是选择他们作为顾客的治理形式。主权的私有化将与五个世纪前的良知私有化并行不悖。两者都是主导机构的前支持者的大规模叛逃。正如研究 "对公司、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反应 "的专家阿尔伯特-0-赫希曼所写的，这种类型的退出是困难的，因为 "退出常常被打上犯罪的烙印，因为它被贴上了逃兵、叛变和叛国的标签"。有主权的个人将不再仅仅接受作为国家的人力资源强加给他们的东西。数百万人将摆脱公民的义务，成为政府提供的有用服务的客户。事实上，他们将创建和赞助平行机构，将大部分与公民身份相关的服务置于完全商业化的基础之上。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生产者一直被国家视为资产，就像奶农对待奶牛一样。他们被压榨得越来越厉害了。现在，奶牛将长出翅膀。

## 脱离公民身份

正如新的大政治条件在十六世纪破坏了教会的垄断一样，我们预计信息时代的大政治最终将决定二十一世纪的治理条件，无论它的新条件在那些将现代政治的价值观纳入自己的价值观的人看来是多么的离谱。



从 "公民 "身份到 "顾客 "身份的演变，意味着对过去的背叛，就像现代早期从骑士精神到公民身份的转变一样尖锐。信息精英们对公民身份的背叛将产生一种刺激，就像五百年前导致数百万欧洲人放弃教皇的无误性一样。

如果与宗教改革的平行关系并不令人信服，部分原因可能是今天并不明显，放弃对宗教机构的忠诚曾经是二十世纪叛国的大问题。在少数伊斯兰国家之外，二十世纪末的异端是一种精神上的轻罪，对个人声誉的打击并不比在 30 英里的区域内驾驶 45 英里的超速罚单更大。

在美国，可以找到不相信上帝或否认他们所支持的信仰的关键原则的神职人员甚至主教。今天，一个异端几乎需要公然的魔鬼崇拜才会被注意到。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宗教教义是如此涣散和草率，以至于很少有人能辨认出过去异端争论的焦点神学要点。<sup>11</sup> 这反映了人们的注意力普遍从宗教上转移。

在某种程度上，宗教领袖实际上帮助领导了 20 世纪末对精神问题的认真态度，他们把精力从精神方面的关注转移到游说者和社会煽动者身上。他们就像被权力的磁铁吸引一样，将大部分活动用于向政治领导人施压，使其采取对民族主义交易至关重要的再分配政策。在阿根廷，天主教会大声疾呼，向卡洛斯-梅内姆总统的政府施压，要求其放弃经济改革，支持传统的通货膨胀货币和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在新西兰和其他许多国家，宗教领袖也对调整臃肿预算的努力提出了类似的抱怨。天

主教教徒大力游说，反对美国的福利改革。

财政裁判所？

简单地说，当代宗教领袖把他们不断下降的道德权威大部分集中在世俗的救赎和影响国家的鼓动上，而不是在精神救赎上。鉴于这种记录，可以预期他们会作为帮凶参与到对即将到来的世俗改革的反应中。随着民族国家受到挑战并开始摇摆不定，它将不再能够履行作为民众支持核心的物质利益的承诺。在法国大革命时达成的事实上的交易将失效。国家将不再有能力保证其公民的低成本或免费教育，更不用说医疗服务、失业保险和养老金，以换取本来报酬很低的军事服务。虽然不断变化的战争要求将使政府能够在没有大规模军队的情况下保卫自己和统治下的领土，但这很难减轻政府对打破已成为不合时宜的交易的批评。事实上，随着新的大政治逻辑的确立，它的后果将证明在新的信息经济中的失败者是非常不受欢迎的。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许多宗教领袖和政府开支的主要受益者，将站在怀旧反应的最前沿，寻求重新确认民族主义的主张。他们将声称，不应该让美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或其他国籍的人--填空--饿着肚子睡觉。即使是那些一直站在改革前沿并从 "市场友好的全球主义 "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国家，如新西兰，也会被反动的失败者所折磨。他们将寻求阻挠资本和人员的跨境流动。而且他们不会就此罢休。

像新西兰第一党的领导人温斯顿-彼得斯这样的蛊惑者，懒得去思考新世界将如何运作。但是，在适当的时候，温斯顿和他的手下会被告知信息经济的逻辑。他们将寻求阻止计算机、机器人、电信、加密和

其他信息时代技术的扩散，这些技术正在促进全球经济的几乎每个部门的工人被取代。无论你在哪里，都会有一些政客乐意挫败长期繁荣的前景，只是为了防止个人宣布独立于政治。

到 2020 年，或者说在马丁-路德将他的 95 条颠覆性论文钉在维滕贝格的教堂门上大约五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公民身份的成本/收益比率的认识将经历类似的颠覆性澄清。有能力和财富的人，即未来的主权个人，对民族国家的看法将经历相当于激光手术的政治过程。他们将看到 20/20。

在 20 世纪，就像整个现代社会一样，暴力的持续高回报使大政府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主张。尽管对收入和资本征收掠夺性税收，但大规模权力的决定性动员了富人和野心家对经合组织国家的忠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里，每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政治家都能够征收接近或超过 90% 的边际税率。

正如我们所探讨的那样，富人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同意这种强加的做法。

形势所迫，他们不得不依靠那些能够大规模掌握暴力的政府来保护自己。除了有机会到香港任职的英国警察之外，经合组织政府征收垄断性税收的情况很少发生。在工业时代，任何希望享受领先经济机会的高收入者，除了居住在高税率的经济体中，通常没有什么选择。这意味着要承担与所提供的服务不相称的税收负担。

政治的算术

19 世纪的美国副总统约翰-J-卡尔霍恩精明地勾勒出现代政治的算术。卡尔霍恩的公式将民族国家的全部人口分为两类：纳税人，他们对政府服务成本的贡献大于他们的消费；以及税收消费者，他们从政府获得的利益超过了他们对成本的贡献。除了几个明显的例外，大多数经合组织的企业家在 20 世纪结束时都是净纳税人，而且程度很夸张。例如，在 1996 年，英国最高 1% 的纳税人承担了总所得税负担的 17%。他们比底层 50% 的收入者多支付了 30% 的税款，后者只贡献了 13% 的所得税支付。在美国，富人的负担甚至更加夸张，最高的 1% 的人支付了 28% 的所得税。

随着二十世纪的结束，企业家是净纳税人，而且程度很夸张。例如，在 1996 年，英国最高 1% 的纳税人承担了 17% 的总所得税负担。他们比底层 50% 的收入者多支付了 30% 的税款，后者只支付了 13% 的所得税。在美国，富人的负担甚至更夸张，1994 年，最高的 1% 的人支付了总所得税收入的 28%。<sup>12</sup> 正如弗雷德里克-C-莱恩提醒我们的那样，富人不仅必须为那些 "质量差、价格高得离谱 " 的服务付费，而且他们的付款往往与任何服务都不相称。

高层纳税人所支付的福利往往完全归于他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富人很乐意少消费政府服务，而这些服务通常是低质量的。几乎每个国家的政府机构都是有名的效率低下，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往往由缺乏激励的雇员控制，以提高生产力。几乎从任何角度来看，在 202 年工业时代，最大的纳税人 为政府服务支付的费用比它们在竞争性市场上的价值高很多倍。

这一点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然而，不幸的是，用莱恩的话说，认识到为保护而向政府付款是 "按理想标准的浪费"，这在 20 世纪中期很少是一种可操作的见解。相反，它只是一个被接受的缺陷，"社会组织中各种类型的浪费之一"。

例如，不满的人的选择不是从英国搬到法国，或从美国搬到加拿大。除非在极少数情况下，否则这不会有什么用处。主要的民族国家都有同样的缺点。他们都采用了或多或少的没收性税收制度。要实现自主权的大幅提高，就必须完全逃离欧洲和北美的核心国家，前往周边国家。在亚洲部分地区、南美和各种偏远岛屿，税收负担明显降低。但是，逃避掠夺性税收通常要付出代价--经济机会的丧失，而且往往是生活水平的下降。正如我们所探讨的，在工业时代的条件下，经济机会受到限制，在核心工业国家以外的大多数司法管辖区，生活水平也不尽如人意，这些国家沉溺于没收性税收。

考虑将共产主义制度作为一个范本。与许多第三世界政权一样，它们通常不征收高额所得税，甚至不征收任何所得税。

然而，在苏联存在的四分之三个世纪里，很少有企业家在那里寻求税收庇护。虽然苏联的所得税率并不高，但他们没有任何优势，因为苏联人以拒绝承认产权为由。这带来了比税收更糟糕的负担。共产主义制度使人们几乎不可能组织一个企业并赚到任何大钱。

实际上，共产党国家没收了税前收入。

此外，如果有人因为一些古怪的原因已经拥有了稳定的收入而选择住在莫斯科或哈瓦那，他将很难用钱来购买一个体面的生活标准。在前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活，除了能享受到上好的雪茄、鱼子酱、优秀的管弦乐队和芭蕾舞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消费乐趣。生活中大多数稀缺的好东西都无法获得，或者在政治影响的基础上被严格配给，而不是公开交换。后现代生活的批评者强调 "消费在后现代体验中的重要性"，冒着验证这种陈旧观念的风险，自共产主义垮台以来，全世界范围内可获得的商品和服务的标准不断提高，肯定使各管辖区之间的竞争更加活跃，从而有助于削弱与国家和地方的联系。

在旧政权下，消费者的选择是如此有限，甚至卡斯特罗本人如果想清理牙齿上的科伊巴碎片，也很难获得一包体面的牙线。直到最近，甚至全球许多地方的富人都无法享受到西欧或北美中产阶级常见的生活质量。面对这种悲惨的局面，大多数有杰出才能的人都被感动了，在工业时代接受了民族主义的讨价还价。

他们留在原地，支付高得离谱的税款，以获得在他们出生地垄断暴力的特定民族国家所提供的可疑保护。

"天堂现在被关闭和锁住了，被天使挡住了，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向前走，环游世界，看看是否在某个地方有一条后路可以进去。"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 \*\*\*古巴只是在1996年作为紧急措施征收所得税，以应对欧洲共产主义崩溃导致的补贴结束后的经济萧条。

共产主义的垮台拆除了阻碍旅行的 "铁幕"，有效地阻止了商业的全球化，从而使世界人为地保持 "大"。喷气式飞机与破坏共产主义的信息技术相结合，增加了对高端旅游资金的竞争。即使是最偏远的省份，银行家们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也极大地刺激了全世界的住房和美食标准。这里我们指的不是麦当劳汉堡包和肯德基炸鸡加盟店的传播，甚至是在莫斯科和布加勒斯特这样以前禁止的地方。不太引人注目，但更重要的是领先的连锁酒店和高质量的餐厅的传播，这些餐厅提供的是特级红葡萄酒，而不是伏特加和可乐。由于这种转变，任何有能力的人现在几乎可以在地球的任何地方享受到高物质标准的生活。

事实上，现在很少有国家没有一家一流的酒店和至少一家能让米其林检查员感兴趣的餐厅。

正如赫斯曼在四分之一世纪前所预料的那样，技术进步大大增加了退出的吸引力，作为解决服务提供和定价不尽人意的办法。他写道："另一方面，对一个人的国家的忠诚，是我们可以不做....。只有当各国由于通信和全面现代化的进步而开始相互相似时，才会出现过早和过度退出的危险，'人才外流'就是目前的一个例子。"<sup>16</sup> 请注意，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指出的那样，赫希曼的 "过早和过度退出 "的标准是从被抛弃的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的，而不是从个人的角度。

尽管如此，他的结论是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将增加叛逃和退出的吸引力，这是无可指责的。现在在任何地方都更容易生活得很好，这一事实使得生活在成本最低的地方很有吸引力。然而，比你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得很好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你

现在可以在任何地方获得高收入。正如凯恩斯勋爵所建议的那样，不再需要居住在一个高成本的管辖区，以积累足够的财富来生活，"明智地、愉快地和良好地"。由于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原因，微技术改变了民族国家赖以生存的大政治基础。在信息时代，一个新的网络经济将出现，超出任何政府的垄断能力。这是第一次，技术将使个人能够在一个不能轻易屈服于系统强制要求的领域积累财富。

新的社会，以及新的文化，将由机器比人做得更好，由自动化取代越来越多的低技能工作，以及由信息技术给那些真正有才能利用它的人带来的权力来定义。在这样一个 204 社会中，一小部分人（可称为信息贵族）和越来越多的下层人（可称为信息穷人）之间的关系将更加紧张。他们之间的区别之一是，信息贫民要么被地理所束缚，要么发现移动的好处很少。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讨论的那样，信息贵族将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因为他们能够在任何对他们有吸引力的地方赚钱，就像通俗小说家一直能够做到的那样。一百年前，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可以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谋生；现在，信息贵族们都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 辖区内的市场竞争

由于信息技术超越了地方的暴政，它将自动使各地的管辖区在质量和价格的基础上面临事实上的全球竞争。换句话说，行使地方领土垄断权的政府，就像大多数其他实体一样，最终将根据他们对客户的服务质量，接受真正的市场竞争。这将很快使人们不可避免地看到，在工业时代有利于高成本制度的旧逻辑已经逆转了。领先的民族国家，及其掠夺性、再分配的税收制



度和严厉的监管，将不再是首选的司法管辖区。冷静地看，它们以垄断价格提供劣质的保护和减少的经济机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它们可能会被证明比亚洲和拉丁美洲那些传统上收入更不平等的地区更不受社会影响，更容易发生暴力。领先的福利国家将因弃权而失去他们最有才华的公民。

## 未来的 "非国家 "时代

随着 "主权个人 "时代的形成，许多最优秀的人将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国家的一方，是 "英国人 "或 "美国人 "或 "加拿大人"。一个新的对世界的 "跨国 "或 "非跨国 "的理解，以及确定一个人在其中的位置的新方法，将在新的千年里被发现。这种新的身份等式，与国籍不同，不会是使民族国家和国家制度在二十世纪普遍存在的系统性强制的产物。

涵盖整个地球的发展通常被描述为 "国际"，仅仅这一事实就表明民族主义范式已经深入到我们构想世界的方式中。经过两个世纪对 "国际关系 "和 "国际法 "的神秘灌输，我们很容易忽视 "国际 "并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西方概念。事实上，国际这个词是杰里米-本瑟姆在 1789 年发明的。它首次被用于他的《道德和立法原则导论》一书中。本瑟姆写道："必须承认，国际这个词是一个新词，尽管它希望有足够的相似性和可理解性。"这个词很受欢迎，但并不只是在本瑟姆 205 年的狭义上。"国际 "变成了一个马虎的同义词，指的是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任何事情。

国际时代开始于 1789 年，与法国大革命同年。它持续了两个世纪，直到 1989 年，欧洲开始了对共产主义的反抗。我们认为，

那场第二次革命标志着国际时代的结束，而不仅仅是因为名誉扫地的共产主义颂歌是 "国际"。具有国家所有权的指令性经济是民族国家最雄心勃勃的表现。国家权力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反映在语言上。现代社会最具侵略性的动词是 "国有化"，意思是将国家所有权和控制权纳入其中。在国际时代，这个词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的煽动者的口中都很容易被绊倒。现在，它已成为过去词汇的一部分。国有化已经变得不合时宜，正是因为国家权力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在现代的黄昏，国家的集中权力被技术创新和市场力量之间的互动所削弱。现在，市场胜利的下一个阶段即将展开。不仅单个民族国家将开始解体，而且在我们看来，即使是民族国家的俱乐部--联合国，也注定要走向破产。我们不会惊讶地看到联合国在千年之交的某个时候被清算。

如果 "国际 "是一种股票，现在就是卖出的时候。这个概念很可能在新的千年里被取代，或者至少缩小到其原来的含义，因为令人信服的理由是，整个世界将不再由一个相互关联的主权国家系统所主导。关系将采取新的 "非国家 "形式，这是由日益重要的微型管辖区和主权个人所决定的。拉布拉多海岸的一块飞地与一个主权个人之间的争端将不能被正确地描述为 "国际 "争端。它将是跨国的。

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社区和效忠将不以地域为界限。识别将更精确地针对真正的亲缘关系、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基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所关注的虚假的亲缘关系。保护将以新的方式组织起来，而这些方式是六分仪、铅垂线或测量

师工具包中其他划定领土边界的早期现代工具所无法解析的。

## 发明的社区和传统

人类必须自然地将自己置于一个被称为国家的 "发明" 社区中的想法，在下个世纪将被世界性的精英们视为古怪和不合理的，就像它在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一样。正如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写的，民族国家 "在历史上没有先例"。<sup>8</sup> 民族主义的权威人士迈克尔-比利格 ( Michael Billig ) 放大了这一点。在其他时代，人们并不持有语言和方言的概念，更不用说今天如此普遍的领土和主权的概念，而这些概念

206

在下个世纪，被称为国家的社区将被世界性的精英们视为古怪和不合理的，就像它在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一样。正如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写的，民族国家 "在历史上没有先例"。<sup>8</sup> 民族主义的权威人士迈克尔-比利格 ( Michael Billig ) 放大了这一点。在其他时代，人们并不持有语言和方言的概念，更不用说那些领土和主权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在今天是如此的普遍，对 "我们" 来说，206 似乎是如此的物质真实。这些概念如此强烈地嵌入当代常识中，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忘记它们是被发明的永久性概念。中世纪的蒙泰卢或圣马特奥工场的修鞋匠，在 700 年的时间里，现在对我们来说可能是狭隘的、迷信的人物。但他们会发现我们关于语言和民族的想法是奇怪的神秘主义；他们会感到困惑，为什么这种神秘主义会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我们猜想，在境外的未来，有思想的人同样会感到困惑。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国家是 "想象中的社区"。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言，如果没有想象力，一个人就会很乐意 "与女仆和公爵夫人上床"。然而，对于那些在 20 世纪长大的人来说，"国家 "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组织单位，以至于很难理解它们是 "想象的 "而不是自然的。为了理解未来可能与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有多大不同，有必要看看民族主义是如何被强加给工业时代的 "常识 "的。

我们很容易忽视 "民族共同体 "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持续的想象力投资形成的。没有客观的标准来准确界定哪个群体应该是 "民族"，哪个群体不应该是。严格来说，也没有 "自然边界"，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欧文-拉蒂莫尔 ( Owen Lattimore ) 和 C-R。

惠特克已经表明。"拉蒂莫尔在写到帝国中国时说："一个主要的帝国边界，"不仅仅是一条划分地理区域和人类社会的线。它也代表了一个特定社会的最佳增长极限"。2 或者如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罗纳德-芬德利所说："只要在经济学中考虑到它们，一个特定经济体系或'国家'的边界通常被认为是既定的，还有生活在这些边界内的人口。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无论这些边界在国际法中多么神圣，它们都曾在敌对的索赔者之间发生过争执，并最终由争执各方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平衡决定。

22

如果有人拥有世界上半民族国家的所有数据和一套精美的卫星地图，就无法预测其他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哪里。也没有任何科学方法可以从生物学或语言学上区分一个民族的成员和另一个民族的成员。无论

多么先进的验尸程序，都无法在飞机失事后从基因上区分美国人、加拿大人和苏丹人的遗体。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界限不是自然的，就像物种之间的界限或动物品种之间的物理区别。相反，它们是过去和现在投射权力的努力的产物。

"一种语言是一种带有军队和海军的方言"  
MARIO PEI

## 作为权力工具的语言

令人惊讶的是，语言也可以这么说。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民族国家统治之后，"语言"并不构成区分民族的客观基础，这种想法可能显得考虑不周，甚至是荒谬的。但仔细看看。现代语言的历史清楚地揭示了它们被塑造来加强民族主义认同的程度。我们现在所理解 and 使用的西方"语言"并没有自然地演变成它们目前的形式。它们与"方言"也没有客观上的区别。在现代世界中，没有人愿意说"方言"。

几乎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母语被认为是真正的东西--"语言"。"不要说在这种时候，文字没有什么用处。语言和行动是合二为一的。让人安心的强大能量肯定会产生行动--说出来的东西就会产生。行动在这里是话语的仆人，它顺从地跟在后面，就像在世界的第一天：他说了，世界就在。米歇尔，1792年8月

"言行合一"

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南部使用的混血拉丁语版本，即 la langue d'oc 或 Occitan，与西班牙北部加泰罗尼亚地区

的白话文相比，与 la langue d'oïl，即成为 "法语 "基础的巴黎语言相比，有更多的共同点。事实上，当《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以巴黎风格发表时，生活在法国当前边界内的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sup>23</sup> 法国革命者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计算如何将他们的大字报和法令翻译成无数村庄的土语，而这些村庄彼此之间只能模糊地理解。

生活在后来成为 "法国 "的人们有相当不同的说话方式，但作为一项政策，他们有意地将其合并为一种官方语言。

自弗朗西斯一世于 1539 年颁布《维勒-科特雷茨敕令》以来，书面法语一直是司法法庭的官方语言。<sup>24</sup>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被广泛理解，就像 1200 年后 "法律法语 "在英国被广泛理解一样，当时它成为法院的官方语言。每种语言都是一种 "行政白话"，而不是一种在整个领土上使用和理解的标准语言。

法国革命者希望创造一种更全面的東西，一种民族语言。历史学家 Janis Langins 在《语言的社会历史》中评论说："革命者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团体认为，通过有意识地在共和国领土上强加一种标准的法语，可以促进革命的胜利和启蒙运动的传播。"<sup>25</sup> 这种 "有意识的努力 "包括对个别词汇的使用进行大量的争论。考虑一下 "革命 "这个形容词的典型例子，它是马拉布在 1789 年首次使用的。正如 Langins 所说，在经历了一段 "有点广泛和不加区别的使用 "之后，"在恐怖时期，出现了一段压制和遗忘的时期，长达数十年。...1795 年 6 月 12 日，大会决定改革语言以及我们以前的暴君[即被打倒的罗伯斯庇尔主义者]创建的机构，在官方

名称中取代'革命'一词。"26 这种语言工程的传统 208

其中包括对个别词语的使用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考虑一下 "革命 "这个形容词的典型例子，它是由马拉布在 1789 年首次使用的。在经过一段 "有点广泛和不加区别的使用 "之后，正如兰金斯所说，"在恐怖时期，出现了一段压制和遗忘的时期，长达数十年。...1795 年 6 月 12 日，大会决定改革语言以及由我们以前的暴君 [即被征服的罗伯斯庇尔主义者]创建的机构，在官方名称中取代'革命'一词。"26 这种语言工程的传统 208 在法国当局对 "周末 "等从英语进入法语的词汇的微妙接受中得以延续。

然而，两个世纪前，法国的国家语言工程师并不仅仅是歧视来自英吉利海峡彼岸的词汇；他们还面临着一项更大的工作，即消除共和国领土内的地方语言变体。这项工作不仅仅局限于压制 "法语"。在英吉利海峡上说的 "法语 "是指

当时的里维埃拉与东部更远地区的 "意大利语 "相比，更接近巴黎的法语。

同样，阿尔萨斯的语言可以说是被归类为德语的一种形式，而德语本身也有许多地方性品种。巴斯克语在比利牛斯山脉使用。与法国西北海岸的布列塔尼语一样，巴斯克语与作为 "法语 "基础的拉丁语的任何白话 "方言 "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在东北部也有大量讲佛兰德语的人。正如迈克尔-比里格提醒我们的那样，"巴黎的语言风格 "不是通过自发的市场过程传播

的，而是 "在法律上和文化上作为'法语'强加的。"27

法国的情况在其他地方的民族国家建设中也是如此。

语言往往由军队携带，由殖民国家强加。例如，非洲独立后的地图是根据欧洲列强的行政语言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来确定的。当地方言很少在学校里教授。公认的 "语言 "和 "方言 "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前者倾向于定义 "国家"，甚至是具有任意的殖民边界的国家，而后者则不是。

简而言之，强加一种 "民族语言 "是全世界用来加强国家权力的过程的一部分。在国家垄断暴力的领土上，鼓励或强迫每个人讲 "母语"，对促进权力的行使有很大好处。

## 语言不规范性的军事层面

在一个回归暴力的世界里，采用一种民族语言能带来军事优势。民族语言几乎是巩固民族国家中央权力的先决条件。鼓励公民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中央政权，能够更好地削弱地方豪强的军事力量。法国大革命后，语言的标准化使现代军事力量的最廉价和最有效的形式--国家征兵军队--成为可能。

使得最廉价和最有效的现代军事力量形式--国家征兵制军队--成为可行。共同的语言使来自 "国家 "所有地区的部队能够彼此流畅地交流。这是大规模征兵军队能够



取代不是由中央当局而是由强大的地方豪强召集和控制的独立营队的前提条件。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所讨论的那样，军队是由当地的权贵们组建和指挥的，他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响应来自巴黎或其他首都的战斗号召。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立场都是经过仔细协商后决定的。正如查尔斯-蒂利所指出的，"给予或不给予支持的能力....."。...

"国家军队"极大地增强了国家政府在整个领土上实施其意志的权力。强制推行国家语言在促进国家军队的形成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国家军队能够有效组建和运作之前，他们的各个成员能够流利地交流显然是有益的。

因此，如果一个辖区内的每个人都能理解命令和指示，并将某些情报沿着官僚的指挥系统传递回去，那就是一种军事上的优势。法国革命者几乎立即证明了这一点的价值。除了开办相当于语言学校的课程外，他们还专门开设了为期一个月的"速成班"，正如兰金斯所写的那样，"来自法国各地的数百名学生将接受火药和大炮制造技术的培训"29。

法国人的做法在军事上的优势表现在他们在拿破仑时期的成功，以及那些在战争期间不能依靠共同语言的动员优势的政权所发生的相反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造成俄国军队灾难性失败和士气低落的许多因素之一是，沙皇的贵族军官团倾向于用德语交流（罗曼诺夫家族的另一种宫廷语言是法语），而普通部队，更不用说公民，根本不懂德语。

这指出了共同语言的另一个重要军事优势。它减少了打仗的动力障碍。如果无法理解，宣传是没有用的。在这方面，法国革命者也很好适应了这种可能性。兰金斯认为，他们的 "主导思想 "是 "人民的意愿，因此他们必须通过用自己的特殊语言来表达人民的意愿，来认同自己"。30 在 1789 年之前，"公民 "之间的相互不理解是表达 "人民意志 "的一个缺点，因此也是对国家层面行使权力的制约。在工业化时期，多语言国家和帝国在动员战争方面面临着更多的障碍。

因此，在边缘地区，它们往往被那些更有能力激励其公民作战和调动战争资源的民族国家所取代。民族主义的巩固就是一个例子，例如 18 世纪末法国和法国人的发明。在哈布斯堡帝国之后出现的新民族国家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正如凯恩斯所说，"不完整和不成熟"。然而，他们声称要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至少有 210 个部分是由语言定义的，这说服了伍德罗-威尔逊和其他起草《凡尔赛条约》的盟国领导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欧的分裂说明了语言在国家建设中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当暴力事件不断增加时，共同的语言促进了权力的行使和管辖权的巩固。

然而，当巩固的动机较弱时，少数民族围绕语言争端形成的派别也往往会使多语言国家分裂。十九世纪中期，奥匈帝国各城市的分离主义情绪激增，随之而来的是流行病对讲德语的人口造成的破坏。十九世纪初，布拉格是一个讲德语的城市。与其他城市一样，随着本世纪的展开，它迅速发展，主要是通过移民，因为大量没有土地的捷克语农民从农村被同化。一开始，

新来的人发现有必要学习德语，以便相处，所以他们这样做了。但在本世纪中叶，饥荒和疾病带走了大量讲德语的城市居民，他们被讲捷克语的农民所取代。突然间，讲捷克语的人多了起来，新居民不再需要学习德语了。布拉格成为一个讲捷克语的城市和捷克民族主义的温床。

当代分离主义运动现在经常围绕着多语言国家的语言争端而形成。比利时和加拿大的情况就很明显，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这两个国家很可能是经合组织中第一批在新千年中解体的国家。很少有政府能够超越魁北克省的魁北克党强行实施语言统一的严厉行动。<sup>31</sup> 更令人惊讶的是，语言的不满也在意大利北方分离主义者的早期活动中发挥了作用，意大利也面临着解体。在 1980 年代初，伦巴第联盟（当时的名称）"宣布伦巴第语是一种独立于意大利语的语言"。Billig 评论说："如果联盟的方案在 80 年代初获得成功，如果伦巴第从意大利分离出来，建立自己的国家边界，就可以做出一个预测：伦巴第语会越来越多地被承认为与意大利语不同"。<sup>32</sup> 这不是一个武断的断言。它反映了在类似情况下发生的情况。例如，在挪威于 1905 年独立之后，挪威民族主义者就开始了协调一致的努力，以确定和强调 "挪威语言" 有别于丹麦语和瑞典语的特点。同样，赞成独立的白俄罗斯的活动家将路标改为 "白俄罗斯语"，但显然没有说明白俄罗斯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而不是俄语的方言。

现在，赞成语言统一的军事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超越，我们预计民族语言将逐渐消失，但不是没有斗争。可以预见的是，"战争是国家的健康" 这句演练过的格言将作为一种休养生息的手段受到考验。随着民族国家滑向无足轻重的境地，煽动者和反动派将沿着蹂躏前南斯拉夫和非洲许

多地区（从布隆迪到索马里）的种族和部落战斗的路线，煽动战争和冲突。冲突将被证明是方便的，因为它们为那些试图阻止主权商业化的趋势的人提供了借口。战争将有助于维持更严格的税收制度，并对逃避公民义务和负担的行为施加更严厉的惩罚。战争将有助于巩固民族主义的 "他们和我们 "层面。对于系统性胁迫的支持者来说，商业化的主权，让个人根据价格和质量选择主权服务，似乎与宗教改革期间个人主张否决教皇的判决和选择自己的救赎道路一样，都是一种罪恶。

十五世纪末的新印刷技术和二十世纪末的新信息技术都以一种解放的方式将以前的神秘知识交给个人使用，这一事实强调了这种相似性。印刷机将圣经和其他圣典直接带到个人手中，而这些人以前必须依靠牧师和教会等级制度来解释上帝的话语。新的信息技术使任何有电脑连接的人都能获得有关商业、投资和当前事件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以前只有政府和公司高层的人才能获得。

["印刷和出版业的发展使新的民族意识成为可能，并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  
"33 JACK WEATHERFORD

## 网络空间的摇滚乐

不要搞错了，互联网和万维网的出现对民族主义的破坏力就像火药和印刷术的出现有利于民族主义一样。全球计算机链接不会使拉丁语重新成为通用语言，但它们将帮助商业从地方方言，如魁北克的法语，转移到互联网和万维网的新的全球语言--奥蒂斯-雷丁和蒂娜-特纳教给世界的语言，即摇滚乐的语言，英语。

这些新媒体将通过创造超越地理边界的新亲和力和来削弱民族主义。它们将吸引广泛分散的受众，无论受过教育的人碰巧在哪里找到自己。这些新的非地域性的亲和力将蓬勃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帮助创造一个新的 "爱国主义 "的焦点。或者说，它们将形成新的 "群体"，个人可以在不一定牺牲其经济理性的情况下与之认同。犹太人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表明，从长远来看，在面对敌对的地方条件时，这是有可能的。正如本章开头引用的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f）的评论所表明的那样，认为对自己祖先的土地（*patria*）的忠诚必然意味着对类似于民族国家的机构的忠诚，这是一种历史性的错误想法。

杰弗里-帕克和莱斯利-M-史密斯在《十七世纪的普遍危机》中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表明看似现代早期民族主义的例子，其实更多的是爱国者在捍卫一种更狭隘的爱国主义--通常是为了对抗国家的侵袭。他们写道："所谓对一个民族社区的效忠，往往在检查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国家本身至少有可能是一个家乡或省份，而不是整个国家。"34

正如杰克-韦瑟福德在《野蛮人与文明》一书中清晰地解释的那样，作为第一种大规模生产技术，印刷术的兴起对政治的产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要求人们效忠于更广泛的民族国家。到 1500 年，欧洲有 236 个地方有印刷厂在运作，"它们总共印刷了大约 2000 万本书。"35 古腾堡的第一本印刷品是一本拉丁文版的《圣经》。随后，他又用拉丁文出版了其他流行的中世纪书籍。正如韦瑟福德所解释的那样，印刷术的发展方向打破了早期的期望，即文本的随时可得将使拉丁语甚至希腊语的

使用得到普及。恰恰相反。印刷机没有加强拉丁语的使用，有两个重要原因。首先，印刷术是一种大规模生产技术。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指出的，"如果手稿知识是稀缺的、神秘的传说，那么印刷知识则是靠可复制性和传播来生存的。"<sup>36</sup> 1500 年，很少有欧洲人会使用多种语言。这意味着拉丁文作品的受众并不是大众读者。绝大多数人都是单语者，他们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潜在读者市场。此外，对读者如此，对作家更是如此。出版商需要产品来销售。

由于当代 15 或 16 世纪的作者很少能用拉丁文创作出令人满意的新作品，出版商受市场需要的驱使，用白话出版作品。因此，印刷有助于将欧洲区分为不同的语言子集。这不仅受到了出版新作品的鼓励，这些作品确立了新语言的身份，如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而且还受到了采用特色字体的鼓励，如罗马体、斜体和德国出版业常见的沉重的哥特式字体，直到二十世纪。新的乡土出版，即安德森所说的 "印刷资本主义"，是非常成功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印刷术给异端带来了决定性的推动力，我们期望从互联网上获得对个人的非国家化。特别是，路德成为 "第一个如此出名的畅销书作者。或者换个说法，第一个可以靠自己的名字'卖'出新书的作家。"<sup>37</sup> 令人吃惊的是，路德的作品 "在 1518 年至 1525 年期间占有所有德语书籍销售量的三分之一以上。"<sup>38</sup>

在许多方面，信息时代的新技术将对抗 15 世纪的技术--印刷术在刺激和支持民族国家崛起方面的部分巨大政治影响。万维网创造了一个具有全球语言--英语的商业场所。它最终会被同声传译软件所加强，使几乎每个人都能有效地使用多种语言，并帮助语言和想象力非民族化。正如印刷

技术破坏了对中世纪主导机构--圣母教会的忠诚一样，我们期望信息时代的新通信技术也能破坏保姆式国家的权威。在适当的时候，几乎每个地区都会变得多语言。地方方言的重要性将上升。来自中央的宣传将失去大部分的一致性，因为移民和讲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更有勇气抵制与国家的同化。

## 军事神秘主义

国家远不是客观的社区，就像 "狩猎采集队" 是客观的一样，国家是由一种神秘主义激发出来的，而这种神秘主义是由一种失效的军事需要激发出来的，即通过一种身份感将生活在一个领土内的每个人联系起来，这种身份感可以被认为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正如 Kantorowicz 所指出的，"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刻，抽象的国家或作为公司的国家出现了一个神秘主义的躯体，而为此新的神秘主义躯体而死的价值似乎等同于为上帝事业而死的十字军战士！" 这不是一个巧合。<sup>39</sup> 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神秘的构造。然而，正如 Billig 所指出的，民族主义是 "一种平庸的神秘主义，它是如此平庸，以至于所有的神秘主义似乎早就蒸发了"。它 "将'我们'与祖国--那个特殊的地方联系在一起，它不仅仅是一个地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球物理区域。在这一切中，祖国被认为是家常便饭，毋庸置疑，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值得牺牲。尤其是男人，他们被赋予了特殊的、充满快感的、对牺牲的可能性的提醒"。

民族主义者一有机会就会继续强调国家和家园之间的想象性联系。正如 Billig 所建议的，国家被想象成 "家庭式的空间，在其边界内舒适，安全地抵御危险的外部世

界。而 "我们 "这个在家园中的民族可以很容易地把 "我们自己 "想象成某种家庭。"41

民族主义的陈词滥调，不知疲倦地不断重复，包括许多关于亲属关系和身份的通俗隐喻。他们把国家与个人的 "包容性强 "的意识联系在一起，这是利他主义和牺牲的强大动机。

牺牲性的利他主义确实存在于社会性昆虫、其他非人类动物和人类中，这意味着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不能仅仅定义为个体有机体的愿望和需要。事实上，利他主义的存在，特别是对亲属的利他主义，已经要求对生物学中适者生存的传统概念进行全面的反思。这导致人们越来越相信，自然选择最终并不是在个人身上进行的。

## 民族主义和包容性健身

我们在这本书中主要关注的是改变人类选择的成本和回报的客观 "大政治 "因素。分析的预测能力所依赖的基本前提是，个人将寻求回报，回避成本。这是查尔斯-达尔文所说的 "自然经济 "的一个基本真理。但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理。简单的奖励优化并不能解释生活中的一切。然而，它确实阐明了人类社会性的三种主要形式中的两种，被皮埃尔-范登贝尔赫确定为 "互惠和胁迫"。43 范登贝尔赫所说的 "互惠 "是指 "为了互利而合作。"44 互惠最复杂和影响最深远的例子是市场互动：交易、购买、销售、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胁迫是为了单方面的利益而使用武力，也就是为了特定的内部寄生或掠夺的目的。"45 正如我们在这 214 卷和之前的两本书中所探讨的那样，我们认为胁迫是人类社



会的一个关键因素，比通常所承认的要大。胁迫有助于决定财产的安全性，并限制个人进行互利合作的能力。

强制是所有政治的基础。范登贝格的人类社会性类型学中的第三个要素是 "亲属选择"，即动物与亲属的合作行为。下文将更全面地描述亲属选择，这也是 "自然经济 "的一个重要特征。

正如 Jack Hirshleifer 所写的，"达尔文进化选择理论应用于社会行为问题的复兴，被称为社会生物学"，具有 "明显的经济方面"。而且。纵观整个生命领域，社会生物学正试图找到决定生物体之间多种形式的关联的一般规律。例如，为什么我们有时观察到性和家庭，有时观察到没有家庭的性，有时观察到既没有性也没有家庭？为什么有些动物成群结队，有些则保持独处？在群体中，为什么我们有时观察到等级统治模式，有时则没有？为什么有些物种的生物会划分领地，有些则不会？是什么决定了社会性昆虫的无私，为什么这种模式在自然界如此罕见？我们何时看到资源的和平分配，何时通过暴力手段？这些问题都是以可识别的经济学术语提出和回答的。社会生物学家问的是，观察到的关联模式对显示这些模式的生物体有什么净优势，以及这些模式在社会平衡状态下持续存在的机制是什么。也许正是这种对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之间经济行为连续性的断言（被一个反对者称为 "遗传资本主义"），解释了一些思想家对社会生物学的敌意。.....

我们将社会生物学引入我们对民族主义的分析，因为它提供了对有助于促进系统性胁迫的人性方面的看法。我们同意自然科学家 Cohn Tudge（《历史之前的时间》

一书的作者)的观点,即在我们能够理解当前的世界之前,更不用说获得对未来世界的看法,我们需要理解历史的前言。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时间的大尺度上审视自己。"<sup>47</sup> 塔吉提醒我们,"在我们生活的表面震荡之下,有更深层、更强大的力量在起作用,最终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和我们所有的生物。<sup>48</sup> 我们怀疑,在"这些更深层、更强大的力量"中,有一种受基因影响的动机成分支撑着民族主义。正如 Hirshleifer 所指出的,套用亚当-斯密和 R.H.科斯的话,"人类的欲望最终是由人类的生物本性和地球上的情况所形成的适应性反应。"<sup>49</sup>这一点在大多数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中明显带有生物暗示。即使在美国,一个明显的多民族国家,政府也被人格化为家庭式的"山姆大叔"。

## 生物学遗产

简而言之,人性、物种的起源以及通过自然选择的发展是在理解 215 年人类社会的持续演变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正在考虑人类对信息技术带来的新情况的可能反应。特别是,我们正在关注对网络经济的出现及其许多后果的反应,包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明显的经济不平等的出现。至少一些预期反应的关键在于我们的遗传基因。

当一个新的物种形成时,它并没有丢弃它在以前的形式中携带的所有 DNA,而是增加了它。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的全部差异包含在每个物种中不到 2% 的 DNA 中;略高于 98% 的 DNA 是两者共有的,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非常原始的早期生物,远远低于历史发展链。

## 遗传惯性

人类文化也同样包含了一些普遍的元素，其中一些确实是从前人类祖先那里继承的。我们如何寻找食物，如何交配，如何组建家庭，如何与陌生群体联系，如何保护自己，都是本能和文化的复杂混合物，有着非常原始的根源。它们也都能够进行现代的适应性调整，例如那些在现代时期成为民族国家特征的调整。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思考文化，我们将看到它们与遗传发展是平行的。三个最大的区别是：文化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信息链传播的，而不是通过代际之间的基因链；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智能行动来改变；它们随着成本和回报的普遍环境而改变，这比基因的变化要快得多。在身体上，我们与三万年前的祖先非常相似；在文化上，我们已经离他们相当远了。

## 进化模型

关于物种进化的方式，有两种生物学模式。科学的正统观念是新达尔文主义。随机的遗传变化产生不同的物理形式。这些形式中的大多数对生存没有好处，例如白化黑鸟，它们倾向于消亡。其中一小部分对生存有帮助，并在物种中传播。这一理论仍有许多困难，科学家们可能会在下个世纪解决这些问题，但随机性和有利的适应性的生存是目前科学的正统观念，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另一个选择是 20 世纪初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理论的一些变体，他认为自然界有一些非随机的创造性目的，是一种寻求解决方案的智能力量。这一概念在大卫-雷泽和斯蒂芬-杰-古尔德等当代权威人士的工作中得到了呼应，他们强调遗传变异不是简单的随机性，而是显示

出明确的倾向性。50 这不是严格的圣经意义上的创造论，但它避免了正统达尔文主义的许多问题。

"社会生物学的伟大理论贡献是将健身的概念扩展到'包容性健身'的概念。事实上，动物可以通过自己的繁殖直接复制其基因，或通过与之共享特定比例基因的亲属的繁殖间接复制。因此，可以预期动物会有合作行为，从而在它们有遗传关系的情况下提高彼此的健身能力。这就是亲属选择的含义。简而言之，动物是裙带关系的，也就是说，它们喜欢亲属而不是非亲属，喜欢近亲而不是远亲。这可能像人类一样有意识地发生，或者更常见的是无意识地发生。"5 PIERRE VAN DEN BERGHE

## 受遗传影响的动机因素

1963 年，汉密尔顿 (W D. Hamilton) 在《利他行为的进化》中提出了 "包容的适应性" 这一概念，从而加强了对人类行为的生物学观点。汉密尔顿认识到，虽然人类从根本上说是以自我为导向的行为，但他们也偶尔会采取利他主义或自我牺牲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对个人的生活没有明显的好处。汉密尔顿试图调和这些明显的矛盾，认为基本的最大化单位不是个体有机体，而是基因。任何物种中的个体都会寻求最大化，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个人福祉，而是汉密尔顿所称的 "包容性健身"。他认为，"包容性健康" 不仅包括达尔文意义上的个人生存，还包括分享相同基因的近亲的繁殖和生存。52 汉密尔顿的 "包容性健康" 理论有助于阐明人类社会的许多其他奇怪的特征，包括民族国家的政治方面。

利他主义。误称或化石式的亲属选择？

范登贝格认为："那么，利他主义主要是针对亲属，特别是近亲，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名称。它代表了最终的遗传自私性。它不过是包容性健身最大化的盲目表达"。然而，这并不是说没有汉密尔顿和范登贝格提到的密切的遗传关系就不存在利他主义。人类通过有性繁殖而不是无性克隆的事实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几乎保证了"包容性健身最大化"的倾向会刺激大量的"利他主义"反弹，使"自私基因"以外的等位基因受益。首先，总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些采取帮助行动的人可能会错误地认为他们在帮助近亲。为后代采取牺牲行动的父亲事实上可能不是祖先，而只是认为自己是祖先。

反弹，使"自私基因"以外的等位基因受益。首先，总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些采取帮助行动的人可能在错误地假设他们在帮助近亲的情况下这样做。为后代采取牺牲行动的父亲事实上可能不是祖先，而只是认为自己是\*。这不仅仅是肥皂剧的主题，它说明了一个原始的难题：如果每个表面上的父亲表现得好像他真的是父亲，即使有可能他不是，也可能有利于"自私基因"的生存。

然而，正如 Hirshleifer 所指出的，许多"利他主义"的悖论都是语义上的混淆，它们经常混淆或误导人们，使他们忽略了"帮助"可以传达生存优势的竞争背景："如果利他主义的战略选择在与非利他主义的竞争中是可行的，利他主义必须比非利他主义对自我生存的贡献更大，因此它不可能真的是利他主义。如果我们放弃"利他主义"这一术语，转而询问，就可以避免所有这些糊涂事。可以被称为帮助的完

全客观的现象的决定因素是什么？"54 这个问题在 "亲属帮助 "的情况下也许最有意思。汉密尔顿对包容性健身的基本表述涉及一种生物成本效益分析，在这种分析中，一个个体或 "控制帮助行为的基因 "对自身的一个相同拷贝的生存的重视程度与自身的生存相同。

因此，进行帮助的意愿，更不用说牺牲了，随着另一个人拥有相同基因的机会而变化。"具体来说，亲属帮助的基因指示一个人（其他条件相同），如果他能因此拯救两个兄弟姐妹、四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八个表兄弟姐妹等，他就会献出自己的生命。"55 \*同样的逻辑当然也适用于为那些他认为是他的兄弟姐妹但不是他的兄弟姐妹的儿子或女儿作出牺牲。

## 包容性健身的概率问题

虽然这种生物学原理似乎很清楚，但经过仔细研究，它掩盖了一些困难。例如，一个人的兄弟姐妹或子女可能有 50% 的概率共享一个相同的基因，但从严格的逻辑来看，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基因在他们身上实际表达。每个人的每个基因都携带两套，一套来自父亲，一套来自母亲。但是，这当然意味着，父母个体携带的基因中只有一半必然存在于后代中。此外，生殖过程中总是存在突变的风险，尽管这不太可能，但却降低了遗传成本效益分析的确定性。因此，如果 "基因作为优化者 "的隐喻被认真对待，那么不是祖先的父亲的情况只是一个更广泛问题的最明显的例子。如果确实是通过为近亲牺牲来优化 "自私基因 "的生存，那么任何导致另一个等位基因替代 "自私基因 "的相同拷贝的可能性都可以被认为是大自然母亲对自己玩的那些复杂的把戏之一。

## 不确定的后果

因此，针对亲属的利他主义涉及问题。对于 "自私的基因 "来说，不仅有一个概率问题，即其宿主的明显亲属事实上可能不会分享其相同的副本。还有一个困难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确定任何特定的牺牲姿态事实上是否主要有利于亲属而不是其他人。(主要有利于他人的牺牲实际上可能会损害自私基因的包容性，因为它减少了在后续种群中出现的可能性)。)考虑一个可怕的例子，这个例子是在我们写作时受到新闻的启发。假设苏格兰邓布兰的一位家长在短时间内得知一个武装的疯子正在进入当地的学校，显然是要进行伤害。通过即时行动，他或她可以采取英勇但可能注定失败的姿态，与疯子对峙，从而可能拯救他或她在学校的孩子。

也可能不是。

即使是一个打算杀死地球上所有儿童的冷酷无情的疯子，在弹药不足或被他人制服之前，他所能造成的伤害也是有限的。

如果牺牲的父母决定不干预，那么他的孩子很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活下来，就像学校的大多数孩子一样。一个英勇的牺牲行为所能避免的所有伤害可能会落在其他人的孩子身上。因此，通过冒着生命危险，主要是为了其他人的孩子，有关的父亲或母亲实际上可能已经降低了他的 "包容性健康"。通过剥夺他的所有孩子的父母之一，他可能会让这些孩子在达尔文的斗争中处于更糟糕的地位。

虽然这确实是一个紧张的例子，但它也是现实的。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生活中存在着无数的情况，大大小小的帮助行为会产生有益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行为的直接受益者不容易被隔离为密切相关的亲属。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所考虑的那样，这可能是使那些具有较少歧视性的帮助基因的人能够忍受所有千年的不愉快的部分生存利益。

## 利他主义和遗传惯性

如果像我们认为的那样，"自私的基因"论是对人类行动动机的准确近似，那么假设它所产生的帮助或牺牲行为可以狭义地运作，并且只为实际的亲属谋福利，那就太简单了。

不完全的知识使区分亲属在某些情况下成为一种不确定的艺术。

即使假设亲属关系是已知的，任何特定的"自私基因"在亲属群体中的实际代表性也不能确定，而只是一个概率问题。直到最近，还不可能在个体之间区分出实际的遗传标记。而且我们离能够实际区分哪些近亲实际表达了什么"自私基因"以优化其生存仍有一定距离。除此之外，将利益限制在亲属而不是其他人身上的难度更大。

此外，根据经验，如果没有合适的亲属，人类有时会为了非亲属的利益而转移他们的"养育本能"，这也是很明显的。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父母对被收养孩子的行为，甚至是某些人（通常没有孩子）对其家庭宠物的行为。这些人为了营救被



困在树上的猫，不惜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死亡，这并非闻所未闻的事情。当然，在任何一年里，都有数量不小的人在家庭事故中丧生，而这些事故是由发现自己处于危险中的宠物以某种方式促成的。对宠物如此，对收养的孩子更是如此。如果说被收养儿童的父母经常 "像 "对待亲属一样对待他们，从而使 "亲属选择 "的概念具有另一种含义，这当然不是夸张。

这些案例并不像一些批评者所希望的那样否定 "自私基因 "理论。恰恰相反。我们看到人们的行为 "就像 "为近亲牺牲以促进自己的包容性健身的例子，是 "遗传惯性 "的实例。换句话说，它们反映了霍华德-马戈利斯在《自私、利他主义和理性》中指出的事实，即 "人类社会的变化速度 "比人类的基因构成快。因此，人们继续 "基本上像生活在一个小型狩猎-采集群体中一样 "行事。<sup>56</sup> 正如 Van Den Berghe 所说，这种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们是由几百个人组成的小型近亲繁殖群体。

部落成员虽然被细分为较小的亲属群体，但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与外界隔绝，并通过亲属关系和婚姻网相互联系，使部落实际上成为一个超级家庭。较高的近亲繁殖率保证了大多数配偶也是亲属”。<sup>57</sup>

简而言之，在农业出现之前的所有人类生存中，种族群体都是 "近亲繁殖的超级家庭"。鉴于过去家庭和群体之间的这种认同，很可能存在一种受基因影响的倾向，即把群体内的人当作亲属。很容易想象，当 "近亲繁殖超级家庭 "的每个成员都是亲属时，这种行为在过去可能具有生存价值。正如马戈利斯所建议的，很容易想象，对于 "这种小规模狩猎采集者，关系密

切，包容性的自私（除了任何互惠或复仇的前景）将单独支持对群体利益的承诺的措施。于是，人们可以争辩说，某种对群体利益的动机倾向作为一种化石般的亲属利他主义而存在。" 58

换句话说，由于我们保留了狩猎-采集者的基因构成，我们对群体内的行为反映了那种 "利他主义"，预计这种行为会优化由 "近亲繁殖超级家族 "组成的群体内的生存成功。

据推测，正如马戈利斯推测的那样，这种由 "化石亲属利他主义 "或遗传惯性产生的群体利益行为倾向，有助于智人的生存，"而其他类人物种则灭绝了"。

## 表观遗传学

我们把这种 "仿佛 "行为看作是 "表观遗传 "的一个主要例子，或者说，受遗传影响的动机因素使人类天生偏向于某些选择而不是其他选择。换句话说，人类的头脑不是一块白板，而是一个带有预设电路的硬盘，使某些反应比其他反应更容易学习和吸引人。因此，有一种说法是，人的思维倾向于以引起敌意或敌视的外群体和通常为亲属保留的感到非常友好或忠诚的内群体来思考。

这种对内群体的行为就像由近亲组成的表观倾向造成了一种易受操纵的特点，民族主义者通常利用这种特点来为国家提供牺牲性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的宣传到处都用亲属关系的词汇来装扮，这并不是一个 220 的巧合。

"通过她的大炮的声音报警，美丽的法国要求她的孩子起床。我们周围的士兵正在武装起来。呐喊吧，呐喊吧，是我们的母亲在呐喊。法国士兵的颂歌

## 虚假的亲属关系

考虑到各地的政治家都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用借用亲属关系的术语来描述国家。国家是 "我们的祖国 "或 "我们的祖国"。它的公民是 "我们"，"家庭的成员"，我们的 "兄弟姐妹"。62 像法国、中国和埃及这样文化上不同的国家采用这样的比喻，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修辞上的巧合，而是 "表观遗传 "或受基因影响的动机因素先天偏向于人类的某些选择的倾向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种外生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为利用对民族国家的情感忠诚而采用的认同机制，利用了各种在原始时代作为亲属关系标志的装置，"将个人的包容性健身关切 "与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63 例如，肖和黄集中讨论了现代民族国家用来动员其人民反对外族的五种认同装置。这些装置是：  
1:1.共同的语言 2.共同的祖国 3.相似的表型特征 4.共同的文化背景。

当然，这样的特征在原始时代就能区分出核心的民族群体。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这些识别手段被采用的方式，并以亲属关系的语言加以装扮，正如上面引用的法国士兵的颂歌所说明的。这种将国家称为 "祖国 "或 "祖国 "的动员手段在全世界都很常见，因为它们很有效。  
民族主义、反动和新鲁德派 271

## 遗传会计

就国家而言，这些亲属关系的想象性特征表现在，它们不具备实际亲属关系所具有的可变性程度。即使在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大家庭中，也不是每个人的关系程度都相同。父母和兄弟姐妹是最亲近的关系，祖父母和堂兄弟姐妹则不那么亲近，遥远的、亲近的堂兄弟姐妹如此遥远，以至于他们几乎不可能比完全陌生的人分享任何特定的共同基因。丈夫和 221 个妻子一般不再像石器时代那样有密切关系。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实际的亲属关系都可以用数学术语定义为 "亲缘关系系数"，汉密尔顿将其计算为基因重叠的措施。

相比之下，民族 "家庭 "被想象成与国家的领土范围完全吻合，而且很有弹性。国籍像液体一样均匀地延伸到严格定义的边界内的每个缝隙。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写道："在现代概念中，国家主权在法律划定的领土的每一平方厘米上都是完全的、平坦的、均匀的运作。"<sup>66</sup> 当然，当涉及到为国家做出牺牲时，想象中的相关系数永远是 1。

这种将包容性健身与民族国家相提并论的做法很有意思，因为它有助于了解人类欢迎或抵制新千年变化的取向。正如我们前面所探讨的，在信息时代之前，所有类型的社会都是以领土为基础的。它们要么围绕核心族群的家乡领土形成，要么像民族国家一样，利用群体团结的相同动机，动员力量保卫当地领土，抵御外来者。在每一种情况下，一个人的直接领地之外的陌生人都被视为敌人而感到恐惧。鉴于原始时代的亲属选择假设，这是有道理的。

当人类以其目前的遗传形式出现时，部落的成员是近亲。

他们是一个核心种族群体的成员，"近亲繁殖的超级家族"。

此外，考虑到亲属选择的必要性，个人将直系亲属的繁荣和生存与他的部落或超级家庭的繁荣和生存联系起来，确实有一个实际的经济理由。狩猎-采集部落的一个成员的繁荣确实取决于整个部落的成功。没有独立的财产，也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让个人或家庭在脱离部落的情况下有希望生存和繁荣。这使个人的自我利益与群体的利益紧密相连。用 Hirshleifer 的话说，"如果一个群体的成员有共同的命运或结果，互相帮助就成了自助"。67

"显然，原始人--洛夫图人可以被视为数百个类似民族的代表--认为一个社会的标准是，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每个人的情况都是完全平等的。"赫梅特-肖克

新环境，旧基因

现在，微观技术正在促进创造非常不同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是我们石器时代的条件下从遗传学角度所决定的。

信息技术正在创造经济不平等，其程度超出了我们的祖先在原始的平等主义石器时代所经历的任何范围。

信息技术也在创造超域资产，这将有助于颠覆内部团体的体现，即民族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新的网络资产可能会

有更高的价值，正是因为它们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建立的。如果出现我们所期待的那种对富裕工业国家信息技术日益渗透所产生的经济不平等的反感，情况就更糟糕了。这一事实将使远距离持有的资产更具价值。它们不仅不会受到嫉妒的影响，而且更有可能被置于个人必须应对的最具掠夺性的群体--他自己的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外。

## 自然界的非经济性和民族主义

人们很少注意到与现代民族国家有关的内群体认同的讽刺性，这也许是外源性在告知态度方面的重要性。现代时期的暴力逻辑倾向于混淆这种冲动，这种冲动首先引起了对内群体认同的倾向。为什么？因为在一个敌对的世界里，对个人的 "包容性健身" 与民族内群体的认同，非但没有促进近亲的生存和繁荣，反而将个人可能做出的任何牺牲的价值稀释到对其亲属无足轻重的程度。典型的现代民族国家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在个人和对他提出要求的国家的其他公民之间存在着统计意义上的 "关系系数"。不仅近亲在群体中的比例从石器时代的几乎统一急剧减少到 20 世纪几乎没有化学痕迹；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个人和国家其他成员之间的 "关系系数" 不会比整个人类高得多。一个拥有数千万甚至数亿（或者在中国人的情况下，超过十亿）成员的群体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将任何牺牲或利益传达的包容性健身效果稀释到海洋中的一个唾液规模。因此，在严格的逻辑中，现代民族主义者，与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不同，不能合理地期望任何牺牲或帮助他的 "同族" 的姿态，以有意义的方式提高他的家庭的生存前景。

尽管国家经济成为现代衡量福祉的基本核算单位，但有才华的个人的成功，以及他的亲属的成功，最大的障碍是以国家的名义强加的负担，即内群体本身的负担。

68

民族国家的逻辑表明，公民身份的最终代价是牺牲和死亡。正如简-贝特克-埃尔斯坦所观察到的，民族国家向公民灌输的是牺牲而不是侵略。"年轻人上战场与其说是为了杀戮，不如说是为了死亡，为了整个政治体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特殊的身体"。<sup>69</sup> 对于纳税人来说，牺牲的冲动也同样活跃。纳税，就像携带武器一样，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人们放弃金钱来获得一些具有同等或更大价值的产品或服务。这一点在普通的讲话中得到了承认。人们谈论 "税收负担"，就像他们不谈论购买营养品的 "食品负担"，或购买汽车的 "汽车负担"，或旅行的 "度假负担" 一样，正是因为商业购买通常是公平的交换。否则，购买者就不会这样做。

在这方面，民族主义显示了外源性如何扭转达尔文 "自然经济" 的逻辑。民族国家促进了系统的、基于领土的掠夺。与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所面临的情况不同，在 20 世纪末，个人的主要寄生虫和捕食者不可能是 "外来者"，即外国敌人，而是假定的 "内群体" 的化身，即当地民族国家本身。因此，在信息时代，超越领土的资产的出现所提供的主要优势，正是这种资产可以被置于当地民族国家所动员的系统性胁迫的范围之外，而未来的主权个人则居住在其领土上。

如果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微观技术将使个人在技术上可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

脱从属公民身份的负担。在新的 "虚拟城市 "中，他们将成为自己的外在主权者，而不是臣民，通过合同或私人条约来效忠，这种方式更让人想起前现代的欧洲，商人们通过商业条约和宪章来保护自己 "免受财产的任意扣押"，并获得 "豁免于领地法"。在网络文化中，成功人士将获得豁免因出生意外而产生的公民义务。他们将不再倾向于把自己主要看作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他们将是整个世界的内在居民，只是碰巧居住在一个或多个地方。

## 网络经济和我们的遗传基因

然而，问题在于，这个技术奇迹和它所暗示的经济奇迹--摆脱地方的暴政--取决于个人是否愿意将他们的大部分财富和未来委托给陌生人。当然，在严格的遗传核算中，这些陌生人在遗传上并不一定比我们的大多数 "同胞 "更亲近，在最近几个世纪里，我们必须依赖他们。

问题是，在民族国家的情况下，群体内友好的反常结果对网络经济来说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指标。那些将失去强制再分配利益的 "左撇子 "会不会把民族国家的死亡当作对亲属的攻击？新千年的前四分之一世纪将会告诉我们。情绪反应可能是复杂的。在 20 世纪，有 1.15 亿人在为民族国家而战的过程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一事实鲜明地证明了民族的力量。<sup>71</sup> 它表明，许多人确实认为民族的生存是生死攸关的大事。问题是，这种态度是否会延续到一个有着不同的大政治需求的新时代。

受基因影响的代表民族国家的牺牲往往不利于亲属选择的进化目的，这一事实也告诉你，人类有足够的适应性，可以适应许



多我们在石器时代的条件下没有被基因编程的环境。正如塔吉在描述人类的 "极端普遍性" 时所阐述的那样。"我们是相当于图灵机的动物：可以转用于任何任务的通用设备"。72 在即将到来的转型危机中，哪种倾向会浮出水面？可能两者都有。

主权的商业化本身取决于数十万主权个人和数百万其他人的意愿，将他们的资产部署在 "无名第一银行"，以确保免于直接强制。这种类型的信任在过去的原始时代没有明显的类似物。石器时代的资产很少。那些确实存在的资产被囤积在一个部落的控制之下，一个对外来者充满疑虑的 "近亲繁殖的超级家庭"。然而，尽管网络经济在进化上是新颖的，但它给了人类机会来表达我们最新颖的遗传基因--伴随着我们巨大的大脑而来的智慧。那些信息精英们肯定会足够聪明，当他们看到一个好东西时就会识别出来。

此外，创造对掠夺基本免疫的资产，实际上应该以一种实际的方式反弹，以增加主权个体的 "包容性健康"。

虽然参与网络经济的经济逻辑颠覆了民族国家的理由，但它是令人信服的，特别是对高技能的人来说。

为了优化他们在司法管辖区之间的购物优势，个人必须愿意退出民族国家，将他们的个人保护委托给主要受市场激励的安全人员，而这些地区可能与他们出生和长大的地方相距遥远。这意味着多语言和世界性的文化，而不是金戈铁马，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它还意味着，任何认真实现网络经济对自己和家人的解放潜力的人，都应该开始在他主要商业生涯中居住地以外的

几个司法管辖区为自己谋求出路。欲了解更多细节，请参阅我们在附录中对实现独立战略的讨论。

## 真正的亲缘关系

对世界的新的外在理解和确定自己在其中的位置的新方法可以改变人类文化的习惯，如果不是我们近亲繁殖的倾向的话。

我们期望在新千年看到的新的身份的外在等式，可能比看起来更容易采用新的世界。与国籍不同，新的身份将不是系统性强制的产物，这种强制使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在 20 世纪得到普及。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社区和效忠将不以领土为界限。

身份识别将更精确地针对真正的亲缘关系、共同利益或实际的亲属关系，而不是传统政治中孜孜不倦地宣传的虚假的公民身份亲缘关系。保护将以新的方式组织起来，这在划定领土边界的勘测工具中是无法比拟的。资产将越来越多地存放在网络空间，而不是在任何特定的地方，这一事实将促进新的竞争，以减少 "保护成本 "或大多数领土管辖范围内的税收。

"那么，雄心勃勃的人明白，迁移的生活方式是出人头地的代价。"73 --克里斯托弗-拉什 225

## 逃离民族国家

尽管民族国家作为 "内部群体 "对现代人的想象力有着牢固的控制，但那些还没有对隶属于一个极其昂贵的 "想象中的社区

"的效用产生怀疑的能人很快就会怀疑。事实上，民族国家的拥护者们已经开始抱怨认知精英们的日益疏离。

已故的克里斯托弗-拉施在他的《精英的反叛与民主的背叛》一文中，抨击那些 "其生计与其说是依靠财产所有权，不如说是依靠对信息的操纵"。74 拉斯奇对新兴信息经济的外在特征表示遗憾。他写道：新的精英们所经营的市场现在是国际范围的。他们的财富与跨越国界的企业紧密相连。他们更关心的是整个系统的顺利运作，而不是其中的任何部分。他们的忠诚度--如果这个词在此背景下本身没有过时的话--是国际的，而不是区域的、国家的或地方的。他们与布鲁塞尔或香港的同行有更多的共同点，而不是与尚未接入全球通信网络的广大美国人。75

尽管拉施远不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而且他显然是想让他对信息精英的描述变得不光彩，但他对那些从地方暴政中解放出来的人的蔑视是建立在对一些相同发展的看法上的，而这些发展正是本书的重点。当我们阅读 Lasch 的批评或 Mickey Kaus（《平等的终结》）、Michael Walzer（《正义的领域》）或 Robert Reich（《国家的工作》）的批评时，我们看到我们分析的一部分得到了证实，往往是不愉快的，这些作者对市场深化的许多后果极不同情，更不用说主权个体的非国家化。拉斯奇指责那些有跨国野心的人 "觊觎新的头脑贵族的成员资格"，因为他们 "在快速流动的金钱、魅力、时尚和流行文化中培养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他继续说道。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这是一个问题。当然，爱国主义在他们的美德体系中排名并不高。另一方面，"多元文化"非常适合他们，使他们联想到一个令人愉快的全球集市的形象，在这个集市上，异国

美食、异国服装风格、异国音乐、异国部落习俗都可以不加选择地品尝，不需要问问题，不需要承诺。新的精英们只是在旅途中才在家，在前往一个高级会议、一个新的特许经营权的盛大开幕、一个国际电影节或一个未被发现的度假村的途中。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基本上是游客式的，而不是一种可能鼓励对民主的热情奉献的观点。

## 经济民族主义

潜伏在对构成信息时代虚拟社区的 "暂居者 "的批评背后的是这样一种认识：对许多精英阶层来说，暂居的好处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成本。像 Lasch 和 Walzer 这样的批评家并没有争论，清醒的成本效益分析使得公民身份对于高技能的人来说已经过时了。他们并没有提出，那些他们所鄙视的态度为 226 的信息精英们，对他们的最佳利益所在进行了误判。他们也不假装复利表真的表明，继续把钱注入国家社会保障计划，更不用说所得税，会产生比私人投资更好的回报。恰恰相反，他们懂得算术。他们已经看到了其明显的结论的总和。但他们不承认经济理性的颠覆性逻辑，而是退避三舍，认为信息精英们超越地方的暴政，抛弃 "未开化的人 "是 "背叛 "77。

像帕特-布坎南一样，社会民主党人是经济民族主义者，他们憎恨市场对政治的胜利。他们谴责 "新的脑力贵族 "脱离地方，不热衷于他们对大众的最佳利益所在的想法。虽然他们没有明确承认个人的非国家化，但他们抨击其早期的暗示和表现，即沃尔泽所说的 "市场的帝国主义"，或金钱 "跨越边界渗入 "的趋势，以购买拉什所阐述的 "不应出售 "的东西，如免于服兵役。78 请注意，反动派把民族国家的

军事要求作为货币和市场不应侵犯的圣地来叫嚣。

这些对信息精英的批评，预示着在下一个千年里，民众对主权个人的崛起的反应条件。随着新的、更加市场化的保护形式的出现，对于大量有能力的人来说，国籍的大部分所谓好处都是想象出来的，这将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不仅会导致对公民身份的机会成本进行更好的核算，也会为所谓的 "政治 "甚至是 "经济 "问题创造新的框架方式。引用弗雷德里克-C-莱恩

（Frederic C. Lane）对一个古老难题的表述，"一个为自己行事的企业家 "将首次能够通过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之间移动来改变自己的保护成本，而不必等待它们通过 "团体决定和团体行动 "来实现。<sup>79</sup>

随着为保护所付出的代价变得 "受制于替代原则"，这将暴露出强迫的算术，加剧了信息时代新的世界性精英和 "信息穷人 "之间的冲突，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单一的，不擅长解决问题或拥有一些全球市场的技能。这些 "失败者 "或 "左撇子"，正如托马斯·

弗里德曼对他们的描述，无疑将继续把他们的福祉与现有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sup>80</sup>

大多数政治议程将是反动的

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那些怀有热切政治目的的人，无论是民族主义者、环境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会团结起来捍卫摇摆不定的民族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情感的生存将变得越来

越明显，这是维护政治强制力领域的前提条件。正如 Billig 所指出的，民族主义 "是常规（政治）策略的条件，不管是什么特定的政治"。81 因此，所有政治方案中的民族主义 227 内容在未来几年会像饕餮盛宴一样膨胀起来。

例如，环保主义者将较少关注保护 "地球母亲"，而更关注保护 "祖国"。由于我们稍后探讨的原因，国家和公民身份对那些高度重视平等的人来说将特别神圣。比起他们现在可能理解的，他们会同意克里斯托弗-拉施的观点，他跟随汉娜-阿伦特宣称："是公民权赋予了平等，而不是平等创造了公民权。"82

主权的私有化将通过切断财富创造者与国家和地方的联系，使工业时代对平等的重视程度下降。公民权将不再作为一种机制，在一个有限的领土内根据投票的平等性强制进行收入再分配。其后果将包括对进步的历史观的又一次挫伤。与二十世纪开启时那些所谓有远见的人的期望相反，自由市场并没有被几十年的时间摧毁，而是胜利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者预计，资本主义的消亡从未发生，它将导致民族国家的超越和工人中普遍的阶级意识的出现。事实上，国家将被黯然失色，但方式非常不同。与他们的期望几乎相反的事情正在发生。资本主义的胜利将导致在资本家中出现一种新的全球意识，或者说外在意识，其中许多人将成为主权个人。

最有能力、最富有的人远远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想象的那样依靠国家来约束工人，他们是民族国家行动的净失败者。显然，在市场战胜强制力的过程中，他们通过超越民族主义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也许不是立即，但很快，肯定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信息精英中的几乎每个人都会选择在低税率或无税率的司法管辖区进行赚取收入的活动。随着信息时代对全球的改变，它将给人们留下一个明确的复利的实物课程。在几年内，更不用说几十年了，人们将普遍理解，几乎所有有才能的人都可以通过放弃高税率的国家积累更多的净资产，享受更好的生活。我们已经暗示了主要民族国家所带来的惊人的成本，但由于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问题的关键，值得再次强调国籍的机会成本。

## 机会成本

目前由高额税收资助的政府服务非但没有遭受损失或缩减，信息精英们还会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方式蓬勃发展。

仅仅通过摆脱他们现在支付的超额税收负担，他们将获得改善家庭物质生活的巨大空间。如前所述，如果你能从你的投资中每年获得 10% 的收益，每年支付的每 5,000 美元的税款会使你一生的净资产减少 240 万美元。但是，如果你能赚到 20%，每年支付的每 5,000 美元的税款将使你在 40 年内减少 4400 万美元。因此，累积起来，每年支付 5000 美元将使你每年损失超过 2.28 亿美元。按照这个比例，每年 25 万美元的税款很快就会转化为每年超过 5000 万美元的损失，或者一生中的 22 亿美元。当然，零星的高收入，哪怕是几年，特别是在生命的早期，也意味着掠夺性税收带来的更惊人的财富损失。

你们的作者已经看到了我们自己的满意，高于 20% 的回报是可能的。我们在百慕大 Lines 海外管理公司的同事在我们写这

本书的那几年里，获得了三位数的回报，平均每年 226%。他们的经验强调了电子表格所显示的，对许多高收入者和资本所有者来说，掠夺性税收带来的终身成本相当于一大笔财富。

一个具有高收入能力的人按香港税率纳税，最终可能比具有相同税前业绩的人按北美或欧洲税率纳税多出一千倍的财富。让你的资本反复受到高税收管辖区的侵袭，就像在比赛中，你每走一步就会有人向你开枪。如果你能在有适当保护的情况下参加同样的比赛，并且不受到伤害地奔跑，你显然会跑得更远、更快。

未来的 "主权个人 "将利用 "短暂 "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克里斯托弗-拉施和其他信息精英的批评者感到不满，他们将选择最有利可图的司法管辖区作为住所。虽然这与民族主义的逻辑相悖，但它符合一个令人信服的经济逻辑。A 10

他们会选择最有利可图的司法管辖区作为自己的住所，这让克里斯托弗-拉什和其他信息精英的批评者很不爽。虽然这与民族主义的逻辑相悖，但它符合一个令人信服的经济逻辑。10%，更不用说 10 倍的底线差异，往往会促使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技术，以及他们的居住地。西方文明的历史是一个不安分的变化记录，在蜿蜒的大政治条件的刺激下，人们和繁荣一再迁移到新的机会区域。底线收益的千倍之差将与有史以来使理性人行动起来的最有力的刺激措施相匹配。或者换一种说法，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被托马斯-弗里德曼称为 "失败者和被抛弃者 "的人，如果有机会的话，会很乐意为了 5000 万美元离开任何民族国家，更不用说民族国家从最高 1%的纳



税人那里征收的更大成本。因此，选择司法管辖区的主权个人的崛起是人们可以做出的最可靠的预测之一。

## 主权的商业化

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公民身份已经是一个可怕的交易了。澳大利亚议会研究服务部的伊恩-爱尔兰 ( Ian Ireland ) 在 1995 年 8 月编写的题为 "女王是澳大利亚公民吗？" 的议会研究报告强调了这一点。<sup>83</sup> 爱尔兰对 1948 年的《澳大利亚公民法》进行了研究，回顾了人们获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的四种途径。这些方法与其他主要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选择相似，即：出生公民身份 229 通过收养获得公民身份 通过血统获得公民身份 通过授予获得公民身份

除了将注意力集中在主权和公民权之间的区别上，这一切都不值得一提。正如爱尔兰所说，"根据传统的法律和政治概念，君主是主权者，人民是他/她的臣民。臣民通过效忠和服从对君主进行约束"。注意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主权者这一明显的事实，他的结论是："有一种说法是女王不是澳大利亚公民"。<sup>84</sup>

的确，她不是。女王，愿她长命百岁，幸运的是，她已经不再关心作为一个公民的问题。她是君主，是她的臣民的君主。像世界上其他少数几个君主一样，女王是天生的君主，她的地位是在现代之前的习俗中继承下来的。君主制的概念是古老的，可以追溯到人类生活的最早历史记录。那些保留了君主制的国家将其宪法归功于其古老的历史，但它仍然有助于决定其社会

的形态，即使不是政治权力，也是阶级威望方面的。

后现代的个人，如果没有女王的领先优势，将不得不发明新的法律理由，以作为信息技术将赋予他们的事实上的主权的基础。

主权个体也将不得不应对嫉妒的腐蚀性后果--这种困难有时会让君主们感到拘谨，但那些不受传统崇敬但却发明了自己的主权的人将会更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嫉妒。正如 Helmut Schoeck 在他的综合调查报告《嫉妒》中写道："在只有一个国王、一个美国总统的地方--换句话说，只有一个特定地位的成员，他可以相对不受惩罚地过着那种即使在小得多的范围内，如果被更大的职业或社会团体的成功成员采用，也会在同一个社会中引起愤慨的生活"。85 君主，作为国家的化身，享有某种豁免权，不受嫉妒的影响，而这种豁免权不会延续到主权个人。

信息社会中的 "失败者和留守者 "肯定会羡慕和怨恨成功者，特别是由于市场的深化意味着这将是一个越来越 "赢家通吃 "的世界。越来越多的奖励已经开始基于相对表现，而不是像工业生产中的绝对表现。工厂工人的工资要么是根据考勤表衡量的出勤时间，要么是根据一些产出标准，如制造的工件、组装的单位或一些类似的衡量标准。由于使用相同工具的每个人的产出都是相似的，标准化的工资才成为可能。但是，概念财富的创造，就像艺术表现一样，在使用相同工具的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方面，整个经济正变得越来越像歌剧，最高的报酬给了那些拥有最好嗓音的人，而那些唱得走调的人，无论多么认真，通常都不会吸引大量的报酬。随着许多领域向真正的全球竞争开放，普通

业绩的回报必然会下降。中等人才将大量涌现，有些人可以以领先的工业国家普遍存在的价格租用他们的时间，而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输家将是那些拥有 "滑球速度棒 "的小联盟外野手，他们的 230 次反射距离击出大联盟快球还差半秒。他们不是靠打出全垒打年薪百万美元，而是 25,000 美元，没有来自名人代言的补充收入。其他人将完全被淘汰。

"一旦一个国家向全球市场开放，那些有能力利用它的公民就会成为赢家，而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就会成为失败者或留守者。通常有一方....声称能够抵制全球化或减轻其痛苦。这就是美国的帕特-布坎南、俄罗斯的共产党和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兰福利党。因此，在土耳其发生的事情比原教旨主义者的接管要复杂得多。这就是当不断扩大的全球化使越来越多的失败者脱颖而出，当不断扩大的民主化使他们都有投票权，而宗教党派却有效地利用这种巧合来夺取政权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87  
THOMAS L. FRIEDMAN

在信息时代，谁会是输家？一般说来，税收消费者将是输家。通常是他们无法通过转移到另一个管辖区来增加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存放在一个国家政治管辖区的规则中，而不是由市场估值来传达。因此，取消或大幅减少对他们的净资产产生不利影响的税收，可能不会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降低税收的代价是减少转移支付的流量。他们将失去收入，因为他们将不再能够依靠政治上的强制力，从比自己更有生产力的人的口袋里掏钱。那些没有储蓄的人，如果依靠政府来支付他们的退休福利和医疗服务，很可能会遭受生活水平的下降。这种收入的损失转化为金融作家斯科特-伯恩斯所称的 "超验 "或政治资本的贬值。88 这种 "超验的 "或想

象的资本不是基于资产的经济所有权，而是基于政治规则和条例所确立的对收入流的事实上的要求。例如，政府转移项目的预期收入可以转化为按现行利率计算的债券资本。这个由想象中的社区资助的想象中的债券是超验的资本。它将被 "伟大的变革 "突然贬值，而这一变革注定要减少政治当局对赎回其承诺所需的现金流的控制。

"在边境和公海上，没有人能够持久地垄断暴力的使用，商人们避免支付如此高的费用，因为通过其他手段可以更便宜地获得保护。"弗雷德里克-C-莱恩

不需要巨大的想象力就可以看出，信息精英们很可能会利用新的网络经济提供的解放和个人主权的机会。同样，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影响在新千年的增长，"左派 "将变得越来越金戈铁马和令人不快。很难准确地猜测在什么时候反应会变得丑陋。我们的猜测是，当西方国家开始像前苏联那样毫不含糊地分裂时，责难将加剧。

同样，每当一个民族国家解体，它将促进进一步的权力下放，并鼓励主权个体的自治。我们预计会看到主权实体的大量增加，因为从国家的废墟中出现了许多更类似于城邦的飞地和管辖权。这些新实体将包括许多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保护服务价格，对收入和资本征收低税或不征税。这些新实体的保护服务定价几乎一定会比领先的经合组织国家更有吸引力。仅仅作为一个市场细分的问题来看，市场中服务最差的领域是高效率、低成本的一端。任何希望支付高额税收以换取一系列复杂的国家支出的人都有充分的机会这样做。因此，对一个新的迷你主权来说，最有利和最有利的

策略几乎必然是高效率、低价格的选择。这样一个小国只能非常困难地期望提供比幸存的民族国家所提供的更全面的服务。由于所有的民族国家肯定不会一下子崩溃，国家主义的替代方案可能会得到很好的供应，特别是在过渡的早期。

另一方面，可以相对便宜地提供一个不花钱的可容忍的法律和秩序制度。如果社会动荡和犯罪在旧的核心工业国家蔓延到我们预期的程度，那么在一个司法管辖区，可容忍的法律和秩序将比国家太空计划、国家资助的妇女博物馆或为流离失所的管理人员提供补贴的再培训计划更具吸引力。

## 个人的非国家化

随着新机构的出现，公民身份的吸引力和持久性将降低，以促进对政府现在所从事的服务的选择，首先是保护。

这将使个人不再以国家的名义认同自己的身份成为现实。然而，公民身份的去神秘化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你会不断接触到一系列平庸的信息，以加强你对当地民族国家的认同。这些信息使你非常不可能忘记 "你的国籍"。对许多人来说，国籍是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 "被教导要从国籍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 "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竞争。当他们获胜时，仪式上挥舞的是 "我们 "的旗帜。在颁奖仪式上，"我们 "的国歌让评委和其他竞争者注意到。"我们 "被引导去相信这是 "我们 "的胜利，尽管从来没有很清楚 "我们 "是如何参与的，除了作为一个公民在同一领土内之外。

## 从第一人称复数到单数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它将有助于促进全球视角，并创造出一些方法，使主权个人能够利用信息技术的潜在可能性来摆脱民族主义的税收负担。

例如，在未来几十年内，狭义播送将取代广播，成为个人获取新闻的 232 种方法。这具有重大意义。这相当于在数百万人的想象中，从第一人称复数到单数的变化。

当个人自己开始充当自己的新闻编辑，选择感兴趣的话题和新闻故事时，他们就不太可能选择向自己灌输为民族国家牺牲的紧迫性。在技术的推动下，教育的私有化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在中世纪时期，教育被牢牢地控制在教会的手中。在现代，教育一直在国家的控制之下。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话说，"国家教育将人们转变为特定国家的公民：'农民变成了法国人'。"90 在信息时代，教育将被私有化和个人化。它将不再像工业时期的教育那样背负沉重的政治包袱。民族主义将不会被不断地灌输到思想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向互联网和万维网的转移也将降低商业中地点的重要性。它将创造不受地域限制的个人地址。基于卫星的数字电话服务的发展将超越基于地点的陆路系统，共享一个共同的国际拨号代码。个人将拥有自己的、独特的全球电话地址，就像互联网地址一样，无论他在哪里都能找到他。在适当的时候，国家邮政垄断将崩溃，允许由与任何现有民族国家没有特别联系的全球服务提供私有化的邮件。

这些和其他明显的小步骤将有助于把普通消费者和认知精英从对民族国家的死板认同中解放出来。公民身份的去神秘化将因在国家垄断的有界领土内交易的实际替代方案的出现而得到最大幅度的加速。网络经济的组成部分--网络货币、网络银行和不受监管的全球证券网络市场--几乎必然会大规模地出现。

当他们这样做时，贪婪的政府没收 "公民" 财富的能力就会减弱。

虽然领先的国家无疑会试图通过合作限制加密和防止公民逃离他们的领域来实施卡特尔以维护高税收和法币，但各州最终会失败。地球上最有生产力的人将找到他们的经济自由之路。国家甚至不太可能有效地将人们关在一起，让他们在身体上被勒索，这是不可能的。禁止非法移民的努力的无效性令人信服地表明，民族国家将无法封锁其边界以防止成功人士逃跑。富人至少会像未来的出租车司机和服务员一样积极地逃亡。

自中世纪主权支离破碎的时期以来，边界将首次没有明确的划分。正如我们之前所探讨的，未来的许多金融交易将没有明确的领土。越来越多的 "主权个人" 将利用这种模糊性来逃避他们的税收责任，而不是接受基于出生时的责任继承，超越公民身份而成为客户。正如第 8 章所分析的那样，他们将以客户的身份与瑞士谈判私人税收协定<sup>233</sup>。与讲法语的瑞士各州谈判的一个典型的私人税务条约允许个人或家庭居住，以换取每年 50,000 瑞士法郎（目前约 45,000 美元）的固定税款。请注意，这不是一个统一的税率，而是一个与收入无关的固定税额。如果你的年收入是 50,000 瑞士法郎，（45,000 美元），

你不应该签订这样的私人税务条约，因为你的税率将是 100%。在收入为 500,000 瑞士法郎时，你的税率为 10%。在 500 万瑞郎时，税率仅为 1%。在 5000 万瑞士法郎时，你的税率仅为 1/10。如果与纽约市 58% 的边际税率相比，这似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交易，这只是衡量工业时期政府服务的定价普遍变得多么具有掠夺性和垄断性。

事实上，5 万瑞士法郎对于政府提供的必要和有用的服务来说，是一笔充足的年费。瑞士人肯定会从为每一个搬来的百万富翁提供服务并每年向他们支付 5 万瑞士法郎的特权中获得巨大的利润。

在许多情况下，政府让另一个百万富翁居住在辖区内的边际成本约为零。因此，它在交易中的年利润将接近 50,000 瑞士法郎。任何可以被压低价格并仍能让低成本提供者获得大约 100% 的利润的服务都是垄断的，价格过高到了极点。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所征收的税率在收入中的百分比应该下降，但它似乎曾经是 "公平的"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被压低价格而仍能让低价供应商获得大约 100% 的利润的服务被垄断，价格过高到了极点。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征收的税率应作为收入的百分比下降，但在 20 世纪，不同的人为政府的服务支付巨大的不同金额，这似乎是 "公平 "的。这一点特别奇怪，因为那些使用政府服务最多的人支付最少的费用，而那些使用政府服务最少的人支付最多的费用。所有这些人都会作为美国的一个住所，对任何高收入的美国人来说，在一生中价值数千万的优势。除非美国的税收进行改革，使其与其他司法辖区的



税收相比更具竞争力，并且不再以国籍为基础进行征收，否则有想法的人将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尽管克林顿的出境税给他们带来了障碍，但他们会拿起那些带来较少责任的护照。

工业时代的政府是根据纳税人的成功来为其服务定价，而不是根据所提供的任何服务的成本或价值来定价。政府服务的商业定价运动将导致更令人满意的保护，其价格远远低于传统民族国家所施加的保护。

## 公民身份走向骑士精神之路

简而言之，公民权注定要走骑士精神的道路。随着提供保护的基础再次被重组，补充该系统的合理化和激励性意识形态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半个世纪前，在中世纪末期，当提供保护以换取个人服务普遍不再是一个有偿的提议时，人们以可预见的方式作出反应。他们放弃了骑士精神。宣誓的誓言和个人的忠诚不再像过去五个世纪那样被认真对待。现在，234 项信息技术有可能同样颠覆公民权。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主张将被解密，正如五个世纪前垄断教会的主张被解密一样。

虽然反动派会通过试图诋毁创新者和重振民族主义情绪来回应，但我们怀疑在政治上已经停摆的民族国家能否施加足够强大的忠诚度，以抵御信息技术所释放的竞争压力。在一个政府破产的世界里，大多数有思想的人宁愿作为保护服务的客户得到良好的待遇，而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公民被掠夺。

富裕的经合组织国家对在其境内做生意的个人施加了沉重的税收和监管负担。当经合组织国家是人们可以在合理的舒适水平上做生意和居住的唯一管辖区时，这些成本可能是可以容忍的。这一天已经过去了。作为最富有的民族国家的居民而被征税和监管，所付出的代价已经无法偿还了。

随着司法管辖区之间竞争的加剧，这种情况将越来越难以容忍。那些拥有盈利能力和资本以应对信息时代竞争挑战的人将能够在任何地方落户，在任何地方做生意。在有住所选择的情况下，只有最爱国或最愚蠢的人才会继续居住在高税率国家。

出于这个原因，可以预见，一个或多个民族国家将采取秘密行动，颠覆短暂性的吸引力。生物战可以有效地阻止旅行，例如爆发致命的流行病。这不仅可以阻止人们的旅行欲望，还可以给全球各地的司法机构提供一个封锁边界和限制移民的借口。

## 国籍税的弊端

除非政策发生惊人的、几乎是奇迹般的变化，否则信息时代的成功投资者或企业家将终生支付数千万、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罚款，以居住在财政政策类似于 20 世纪享有最高生活水平的国家。

如果没有彻底的改变，美国人的惩罚将是最高的。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三个根据国籍而不是居住地征税的司法管辖区之一。其他两个国家是菲律宾，一个前美国。

虽然这只是对美国税率的苍白模仿，但即使是这种负担也使厄立特里亚的公民身份

在信息时代成为一种责任。目前的法律使美国公民身份成为一个更大的负担。国税局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出口之一。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多地将手伸向地球的各个角落，从其国民那里榨取收入。

如果一架 747 喷气式客机装满了来自地球上每个司法管辖区的一个投资者，在一个新独立的国家降落，每个投资者在新经济中的一个初创的 235 企业中冒 1000 美元的风险，美国人将面临远高于其他人的任何收益的税收。对外国投资的特殊惩罚性税收，例如所谓的 PFIC 税收，再加上美国国籍税，可以导致在美国境外持有的长期资产的税收责任达到 200% 或更多。一个成功的美国人可以作为全球 280 多个其他司法管辖区中的任何一个的公民来减少他一生的总税务负担。

美国拥有全球最具掠夺性的、浸泡富人的税收制度。

与任何其他国家的公民相比，生活在美国或国外的美国人更多地被当作资产，而不是顾客。因此，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些声名狼藉的高税率福利国家相比，美国的税收制度更不合时宜，更不符合信息时代的成功。丹麦或瑞典的公民在实现他们作为个人的日益增长的技术自主权方面几乎没有面临法律障碍。

如果他们希望协商自己的税率，他们可以自由选择通过私人条约在瑞士缴税，或者搬到百慕大，根本不交所得税。一个瑞典人或丹麦人如果因为相信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国家是值得的而希望支付高额税款，实际上是在做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按文明或不文明世界的任何其他管辖区的任何

税率纳税。要改变他的税率，他只需要搬家。技术使这种选择越来越容易。然而，美国人却被剥夺了这种选择。

持有美国护照注定会成为实现信息革命所带来的个人自主机会的一个主要障碍。

在工业时期出生的美国人是一个幸运的意外。即使在信息时代的早期阶段，它已成为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责任。

要想知道这个责任有多大，请考虑一下这个比较。在合理的假设下，一个新西兰人的税前业绩与美国最高 1% 的纳税人的平均水平相同，他所付的税款会少得多，单是他节省的税款的复利就会使他比美国人更富有。在一生结束时，新西兰人将有 7300 万美元可以留给他的孩子或孙子。而新西兰甚至不是一个公认的避税天堂。其他 40 多个司法管辖区的所得税和资本税都比新西兰低。如果我们的论点是正确的，低税率司法管辖区的数量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所有这些司法管辖区都将提供比美国更多的住所优势，在一生中价值数千万，甚至数亿。除非美国

信息时代的竞争条件将使人们有可能在几乎任何地方获得高收入。实际上，民族国家用来征收极高税收的地区垄断将被技术所打破。随着这些垄断的进一步削弱，竞争压力几乎必然会促使最具进取心和能力的人逃离税收过高的国家。正如《经济学人》前编辑诺曼-麦克雷所说，这些国家"将主要由傻瓜居住"。

富人逃离先进的福利国家将在人口统计学上的错误时间发生。在 21 世纪初，欧洲

和北美的大量老龄人口将发现他们没有足够的储蓄来支付医疗费用和资助他们的退休生活方式。例如，有 65% 的美国人根本没有退休储蓄。没有。而那些有储蓄的人则储蓄得太少。平均而言，美国人在 65 岁之前将面临超过 20 万美元的预期医疗费用，净资产不到 7.5 万美元。即使是拥有私人养老金的少数人，也不可能过得很舒服。平均养老金只能取代退休前收入的 20%。典型退休人员的大部分资产不是真正的财富，而是 "超验资本"，即转移支付的预期价值。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于依靠这些转移支付来弥补他们私人资源的差距。问题是，这些钱不太可能得到。现收现付制度将缺乏现金流或资源来兑现它们。尼尔-豪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美国的税前收入比过去 20 年增长得更快，到 2040 年，美国的平均税后收入将不得不下降 59%，以资助目前水平的社会保障和政府医疗项目。

这不是一个可以在边缘地带操纵的问题。福利国家面临破产。它的融资困境在欧洲甚至比在北美更加严重。意大利也许是最糟糕的情况，紧随其后的是瑞典和其他北欧的福利国家，它们为收入支持计划中的慷慨条款制定了标准。《金融时报》估计，如果 "包括意大利国家养老金的现值，该国的公共部门债务将上升到 GDP 的 200% 以上" <sup>91</sup>

在这样的水平上，负债在数学上是没有希望的。几年前对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公司的商业债务进行的全面研究表明，很少有公司能像今天的主要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债务比率那样，在四分之一的极端情况下生存。<sup>92</sup> 简而言之，他们已经破产。当人们面对这一现实时，勉强但不可避免地，数以万亿计的没有资金支持的福利义务将被注销。

这就是网络经济的逻辑。一个可能的障碍可能是简单的惯性，即使人类不愿意拿起木桩和移动的筑巢本能。如果还有其他障碍，它们可能是人类本性中的硬伤。在网络空间部署资产的经济逻辑可能与根深蒂固的对外人的怀疑所表达的生物逻辑相悖。每种文化中的儿童都对陌生人表现出厌恶。主权商业化的反对者将尽力煽动对信息时代新的全球文化和它所暗示的民族国家的消亡的怀疑。另一个由表观遗传或受遗传影响的动机因素引起的可能障碍是，"失败者和留守者"将对破坏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像狩猎采集者 237 号那样愤怒的反应。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迷失方向和被疏远的个人将有更大的力量来破坏和毁灭，对信息经济的反击可能被证明是暴力和不愉快的。

"历史上，集体暴力经常从西方国家的中央政治进程中流露出来。寻求夺取、掌握或重新调整权力杠杆的人们不断地参与集体暴力，作为他们斗争的一部分。被压迫者以正义的名义出手，有特权者以秩序的名义出手，两者之间以恐惧的名义出手。权力安排的巨大变化通常会产生，而且往往取决于集体暴力的特殊时刻。

## 暴力透视

关于在变革条件下是什么催生了暴力，至少有两种有争议的理论。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总结了一种理论："集体暴力的刺激主要来自于人们在既定体制瓦解时的焦虑。如果苦难或危险加剧了焦虑，理论上讲，反应会变得更加暴力。"然而，在蒂利看来，暴力与其说是焦虑的产物，不如说是一种更为理性的尝试，以欺负当局来履行其责任"，其动机是 "

正义被剥夺的感觉”。根据蒂利的解释，“大型结构性变化”往往会刺激具有“政治”性质的集体暴力。”此外，暴力斗争并不构成对‘正常’政治生活的急剧突破，而是倾向于伴随、补充和扩展同一批人为实现其目标而进行的有组织的和平尝试。它们与非暴力抗争属于同一个世界”。94

无论哪种暴力理论更正确，大转型期间的社会和平前景似乎都很有限。民族国家的崩溃无疑是一个“既定机构崩溃”的明显例子。

因此，焦虑可能会盛行，对暴力的政治激励也会盛行。这在领先的福利国家可能尤其如此，那里的人民习惯于相对的收入平等。鉴于处于信息经济早期阶段的人口将在工业时期长大，当时政治当局确实有能力以物质利益来回应不满，因此有理由期待“左撇子”继续要求物质利益。在经合组织的人民从能够强迫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的期望中清醒过来之前，可能需要对网络经济的现实进行缓慢而痛苦的辅导。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无论暴力是来自于“焦虑”还是作为一种更有计划的努力来利用

人们不再期望能够大规模地强制进行收入再分配。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无论暴力是源于“焦虑”，还是作为一种更有计划的努力来利用系统强制的好处，条件似乎都会使暴力成为可能。

## 失败者的选区

强迫性收入再分配的崩溃，必然会使那些期望接受数万亿转移项目的人感到不安。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将是“失败者或留

守护者"，即没有技能在全球市场竞争的人。就像前苏联的养老金领取者构成了祖加诺夫的共产主义支持的核心一样，垂死的福利国家的失望的养老金领取者将形成一个反动的选区，热衷于阻止民族国家的主权被私有化，从而剥夺了国家的偷窃许可。当他们意识到他们以前控制的政府正在失去对资源的主权和迫使大规模收入转移的能力时，他们将变得像法国公务员一样坚定地与算术斗争。

你可能还记得总理阿兰-朱佩提出的相当温和的建议，即缩减 "人口上不可持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退休福利，并节约国有铁路系统的运营费用，引起了激烈的反应。

法国人称自己的社会福利制度为 Etat Providence，其荒谬性的象征是允许 "计算机化的高速 TGV 列车上的工程师在 50 岁时退休，就像他们在燃煤机车上劳作的前辈一样 "的规定 95

在任何一个经合组织国家，对不可持续的福利的削减作出激烈的反应是一种明显的可能性。即使在民众反应不那么愤怒的地方，你也可以预期可能的失败者会尽其所能阻止国家强制力的侵蚀。

这将导致一些令人惊讶的转折。例如，在美国，本土主义情绪在历史上一直带着不止是轻微的种族主义色彩。

这是一个始于 19 世纪的 "白帽子 "和三 K 党的传统。然而，黑人作为一个群体，是收入转移、平权行动和其他政治强迫性成果的主要受益者。他们在美国军队中的比



例也过高。因此，他们有可能与蓝领白人一起成为美国民族主义最狂热的支持者。

愿意迎合那些相对才能远低于阿蒙的萝卜的人的不安全感的政治家，几乎在每个国家都会喧宾夺主。

从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到美国的帕特-布坎南，到新西兰的温斯顿-彼得斯，再到土耳其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福利党的内吉梅丁-埃尔巴坎，煽动者们将抨击市场全球化、移民和投资自由。

那些认为自己是 "全球经济的牺牲品 "的人将会对富人和移民产生特别的敌意。用安德鲁-希尔的话说，他们将 "鄙视那些主要的入境标准似乎是他们的财富或缺乏财富的移民，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使他们成为福利的负担。"96

## 对自由的恐惧

民族国家在新千年初期消失的前景似乎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扰乱易受影响的人们的生活。这 239 将导致广泛的不愉快。一些观察家已经认识到了一种反应模式，这种模式在那些因无边界世界的前景而感到被遗弃的人中很常见。随着更大的、更具包容性的国家集团开始瓦解，随着流动性更强的 "信息精英 "将他们的事务全球化，"失败者和被遗弃者 "回到了一个种族亚群、一个部落、一个帮派、一个宗教或语言上的少数群体中。这部分是对以前由国家提供的服务（包括法律和秩序）崩溃的一种实际和实用的反应。对于那些没有什么市场资源的人来说，往往很难购买到替代失败的公共服务的市场机会。

对于那些有足够资源购买高质量私人物品的人来说，将以前被视为公共物品的东西，如教育、提供清洁水和邻里治安，转变为私人物品，显然更容易管理。然而，对于那些想要现金的人来说，最实际的选择往往是依靠亲属，或加入一个按种族组织的互助团体，如东南亚古老的华人 "福建人"，或通过一个宗教会所。在世界那些活跃的、传教的宗教地区，他们的项目之所以受欢迎，部分原因是他们倾向于回溯到提供社会福利和公共物品的前现代机制。例如，在南非开普敦，由穆斯林领导的民团在打击暴力团伙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sup>97</sup> 但是，尽管这种民族和宗教组织的帮助可以是实际和实用的，但更多的是涉及对国家凋零的反应。

在反对全球化的反应中，似乎还有一个强烈的心理因素。

这一论点与埃里希-弗洛姆在其 1942 年首次出版的著名作品《对自由的恐惧》中对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所做的心理学解释并无二致。根据弗洛姆的说法，资本主义引入的社会流动性破坏了传统乡村生活的固定身份。农民的儿子不再知道他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农民，甚至不知道他将注定要在他父亲耕种的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拼命地收获庄稼。他现在有一个广泛的职业选择。他可以成为一名教师，一名商人，一名士兵；学习医学或出海。即使作为一个农民，他也可以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或阿根廷，在远离祖国的地方生活。资本主义为人们提供的这种 "创造自己的身份" 的自由，对那些不准备创造性地利用它的人来说是可怕的。正如 Billig 所说，他们渴望 "稳固身份的安全感"，并 "被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简单性所吸引"。<sup>99</sup>

同样，正如 Billig 在谈到工业时代的黄昏时写道："有一种全球心理学，它从上面打击国家，用身份的自由游戏来消除忠诚。然后，还有种姓或部落的热心理，它以强大的不容忍的承诺和情感上的凶猛来打击国家的软肋。"100

安德鲁-希尔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同一现象。他看到两个伟大的 "全球政治和经济趋势。...趋势之一是全球经济的增长。...第二个趋势是民族主义、种族和地区主义情绪的兴起，无论是毛利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还是反移民派，即使他们的 240 个政府把他们推向新的、无边界的地平线，他们也会把自己往相反的方向用力拉。"101 无论你选择如何看待它们，无论是作为主要的 "趋势"

政府把他们推向新的、无边界的地平线，却把他们自己拉向相反的方向"。101 无论你选择如何看待它们，无论是作为主要的 "趋势 "还是 "心理主题"，很明显，一种支持民族主义、反对边界下降和市场深化的强烈反动情绪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聚集其声音。

## 多文化主义和受害情况

在它的暮年，随着从空荡荡的口袋中赎回不劳而获的承诺的能力的减弱，福利国家发现助长新的歧视神话是合宜的。许多类别的官方 "受压迫 "的人被指定，特别是在北美。被指定为 "受害者 "的群体中的个人被告知，他们对自己生活中的缺点没有责任。

相反，据说错误在于欧洲后裔的 "死亡白人男性"，以及据称被排斥群体处于不利地位的压迫性权力结构。

黑人、女性、同性恋、拉丁裔、法语、残疾等等，都有权对过去的压迫和歧视进行补偿。

如果拉什的论点是可信的，提高受害感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国家，使新的、脚踏实地的信息精英们更容易逃避公民的承诺和义务。我们并不完全相信新的精英，尤其是大众传媒中的大多数人，狡猾到足以推理出这样一种姿态。如果觉得他们是这样的人，那几乎是令人放心的。我们认为，受害现象的增长主要是试图通过扩大功利主义的成员数量来购买社会和平，就像拉什所认为的那样，而且还通过重新构建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性。新的受害者研究运动在北美以其最夸张的形式出现，因为信息技术在那里渗透得更深。然而，我们怀疑，新的歧视神话将在某种程度上在所有工业社会的衰老状态下普遍存在。北美的多民族福利国家只是更容易受到诱惑，将收入再分配的成本强加给私营部门。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激起不满和权利感，把社会中各种亚文化的经济缺陷归咎于整个社会的结构，以及一般的白人男子。

## 创新的大政治学

甚至在信息技术开始威胁到工业经济的 "创造性破坏" 之前，它就已经明显地使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珍视的许多神话过时了。我们在前一章中研究了创新的大政治学。我们在那里强调的一点，对于将信息革命的社会影响纳入视野具有重要意义。近几个世纪以来，技术扩大就业机

会的先例似乎是经济 241 生活的可靠规则，但它不一定是。收入有可能集中在少数繁荣的人手中。

实际工资下降 50

这的确是现代时期前两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内发生的事情。从 1500 年左右的火药革命开始到 1700 年，西欧大部分地区底层 60%-80% 人口的实际收入下降了 50% 或更多。<sup>102</sup> 在许多地方，实际收入持续下降，直到 1750 年，直到 1850 年才恢复到 1500 年的水平。

与过去 250 年的经验不同，现代时期前半段的收入收益，即西欧经济急剧扩张的时期，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目前的信息技术创新与近几个世纪以来世界所经历的工业技术的创新有很大的不同。差异在于，当前大多数具有节省劳动力特征的技术创新都倾向于创造熟练的工作，并减少规模经济。这与 1750 年以来的经验正好相反。

工业创新倾向于为无技能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增加企业的规模经济。这不仅提高了穷人的收入，而不需要他们付出任何努力，它还倾向于增加政治制度的力量，使他们更有能力抵御动乱。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那些被机械化和自动化取代的人往往是熟练的工匠、手艺人 and 工匠，而不是非熟练工人。纺织业当然也是如此，它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机械化和动力设备的行业，这导致了 Luddites 的暴力反应，他们在 19 世纪初的狂欢中破坏了纺织机械并谋杀了工厂主。另一方面，1830 年英格兰东南部叛乱的神话领袖斯温上尉的追随者是日工。他们的要求包括向当地富人征收钱财或啤酒，向当地的日工雇主增加工资，

以及 "摧毁或要求摧毁；新的农业机械，特别是脱粒机"，这些机械减少了农民对农村日工的需求。103

与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人将节省劳动力的技术的暴力反对者变成英雄的浪漫的胡言乱语相反，他们是一群令人不快的暴力分子，他们反对引进提高全世界生活水平的技术，完全是出于自私的原因。

虽然奈德-卢德和斯温船长的暴力追随者在英国危害了许多个月的公共秩序，但一旦被中央当局镇压，他们的运动必然会流产。贫穷的、没有技能的大多数人不可能长期被一项事业所吸引，因为这项事业承诺要摧毁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的机器，并通过降低他们所需物品的成本，如保暖衣物和面包，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 非技术工人的更高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和农业自动化对一无所有的人有吸引力，因为它为他们创造了收入机会，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新的工具使那些没有技能的人能够生产出与高技能者所生产的产品质量相当的产品。装配线上的天才和白痴都可以生产同样的产品，并赚取同样的工资。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工业自动化极大地提高了非技术性工作的工资，特别是在世界的一小部分地区，那里的条件首先允许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先进工业企业的庞大规模不仅以前所未有的工资回报了非技术工人，而且还促进了收入的再分配。

福利国家的出现是工业化技术的必然结果。由于其规模大、资本成本高，主要的工业雇主是最容易征税的目标。而且可以依靠他们来保存记录和强制扣押工资，这使得所得税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在前几个世纪经济比较分散的时候是不可行的。最终的效果是，工业创新所促进的规模经济的增长使政府更加富有，并且可以推测出更有能力维持秩序。

## 进程被颠覆

根据我们的判断，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信息技术正在为有技能的人提高收入机会，并破坏了大规模运作的机构，包括民族国家。

这指出了信息时代的另一个讽刺--即自由市场的批评者对工业工作的兴衰所持的分裂和根本性的阻挠态度。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他们对所谓的工业工作的邪恶感到窒息，因为它把无地的农民从 "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 "吸引过来。听批评者说，工厂工作的出现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邪恶和对工人阶级的 "剥削"。但现在看来，唯一比工厂工作的出现更糟糕的事情是它们的消失。那些为工厂工作的出现而哀嚎的人的曾孙们，现在正在为工厂工作的短缺而哀嚎，这些工作为低技能的工作提供了高薪。

贯穿这些抱怨的一条连贯线索是对技术创新和市场变化的坚定抵抗。在工厂系统的早期阶段，这种抵抗导致了暴力。它可能再次发生。

而不是因为资本家在 "剥削工人"。计算机作为一种典范技术的出现揭示了这种说法的荒谬性。对于注意力不集中的人来说，假设一个几乎不识字的汽车工人在生产汽车的过程中被那些构思和资助雇佣工人的企业的老板 "剥削 "了，这可能是半信半疑的。概念性的 243 资本在有形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的关键作用没有在信息时代的产出中那么明显，这显然涉及到脑力劳动。因此，假设企业家以某种方式攫取了由工人实际创造的信息产品的价值，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就大打折扣了。如果价值明显是通过脑力劳动创造的，比如在消费类软件的生产中，假设它实际上是构思该产品的技术工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产品，那就太荒谬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远远没有假定工人创造了所有的价值，明显的和日益增长的非技术性就业的趋势，引起了对完全相反的问题的广泛担忧--非技术工人是否仍有任何经济贡献。

因此，收入再分配的理由从 "剥削 "转移到了 "歧视"，因为 "剥削 "假定低收入者有生产能力。然而，"歧视 "被指责为低技能者未能发展更有价值的技能的原因。

这种歧视也被认为是强加非最佳雇用标准和其他开放 "机会 "的标准的理由，或者更确切地说，将收入重新分配给落后的群体。例如，在美国，基于种族的成绩和能力测试的规范化允许黑人在客观分数较低的情况下超过白人和亚裔申请人。通过这种方法和其他方法，政府迫使雇主以更高的工资雇用更多的黑人和其他官方 "受害 "群体。任何不遵守规定的人都会面临昂贵的法庭诉讼，包括涉及大量惩罚性赔偿的诉讼。



指定受害者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工业社会的重要子群体中孵化出被迫害的偏执妄想，也不是为了补贴反作用的价值观的传播。它是为了减轻破产的国家在重新分配收入方面的财政压力。灌输迫害妄想只是一个不幸的副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 "歧视" 关注的激增恰好与技术革命的早期阶段相吻合，而技术革命必将使实际的任意歧视比以前少得多。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或关心一个新的软件程序的作者是黑人、白人、男性、女性、同性恋，还是一个素食侏儒。

虽然现实中的歧视在未来一定会减少压迫性，但这并不一定会缓解要求 "赔偿" 的压力，以补偿各种真实或想象中的错误行为。每个社会，无论其客观情况如何，都会产生一种或多种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性。它们的范围从微妙到荒谬，从《圣经》中 "爱邻如己" 的禁令到黑魔法的召唤。巫术、女巫和邪恶之眼是宗教感情的反面，相当于税务局或国税局的精神。当人们不能被爱所感动而去补贴穷人时，穷人自己会试图看到他们被恐惧所感动。有时，这采取的形式是赤裸裸的敲诈，用刀抵住喉咙，用枪指着头。在其他时候，威胁是伪装的或虚构的。现代早期的大多数 "女巫" 都是寡妇或资源匮乏的未婚妇女，这并不是巧合。她们用诅咒恐吓她们的邻居，而这些诅咒往往会让 244 名邻居付出代价。绝不是说那些这样做的人只是迷信者。邪恶之眼的恶意并不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事实。

即使是一个贫穷的女人也可以放牛或放火烧别人的房子。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早期的巫术审判并不完全像它们看起来那么荒谬。虽然惩罚是残酷的，而且毫无疑问，许多无辜的人在麦角中毒的影响下遭受了

邻居的幻觉，但对女巫的起诉可以理解为起诉勒索的一种间接方式。

我们预计，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分享成就的愿望为动机的敲诈勒索会重新出现。对过去的歧视感到不满的群体不可能仅仅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要求变得不那么合理或难以执行而迅速放弃他们作为受害者的明显有价值的地位。

他们将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直到当地环境中的证据毫无疑问地让他们不再得到回报。

非洲裔美国人和非洲裔加拿大人中反社会行为的增长告诉你。它说，在黑人的愤怒和对黑人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反社会行为自我造成的后果的现实评价之间几乎没有平衡。黑人的愤怒已经上升，甚至在黑人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不正常的时候。非婚生子女的数量激增。教育程度下降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黑人卷入犯罪活动，以至于现在监狱里的黑人比大学里的黑人还多。

这些不正常的结果可能产生了暂时的效果，即在工业化的黄昏，通过提高对整个社会的敲诈威胁，增加了流向底层社区的资源。但这种影响可能只是暂时的。通过消除竞争对挑战成绩不佳者以符合生产规范的有益影响，福利国家帮助创造了功能失调、偏执和文化程度低下的人群，相当于一个火药桶的社会。民族国家的死亡和大规模收入再分配的消失，无疑会导致这些不快乐的灵魂中一些更有心理障碍的人对任何比他们更繁荣的人进行攻击。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社会

和平将处于危险之中，特别是在北美和西欧的多民族飞地。

"我们永远不会放下武器，[直到]下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取缔所有伤害共同利益的机械，并废除绞死破框者的法案。但是我们。我们不再请愿了--那是不行的--必须战斗。"救国军将军内德-路德书记签名 "救国军--永远的阿门"

## 新鲁德主义者

鉴于过去 19 世纪初反技术叛乱的经验，以及欧洲和北美长期以来的集体暴力传统，看到新卢德派对信息技术和使用它的人的攻击，没有人应该感到惊讶。前面提到的卢德派是集中在英国西约克郡的布业工人，他们在 1811 年至 1812 年期间发起了一场针对自动耕作机和采用这些机器的工厂主的恐怖运动。脸色发黑的 245 人在西约克郡肆虐，焚烧工厂，谋杀敢于采用新技术的工厂主。大多数暴力事件都是 "剪羊毛的人" 干的，这些人是高度熟练的工匠，他们挥舞着重达 50 磅的巨大剪刀的劳动在以前是毛布生产的关键部分。但是，正如罗伯特-里德 (Robert Reid) 所写的关于卢德派崛起的最好和最全面的讨论《失去内容的土地》(Land of Lost Content) 的作者所言，裁缝们所做的收尾工作，即 "用茶刀提高棉絮，用剪子裁剪布料"，是。1812 年卢德派起义》一书的作者罗伯特-里德认为，"太简单了，不可能被机械化"。107 达芬奇已经画出了这样一台机械化耕作机的设计图。然而，莱昂纳多的自动耕作设计被搁置了几个世纪。最后，到了 1787 年，类似莱昂纳多的设备被重新发明并在英国投入生产。正如里德所指出的那样，"这项技术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已为人所知，令人惊讶的是，

它没有更早地被引入。...工业革命的新设备只需要很少的力量和技能就可以使用，以至于许多工作机会被妇女和儿童占据，最初工资很低。这些新机器中的一台，即使由相对不熟练的人操作，现在也能在 18 个小时内完成一个熟练的农夫用手剪需要 88 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庄稼。"108

请注意，抨击机械化的工人在反对新技术方面是相当有区别的。他们只攻击和打击那些取代他们自己的工作或减少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技术。当一位名叫威廉-库克 (William Cooke) 的企业家在西约克郡地区引进地毯编织机械时，没有引发任何暴力事件。没有人试图烧毁库克的工厂，或破坏他的机器，更没有人企图谋杀他。正如罗伯特-里德在他的《卢德起义史》中解释的那样，库克的新技术没有引起反对，因为地毯是一种 "在那之前山谷中没有人擅长的产品"。109 里德继续说："由于库克引进了一种新产品，并创造了不基于任何传统做法的就业，他的工厂蓬勃发展。"110 这是一个对未来有重要影响的例子。它表明，在下一个千年里，有思想的企业家将首先在没有生产任何产品或服务传统的地区引进巨大的节省劳动力的自动化。

如果过去是一种指导，新千年早期几十年中最暴力的恐怖分子将不是无家可归的贫民，而是以前享有中产阶级收入和地位的流离失所的工人。1812 年的卢德起义当然就是这种情况，其中大部分卢德分子不是贫穷的无产阶级，而是习惯于赚取比普通工人多五倍或更多收入的熟练工匠。今天的同类群体可能是被淘汰的工厂工人。不幸的是，扫描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口统计学，我们发现更多的地区可以被强调为潜在的暴力反应场所。

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将寻求对抗网络经济和能够利用它来积累财富的主权个人。一场愤怒的民族主义反应将席卷全球。其中的一部分将是反殖民主义的反应，相当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卢德主义和其他反技术的叛乱。我们应该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可能是新千年治理演变的一个关键。未来巨大变革的关键挑战之一是在暴力升级的情况下维持秩序，或者是躲避暴力的冲击。与信息时代的到来特别相关的个人和公司，包括硅谷的个人和公司，甚至为新技术提供动力所需的电力供应商，将不得不对自由职业者、新鲁德主义的恐怖主义保持特别的警惕。

不幸的是，由于对收入下降的失望和对成就的怨恨不断增加，像 Unabomber 这样的疯子可能会刺激大批的模仿者。

我们怀疑即将发生的大部分暴力事件将涉及爆炸事件。正如《纽约时报》所报道的那样，美国各地的国内恐怖主义在 20 世纪 90 年代猛增。

"在过去五年里，它们增加了 50% 以上，在过去十年里几乎增加了两倍。犯罪爆炸和未遂事件的数量从 1985 年的 1,103 起上升到 1994 年的 3,163 起....。[在小城镇和郊区社区，以及城市内的街头帮派中，一种花园式的炸弹袭击者一直在扩散。"  
111

国防成为一种私人物品

尽管民族国家征收刑事税作为保护的代价，但在未来的岁月里，它们不可能有效地提

供保护。新的信息技术所暗示的暴力规模的下降，使得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机构的作用大打折扣。这不仅意味着战争中的决定性下降，意味着国家实际保护公民的能力将下降，还意味着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明显的域外霸权在下个世纪将不如英国在 19 世纪的霸权那样有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权力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从核心区有效而果断地投射到周边地区。在二十一世纪，大国对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的威胁必然会随着暴力的回归而减少。暴力回报率的下降表明，能够大规模行使军事力量的民族国家或帝国在信息时代不可能生存或出现。

随着提供足够防御的财政要求下降，将保护服务当作私人物品来对待将变得更加可信。

毕竟，规模缩小的安全威胁将越来越多地被那种可以在商业上参与的安全部队所防御，例如通过使用墙壁、围栏和安全围栏来屏蔽麻烦的人。此外，一个富裕的个人或公司可能有能力雇用保护措施，以防止在信息时代可能出现的大多数威胁。在边际上，军事威胁的规模缩小将增加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或在单一领土内的竞争暴力。但它也将加剧各司法管辖区之间在竞争条件下提供保护的竞争。这将意味着各司法管辖区之间在保护服务、护照和领事服务以及提供司法方面的竞争加剧。

当然，从长远来看，"主权个人"可能将能够凭非政府文件旅行，这些文件像信用证一样由私人机构和亲和 247 团体签发。不难想象，一个团体将作为网络空间的一种商人共和国出现，其组织形式类似于中世纪的汉萨同盟，以促进司法管辖区之间的私人条约和合同的谈判，并为其成员提

供保护。想象一下，由主权个人联盟颁发的特殊护照，表明持有人是受该联盟保护的人。

这样的文件，如果它出现了，也将只是脱离民族国家和它所培育的官僚时代的一个暂时的人工制品。在现代时期之前，护照对于通过边境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边境的定义是松散的。

虽然中世纪的边疆社会有时会使用安全通行证，但它们通常是由被访问国的当局签发的，而不是由旅行者所在的管辖区签发。比护照更重要的是介绍信和信用证，它使旅行者能够找到住所并进行商业谈判。这一天将再次到来。最终，有身份的人将能够在没有任何文件的情况下旅行。他们将能够在万无一失的生物识别基础上，通过声音识别系统或视网膜扫描来识别他们的身份。

简而言之，我们预计在下个世纪上半叶的某个时候，世界将经历主权的真正私有化。这将伴随着可以预期的条件，使强迫的领域萎缩到其逻辑上的最低限度。然而，对于下一个千年的世俗审问者和反动派来说，将曾经 "神圣 "的国籍属性置于市场之上，作为一个成本效益计算的问题进行买卖，将是既愤怒又威胁的。

我们在这本书中认为，不再需要一个民族国家来打一场信息战争。这种战争可以由计算机程序员部署大量的 "机器人 "或数字仆人来进行。比尔-盖茨已经拥有在全球脆弱系统中引爆逻辑炸弹的能力，比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国家都要强。在信息战争时代，任何软件公司，甚至山达基教会，

都将是一个比在联合国拥有席位的大多数国家所造成的累积威胁更可怕对手。

民族国家权力的丧失是低成本、先进的计算能力出现的一个逻辑后果。微处理既降低了暴力的回报，也首次为政府在工业时期收取垄断价格的保护服务创造了一个竞争性市场。

在商业化主权的新世界里，人们将选择他们的司法管辖区，就像现在许多人选择他们的保险公司或他们的宗教一样\*。

未能提供适当的服务组合的管辖区，无论这些服务是什么，都将面临破产和清算，就像不称职的商业企业或失败的宗教会所一样。因此，竞争将调动地方管辖区的努力，以提高其经济和有效提供服务的能力。

在这方面，各辖区之间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竞争将产生类似于在生活的其他部门所观察到的影响。竞争通常会提高顾客的满意度。

## 竞争和无政府状态

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预期的管辖区之间的竞争，主要不是在同一地区使用暴力的组织之间的竞争。如前所述，使用暴力的竞争组织往往会增加暴力在生活中的渗透，减少经济机会。正如莱恩所说，在使用暴力方面，在与敌对的使用暴力的企业竞争或建立领土垄断时，显然有很大的规模优势。这一事实是对政府的一个方面进行经济分析的基础：使用暴力、控制暴力的行业是一种自然垄断，至少在土地上是如此。在领土范围内，它所提供的服务可以由垄



断者更便宜地生产。可以肯定的是，曾有过使用暴力的企业在几乎相同的领土上竞争要求支付保护费的情况，例如，在德国的三十年战争期间。但这种情况甚至比敌对的电话系统在同一地区的竞争更不经济。<sup>112 \*</sup>

见 Stephen J. Duhner，《选择我的宗教》，《纽约时报》杂志，1996 年 3 月 31 日，第 36 页以下。

莱恩的评论在两个方面是有参考价值的。首先，我们同意他的一般结论，即主权国家将倾向于实行领土垄断，因为这样做将使他们能够提供更便宜和更有效的保护服务。莱恩评论的第二个有趣方面是他与垄断电话服务的过时比较。显然，我们现在知道，电话系统不一定是垄断的。这在分析中引入了一个警告。技术条件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使领土范围内的无政府状态是不可行的这一一般结论失效。

例如，如果网络资产在某一领域发展到大规模，将其置于强制力的范围之外，那么保护服务的定价可能就不是 "需求 "的问题，而是市场谈判的问题了。<sup>404</sup>

然而，我们在这里指的是与普遍的无政府状态不同的东西--即管辖区之间的竞争，每个管辖区都在自己的领土上享有对暴力的垄断。我们看到这些司法管辖区在竞争中尽可能提供最大的价值，以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吸引其 "客户 "的保护服务。诚然，在信息时代，保护服务的提供无疑会有更大的模糊性，私人提供的治安和防御服务比我们以前所习惯的更完整。然而，我们所设想的竞争与多个保护机构在同一

地区为不同客户提供服务的大规模冲突是不同的，后者是无政府状态。

然而，在严格的逻辑中，主权国家的增加，个人在积累足够资源的情况下承担更多的主权国家的角色，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世界上无政府状态的范围会增加。主权国之间的关系总是无政府主义的。现在和过去都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规范单个主权国家的行为，无论是小国、民族国家，还是帝国。正如 Jack Hirshleifer 所写的，"从原始部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协会都是由某种 249 形式的法律进行内部管理的，它们彼此之间的外部关系主要还是无政府状态。""<sup>3</sup> 当世界上有更多的主权实体时，不可避免地会有更多的关系在一个以上的管辖范围内发生，因此是无政府状态。

重要的是要注意，无政府状态，或缺乏一个压倒性的权力来仲裁争端，并不是完全混乱或没有形式或组织的同义词。

Hirshleifer 指出，可以对无政府状态进行分析。"部落间或国际体系也有其规律性和系统性的可分析模式。""<sup>4</sup> 换句话说，正如数学中的 "混乱 "可以包含复杂和高度有序的组织形式一样，"无政府状态 "也不是完全没有形式或无序的。

Hirshleifer 分析了一些无政府状态的环境。除了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外，还包括禁酒令时代芝加哥的帮派战争和 "加州淘金热中的矿工与跳楼者"。请注意，即使加利福尼亚在 1849 年淘金热开始时是美国的一部分，但金矿区的情况被恰当地描述为无政府状态。正如 Hirshleifer 所指出的，"官方法律机构无能为力"。""他认为，山区营地的地形条件，加上矿工为打击跳槽者而进行的有效治安组织，使得外来者团伙难以夺取金矿，尽管缺乏有效的执法。

换句话说，在某些条件下，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有价值的财产也能得到有效保护。

问题是 Hirshleifer 对达尔文 "自然经济 " 的自发秩序的动态的理论分析是否与信息时代的经济有关。我们怀疑它是。虽然我们并没有预料到普遍的无政府状态，或到处都是金矿的情况，但我们确实预料到世界体系中无政府关系的数量会增加。鉴于这种预期，Hirshleifer 关于 "两个或更多的无政府竞争者 " 可以 "在平衡中保留社会可用资源的可行份额 " 的条件的论点是有提示性的。

能 "在平衡中保留社会可用资源的可行份额 " 是有提示意义的！。16 特别是，他探讨了无政府状态何时容易 "分解 " 为暴政或统治等级，当无政府状态的各方可以被压倒性的权威所制服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些问题在信息时代可能比在工业时代更需要理解。关于无政府状态动态的精细区分在最近几个世纪没有那么关键，而在新的千年里可能是这样，部分原因正是因为现代时期，暴力的回报率在上升。这意味着，像民族国家在近几个世纪所做的那样，集结越来越大的军事力量，往往会带来决定性的战争。根据定义，决定性的战争通过将资源控制权的竞争者置于一个更强大的权力机构的统治之下而制服了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与军事技术方面的防御优势相对应的战斗中的下降的决定性，有助于无政府状态的动态稳定。因此，信息技术在降低军事行动的决定性方面的明显影响应该使小国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更加稳定，不容易被大国政府通过征服而取代。战斗的果断性降低也意味着战斗的减少，

这对信息时代的世界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推论。

## 盈利能力

无政府状态得以维持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生存能力或收入的充足性。缺乏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个人很可能会（1）投入大量的精力去战斗，以夺取足够的资源来生存，或者（2）向另一个竞争者屈服，以换取食物和养料。与此类似的事情发生在 1000 年转型期间封建主义的崛起。我们预计，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以前会依靠国家的转移支付，作为家臣与富人家庭联系。尽管如此，在霍布斯式的混战（或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中，仅仅是一些竞争者无法生存的事实并不确定。正如 Hirshleifer 所说，"在无政府状态下，仅仅是收入低的事实，.....本身并没有提供关于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的明确指示。"

## 资产的特性

无政府状态可持续性的另一个有趣的条件是，资源是 "可预测和可防御的"。在 Hirshleifer 的分析中，"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社会安排，其中竞争者为征服和捍卫持久的资源而斗争。"118

他将 "耐用资源 "定义为包括 "土地领土或可移动资本货物"。119

在信息时代，数字资源可能被证明是可预测的，但它们不会是 Hirshleifer 认为的那种具有领土性和无政府状态的 "可持续资源"。事实上，如果数字货币可以以光速

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转移，对网络银行所处领土的征服可能是浪费时间。希望压制主权个人的民族国家将不得不同时夺取世界上的银行天堂和数据天堂。即使如此，如果加密系统设计得当，民族国家也只能破坏或摧毁某些数字货币，而不是夺取它们。

结论是，在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富人最可预测和最脆弱的资产可能是他们的人身，换句话说，他们的生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担心未来几十年会出现卢迪特式的恐怖主义，其中一些可能是由民族国家雇佣的特务挑衅者暗中鼓励的。

然而，从长远来看，我们怀疑领先的民族国家能否成功地压制 "主权国家"。首先，现有的国家，尤其是资本贫乏地区的国家，会发现它们通过庇护 "主权个人 "比通过保持与北大西洋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维护 "国际 "体系的神圣性更有好处。破产的高税收福利国家想把 "他们的公民 "和 "他们的资本 "留在 "他们的国家"，这一事实将不会成为其他地方数百个四分五裂的主权国家所遵守的令人信服的动机。

我们这样说，尽管有数以千计的多国组织旨在制约世界各主权国家的行为。

毫无疑问，其中一些组织，如欧盟和世界银行，是有影响力的。但请记住，使主权  
251 的管辖范围

欢迎个人从他们的存在中获得巨大利益。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猪头大国，在当前的趋势下也必须大力防止美国政府控制之外

的网络经济的出现，最终也不会希望将全球那些拥有正数银行余额但不希望成为美国人的居民排除在外。这一点尤其有可能，因为购物现在是旅行者的主要魅力所在。最终，虽然比其他国家晚了很久，但由于竞争的压力，美国或其部分地区将加入主权商业化的行列。

## 需求创造供应

这些压力将在资产负债表最薄弱的民族国家早期更强烈地感受到。新的 "离岸 "中心将是当前民族国家的碎片和飞地，如加拿大和意大利，它们几乎肯定会在 21 世纪第一季度末之前解体。一个高质量、高成本效益的司法管辖区的全球市场的诞生将有助于这些司法管辖区的形成。正如在普通商业中，小规模的竞争者将更加灵活，更有能力进行竞争。人口稀少的司法管辖区可以更容易地构建自己的结构，有效地运作。

信息精英们将以合理的费用在合同上寻求高质量的保护。虽然这个费用远远低于现在结构的民族国家的全部人口（有几千万到几亿公民）重新分配一个明显的利益所需要的费用，但在一个人口只有几万或几十万的管辖区，这不是小事。少数极其富有的人的存在所带来的税收和其他经济优势，意味着人口较少而不是人口众多的司法管辖区的人均收益要高得多。

由于一个人在哪里注册企业实际上并不重要，除了在纯粹的负面意义上，一些地址将意味着比其他地址更高的责任，小的司法管辖区将发现更容易制定商业上成功的保护条款。

因此，人口少的司法管辖区在制定对主权个人有吸引力的财政政策方面将享有绝对优势。

我们相信，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但这并不是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人类情感的牵引，其吸引力会立即安静下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完全可以利用普遍的情感需求。我们都有过敬畏的经历，比如第一次看到巨大的瀑布，或者第一次站在大教堂的门口，都会有这种感觉。我们都有过归属感的体验，比如我们在家庭圣诞聚会上，或者作为某个运动项目的成功团队的成员，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人类文化要求对这两种强大的情感作出回应。我们被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所照亮，它本身就是人类大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因知道自己属于一个文化团体而感到安慰，这使我们有了参与感和认同感。

这些文化符号的影响可以产生最强烈的情感效果。美国人对国旗、国歌或感恩节的家宴的联想，英国人对君主制或板球的联想--都分别对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想象力产生了真正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重复得到加强，并深入到潜意识中。这样的符号有助于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并提醒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化。当反越战的示威者想要震撼美国其他地区时，他们烧毁了国旗。被疏远的英国人攻击君主制，甚至被称为在板球场上挖洞。

这些触发点是表面的，但并非不重要。它们是我们被教导要为之流血的关联。无论大政治条件如何变化，或由此产生的机构变化如何，它们在像我们一样在二十世纪成年的人的想象中可能仍然很重要。

## 第十章 民主的黄昏

"就历史而言，民主政治制度是最近的事情。它们曾在希腊和罗马短暂存在，之后在 18 世纪重新出现，距今不到 200 年。...

一个否定的循环现在可能又开始了。

""WILLIAM PFAFF

在政府的历史上，民主是相对罕见和短暂的，这不是什么秘密。在那些古代和现代的民主盛行的时代，它的成功取决于加强了军事力量和群众重要性的大政治条件。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在《武器系统与政治稳定》中探讨了这些特点。1.

廉价和广泛分散的武器装备。当购买有用武器的成本较低时，民主往往会蓬勃发展。

业余人员可以有效使用的武器。当任何人都能使用有效的武器而不需要延长训练时，民主就更有可能。

徒步参加战斗的人数众多的军事优势。

正如奎格利所指出的，"步兵占优势的时期是政治权力在社区内更广泛地分散的时期，民主有更好的机会取得胜利"。

这几乎是一份关于民主可以存在的条件的全面目录。如果是这样，民主就不会在二十世纪末成为一种胜利的制度。可以说，在工业时代的尾声，武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昂贵。而且许多最有效的武器肯定需



要专家才能有效使用。此外，美国、其盟国和伊拉克之间的海湾战争证明了大型步兵队伍是多么脆弱，即使是依偎在战壕和挖好的工事里。那么，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为什么民主在这些条件下显得很繁荣？

民主，共产主义的兄弟姐妹？

我们在第五章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解释，即民主作为共产主义的兄弟姐妹而繁荣，正是因为它有利于国家不受阻碍地控制资源。

这个结论对于工业时代的 "常识 "来说可能显得很愚蠢。我们不否认，在工业社会的条件下，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是截然相反的。但是，从大政治的角度来看，正如从信息时代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制度的共同点比你所怀疑的要多。

在武器装备极其昂贵的情况下，民主成为了使国家最大限度地控制资源的决策机制。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样，民主制度提供了巨额资金来资助大规模的军事机构。不同的是，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相比，民主福利国家将更多的资源掌握在国家手中。这说明了一些问题，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几乎对所有值得拥有的资产都提出了要求。

冷静地看，民主国家仅仅是一种资源收集机制，它比国家社会主义更有优势，是一种使国家致富的秘诀。正如我们前面解释的那样，由于民主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相适应，民主为军队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国家拥有一切的理论为前提的。相比之下，民主福利国家的初始要求更为有限。

它假装允许私人所有权，尽管是一种偶然的所有权，从而利用优越的激励机制来调动产出。西方的民主政府没有从一开始就管理不善，而是允许个人拥有财产和积累财富。只有在财富被创造出来之后，民主国家才会介入，对其中的一大部分征税。

"大"字应大写。例如，在 1996 年，美国的终身联邦税率为每美元 73 美分。对于通过分红获得收入的公司所有者来说，税率为每美元八十三美分。而对于那些想把钱留给或给孙子的人来说，联邦税率是每美元九十三美分。如果把州和地方税也考虑在内，各级民主政府没收了在美国赚取的每一美元中的绝大部分份额。掠夺性的税率使民主国家成为事实上的合作伙伴，在所有收入中占有四分之三到十分之九的份额。可以肯定的是，这与国家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但它是一种密切的关系。

民主国家生存的时间更长，因为它更灵活，与莫斯科或东柏林的资源相比，收集的资源数量更惊人。

"效率低下的地方"

我们曾将民主作为一个强大政府的决策规则的巨大政治优势描述为 "无效率，在它算得上是"。相较于 255

共产主义，福利国家确实是一个效率高得多的系统。但与香港这样一个真正的自由放任的飞地相比，福利国家是低效的。香港的增长率是惊人的，但其优越性恰恰在于，香港居民，而不是政府，能够将更快增长的 85% 的利益收入囊中。

当然，香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事实上，它是我们期望看到在信息时代蓬勃发展的那种管辖区的心理模式。在工业时代，香港没有必要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因为它不需要收集资源来支持一个强大的军事机构的令人不快的必要性。香港从外部受到保护，所以它可以维持一个真正的自由经济。

恰恰是这种掠夺资源的能力，使民主在工业时代的大政治条件下变得至高无上。

大众民主与工业主义齐头并进。正如阿尔文-托夫勒所说，大众民主 "是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分配、大规模消费、大规模教育、大规模媒体、大规模娱乐以及其他一切的政治表现 "4。

现在，信息技术正在取代大规模生产，预计大规模民主的黄昏也是合乎逻辑的。使大众民主在工业时代取得胜利的关键性的大政治需求已经消失了。因此，大众民主迟早会走向它的兄弟姐妹--共产主义的道路。

大众民主与信息时代不相容 稍加思考就会发现，信息时代的技术本质上不是一种大众技术。在军事方面，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它为 "智能武器 "和 "信息战争 "打开了潜力，其中 "逻辑炸弹 "可以破坏集中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信息技术不仅清楚地

指向由专家操作的武器的完善；它还降低了战争的决定性，改善了防御的相对地位。微观技术使个人军事力量的大幅提高成为可能，同时降低了大规模步兵编队的重要性。

最终，这意味着大众民主的终结，特别是其主要形式，即国会式或议会式的代议制错误政府。

## 虚报的大政治学

当大政治条件发生大的变化时，就像现在的变化一样，政府的组织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事实上，代议制政府的形式在传统上是原始权力分配的一个产物。这一点从代表是在地理基础上而不是以其他方式选择的事实本身就可以看出。

想一想吧。原则上，如果一个立法机构的成员是根据人口的任意划分来选择的，那么它也是一样的民主。

议会选区或国会选区可以以生日为基础，甚至可以按字母顺序划分选区。1月1日出生的人可以从256名候选人的名单中投票。1月2日出生的人可以从另一个名单中投票。或者每个名字以"Aa"到"Af"开头的人可以在一份候选人名单中选择。那些名字以"Ag"开头的人可以在另一份名单中选择。以此类推。

现在不存在这样的系统，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充分的理由是，在十八世纪，这种制度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但更重要的是，按生日或字母顺序划分的选区不会反映或甚至近似于当时投票所必须体现的原始权

力的分配。那些除了生日或名字的前几个字母有共同之处的人，过去和现在都很难被组织成任何一致的权力基础。

为什么地理横断面的计数更多？

投票确实是作为军事竞赛的代理开始的。所以它仍然存在，即使只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这种竞赛可以按照地理界线组织，更罕见的是按照亲属关系或宗教界线。

他们不能根据生日或名字的首字母来组织。

他们也不能按照职业有效地组织起来，除非职业被限制在世袭的行会中，如印度的种姓，或者像爱荷华州的农民那样在当地聚集。

目前代表制的全部意义在于，它们代表的是地理上的利益，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利益。

在历史上，军事成功的关键是控制领土。所有的军事威胁都是在当地形成的。

代表制的目的是为这种权力的表达提供一个不同的场所。他们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促进当地的既得利益，这是代表制的一个伪命题。地理上的选区促使代表们以牺牲一个国家所有居民的共同利益为代价，为特殊群体争取利益。

正如公共选择经济学家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选举结构形式或投票计算方式的微小变化，都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巨大且可预测的影响。这也是导致我们超越宪法，将目

光投向由特定环境中普遍存在的大政治因素决定的最终元宪法的考虑之一。

技术变革已经扫除了将投票权限制在地理选区内的一些基础。当现代代议制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出现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通讯都是本地的。大多数人的生死都在他们出生地的几英里范围内，他们的全部商业和通信都在当地进行。今天，全世界都有即时通讯。你可以和五千英里外的人做生意，几乎就像和邻居做生意一样容易。

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经济正在超越地理上的限制。

社会的流动性大大增强。

而信息时代的财富也是如此。与钢铁厂不同，计算机程序不能轻易地被当地的政治进程所挟持。当立法者决定对其征税或监管其所有者时，一家钢铁厂几乎无法被移动。一个计算机程序可以通过调制解调器以光速在世界任何地方传输。所有者可以收拾他的笔记本电脑，飞走。这也破坏了地理选区的大政治基础。

根据我们的分析，所有代议制民主制度的一个主要困难是，它们的地理选区必然会过度代表工业时代企业的既得利益。失败者 "或 "被遗弃者 "是完美的选民，在地理上集中，在政治上需要。工业民主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即使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工业时代的高潮中，来自新兴产业的 "赢家 "在立法审议中的代表人数也长期不足。<sup>6</sup> 政治家们倾向于代表现有的、成熟的竞争者，而不是可能出现的新企业或新企业的潜在客户，这可能是代议制政府的

一个固有特征。正如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所说，寿命长的行业往往会发展出更有效的 "分配联盟 "来游说和争夺政治战利品。<sup>7</sup> 当涉及到信息时代的经济时，这个问题就被放大了，无法估量。新经济中更有创造力的参与者在地理上是分散的。因此，他们不可能像苏格兰的鲑鱼渔民或萨斯喀彻温省的麦农那样，形成足够的集中，以获得立法者的关注。

事实上，新经济中的许多有活力的人物不太可能是最广泛的管辖区的公民。因此，他们在代议制民主国家的立法审议中几乎没有发言权。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考虑一下美国数学博士们为阻止外国数学家在美国工作所做的不光彩的努力。他们向国会提出的阻止雇主择优录用的仇外言论很有可能会被听从。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陈旧的地理代表权并不理会外国数学家，或任何其他非选民的繁荣的重要贡献者。

"为什么人们相信民主机构的合法性？回答这个问题几乎和解释人们为什么相信特定的宗教信条一样困难，因为就像宗教信仰一样，理解的程度、怀疑和信仰的程度在社会上和时间上有很大的不同。"<sup>9</sup>  
JUAN J. LINZ

很少有人开始协调一致地思考技术变革在破坏工业主义和改变收入分配方面的后果。

显然，如果在信息经济时代，收入的差异有多大，民主就不可能是合法的寄生主义的秘诀。更少有人注意到工业政府的一些机构与后工业社会的大政治之间隐含的不相容性。然而，无论这些 258 个矛盾是否被明确承认，它们的后果将随着世界各地政治失败的例子而变得越来越明显。现

代时期出现的政府机构反映了一个或多个世纪前的大政治状况。它们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城市工业化的过渡。但是，信息时代可能需要新的代表机制来避免长期的功能失调，甚至是苏联式的崩溃。

你可以预期，在许多国家，随着政治承诺被放空，政府的信贷和机构支持耗尽，会出现政府不善的危机。

最终，必须出现新的制度形式，能够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维护自由，同时使个人共同的利益得到表达和生命。

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在 20 世纪所知道的大众民主已经结束。问题是，什么将取代它？如果大众民主的唯一替代方案是个人对自己的命运没有发言权的独裁统治，那么人们可能会受到诱惑，加入新鲁德派的 "对未来的反抗"。然而，令人高兴的是，独裁并不是大众民主的唯一选择。我们相信，信息时代的技术将产生新的治理形式--就像农业革命和后来的工业时代带来它们自己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样。

这种新机构可能是什么？在某个地方，在某个管辖区，在末日来临之前的某个时候，有人会意识到计算机技术提供的潜力，使真正的代议制政府成为可能。竞选开支过大的问题和长期的政治竞选无疑是令人讨厌的，这些问题可以在瞬间得到解决。与其说是选举，不如说是完全随机地选出代表，他们的才能和观点很有可能与广大民众的观点相一致。

这只不过是古希腊抽签选拔制度的现代版本。正如斯塔维利 ( E. S. Staveley ) 在



他的权威历史《希腊和罗马的投票和选举》中详细介绍的那样，雅典的许多职位，从行政官到大主教，都是通过分类选择来代替选举的。10 一系列黑豆和白豆被用作随机计数器，以确定谁将被选为各种职位，以及 "确定议会中各部落轮流担任 *plytaneis* 的顺序"。11 这一想法的经典出处可能使其具有额外的可信度。但它的主要吸引力恰恰在于它可以避免政治中自我选择的弊端。从统计学上讲，它可以保证更少的律师和自大狂参与到公众事务中来。

立法机构可以由真正的代表组成。由于他们不会因为追求权力而聚集在一起，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被再次选中的机会都微乎其微，因此他们可以自由地处理政府事务，并在理性分析问题的基础上制定政策。

## 直属委员会

今天，一心想要优化选票的政治家们没有什么动力去连贯地分析问题。因此，与企业家、企业高管和运动队教练相比，他们在实际解决问题方面的记录是如此可怜，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是根据业绩来获得奖励的。以业绩为基础的立法者报酬不会使每个被随机选中的人都像李光耀一样有效。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立法者的薪酬与一些客观的绩效衡量标准挂钩，如税后人均收入的增长，那么绩效将得到极大的提高。根据他们的表现支付报酬，他们表现的机会就会增加一千倍。

扣除税收后提高实际收入的政策给社会带来的收益可能是巨大的。为什么不向总理和总统支付他们的政策所带来的收益的哪怕是很小的一部分呢？这种支付的资金可以通过一个小的、不显眼的税收来收集。

这样的安排将使社会摆脱它现在所面临的来自像理查德-尼克松和比尔-克林顿这样具有专门政治才能的野心家的威胁。

"他们给他带来了金银和衣服；但'基督'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穷人。当有人献上礼物时，他和他的女伴会匍匐在地，献上祈祷；但随后他又站起来，命令大家敬拜他。后来，他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带领他们穿越乡村，拦截和抢劫路上遇到的旅行者，但在这里，他的野心也不是变得富有，而是被崇拜。

他把所有的战利品都分给了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包括，人们可以假设，他自己的追随者"。12 诺曼-库恩

## 救世主的个性

人们很少注意到，选举政治诱使混乱的、救世主式的人物进入权力地位的事实。

这样的人是存在的，甚至在民主政治制度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中也经常对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回顾布列塔尼基督 Eudo de Stell、八世纪的 Adelbert、十一世纪的 Eon、安特卫普的 Tanchelm、Melchior Hoffman 和 Bernt Rothmann 及其同类人的职业生涯，有几点是非常突出的。他们的政治才能似乎越是立竿见影，他们所造成的损害似乎就越大。由于当时国家还没有参与组织广泛的系统性强制，这些早期的原政治家经常自作主张地进行抢劫和掠夺，以便获得现金分发给他们在穷人中的追随者。

## 行动中的原住民政治家

他们的滑稽故事给人的印象是不符合时代的人才，就像在篮球发明之前读到七英尺高的人在球场上跑来跑去。今天，由于NBA的出现，身高畸高的人通过运球和扣篮赚取了数百万美元。如果篮球消失了，他们将再次退缩到社会的缝隙中，可能主要作为马戏团的景点和杂耍出现。

在政治被发明之前，煽动者被吸引到农业世界所能提供的最接近政治的方式：巡回布道。他们在人群中大声疾呼，像政治家一样，雄辩地向那些愿意追随他们的人承诺更好的生活。当时和现在一样，穷人是煽动者的主要目标。

诺曼-科恩（Norman Cohn）关于千禧年运动的伟大历史《千年的追求》（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叙述了投票前众多弥赛亚领袖的职业生涯。从他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他与现代时期的魅力政治家在人格类型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此外，由于被这种神圣的精神所充满，末世的领袖拥有独特的创造奇迹的能力。他的军队将无一例外地取得胜利。他的存在将使地球产出庄稼，他的统治将是一个完美的和谐时代，这是旧的、腐败的世界所不知道的。

当然，这种形象纯粹是一种幻想，因为它与任何曾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人的真实性质和能力毫无关系。然而，这是一个可以投射到活人身上的形象；而且总有一些人非常愿意接受这样的投射，事实上，他们热切地希望被看作是无懈可击、创造奇迹的拯救者。...而他们所行使的优势的秘密从来都不在于他们的出生，也不在于他

们的教育，而总是在于他们的个性。当代关于这些穷人的弥赛亚的描述通常强调他们的口才、他们的指挥能力和他们的个人魅力。最重要的是，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即使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可能是有意识的冒名顶替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真的把自己看作是神的化身。..而这种完全的信念会很容易地传达给那些最渴望得到末世救主的人群。13

虽然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描述了那些经常扰乱中世纪社会的千禧年救世主，但它并不能完全体现出科恩的巨著的味道。在阅读整部作品时，我们不能不在这些预言家的滑稽行为中认识到现代蛊惑人心的特点：雄辩，261 "个人的磁性"，"救世主的伪装"，以及反复出现的被当作穷人的护民官来崇拜的愿望。

人们发现，中世纪社会对这些冒名顶替者的接纳与 20 世纪末民主制度所提供的接纳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在中世纪，这些人通常会被处决，而在 20 世纪末，现代民主政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合法夺取民族国家权力的公开渠道。一个经常将地球上最大、最致命的企业的控制权交给有魅力的煽动者之间的人气竞赛的赢家的制度，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受到影响。

付给领导做好工作的报酬

合理的选拔过程，再加上奖励积极领导的建设性激励结构，将把有能力的人带到政府的领导岗位上。它还将调动新型人才，否则他们通常不会对治理问题感兴趣。

如果能根据他们为社会实际取得的成果来支付报酬，就能吸引世界上最有才华的管理人员来管理摇摇欲坠的政府。

在任何一个领先的西方国家，一个能够大幅提高实际收入的领导人，其薪酬理应远远超过迈克尔-艾斯纳。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每个成功的政府首脑都将是一个千万富翁。

## 电子公投

另一个明显的替代代议制错误政府的方法是电子公民投票，公民，也许是通过防篡改排序选出的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可以直接对立法提案投票。计算机技术允许通过电子公民投票以民主的方式作出决定。全民公决可以很容易地与分配相结合，以缩小对特定问题的投票人数。

无论如何，从原则上讲，对于未来的选民来说，了解政治问题的难度远远小于试图揣摩政治家和评价这些政治家对相同问题的评价，更不用说知道这些政治家上任后究竟会做什么。

这一点尤其困难，因为政治家和他们的幕后操纵者正越来越熟练地包装和操纵他们呈现给公众的形象。

## 商业化的主权

我们期望看到有新的东西出现，以取代政治。虽然我们在上面提到的任何一种可能性都可能被尝试，并取得一些好处，但我们的期望不是政治将被改革或改进，而是

它将被淘汰，并且在大多数 262 个方面被放弃。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希望看到独裁统治，而是希望看到创业型政府--主权的商业化。

与独裁，甚至是民主不同，商业化的主权不会排除选择。它将为每个人提供更大的空间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于那些有才能利用它的人来说，商业化的主权将允许比以往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有更实际的决策和自决空间。

## 定制政府

为了避免这听起来像千禧年，考虑一下微技术的小型化和分解。它促进了定制化而不是大规模生产。你现在可以去商店购买蓝色牛仔裤，它将根据你的尺寸定制图案，并在半个地球之外缝制。当新的机构最终发展到适合信息时代的新的政治现实时，你将能够获得至少像蓝色牛仔裤一样满足你个人需求和品味的定制化治理。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批评了信息技术可以使公民成为顾客的想法。托夫勒说，我们错误地认为，“这是个太狭窄的模式。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外面有一个宗教和感情的世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合同关系”。由于我们前面探讨的原因，我们同意很难将“民族主义感情的世界”简化为“契约关系”。但这么说并不是说这是不可能的，更不是说这将是一个糟糕的安排。民族主义中少一点非理性的冲动，就能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

"进入、退出"和"声音"

当然，主权的商业化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显然甚至对阿尔文-托夫勒来说也是如此。但它的中心思想--经济的表达方式--在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人们的生活中是很常见的。在任何稍微自由的经济中，消费者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和产品来直接表达他们的欲望。或者通过撤回他们的习俗。当你对某一版本的产品或某一服务的提供者感到不满意时，你可以通过 "退出 "的方式直接表达你的不满。换句话说，你可以把你的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

在上一章中，我们分析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很快使你有可能在网络空间创造资产，而这些资产将完全不受民族国家掠夺性入侵的影响。这将创造一个事实上的元宪法要求，即在你支付他们的账单之前，政府实际上为你提供满意的服务。为什么？因为所得税将在事实上成为自愿的，就像它在理论上应该是的那样。

## 避免 "冗长的政治渠道"

实际上，如果信息技术如其所愿地发展，它将保证政府实际上被其客户所控制。作为一个客户，你首先会有几百种，然后是几千种选择，通过与一个民族国家签订私人税收条约，或者完全从民族国家叛逃到新兴的小主权国家，来直接减少你的保护成本。这些合同的 "进入 "和叛逃或 "退出 "选项是你作为一个客户的愿望的经济表达。用你的脚和你的钱投票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它能带来你所希望的结果。

你作为顾客的 "进入 "和退出选择与民主的政治表达方式相比如何？对某些产品或服务不满的人，特别是由政府提供的或受

政府严格监管的产品或服务，可以通过给美国总统写信，或在其他地方寻求与他们的国会议员或其他适当的民选官员会面来 "表达 "他们的意见。有时，这样的情书是有效的。但并不总是如此。通常不会。如果一开始没有成功，寻求用他们的 "声音 "来改变的人可以组织一次示威，在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甚至自己寻求选举职位。

政治性的表达方式确实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声明和演说的渠道。但它带来的缺点是，你很少能通过自己的行动获得满足或改善你的地位。当面对政府不合格的产品或服务时，你不得不继续为它买单，直到你能说服整个政治进程同意你的改变要求。

在西方国家，以及现在几乎在整个地球上，这已经意味着必须确保民主政治制度的多数支持。让多数人参与的要求在你和实现很可能是一个相对直接和理性的目标之间施加了巨大的交易成本。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讨论了经济而非政治表达方式的优点，以推进他的学校券建议。

家长们可以直接表达他们对学校的看法，把他们的孩子从一所学校送去另一所学校，其程度比现在要大得多。一般来说，他们现在只能通过改变居住地来采取这一步骤。

5 阿尔伯特-赫希曼 ( Albert O. Hirschman ) 以政治党人的身份发言，对弗里德曼倾向于 "以退出作为表达自己对一个组织的不利意见的'直接'方式 "表示异议。一个没有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人可能会天真地



认为，表达自己观点的直接方式就是表达自己的观点！"16 通过市场机制来表达你的意见，比如作为顾客提供或撤回你的支持，还是通过 "繁琐的政治渠道 "来表达你的意见更直接或更有效，这是一个 264 的问题。

作为提供或撤回你作为客户的支持，或通过 "繁琐的政治渠道"，是一个 264 个复杂和有争议的问题。不同的人将以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

对于那些主要参与政治表达是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要求利益的人来说，转向经济表达方式可能确实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替代品，而不是写信给政治家并要求更多。

经济表达和 "互惠的社会性"

对于那些打算让他们的伙伴参与 "互惠 "而不是 "胁迫 "或寄生的社会性的人来说，经济的表达方式开启了以较低的时间和麻烦成本获得更大满足的前景。尽管有赫斯菲尔德教授，这一点很容易证明。

任何一套经济表达方式，包括进入、持续的合同和退出，都可以转化为政治 "声音 "的表达，只需让众多的人参与决策。作为一个实验来试试吧。实验所需要的只是几百个觉得生活中的政治不够的人。

他们不会在一年的时间里将可支配收入用于数以千计的不连续的购买，而是将这众多的经济决定转化为少数的政治决定。

首先，所有人都同意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集中起来，然后放弃以个人为单位的购买。每个人都将得到一票或几票，这取决于要填补的职位的数量，而不是以成千上万的方式单独消费，。与其在任何时候直接花钱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不如在举行选举的少数场合花你的一票或几票，以选择代表，然后决定如何使用现在巨大的集体钱袋。

然后，你和其他人一起分享这些项目的消费，而且只有那些执政委员会以多数人的名义批准的项目。

这似乎是一个 "累赘的政治渠道 "的表达方式了吗？等着看吧。

这种模式拥有人们在国家层面的政治中发现的所有演说和说服的潜力。而大部分的潜力则是令人沮丧的。

例如，如果你喜欢新鲜的西兰花，而小组中的食物口味分布一般，你就有麻烦了。有可能你的小组中的一些人或大多数人更愿意把共同的食物津贴花在红肉上而不是新鲜蔬菜上。为了防止食堂委员会去仓库，把整个年度的蔬菜预算挥霍在罐头豌豆和玉米上，你可能不得不站出来，"表达 "你的观点。你可以提请小组注意，与红肉中更多的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相比，摄入更多的维生素和植物营养素（如西兰花中的莱菔素）是有好处的。

当然，在这种构建的政治模式中，如何让人们理解这一点或任何一点，对任何政治事业或候选人的倡导者来说，都是一个难题。你可以发表演讲，但这当然需要你需

要说服的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聚集在某个地方并准备听讲。你可以印制传单，前提是你的政治游戏规则允许这种 "265 活动支出"。你可以写信。但这两种方法都取决于其他参与者是否有足够的阅读能力。

"它描绘了这样一幅社会图景：绝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他们不具备在我们日益增长的技术社会和国际市场上谋生所需的技能。"里查德-雷利。

美国教育部长，在 "美国的成人扫盲 "中说

九千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如果你在这一模式的政治活动中的群体恰好是美国人，你将很难得到任何有说服力的信息，特别是如果该群体的成员与美国的整体选民相似的话。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大量公民成绩不佳，这种看法已被有史以来对美国成年人能力的最彻底调查所证实。这项名为 "美国成人识字率 "的研究表明，为任何政治论点找到一个识字的听众绝非易事。15 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很很大一部分，也许是大多数，缺乏评估观点和制定判断的基本技能。根据美国

教育部，9000 万美国人不能写一封信，不能理解公共汽车时间表，甚至不能用计算器做加减法。如果 9000 万美国人正在经历阿尔茨海默病的各个阶段，这大约就是你所期望的。三千万人被判定为非常无能，甚至不能回答问题。

因此，如果你的健康信息没有扭转潮流，否则就会找到自己的水平，那么你可以向动物权利活动家寻求帮助。也许你可以让他们在食堂委员会里纠察你的对手，或者在有影响力的成员家里大肆宣扬杀牛的罪恶。

这个例子可以无限延伸，这可能远远超过理性人的耐心所允许的时间。它清楚地表明：（1）任何进入或退出的经济表达都可以通过使其成为一个集体决定而转化为政治表达的声音；（2）集体决定，尽管它们提供了雄辩的邀请，但确实是累赘的，而且往往是难以解决的。

这正是经验所表明的。调动改变一个民主国家的进程所需的努力远非易事。重申一下，这很可能是民主福利国家在几个世纪以来与其他政府方法的竞争中幸存下来，并在工业时代结束时占主导地位的原因。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的运作使顾客难以控制政府或限制国家对资源的要求。

然而，由于国家在你的事务中的无限合作关系在信息时代将不再具有军事优势，聪明的人们将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获得政府实际提供的少数有价值的服务。实际的权力可能会从集体机制中被承包出去，而这些机制不再支付 266 美元的费用。我们希望看到效率优先于大规模的权力。正如尼尔-门罗（Neil Munro）简明扼要地指出的那样："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是计算机化的信息，而不是人力或大规模的生产，在一个为 500 人的世界里，它将赢得战争。

电视频道。计算机化的信息存在于网络空间--由计算机网络、卫星、调制解调器、数据库和公共互联网的无尽复制所创造的新维度"。17 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大规模的军队将没有什么意义。效率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正如我们在第 6 章和其他地方所探讨的那样，由于微技术在保护方面创造了一个新的维度，个人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创造和保护完全在任何个别政府的领土暴力垄断领域之外的资产。因此，这些资产将非常容易受到个人控制。对于你和大量其他未来的主权个人来说，"用你的脚投票"，选择离开主要的民族国家，与一个外围的民族国家或新的迷你主权国家签订个人保护合同，这将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将只收取商业上可以容忍的金额，而不是你净资产的大部分。简而言之，你可能会接受 5000 万美元来搬到百慕大。

## 先退出，后签约

对主权商业化的早期刺激将必须来自于通过退出来表达自己经济的人。这一选择在美国将是最困难的，但它也是最有价值的。比尔-克林顿总统和共和党国会强加给资本家的 "柏林墙 "与美国民族主义者在 1960 年代自信地表达的口号 "要么爱它，要么离开它 "相矛盾。通过对那些离开的人征收惩罚性税收，退出税的目的是迫使人们忠诚。然而，这种报复性的立法，让人联想到罗马帝国最后时期对逃离的财产所有者的惩罚，可能无意中为后来信息时代的更合理的政策设定了框架。

在某个时候，当有足够多的有能力的人离开并在海外积累了足够多的财富时，允许公民或绿卡持有者通过支付出境税但不出

境来买通他们未来的税收责任，对美国当局来说将变得有吸引力。

换句话说，退出税可以成为一次性买断的模式。征收退出税的政府将通过允许退出者根据私人条约的条款恢复居住而实现高得多的利益，就像目前在瑞士和其他地方所提供的那样。

美国或其他国家政府的这种举措将是合理的收入优化姿态。最终，保护服务的竞争将迫使税率下降，并将征税条件调整到更文明的标准。与其依赖立法机构制定可接受的税收制度，未来的主权个人将能够通过私人条约谈判出可接受的、定制的一揽子政策。

得罪了真正的信仰者

当然，我们丝毫不认为这其中的大部分会受到欢迎。

个人的非国家化和它所意味着的主权的商业化，将触犯剩余的 20 世纪政治陈词滥调的忠实信徒。

像已故的克里斯托弗-拉施一样，他们认为政治的萎缩是对大多数人福祉的威胁。在他们看来，工业时代政治的复兴，及其对收入再分配的承诺，可能是解决如此多的人在信息技术带来的竞争压力下所感受到的痛苦的一个办法。

E.J. Dionne, Jr., 是《华盛顿邮报》的一名政治记者。和拉什一样，他也在怀念着政治。他也为一种社会民主平权的冲动说

话，这种冲动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一定会找到更响亮的声音，因为信息时代的新的政治现实会更果断地破坏现代世界留下的机构。迪翁认为，20 世纪富裕地区广泛分享的生活水平的物质改善，主要归功于民主政治，而不是技术或经济发展。他的信息是，未来的希望需要扩大政治对信息时代技术的支配力：美国和整个民主世界的首要需求是重新参与民主改革，这是工业时代取得成功的政治引擎。信息时代的技术本身并不能构建一个成功的社会，就像工业主义任其自生自灭会使世界变得更好一样。...即使是技术上最非凡的突破和互联网最巧妙的应用，也不能把我们从社会崩溃、犯罪或不公正中拯救出来。

只有政治，也就是我们如何组织自己的艺术，甚至可以开始承担这种任务”。迪翁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没有理解，使二十世纪的生活特别有利于系统性强迫的条件并不是由任何人类机构选择的。“我们如何组织自己的艺术”是一个在现代时期之前不会被理解的说法。社会太复杂了，不能正确地认为是任何有意的自我组织的努力的结果。现代时期的民族国家是自发出现的，是工业技术提高暴力回报率的一个偶然的副产品。现在，信息技术正在减少暴力的回报。这使得政治变得不合时宜，无法挽回，无论人们多么希望把它保留到下一个千年。

"不是今天的，也不是昨天的，自始至终他们都活着，他们从哪里来的，没有人知道。"苏菲克勒斯，《安提戈涅》"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制造这些东西了"

对 "制定法律 "的热切渴望，似乎是二十世纪政治常识的一部分，但这绝不是所有文化的普遍现象。它在未来的消失可以被

看作是一个周期的一部分，这个周期随着几个世纪的发展而消退<sup>268</sup>。例如，早期希腊人等人认为，法律是不能被制定的。用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话说，希腊人认为“不成文的法律”，即正义的法律，在时间上没有开始。“像其他前政治民族一样，他们认为没有人能够改进不是由任何人力创造的自然的、几何的”正义法则。

他们不相信有一个“法律赋予者”。正如卡西尔所说：“我们要通过理性的思考来寻找道德行为的标准，只有理性，而且只有理性才能赋予它们权威”。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试图通过立法将法律强加给社会的行为，都如同试图通过立法改变几何。

## 立法是一种亵渎

出于非常不同的原因，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制定法律”的类似抵制都很普遍。正如 John B. Morrall 所写，“对德国人来说，法律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东西”。它是部落个人成员“权利的保障”。<sup>20</sup>国王和议会还没有打算制定新的法律。从中世纪早期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意图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半亵渎的，因为法律和王权一样，拥有自己神圣的光环。相反，国王和议员们认为自己只是在解释或澄清已经存在的完整法律体系的真正含义。

日耳曼人的习俗给中世纪的人们带来了一种永远无法忘记的观念，即使在实践中它的表现并非如此。这种想法是，好的法律会被重新发现或重述，但永远不会被重新制定。<sup>21</sup> 在二十世纪立法的过度之后，这种古老的态度有一些古怪。把国家的强制力用于私人目的的愿望，特别是收入的再分配，几乎成为第二天性。



## 遗憾

因此，难怪在政治的最后日子里会有悲歌。它们是完全可以预测的。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大多数思想家对大政治的必要性的盲目性。很少有政治记者像迪翁一样，准备接受政治的明显萎缩和消亡，而这样做可能会让他们回到犯罪的行列。在中世纪末，支持复兴骑士精神的呼声高涨。请看 *Ii Libro del Cortegiano*，或称《廷臣之书》，由 Baldassare Castiglione 伯爵于 1514 年撰写，1528 年在威尼斯由 Aldus 出版。

卡斯蒂利奥内对恢复骑士精神美德的渴望是深入人心的，但对一种已经消失的生活方式的渴望不可能使它在十六世纪回归。在二十一世纪，也不会如此。

正如我们在解释我们的大政治理论时试图表达的那样，技术要求，而不是民意，是变革的最重要来源。

如果我们的大政治理论是有效的，那么具有 269 个公民身份概念和围绕国家组织的政治的现代时代之所以取代了封建制度和围绕个人誓言和关系组织的骑士精神，并不是思想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成本和利益的转变。骑士精神的消亡并不是因为卡斯蒂利奥内或其他人未能说服对此事有任何控制权的无利害关系的民众，在国家事务中不需要荣誉或道德。恰恰相反，卡斯蒂利奥内的《法庭》对王子和与他同时代的尼科洛-马基雅弗利在他的《王子》（*Il Principe*）中赞扬的那种行为进行了批评。但那又怎样呢？马基雅弗利最终通过他的书获得了更多的读者，这并不是因

为他在《王子》中的论点更有说服力，而是因为他的建议更适合现代的大政治条件。

正如二十世纪杰出的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讨论 "马基雅弗利的道德问题 "时所说的那样

该书以完全漠不关心的态度描述了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的方式和方法。关于如何正确使用这种权力，书中只字未提……。没有人怀疑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政治生活充满了犯罪、背叛和重罪。但在马基雅弗利之前，没有一个思想家致力于教授这些罪行的艺术。这些事情已经做了，但它们没有被传授。马基雅弗利承诺成为工艺、背信弃义和残忍的艺术的老师，这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22

简而言之，《王子》是一部激进的作品，它阐述了一个现代配方，有抱负的统治者可以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成功地推动自己的事业发展。马基雅弗利认可的行为被证明很适合权力时代的政治性质。但是，作为现代政治家的精明政策，双重间谍的艺术在前几个世纪形成的骑士精神文化方面是离谱的、颠覆性的。

正如我们前面所探讨的，骑士精神的美德包括强调对誓言的极端忠诚。在一个以个人服务换取保护的社会中，这是一种必要。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交易并不是这样的，它们会在人们中自发地重新出现，以确定他们在胁迫条件下的最佳利益所在。因此，作为骑士精神基础的封建承诺必须要有强烈的荣誉感。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比马基雅弗利的建议更具颠覆性了，他认为王子应该毫不犹豫地撒谎、欺骗和偷窃，只要这样做符合他的利益。

随着二十世纪的结束，马基雅弗利的论点仍在被研究，以了解现代政治和各种二十世纪的犯罪和暴政的重要性。

相比之下，卡斯蒂利奥内的作品几乎被遗忘。一年后，《Il Libro del Cortegiano》可能会被少数几个研究生级别的文学学生和一些礼仪史鉴赏家从头到尾读完。

在未来几十年的某个时候，信息时代的新大政治将使《王子》过时。有主权的个人将需要一个新的成功秘诀，这个秘诀将高度强调在国家控制之外部署 270 个资源的荣誉和正直。我们可以预测，E.J. Dionne, Jr.和其他活着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会高兴地阅读这样的建议。

## 客户制定的政策

这在转型初期尤其如此，当时大多数司法管辖区仍然需要制定政策，而这些政策的倡导者可以吸引大多数人的同意。后来，随着民主的消逝和主权服务市场的深化，制约 "政策 "的市场条件将被更广泛地理解。

我们现在认为的 "政治 "领导力，总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设想的，将变得越来越具有企业家精神，而不是政治性质。在这种情况下，为一个司法管辖区制定 "政策 "制度的可行选择范围将被有效地缩小，就像企业家在设计一流的度假酒店或任何类似的产品或服务时，其选择范围是由人们愿意支付的东西所决定的一样。例如，一家度假酒店很少会试图以要求客人从事苦力来维修和扩展其设施的条件来经营。

即使是由员工拥有或控制的度假酒店，就像典型的现代民主制度一样，试图强迫顾客遵守这样的要求也是徒劳的，尤其是在有了更好的住宿条件之后。如果顾客宁愿打高尔夫球也不愿在烈日下从事繁重的劳动，那么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市场提供的任意选择的空间很小。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的 "政治 "问题将退居二线，成为企业的判断，因为管辖区寻求发现什么样的政策捆绑能够吸引顾客。

## 政治的萎缩

随着这一点被理解，人们的态度将发生巨大变化。

权力下放地区的民众将不再期望从 20 世纪政治辩论中所涉及的那种满足愿望的政策选择中进行选择。由于收入能力比工业时代更加倾斜，司法管辖区将倾向于满足那些业务最有价值的客户的需求，而这些客户对授予业务的地点有最大的选择权。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司法管辖区来说，商业上最理想的政策是否会吸引焦点小组中的 "中位选民"，可能比我们习惯的假设要少得多。

简而言之，主权的商业化将促进客户对政府的控制。这将使非顾客的意见变得无关紧要，或不那么相关，就像吃巨无霸的人对鹅肝的意见与三星级法国餐厅（如巴黎的 L'Arpege）的成功无关。

## "对民主的背叛"

就像已故的克里斯托弗-拉什

( Christopher Lasch ) 一样，反对者不仅会抱怨信息技术破坏了工作；他们还会抱怨信息技术否定了民主，因为它允许个人将其资源置于政治强制力的范围之外。由于这个原因，新千年的反动派将发现信息技术所促进的金融隐私特别具有威胁性。

他们会对所得税和资本税真正取决于 "自愿遵守 "的前景感到退缩。他们将支持以新的甚至是激烈的手段从任何看似富裕的人身上榨取资源，如 "推定征税 "和直接对富人进行勒索。

## 社区财产

在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暗示已经接近表面。早期的证据表明，政府控制国际市场的能力正在逐渐消失，这触怒了那些认为个人理所当然是民族国家资产的人。他们想加强自己的能力，把一个国家的公民当作资产，而不是顾客。反动派认为，所有的收入都应该被视为社会的收入，也就是说，应该由国家来支配。<sup>23</sup> 我们已经讨论过拉施在《精英的反叛与民主的背叛》中提出的论点。但他并不是唯一支持民族国家的论调。哈佛大学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桑德尔 ( Michael Sandel ) 在《不满中的民主》 ( Democracy in Discontent ) 一书中认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控制全球经济力量的政治，今天的民主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这种控制，人们投票给谁并不重要，公司会统治。"<sup>24</sup> 换句话说，国家必须保留其对个人的寄生权力，以确保政治结果能够与市场结果相背离。否则的话，迫使非经济结果的集体决定将毫无意义。

在我们看来，桑德尔的感叹和拉什的感叹一样，也不过是对了一半。我们承认，如果政府缺乏迫使个人按照政治家的要求行事的权力，民主将失去其大部分的重要性。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民主注定要消失。

但桑德尔忽略了市场战胜强制力的真正重要性。他把 "公司统治 "作为民族国家崩溃后的一种危险来援引，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公司将很难在新的全球经济中统治市场。事实上，正如我们所建议的，公司甚至将继续以其熟悉的现代形式存在，这一点远非显而易见。远非如此。在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而发生的巨大政治革命中，企业几乎必然会被改造。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微处理将改变 "信息成本"，这些成本有助于决定界定公司的 "合同关系"。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C-詹森 ( Michael C. Jensen ) 和威廉-H-梅克林 ( William H. Meckling ) 所说，公司只是一种法律形式，为 "个人之间的一系列契约关系提供了一个纽带"。25 公司是否能够生存，更不用说作为 "一个不受市场力量影响的官僚指导领域 "的 "统治"，用经济学家路易斯-普特曼 ( Louis Putterman ) 和兰德尔-克罗斯 ( Randall S. Kroszncr ) 的话说，可能是由 "市场力量的完整性和市场力量渗透到企业内部关系的能力 "决定的。26 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证的，企业能否在市场力量日益渗透到迄今为止的 "企业内部关系 "中生存下来，是值得怀疑的。因此，企业将趋于解体，因为信息技术使得依靠价格机制和拍卖市场来承担需要完成的任务，而不是让它们在正式的组织中内部化，会有更多的回报。

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使生产过程自动化，它将夺走公司的部分理由，即需要雇用和激励管理人员来监督个别工人。

"为什么会有公司？"

请记住，"为什么会有公司？"这个问题并不像偶然观察到的那样微不足道。微观经济学通常假设，价格机制是协调资源用于其最有价值的用途的最有效手段。正如 Putterman 和 Kroszner 所观察到的，这往往意味着像公司这样的组织没有内在的 "经济理由" <sup>27</sup>。在这个意义上，公司主要是信息和交易成本的人工制品，而信息技术往往会大大降低这些成本。

因此，信息时代将倾向于成为没有 "工作" 的独立承包商与长期的 "公司" 的时代。由于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使个人能够摆脱政治家统治的过程也将防止 "公司统治"。公司将与来自全球各地的 "虚拟公司" 竞争，其程度将干扰和威胁到除少数人之外的所有人。随着市场变得更加完善，大多数公司作为机构，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将是幸运的。

可以预期的后果不是个人将受公司的摆布。恰恰相反。公司本身不会比政治家有更多的权力来操纵市场。相反，个人将最终自由地在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中决定自己的命运，既不受大政府的统治，也不受公司等级制度的约束。

这种交易成本的侵蚀也将使最近流行的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的概念成为谎言。英国工党的托尼-布莱尔以及比尔-克林顿的一些随从都很喜欢这种观念，它们的前

提是国家有能力操纵公司。社会主义已经崩溃，干预主义者现在梦想着通过更有市场效率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对公司进行严格的监管。这种新的再分配理论认为，管理层、股东、雇员和 "社区 " 都是公司的 "利益相关者"。其论点是，他们都从长期存在的公司中获得了利益，甚至依赖于这些利益。因此，监管应该保护管理者、雇员和地方税收部门在继续保持他们与企业的历史关系方面的利益。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是一种学说，最终不仅预设了国家操纵公司决策的能力，而且更多的是预设了公司作为能够独立于拍卖市场的价格信号而运作的长期组织的存在，273。

我们怀疑，市场的深化不仅会削弱民族国家的征税能力，也会削弱政治家通过监管将他们的意志任意强加给资源所有者的能力。在一个管辖权优势将受到市场检验的世界里，许多地方市场将向任何地方的竞争开放，很难预期地方 "社区 "将有许多有效的方法将受青睐的公司与全球竞争压力隔离开。因此，他们将很少有办法保证那些负担较高成本的公司（例如，保留不必要的雇员和管理人员，并保持不需要的设施开放，以适应当地的政治压力）将能够抵消这些成本并保持业务。在工业时代，政治家可以关闭市场，限制少数受青睐的公司进入，以满足就业和其他目标。在未来，当信息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自由交易时，政府使当地企业免受全球竞争压力的权力将变得微乎其微。

28 杰里米-里特金 ( Jeremy Ritkin ) 设想 "在政府和第三部门之间建立一种新的伙伴关系，以重建社会经济"。...为穷人提供食物，提供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教育



国家的年轻人，建设可负担得起的住房和保护环境”。29

## 公共产品的消亡

当然，胁迫的辩护人会争辩说，国家权力的减弱将导致无法采购或享受公共物品。由于竞争和其他原因，这是不可能的。首先，随着地点优势因技术而消散，不能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如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司法机构将迅速失去客户。在最极端的失败中，例如在索马里、利比里亚、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已经证明的那些失败，成群结队、身无分文的难民可能会跨越边界，寻求更令人满意的法律和秩序的提供。但是，这些抛弃或用脚投票的极端例子，只因其紧迫性与直接的管辖权选择不同。

在任何情况下，企业都会迫使地方司法机构满足其客户的需求。

## "竞争性领土俱乐部"

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正如经济学家 Charles Tiebout 在 1956 年首次阐述的那样。正如经济学家 Fred Foldvary 在《社会服务的市场提供》一书中所说，社会服务和许多公共产品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提供，这没有什么本质的原因。

Foldvary 的例子也证实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Ronald Coase 有争议的定理，即 "不需要政府干预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如污染问题。31 企业家可以通过市场手段提供集体产品，现在很多人已经在现实世界的社区中这样做了。

Foldvary 的案例研究表明，社区的私有化如何能带来提供和资助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新机制。

## 繁荣之路

微观技术本身将促进新的融资手段，并对以往被视为公共物品的物品的提供进行管理。

回过头来看，其中一些货物将被证明是变相的私人货物。高速公路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只要拥堵是个小问题，道路和公路就可以被当作公共产品来对待，尽管会受到亚当-斯密的批评，即它们使住在附近的人不成比例地受益，而偏远地区的人则被拖着为它们付钱，却几乎享受不到任何好处。

在信息时代，征收通行费，包括拥堵费，在不中断交通流量的情况下为使用高速公路、跑道和其他基础设施准确定价，在技术上将是可行的。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提供可以谨慎地私有化，并由使用该服务的人直接提供资金。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估计，美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市场定价将使美国的 GDP 每年增加 600 亿至 1000 亿美元，同时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并减少污染。

此外，不应忘记，现代民族国家所做的最昂贵的部分--重新分配收入--根本不是提供公共产品，而是以公共费用提供私人产品。这里的 "公共开支" 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即 "以纳税人为代价"。那么真正的公共产品呢，比如提供一支能够阻止大国

进攻的军队？这样一支部队历来都很昂贵。显然，正如我们已经探讨过的，一个缺乏不受约束地没收其公民收入和财产的能力的政府，将无法为参与另一场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大国冲突提供资金。

然而，这种财政限制构成的威胁没有反动派所假装的那么大，原因很简单，不会再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冲突。解放个人的技术本身就能证明这一点。

从政治上来

与其把这种服务的质量和性质留给政治的摆布，"政府"可以以企业的方式运行，并转化为 Foldvary 所描述的 "竞争性领土俱乐部"。我们怀疑，最终，组织这种 "有竞争力的领土俱乐部" 的决策过程，将比它们在满足市场绩效测试方面的成功意义小得多。

今天，很少有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或服务时关心销售该公司的公司是独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还是由养老金计划提名的外部董事控制的公司。同样，我们怀疑在信息时代，理性的主权服务消费者会关心新加坡是一个大众民主国家还是李光耀的独资企业。

## 第十一章

信息时代 "自然经济" 中的道德与犯罪

"腐败.....比以前想象的要广泛和普遍得多。腐败的证据无处不在，在发展中国家如此，在工业国家也是如此，而且越来越

频繁。...著名的政治人物，包括各国总统和部长，都被指控腐败。...在某种程度上，这代表了国家的私有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权力不是像私有化通常意味着的那样转移到市场上，而是转移到政府官员和官僚身上。"VIRO TANZI 我们相信，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分解，后世的野蛮人将越来越多地在幕后行使真正的权力。像俄罗斯黑手党这样的团体在前苏联剔骨，其他民族犯罪团伙、名流、毒枭和叛逆的秘密机构将越来越成为自己的法律。他们已经是这样了。现代野蛮人已经渗透到民族国家的形式中，而没有极大地改变它的外观，这一点远比人们广泛理解的要多。他们是以垂死的系统为食的微型寄生虫。与战争中的国家一样暴力和不择手段，这些团体在较小的范围内使用国家的技术。他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权力是政治缩减的一部分。

微处理减少了团体必须达到的规模，以便有效地使用和控制暴力。随着这场技术革命的展开，掠夺性暴力将越来越多地在中央控制之外组织起来。遏制暴力的努力也将以更多地取决于效率而不是权力大小的方式进行。

随着世界的变化，民族国家内部秘密犯罪活动和腐败的激增将构成一个重要的副情节。

你将看到的可能是一部糟糕的电影《人体入侵》的隐蔽和险恶的版本。在大多数民族国家明显崩溃之前，他们将被后世的野蛮人所支配。就像 20 世纪 50 年代那部著名的 B 级电影一样，他们往往是伪装成野蛮人的。这部电影

然而，未来的 "花苞人 "不是来自太空的外星人，而是来自不同派别的罪犯，他们在担任官方职务的同时，至少部分效忠于宪法秩序之外。

一个时代的结束通常是一个激烈的腐败时期。随着旧制度的束缚解体，社会风气也随之解体，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身居高位的人可能将公共目的与私人犯罪活动相结合。

不幸的是，你将无法依靠正常的信息渠道来让你准确和及时地了解民族国家的衰败。

掩盖罗马帝国灭亡的那种 "持续的虚构 "可能是大型政治实体分解的一个典型特征。现在，它掩盖了民族国家的崩溃，也掩盖了民族国家的崩溃。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总是依靠新闻媒体来告诉你真相。许多人是保守的，因为他们代表过去的政党。有些人被对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承诺所蒙蔽。有些人会因为更具体的原因而害怕揭露腐败，而这种腐败可能会在一个腐朽的系统中越来越大。一些人将缺乏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身体勇气。其他人会担心自己的工作，或害怕因说话而受到其他报复。当然，也没有理由怀疑记者和编辑比建筑检查员或意大利铺路承包商更容易受到腐败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那些看起来热衷于报道任何事情的重要信息机构，可能会被证明没有通常所认为的那么可靠的信息来源。许多人有其他的动机，包括为一个摇摇欲坠的系统提供支持，他们会把这些动机放在诚实地告诉你之前。他们会看得很少，解释得更少。

## 超越现实

随着人工现实和计算机游戏技术的不断改进，你甚至能够订购一份模拟你想听的新闻的夜间新闻报道。想看一个显示自己是奥运会十项全能冠军的报道吗？没问题。这可能是明天的头条新闻。你会看到任何你想要的故事，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在你的电视/电脑上展开，比 NBC 或 BBC 现在能做的任何事情都更真实。

我们正在迅速进入这样一个世界：信息将完全摆脱现实的束缚，就像人类的智慧所能做到的那样。当然，这将对你收到的信息的质量和特性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一个人造现实的世界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即时传送的，判断的完整性和区分真假的能力将更加重要。

但这与我们目前的情况相比，其变化将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小。由于被技术放大的原因，真与假之间的区别通常是模糊的。

我们这样说是认识到，信息革命的许多后果都是解放性的。

技术已经开始超越地理上的距离和政治上的统治。政府可以建立壁垒来阻碍货物贸易，但他们在阻止信息传输方面能做的要少得多。在香港的任何一家餐馆，几乎每一个食客都通过手机与整个地球相连。1991 年 8 月，莫斯科的强硬派 278 号政变策划者无法关闭叶利钦的通信，因为他有移动电话。

更多信息，更少理解

随着信息传输的障碍减少，信息的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是好事。但是，对于信息的意义，也有更多的困惑。现代技术有助于将信息从政治控制和时间、地点的障碍中解放出来，也往往会提高老式判断的价值。

那种有助于从堆积如山的事实和幻想中分辨出什么是重要和真实的洞察力，几乎每天都在增长。这是真的，至少有三个原因。  
1.1. 现在的信息过剩，使人们对简洁的信息更加重视。

简洁性导致了缩写。缩写会遗漏不熟悉的内容。当你有许多事实需要消化，有许多电话需要回访时，自然希望使每个信息处理事件尽可能地简洁。不幸的是，简略的信息往往为理解提供了一个糟糕的基础。历史上更深层、更丰富的纹理恰恰是那些往往在 25 秒的声音片段中被编辑掉的部分，以及在 CNN 上被曲解的部分。传达一个已经被理解的主题的变体的信息比探索一个新的理解模式要容易得多。你可以报道一个棒球或板球的比分，而不是解释棒球或板球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它意味着什么。

最近一项伪装成民意调查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个别职业群体的成员几乎一致不愿意接受任何意味着他们收入损失的结论，无论支持这一结论的逻辑多么严密。

鉴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关于大多数专业化职业群体的解释信息大多是为了迎合这些群体本身的利益。他们对那些可能不礼貌、无利可图或政治上不正确的观点没有兴趣。这种普遍趋势的最好例子莫过于暗示投资股市前景光明的观点的广泛鼓吹。

这些信息大部分是由经纪公司产生的，很少有经纪公司会告诉你股票被高估了。他们的收入来自于交易业务，而交易业务取决于大多数客户是否准备购买。很少听到独立的、相反的声音。

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信息时代还没有成为理解时代。相反，公共讨论的严谨性急剧下降。现在的世界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知道得更多。但几乎没有公众的声音来评估事件的意义，说什么是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报道美国政府高层耸人听闻的腐败暗示兴趣不大的原因，特别是在美国媒体。

我们在本书中纠结的一个核心主题是，不断变化的技术和其他 "大政治 "因素如何改变 "自然经济"。自然经济 "是达尔文的 "自然状态"，其结果是由物理力量决定的，有时是不公平的。在 "自然经济 "中，一个重要的行为链就是生物学家所说的 "干扰竞争"。

## 干扰竞争

正如 Jack Hirshleifer 所说的，"干扰竞争者"，"通过直接打击或阻碍对手来获得和保持对资源的控制。"<sup>2</sup> 无论我们多么希望人类行为总是受制于法律规则和 "其他社会强制的游戏规则"（"政治经济学"），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许多人只有在适合他们的时候才 "按规则办事"。冲突问题的权威 Hirshleifer 是这样说的。["犯罪、战争和政治的持续存在告诉我们，实际的人类事务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经济的潜在压力。"<sup>3</sup> 换句话说，经济结果只是部分地由教科书中描述的经济人的和平



和守法行为决定，他们尊重产权，"不会简单地拿走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正如经济学家 Hirshleifer 所指出的，"即使在法律和政府之下，理性的、自利的个人也会在获取资源的合法和非法手段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是生产和交换，另一方面是盗窃、欺诈和敲诈。"5

## 信息时代的打劫

Michelle R. Garfinkel 和 Stergios

Skaperdas 在一本关于暴力、犯罪和政治的有用书籍《冲突和占有的政治经济学》中探讨了这一点。"个人和团体既可以生产并因此创造财富，也可以攫取他人创造的财富"。6 他们引用了《经济学家》最初报道的一个现代干扰竞争的故事。"一位美国商人，最近到达莫斯科开设办事处，在他的旅馆里，有五个人带着金表、手枪和他公司净资产的打印件来见他。他们要求得到未来收入的 7%。他坐上了前往纽约的第一班飞机，那里的抢劫者没有那么老练"。7 这个关于信息时代抢劫的故事更多的是归功于新技术，而不是俄罗斯的暴徒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受害者的财务资料和信用报告这一简单事实。

## 军事力量的决定性下降

不管是好是坏，通过使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不再具有决定性，信息技术从根本上降低了民族国家在一个不守规矩的世界上强加其权威的能力。如果像伏尔泰说的那样，"上帝曾经站在更大的阵营一边"，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大量暴力回报的神的支持似乎越来越少。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更多的证据表明暴力的回报在减少--这强烈地意味着像民族国家这样

的大型集团将不再有理由证明其巨大的管理成本。

中央集权的决定性下降的最明显证据是恐怖主义的崛起。九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发生的引人注目的爆炸事件表明，即使是世界上的军事超级大国也不能免于攻击。

暴力回报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黑帮和有组织犯罪在世界范围内的增长，以及其必然结果--政治裙带关系和腐败。它们反映了一种普遍的非道德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国家可以强制但不能保护。随着国家对暴力的垄断逐渐消失，新的竞争者也开始出现，比如那些试图对莫斯科的美国商人征收自己的私人税的恶霸。

小团体、部落、黑社会、帮派、黑手党、民兵，甚至是孤独的个人，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军事效力。他们在下一个千年的 "自然经济 "中行使的实际权力将远远超过他们在 20 世纪的表现。采用微芯片的武器已经倾向于将权力的天平转向防御，使决定性的侵略不那么有利可图，因此也不那么可能。

例如，像 "毒刺 "导弹这样的智能武器，有效地抵消了大国、富国以前在部署昂贵的空中力量来攻击较贫穷、较小的团体方面所享有的大部分优势。

## 未来的信息战争

迫在眉睫的是被广泛讨论但很少被理解的 "信息战争 "的可能性。它还指出了暴力的回报率正在减少。"逻辑炸弹 "可以使空中交通控制系统、铁路开关机制、发电

机和配电网、水和污水处理系统、电话中继器，甚至军队自己的通信系统失效或遭到破坏。随着社会越来越依赖计算机化的控制，"逻辑炸弹"的破坏力几乎与物理爆炸一样大。

与传统炸弹不同，"逻辑炸弹"可以远程引爆，不仅可以由敌对政府引爆，还可以由自由职业的计算机程序员团体引爆，甚至有才华的个人黑客引爆。请注意，一名阿根廷少年因多次入侵五角大楼的电脑而于 1996 年被捕。虽然迄今为止，黑客还没有倾向于以破坏性的方式篡改计算机控制的系统，但这并不是因为有真正有效的方法来阻止他们。

当信息战争时代最终到来时，其对手不太可能只是政府。像微软这样的公司肯定比世界上 90% 的民族国家更有能力进行信息战争。

## 主权个人的时代

这也是我们将本书命名为《有主权的个人》的部分原因。随着战争规模的缩小，防御和保护将在更小的范围内进行。因此，它们将越来越多地成为私人而非公共物品，由私人承包商以营利为基础提供。这在北美警察的私有化过程中已经很明显了。在美国，增长较快的职业之一是 "保安"。预测表明，到 2005 年，私人保安的数量将比 1990 年的水平增加 24% 至 40%。然而，正如英爱大师哈米什-麦克雷（Hamish McRae）所指出的，这几乎不是政府刻意决定的结果。他在《2020 年的世界》中写道。没有政府做出具体的决定，不参与一些警务工作，也没有任何政府参与其中；私人部门已经参与其中。部

分原因是人们认为警察的失败，部分原因是社会的其他变化，私人保安公司已经逐渐接管了保护办公室或购物中心内普通平民的大部分工作。正如洛杉矶的门控社区所显示的那样，人们甚至正在向中世纪的城市概念迈进，在那里，市民们生活在由卫兵巡逻的城墙后面，只有在受控制的大门才能进入。

我们认为，这只是二十世纪政府所承担的几乎所有职能的更全面的私有化的一个预兆。由于信息技术已经削弱了中央集权机构为大规模运作的系统投射权力和提供实体安全的能力，"自然经济"中几乎每一个企业的最佳规模都在下降。

为了应对这种技术变化，需要大量的投资要求（读作机会），重新设计具有分布式而非集中式能力的脆弱系统。如果不消除大规模的漏洞，保留这些漏洞的系统将面临灾难性的失败。

大型官僚机构和公司提供的服务和产品迟早会演变为高度竞争的市场，不是由"总部"管理，而是通过一个分布式的、分散的网络来管理。

拥有可以被纠察队包围或被恐怖分子破坏的总部的公司将是脆弱的，直到它最终成为一个没有地点的"虚拟公司"，"同时居住在许多地方"，正如《连线》杂志的执行编辑凯文·凯利在《失控》中写道："凯利明白，282 技术已经改变了将生产流程置于集中控制之下的必要性。"在工业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严重的财富是通过将流程置于一个屋檐下而获得的。规模越大，效率越高"。现在不是了。

凯利预见到，未来的汽车，即 "新贵汽车"，可以由少数几个人在一个虚拟公司中合作设计并投入生产。

在未来，过度的规模可能不仅会产生反作用，而且很危险。

较大的企业是更诱人的目标。正如地下经济的从业者所证明的那样，避税的秘诀之一是避免被发现。对于小规模的公司来说，这要比在摩天大楼的总部里经营的老牌公司容易得多。他们必然更容易受到 "带着金表、手枪和公司净资产打印件的人" 的关注，这些黑帮分子将在全球其他地方像在俄罗斯一样强加他们自己的私人品牌税收。

所有规模的企业都将容易受到有组织犯罪团伙的犯罪洗劫和强加的影响。

## 自然界憎恨垄断

随着 "大营" 对暴力的垄断被打破，可以预见的第一个结果是有组织犯罪的日益繁荣。有组织犯罪毕竟为民族国家提供了为掠夺目的使用暴力的主要竞争。尽管这样说不礼貌的，但不应该忘记，正如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提醒我们的那样，政府本身--"具有合法性优势的典型保护伞"--有资格成为我们最大的有组织犯罪的例子。

"2 如果你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只知道一个重要的垄断正在瓦解，那么你可以做出的一个最简单和最肯定的预测是，其最近的竞争对手将受益最大。因此，毒品卡特尔、帮派、黑手党和各种类型的三合会在世界各地激增，这不是巧合。

## 潜能系统

从俄罗斯到日本再到美国，有组织犯罪在经济运行中是一个远比经济教科书上所描述的更重要的因素。西西里人称之为 "sistema del potere"，即 "权力系统" 的有组织犯罪在决定经济如何运作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欧洲警察官员报告说，包括俄罗斯和意大利黑手党在内的国际犯罪集团在资助近年来蹂躏巴尔干地区的种族灭绝战争中发挥了 "主导作用"。

毒品贩子在资助全球其他地区最近的内战和叛乱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国家警察缉毒队队长胡里奥-费尔南德斯说："从 1986 年到 1988 年，西班牙 80% 的海洛因是由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游击队员与巴塞罗那或马德里的巴基斯坦居民合作携带过来的。当我们用逮捕行动摧毁这一网络后，它就被来自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所取代，他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完全控制了这一网络"。'<sup>3</sup>

有可能的是，每当一场新的内战或叛乱开始时，极度贫困的战斗人员就会通过运送毒品和清洗毒资来资助他们的军事行动。

## 药物资助的贴现

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活动给毒品以外的商品价格带来了下行压力。在微观层面上，犯罪集团用犯罪企业的战利品来补贴表面上合法的企业。他们可以通过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普通商品来清洗毒品利润和其他

非法资金，从而压低其干净的竞争对手的价格，使许多企业破产。

## 山口组通货紧缩

在日本，强大的山口组帮派在 1980 年代末日本亢奋的房地产泡沫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九万名山口组每年赚取 101.9 亿美元（官方估计）至 713.5 亿美元（夏藤高次教授估计），但威胁到日本 5 银行偿付能力的无法收回的贷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向山口组支持的交易提供的。"4 日本经济的通缩压力--日本人称之为 "价格破坏"，就是一个结果。

## 盲目的目光

正如叶利钦本人所承认的那样，俄罗斯的黑手党已经与 "商业结构、行政机构、内政部机构、城市当局." 合并。'~

由于黑手党通过与警察合并获得了豁免权，他们能够通过公然的暴力来强制征收他们的私人税收。

权威人士指出，现在五家俄罗斯企业中有四家支付保护费。"根据一些报告，俄罗斯当地的小企业要向敲诈者支付 30% 到 50% 的利润，而不仅仅是向美国商人要求的微薄的 7%"。16 1993 年，俄罗斯有 355,500 起犯罪被官方指定为 "敲诈勒索" 的例子，包括近 "30,000 起有预谋的谋杀案"，大部分是对商人的黑帮暗杀。据前内政部长维克多-叶林将军说，"大部分是合同杀人，因为商业和金融活动领域的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局 "视而不见"。经济学家詹卢卡-菲奥伦蒂尼和萨姆

-佩尔茨曼在《有组织犯罪的经济学》中写道，犯罪组织 "通过其对胁迫和腐败的控制，在经济中发挥着关键作用。"7 在理论上，这种影响有时是有益的，因为它限制了监管，并可能鼓励政府改善其公共产品的提供。强大的黑手党的存在，"制约了政府当局的垄断作用"。8

在拥有强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地区，政府只能非常困难地接受黑手党反对的政策。

## 勾结

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政府很少愿意直接对抗黑手党，而黑手党是他们使用有组织胁迫的主要竞争对手。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这并不令人惊讶。

"公共行政部门的当选成员 "能够达成的最有利的安排是与有组织犯罪的 "合谋协议"。Fiorentini 和 Peltzman 指出，"有证据表明，在大规模的协议中，有组织犯罪确保了对候选人群体的政治支持，而后者则通过对公共采购的有利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或补贴来回报这种恩惠"。与好莱坞传达的印象相反，渗透和诈骗政府现在似乎是西西里黑手党等犯罪组织的主要焦点之一。"大多数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西西里黑手党最大的业务正是侵占不同的公共支出来源，并组织对地方、国家和欧洲共同体的补贴计划进行欺诈"。20

## 麻醉品共和国

正如我们在《大清算》中警告的那样，世界上许多政府被毒梟彻底腐蚀了。墨西哥就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例子。前墨西哥联邦



副总检察长爱德华多-瓦莱-埃斯皮诺萨（Eduardo Valle Espinosa）在其辞职声明中对墨西哥的制度进行了透视。"没有人能够勾勒出一个政治项目，其中不包括贩毒头目和他们的资助者。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死。"瓦莱表示，贿赂使担任墨西哥警察局的工作变得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候选人仅仅为了被雇用而支付高达 200 万美元。从严格的损益核算来看，购买一个地方警察办公室可以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贩毒集团甚至愿意向低级别的墨西哥官员支付巨款，因为这些钱可以使他们免于因犯罪被起诉。

哥伦比亚是另一个政府高层被毒枭所控制的国家。美国当局最近撤销了哥伦比亚 285 号总统埃内斯托-桑佩尔的美国签证，理由是他在知情的情况下接受了毒贩的政治捐款以换取好处。

## 釜底抽薪

任何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关注过我们的通讯《战略投资》报道的人，都会立即意识到克林顿政府对桑普的姿态是一种讽刺。有可靠的证据表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做了所有桑普被指控的事情，甚至更糟糕。即使你不相信我们的话，克林顿的背景在两本由政治分歧双方的作者精心研究的书中得到了强调。

罗杰-莫里斯的观点普遍偏左，他曾是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官员，也是迪安-艾奇逊、林登-约翰逊总统和沃尔特-蒙代尔的高级助手。莫里斯拥有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

他的《权力的伙伴》一书详细介绍了克林顿的肮脏过去，使桑普看起来像个童子军。

莫里斯讲述了克林顿在阿肯色州温泉市没有父亲的童年，那里是赌博、卖淫和有组织犯罪的中心，他的大多数家人都与之有某种联系。克林顿的继舅舅雷蒙德-克林顿被比尔-克林顿称为 "父亲的形象"，据说他是迪克西黑手党的主要 "教父" 人物。

莫里斯指称，比尔-克林顿成为中情局的一名新兵，并在牛津大学的学生时代监视反越战分子。在莫里斯看来，克林顿在担任州长期间一直是中情局的资产，为中情局在阿肯色州梅纳的毒品和枪支走私活动提供便利。莫里斯似乎将中情局作为一个整体来起诉贩毒，而不是认为克林顿与中情局的一个腐败派别有牵连，而这在我们看来更有可能。然而，无论哪种解释，都表明美国政府的主要秘密情报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大规模的有组织贩毒活动。如果中情局不是有组织犯罪的附属机构，那么它正危险地接近于 50。21

250,000,000 中的一个机会

尽管如此，《权力的伙伴》包含的细节会让任何研究现代美国政治腐败的学生感兴趣。然而，莫里斯的手指绝不是全部指向比尔-克林顿。

他的妻子也受到了一些批评的关注。例如，请看莫里斯对希拉里-克林顿奇迹般的商品交易的描述中的这段摘录。"1995 年，奥本大学和北佛罗里达大学的经济学家利用所有可用的记录以及《华尔街日报》的市场数据，对第一夫人的交易进行了复杂

的计算机统计模型，并在《经济 and 统计杂志》上发表。他们计算出希拉里-罗德姆合法进行交易的概率不到 250,000,000 分之一”。22 莫里斯收集了许多关于克林顿时期在阿肯色州兴盛的毒品经营和洗钱活动的罪证 286 细节。

"由于其航班产生的毒品和金钱数量巨大，阿肯色州的小梅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成为世界麻醉品贸易中心之一"。23

莫里斯引用了一位亲信关于克林顿的证词："他知道"。克林顿不仅知道可卡因走私，而且告诉州警 L.D.布朗，他是克林顿帮助在中央情报局获得职位的前保镖，毒品走私不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哦，不，'克林顿说，'那是拉萨特的交易。"24 丹-拉萨特，被定罪的可卡因经销商，是克林顿的主要财政支持者之一，此人从阿肯色州的生意中赚取了数百万美元，据说曾用牛皮纸袋装了 30 万美元的现金给当时的肯塔基州长约翰-Y-布朗。根据莫里斯的说法，拉萨特 "不仅仅是另一个需要特别尊重的大捐赠者，而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亲信，克林顿经常去他的经纪公司拜访他，而且只要他高兴就会到公馆来"。25 莫里斯回忆说，经常带他到豪宅的拉萨特的司机是 "一个被定罪的杀人犯，他带着枪，而且众所周知，他在外面贩毒。"26 根据莫里斯的描述，美国总统与一个毒贩的关系似乎比哥伦比亚总统埃内斯托-桑佩尔和卡利卡特尔之间的关系更温暖。

"呼!鲍勃说了一些连希拉里都不会说的关于比尔-克林顿的事情" P.J. O'ROURKE

R.美国观察家》的主编小埃米特-泰尔并不像莫里斯那样是个左派自由主义者。但

他的《男孩克林顿》包含了许多与莫里斯所引用的相同的细节，将克林顿描绘成一个腐败的政治家，与毒品交易和其他犯罪密切相关。事实上，《男孩克林顿》的序言引用了克林顿的前保镖 L.D. 布朗的话，提出了耸人听闻的指控，即克林顿是死亡小组活动的同谋，旨在消灭对梅纳毒品交易知情的证人。

具体而言，布朗作证说，他于 1986 年 6 月 18 日被亲自派往墨西哥巴亚尔塔港，携带一支比利时制造的 F.A.L. 轻型自动步枪。布朗以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的化名出行，他要射杀特里-里德。

大家可能还记得，里德是在 1994 年作为《妥协》一书的作者之一进入公众视野的。克林顿、布什和中情局。《妥协》一书的论点是，中情局已经“增选了总统”，其“黑色行动，像癌症一样转移到了政府机关”。更具体地说，里德和他的合著者声称，克林顿和布什都因参与阿肯色州的非法活动（包括毒品贩运）而深受影响。

布朗并没有按照指示杀死里德。他和里德设法活了下来，至少讲述了他们的部分故事，这使他们比当时和后来与克林顿有关的其他人更幸运。想想已故的杰里-帕克斯（Jerry Parks），他在 1992 年为克林顿-戈尔总部提供安保服务，在 1993 年 9 月的一次帮派式暗杀中被射杀。伦敦《星期日电讯报》287 版根据帕克斯的遗孀提供的独家信息披露，帕克斯被已故的文森特-福斯特雇来监视比尔-克林顿，这是一个扭曲的故事的另一个离奇的转折。

福斯特为什么要编制一份关于克林顿的不利信息的档案，谁也猜不透。(他说他是为了希拉里。)但无论如何，这与官方描述的福斯特是一个天真的乡村男孩的说法相矛盾，他被华盛顿的无情方式所震惊，在绝望中自杀。这个从来都不靠谱的故事随着每一次新的披露变得越来越不靠谱。

## 黑帮的主席

虽然整个世界从美国总统因与有组织犯罪和罪犯有密切联系而受到玷污这一令人不安的结论中抽身而退，但这正是证据所表明的。莫里斯引用了一位追踪有组织犯罪人物及其利益的前美国检察官的话。他声称，克林顿在 1984 年当选州长时，"是黑帮真正进入阿肯色州政治的选举，赛马场和赛马场的男孩，那些看到好东西的人，....，它超越了我们的老迪克西黑手党，相比之下，它是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东部和西海岸的犯罪资金，他们注意到了可能性，就像合法公司所做的那样。"<sup>28</sup> 显然，其他有同样想法的人也继续注意到克林顿的可能性。《纽约》杂志继《读者文摘》早些时候的一篇文章之后报道说，"总统在工会运动中的主要盟友也是隶属于美国最肮脏、最暴徒的工会的人。"<sup>29</sup>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克林顿与阿瑟-科亚的密切关系。科亚是克林顿的 "主要筹款人" 之一，他是北美劳工国际联盟的主席，"劳工历史上最张扬的腐败工会之一。"<sup>30</sup> 显然，克林顿先生领导下的司法部与科亚达成了被纽约描述为 "奇怪的慷慨交易"，"面对司法部提出的关于他是有组织犯罪分子的长期伙伴的令人信服的指控，他仍能保住工作。"<sup>31</sup> 无论特里-里德的论点是否正确，即 "中央情报局已经增选了总统"，对于一个被授权开展 "黑色行动 "的秘密组织中的个人来说，显然存在着强烈

的诱惑，他们会沉迷于希斯莱弗教授的理性选择，即采用 "非法手段获取资源"。

鉴于技术变革正在减少世界上大规模军事力量的决定性，人们也许应该期待看到越来越多的腐败，如果不是有组织犯罪企业直接接管政府的话。

Hirshleifer 认为，我们也同意，"政治经济学的体制永远不可能完美到完全取代.....自然经济的基本现实"。32 权力在 "自然经济 "中不断下放。这意味着社会中权力的内部边缘发生了深远的变化。

正如维托-坦齐精明地指出的那样，政治腐败 "代表了国家的私有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权力不是像私有化通常意味着的那样被运往市场，而是运往政府官员和官僚。"33 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克林顿领导下的 288 家联邦调查局和其他警察机构。法治 "正在成为克林顿和他的亲信们所希望的那样。

截至目前，似乎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些腐败关系的细节会对选民产生任何影响，即使它们被大众媒体采纳和讨论。恰恰相反。人们似乎并不关心美国总统与毒品走私、洗钱和更坏的事情有牵连的暗示。

这让人想起已故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担心，即选民缺乏洞察力，无法看透他所谓的虚构人物。

他认为，选民 "被奉承和崇拜所误导。他们被卑躬屈膝的虚伪所背叛，这种虚伪告诉他们，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可以由他们的选票决定"。李

普曼认为 "宪法秩序的崩溃 "可能是 "西方社会急剧和灾难性衰退的原因。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已经堕落了很多。...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衰败--尽管许多旧的结构正在解体，而且是可以被称为历史性灾难的东西"。35 问题在于，政治判断似乎与其说是对现实世界的反应，不如说是对大众对其直接知识之外的现象所构建的一种伪现实的反应。36 但如果你受制于他人所见的限制，那就错了。

即使你不关心文森特-福斯特是否被谋杀，以及他的谋杀是否被美国最高警察机构和负责的官员所掩盖。

从长远来看，最高层的政治腐败使传统上对民主的可能性的赞美成为无稽之谈，而民主是对公共问题的有意掌握。在信息时代，政府的规模和权力远不如它的诚实来得重要。政府在历史上提供的大部分服务注定要在下一个千年里转入私人市场。但是，根据世界各地的证据，你是否可以长期依赖一个腐败的系统 and 腐败的领导人来保障你的家庭和投资安全，这是值得怀疑的。

正如莫里斯所说，"克林顿夫妇不仅仅是症状，而是象征着更大的两党制度在本世纪末的死胡同。"维托-坦齐在他关于腐败的文章中表明，"阻止腐败的唯一方法是大大减少公共干预的规模"。38 信息革命将大大减少 "公共干预的规模"，并在此基础上为道德和诚实的重生带来了希望。信息革命对道德的另一个明显的影响是，随着网络商务和虚拟公司用牢不可破的加密技术进行交流的可能性，脆弱性会增加。

一个组织内部的盗贼，甚至是一个虚拟组织，将更难被发现，而且要追回因出售商业秘密、专利或其他有价值的经济资产而被盗或暗中收到的钱，几乎是不可能的。

犯罪是有代价的，许多人发现用非法的、掠夺性的追求来补充合法的、生产性的追求是有吸引力的。与西方社会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遍存在的情况不同，罪犯不仅仅是不合群的人，没有社会地位。当犯罪得到回报时，你往往会得到一个更好的罪犯阶层，因为犯罪几乎没有社会责任感。例如，西西里黑手党和许多以虚高价格雇佣当地劳动力的毒贩子，在他们的地盘上得到了尊重和民众的支持。

## 道德秩序和它的敌人

所有强大的社会都有一个强大的道德基础。对经济发展史的任何研究都表明道德和经济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实现成功发展的国家和团体，部分原因是他们有一种鼓励自力更生、勤奋工作、家庭和社会责任、高储蓄和诚实等经济美德的道德观。这在社会亚群体中也是如此。犹太人，特别是宗教犹太人，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商业中的贵格会，或者现代美国的摩门教徒，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都表明了具有强大道德框架的文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我们可以拿贵格会的人作为例子。贵格会成员在商业上获得了成功，作为银行家尤其成功，原因有很多。他们为自己设定了尽可能高的可信度标准。他们不会宣誓，但把每一个商业承诺都视为与宣誓一样具有约束力。对他们来说，"我的话就是我的保证"是一个绝对的原则。他们相信一



种安静的生活方式，体面而节俭。作为一项宗教义务，他们避免把钱花在这个世界的虚荣上。他们避免争吵，并认为战争总是罪恶的。他们认为商人有道德上的义务给予公平的价值，作为商人，他们在保持高质量和适度的价格方面形成了声誉。

"Caveat emptor"--让买方当心--对他们来说是不够的。在一个大多数商人遵循高价格、高利润的贸易理论的时代，贵格会的道德观使他们自然而然地采取了低利润、高营业额的政策。正如亨利-福特后来表明的那样，这可能是潜在的更大的利润。他们遵循这一商业政策，因为他们认为不欺骗客户是他们的责任，但事实证明这是扩大业务的最佳方式。事实证明，贵格会的人很会做生意，所以他们的顾客又回来了；双方都有利润。作为一个高储蓄率的社区，贵格会履行其义务，作为银行家具有优势，而贵格会的成员资格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资产，可以激发人们的信心。

不幸的是，这种商业优势可能会被其产生的成功所侵蚀。国家会经历一个周期，这也是 18 世纪亚当-弗格森的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从贫穷和辛勤工作，到富裕，到奢侈，到颓废，再到衰落。古罗马人自己回顾了共和国时期的美德，当时帝国正在建立，并对奢侈和懒惰感到遗憾，他们认为这是帝国衰落的原因。这种繁荣对 290 种勤劳美德的侵蚀会出乎意料地迅速发生。德国人仍然是一个有能力和有效率的民族，但他们不是在工作

勤劳的美德被繁荣所取代，会发生得出奇的快。德国人仍然是一个有能力和有效率的民族，但他们的工作已经不像他们在 1945 年战败后重建国家时那样努力。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已经从长时间工作，几乎是赤手空拳，在严重贫困的条件下，

变成了短时间工作，获得地球上最高的薪酬和最昂贵的福利。

1995 年 10 月，16 个德国雇主协会签署了《彼得堡宣言》。这是一份有充分理由的投诉目录，反映了德国工业士气的下降。

德国的税收负担在 1995 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由于团结附加费和护理保险的支付。德国的公司税总额超过了 60%，远远高于 35%至 40%的国际比较水平。

公共部门的习惯，如规范的晋升、终身工作和较高的养老金支付，必须由自由市场的择优晋升和补偿规则所取代。

由于德国是世界上劳动力成本最高的国家，工资政策必须通过减轻企业的成本来帮助减少失业.....工资的增长应该根据竞争力和生产力来衡量....。工会的行为必须改变。

每年的运动、要求、工人动员、威胁和警告性罢工的仪式都会造成损害。

德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和繁荣的继承人，已经失去了工作的习惯，这种焦虑是科尔总理所共有的。

现有的大众汽车公司的劳动合同给了地球上所有汽车工人最高的工资，还必须加上福利税，以换取每周 28 小时的工作时间-4 天，每天 7 小时。战后的德国现在是一个大规模的工作岗位输出国。英国人在十九世纪中期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工业国家，一百年后他们肯定失去了这一声誉。

繁荣的循环无疑破坏了努力工作和适度期望的美德，这些美德存在于成功的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

国家无法保留其早期的美德，就像个人会因为太容易获得成功而变得贪婪和懒惰。

全球投资无疑会奖励这些勤劳的美德，并惩罚那些变得贪婪和懒惰的人，这是应该的。事实上，人们可以说，健全的投资必须基于道德以及纯粹的财务评估。十八世纪的英国人认购了贵格会银行的资本，很可能会做得很好。在十九世纪，贵格会成员投资于巧克力企业，因为他们认为可可比酒更健康。它可能是这样。然而，对弗莱公司或吉百利公司的投资肯定是一项好的投资。投资者应该关注避免颓废期的到来。即使德国在欧洲市场上保持着强大的地位，而且工业技能高，但高劳动成本和短工时已经降低了德国未来的潜力。

社会道德和经济成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哪些因素有助于维持或倾向于破坏社会道德？二十世纪上半叶伟大的哲学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提出了挑战与回应的理论。社会因挑战而振奋，并发展出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的美德。

人类一直认识到，困难时期可能会产生，而且通常会产生比繁荣时期更健康的反应。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我们都试图使自己变得舒适，我们希望住在我们喜欢的房子里，有一份我们喜欢的工作，在银行有足够的钱，等等。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进行的奋斗是有意义的。我们在学校学习，我们培训自己，我们努力工作，我们的工资政策必须通过减轻企业的成本来为减少失业作出贡献。- ..工资的增长应根据竞争力

和生产力来衡量。...工会的行为必须改变。每年一次的运动、要求、工人动员、威胁和警告性罢工的仪式是有害的。

在太多的人中，这些目标的实现产生了一些陷阱。挣扎比成就更好。本世纪初，伟大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将一位美国商人作为他的病人。这位商人在年轻时就具有这些雄心壮志。他曾努力建立自己的企业，并在 40 岁之前赚到足够的钱来退休。他娶了一个年轻有魅力的女人，买了一个漂亮的房子，有了一个年轻的妻子，他的生意非常成功，到了四十岁，他确实能够卖掉房子退休，成为一个有钱的独立男人，表面上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起初他很享受他的自由，能够做他长期以来答应自己的事情。他带着他的家人去欧洲。他们参观了艺术馆等等。渐渐地，这些兴趣，以及他的自由感本身，开始变得苍白。他开始回顾他不自由的时候，当他整天在生意上工作，并有所有通常的商业烦恼时，是他生命中的快乐时期。他陷入了抑郁症，这导致他的妻子把他带到荣格那里，作为一个病人。荣格诊断他，实际上，他的创造能量没有出口，而这些能量已经转到他身上，正在摧毁他。这个诊断很可能是正确的，但它并没有导致治愈。这位商人从未从他的精神崩溃中恢复过来。

对人类来说，重要的是斗争而不是成就；我们是为行动而生的，而成就可能被证明是一种巨大的失望。野心，无论它是什么，都会使斗争开始，但斗争比它本身的结果更令人愉快，即使目标完全实现。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目标只能部分实现。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我们想要的那么多钱，也没有住在我们梦想的风光里。我们不得不满足于较少的东西。

这种美德是动态的，它包括努力而不是结果的感觉，在十九世纪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强烈的发展。阿瑟-休-克拉夫有一首著名的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生死搏斗中给许多人带来了安慰。值得注意的是，292 个交战国的自杀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所下降；即使是战争的斗争也会比不作为的压抑要好。

不要说，挣扎无益，劳苦和伤痕都是徒然，敌人不会昏倒，也不会畏缩。

事情已经发生，但仍然存在。

如果希望是骗人的，恐惧也可能是骗人的；可能在你的烟雾中，你的战友们现在正在追赶飞行者，而且，如果不是你，就会拥有这个战场。

因为当疲惫的海浪，徒劳地打破，似乎在这里没有痛苦的一寸可以获得。

在后面很远的地方，通过小溪和进水口使，Comes 沉默，涌入，主。

而不是只靠东边的窗户。

白天来了，在光中来了，在前面，太阳爬得很慢，多么慢，但向西看，土地是明亮的。

这种积极的竞争仍然吸引着现代人的感性。事实上，这正是许多现代男女的生活方式，在不断的斗争中抓住潜在的敌对环境中的机会。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里，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从这个世界中收缩出来。当然，也有沉思的精神气质，但这是相当罕见的。

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

( William James ) 在 1891 年对耶鲁大学哲学俱乐部的讲话中，对这种动态的道德观提出了类似的 19 世纪的看法。

实际上，人的道德生活中最深的差别是随和与努力的情绪之间的差别。当我们处于随和的情绪中时，对当前疾病的畏惧是我们的首要考虑。相反，努力的心情使我们对目前的疾病无动于衷，只要能达到更大的理想就可以了。强烈情绪的能力可能在每个人身上都沉睡着，但它在某些人身上比在其他人身上的更难觉醒。它需要更狂野的激情来唤醒它，需要巨大的恐惧、爱和愤慨；或者需要某种更高的忠诚，如正义、真理和自由的深刻的呼吁。强烈的解脱是其视野的需要；而一个所有的山都被打倒，所有的谷都被抬高的世界，是不适合其居住的地方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孤独的 293

正义、真理和自由。强烈的解脱是其愿景的必要条件；而一个所有的山都被打倒，所有的谷都被抬高的世界并不适合它的居住地。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孤独的 293 号思想家身上，这种情绪可能永远沉睡而不醒来。他的各种理想，据他所知，只是他自己的偏好，几乎具有相同的教派价值：他可以随意地玩弄它们。

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没有上帝的单纯的人类世界里，对我们的道德能量的呼吁没有达到其最大的刺激力量。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也是一首真正

的道德交响乐；但它是在几个可怜的八度空间里演奏的，而无限的价值尺度却没有打开。

威廉-詹姆斯认为，动态的道德，包括做而不是存在，做而不是不做，可以扩展到宗教领域。在亚当-斯密（1776）的作品中，竞争和生存的道德观也有了强有力的发展，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道德学说，其中心主题需要仔细考虑。

达尔文主义的主导思想是，物种通过适应环境而生存，这种自然选择的过程塑造了物种的特征。在动物中，这个过程是随机突变的结果，现在人们知道它属于达尔文本人只能猜测的遗传过程。然而，人类社会的生存取决于以人类智慧为基础的文化选择。文化改变人类社会，就像基因改变其他物种一样。因此，变化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中更快地发生。它不必像依赖随机基因突变时那样，经过许多代的努力。取代动物的自然选择，人类发展了文化选择，一些文化在人类历史的某个阶段发展了新技术，使他们在创造财富或凝聚力量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优势。新技术的文化优势，如铁器时代的人对青铜时代的人，或电子人对机械人，都是决定性的。亚当-斯密可能不是第一个把国家的福利归结为个人行为的经济事务作家，但他说得最简洁，也最有权威。

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努力，为他所能掌握的任何资本找到最有利的工作。他所考虑的确实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对他自己利益的研究自然地，或者说必然地导致他倾向于选择对社会最有利的工作。

人口研究的创始人托马斯-马尔萨斯看到，亚当-斯密的论点不仅可以适用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可以适用于人类人口的生存问题。他因提出以下主张而闻名："人口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以几何比例增长。生存只按算术比例增加。只要对数字稍有了解，就会发现第一种力量与第二种力量相比是多么巨大"。

马尔萨斯甚至早于达尔文看到，同样的原则适用于整个自然界。

通过动物和植物王国，大自然以最丰富和自由的手将生命的种子散布到国外，她在空间和养育它们所需的营养方面相对吝啬。在这块土地上的存在胚胎，如果有充足的食物和充足的空间来扩展，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就可以填满数百万个世界。必然性，即自然界无孔不入的法则，将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

世界的发展方式，即使在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这个阶段，到十八世纪末已经被理解为动态的，事实上它一直都是这样。人类本身是众多物种中的一个，由于其无限的生成能力和有限的粮食种植能力之间的不匹配而被迫竞争。人类社会的生存，如同动物物种的生存，取决于对环境的成功适应。因此，一种动态的道德关注的是如何克服适应的问题。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个人使自己的行动适应环境的机会，从而利用社会中的现有资源获得最大利益。

马尔萨斯已经看到，亚当-斯密的思想已经改变了世界，他写道，他关于人口的新论点并不新鲜："它所依赖的原则部分由休谟解释，部分由亚当-斯密博士解释。"



他还看到，这种不断的生存竞争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实际问题。

1798 年的 "论文 "的最后一段写道

邪恶存在于世界，不是为了制造绝望，而是为了活动。我们不是要耐心地顺从它，而是要竭力避免它。每个人不仅有兴趣，而且有责任，用他最大的努力从他自己身上，以及从他能影响的最大范围内消除邪恶；他越是在这个责任中锻炼自己，就越是明智地指导他的努力，这些努力就越成功；他就越可能改善和提高他自己的思想，他就越是完全履行他创造者的意愿。

也许人们可以从达尔文对其划时代著作《物种起源》（1859 年首次出版）第三章内容的总结中，说明他对这一论点的重要性的认识。

他把这一关键章节称为 "为生存而斗争"。主题读物是。"关于自然选择的熊--该术语在广义上使用--增加的几何力量--归化的动物和植物的快速增加--对增加的制约的性质--竞争的普遍性--气候的影响--来自个体数量的保护--整个自然界所有动物和植物的复杂关系--同一物种的个体和品种之间对生命的斗争最严重；同一属的物种之间 295 严重--有机体与有机体的关系是所有关系中最重要。"自 1776 年以来，很明显，优化国家财富的最佳方式是允许个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优化自己的资本回报。自 1798 年以来，很明显，人口的相对生存取决于社会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和政治成就

同属的物种之间--生物体与生物体的关系是所有关系中最重要。"自 1776 年以来，很明显，优化国家财富的最佳方式是

允许个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优化自己的资本回报。自 1798 年以来，显而易见的是，人口的相对生存取决于社会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和政治成就，以便能够养活自己，保护自己不受传染病影响，并在战争中保护其人口。自 1859 年以来，显而易见的是，在人类、动物或植物王国中，整个生命的戏剧由一场持续的生存斗争组成，在这场斗争中，那些彼此距离最近的物种或文化可能是最大的对手。这种斗争需要一种动态的道德，它积极地抵御邪恶，而不仅仅是在它发生时作出反应。

这些思想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从它们被提出的时候起，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对它们作出反应，而去思考人类的本质或道德的问题。卡尔-马克思和查尔斯-达尔文一样相信生存斗争，但他认为这是一场由经济力量形成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战争。阿道夫-希特勒相信生存斗争，并几乎完全从这些方面看待自己的政治生涯。但他认为，这场斗争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斗争。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希特勒都可以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他们把生存斗争，即希特勒所说的 "我的奋斗"，视为核心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阶层看成是独立的物种；纳粹分子也以同样的眼光看待种族。

然而，这不是马尔萨斯设想的动态道德，而是动态的不道德。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都希望解决同一个问题，即为生存而斗争的问题，但却是通过破坏竞争。他们入侵外国领土，他们促进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这些阶级为社会权力而竞争，或不同种族被视为经济剥削者（反犹太主义者对犹太人的正常指控）或危险的下层社会（白人敌人对黑人的恐惧）。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阿道夫-希特勒通过摧毁潜在的竞争者，特别是斯拉夫人和犹太人，来确保德国人民的生存优势的一次尝试，但这次尝试失败了。一个有趣的悖论是，战争的失败证明比纳粹的胜利对德国更有利。

替代破坏性 "干扰 "竞争的是协作性竞争，而协作性竞争是亚当-斯密的中心思想，也是马尔萨斯和威廉-詹姆斯的中心思想。

破坏性竞争的原型是征服者。他摧毁他的竞争对手，以夺取他们的资产，这可能包括接管他们的国家，也可能包括奴役他们的人民。合作性竞争的典型是商人。

顾客对交易感到满意符合商人的利益，因为一个满意的顾客会回来做更多的交易。顾客富裕也符合商人的利益，因为一个富裕的顾客有足够的钱继续购买。征服意味着摧毁对方；商业则意味着满足对方。由于现代技术已经 296 使征服成为一种异常危险的政策，商业已经成为解决生存问题的唯一合理方法。

亚当-斯密的另一个中心思想--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加强了这种相互依存关系，这就是职能的专业化。在《国富论》的开头，亚当-斯密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以及在任何地方指导或应用劳动的大部分技巧、灵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他指出，"以这种方式，制作大头针的重要业务被划分为大约 18 项不同的操作，在一些工厂中，这些操作都由不同的人完成。"职能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制造业的效率就越高，但显然这种经济是高度相互依赖的。如果它要成功，就必须是协作性的。

因此，一个成功的社会道德必须具备某些特征。它必须是强大的--软弱的道德将是脆弱和无效的。它必须为生存斗争做出贡献，但其方式是合作性的，而不是谋杀性的。希特勒有一个强大的生存道德，但其破坏性的品质几乎摧毁了他自己的社会。

它必须是动态的，以配合现代技术，乃至所有现代社会系统的动态变化。

它必须在经济上有效。在列宁主义体系中，平等主义和专制主义思想的混合根本不起作用。然而，这些并不是这种社会道德可能被期望拥有的所有特征。它有一个更广泛的目的，即让社会成为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并将人们联系在一起。此外，道德必须适应和生存；一个脆弱的道德可能在我们这一代被接受，但在下一代却被拒绝。传统的社会道德可能太不灵活，无法适应社会结构的连续变化。另一方面，一个纯粹的相对主义系统根本就不是一个道德；它没有给出如何行事的明确信号。

我们首先可以把所有的社会道德放在一个背景中。一个强大的社区，甚至是一个虚拟社区，取决于道德是否被广泛接受。社会历史上最成功的时期往往是那些集体道德得到充分认同的时期。这样的道德不仅发挥了具体的功能，如减少犯罪，帮助支持家庭和社会结构，而且给公民带来目的和方向感。从历史上看，这样的道德共识似乎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无论那是一个分散的民族早期生存的国家宗教；伊斯兰教及其社会规则；中世纪的天主教；还是早期新英格兰的新教。一个民族、一种道德和一种宗教这三种观念相互依存，而且每一种都倾向于加强其他的观念。

在这样一个道德社会中，公民个人能够在社会支持的框架内努力实现个人目标。诚然，道德法律可能有些武断，或者至少在外人看来是武断的。正统的犹太人失去了吃猪肉或贝类的自由，或在安息日工作的自由。忠诚的天主教徒可能会失去使用人工避孕药的自由，更不用说堕胎了。伊斯兰教徒可能会失去饮酒的自由。虔诚的儒家可能要为他尊敬的父亲服丧很长一段时间，这很不方便--甚至孔子本人也在 297 年警告说，服丧仪式可能被夸大了。然而，这些信仰体系中的每一个的信徒都认为这些观察是为一个共同的、连贯的世界秩序感而付出的小代价，在这个世界上个人有一个安定的位置。一个东正教的犹太人完全可以认为

警告说，哀悼仪式可能被夸大了。然而，这些信仰体系中的每一个的信徒都认为这些观察是为一个共同的、连贯的世界秩序感所付出的小代价，在这个世界上，个人有一个安定的位置。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完全可以说，遵守安息日是法律的好处或犹太家庭的力量所付出的小代价。一个宽容的社会中的共同道德是约翰-洛克和早期自由主义哲学家的理想。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类型的社会可以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维持，但他们认为，这些规则应该受到最佳理性的制约，人们应该被强迫只接受基本的规则。他们确实承认，在社会道德中，特别是在保护生命或财产方面，强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安全，任何社会都无法生存。他们对不影响他人福利的个人选择的变化采用了几乎绝对的宽容。儒家为父亲守丧四十天，可以住在犹太人的隔壁，遵守安息日，而不会打扰到对方，也不会想强迫他遵守自己的宗教习俗。

从这种在基本事务中的社会道德和个人决定中的宽容相结合的学说中，人们实际上得到了一个必须强加给所有公民的核心道德标准和一个公民作为个人或社会中的子群体成员所接受的自愿道德。当本笃会的修士发下贫穷、贞洁和顺从的誓言时，他是作为这样一个亚群体的成员来做的。他并不要求所有的天主教徒，更不要求他的所有同胞都发同样的誓言，或遵守同样的规则。

他将服从他的修道院院长的命令，但他并不期望他的修道院以外的人对这些命令有任何关注。对社会道德的这些可有可无的部分的遵守不需要是普遍的，但核心道德确实必须被分享，不愿意接受核心道德的人既损害社会，也损害自己。在极端的例子中，一个充斥着毫不犹豫地杀人的强盗的社会，就像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一样，没有人能够提供满意的生活，甚至强盗自己也不能；他们总是特别受到其他杀人犯的威胁。今天，美国的一些内城地区也同样如此。无政府状态不是理想的社会，因为没有法律的实施，就没有人类的安全。

当人们审视那些敌视社会道德的力量时，需要考虑这种核心道德，它在大多数现代宗教信仰体系中大致相似。在基督教徒的《旧约》或犹太人的《托拉》的十条戒律中，至少有两条可以被视为对任何可以被视为宗教的东西的普遍性。"不可杀人"和"不可偷盗"。人们甚至可以超越这一点。

几乎所有严肃的不可知论者都会认为谋杀和盗窃--对生命的最终威胁和对财产的最终威胁--是被禁止的，并会接受社会有权惩罚杀人或抢劫的人。他们可能不同意对

某一特定罪行的适当惩罚，但不同意社会有权利进行这样的惩罚。

约翰-洛克的原话有确切的说法。每个人都有 "生命、自由和财产 "的权利。1776 年，托马斯-杰斐逊添加了约翰-洛克的另一个短语，"追求幸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短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但 "生命、自由和财产 "比 "生命、自由和追求 298 个幸福 "更贴近实际。社会绝对依赖于生命权和财产权。在实践中，历史表明，只有在有自由的情况下，这些权利才能得到保护。如果国家是全能的，那么国家就会成为生命的大敌，比如在侵略战争中，也会成为个人财产的大敌，因为它为了自己常常不受欢迎的、总是浪费的目的而过多地占有国家财富。

然而，核心道德在最先进的国家受到攻击，部分原因是赋予这些国家技术优势的现代性力量。美国是世界上领先的技术大国。许多人，包括大多数美国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之前的任何时候，都会把美国视为世界其他国家的道德榜样。现在，这种观点很少被表达出来，即使是那些为自己国家感到自豪的美国人也不例外。人们不可能像全世界那样，听了 O.J.辛普森的审判，而把美国看作是它最初的那个简单的美德共和国。

如果人们回顾一下旧美国的标签，它们反映了边疆社会的需求，即使在大城市，它也会给公民的态度带来色彩。边疆是民主的地方。

人们觉得自己是平等的，早期的美国人抛开了欧洲的阶级等级制度。即使是作为囚犯从英国送来的契约劳工，一旦契约期结

束，他们也会成为独立的商人、农民或自由劳工。工资比欧洲高，必需品的成本也很低，尽管进口产品很贵。在边境地区，人们相互依赖，但生活虽然艰苦，但按照欧洲的标准，还是很不错的。移民可能开始时是在波士顿和纽约的贫民窟中赚取低工资，但他们通常很快就摆脱了贫民窟，而且一代又一代地找到了繁荣。内战结束后，黑人把自己看作是另一个移民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同这些美国的价值观和目标。黑人中产阶级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种愿望在边疆的实际经历以及新教和天主教教会的影响下得到加强，构成了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他们相信，他们生活在上帝自己的国家，这是一个由民主理想和基督教信仰独特引导的概念，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民主国家。这幅画面已经很熟悉了；它体现在我们所有人或几乎所有对亚伯拉罕-林肯的印象中，尽管人们仍然可以找到南方的一些美国人，他们把林肯视为发动第一次现代战争的恐怖，以防止自由州离开他们不再信任的联盟的人。

尽管如此，林肯的形象，粗犷、朴实、诚实、雄辩，<sup>15</sup> 仍是美国的最高形象，而且它基本上是一个道德形象。许多美国人仍然感受到新国家的民主活力与欧洲疲惫的等级制度之间生动的原始对比。在今天的洛杉矶、纽约、休斯顿或华盛顿，外国人很难认识到这种本质上充满活力的功利主义理想，尽管在大郊区地带或农村地区仍然可以找到它的痕迹，而且不仅仅是痕迹。美国的清教徒伦理，连同其所有的历史重要性，在雪线以北地区生存得最好，但企业家的活力更为广泛。



美国人会指出，大城市的衰败，已经成为犯罪，特别是毒品交易的温床，是社区道德感衰退的最严重的症状。大多数美国人也认识到，存在着几种不同的道德文化的冲突，它们都在争夺自己的主张和权威。

政治上正确 "的文化拒绝了许多，但不是全部，维护旧文化的道德原则。它积极强调那些被视为在历史上被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男性文化所剥削的群体的作用和权利，并拒绝这种文化，尽管它是美国的创始文化。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男性主导文化以核心家庭的生存为中心。这在历史上至少给了丈夫-父亲在家庭中的名义上的支配地位，尽管在实践中，家庭往往是由妻子-母亲管理的，而名义上的主人往往是温顺的接受。它使男性老板在工作场所拥有真正的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至今受到女权运动的挑战，但没有被扭转。家庭的利益和历史上的基督教教义将堕胎定为非法。旧的道德观认为堕胎是非法的杀戮，是绝不允许的，传统道德观的信徒仍然这样认为。新道德的拥护者则认为相反。在 "罗伊诉韦德 "案中，最高法院将迄今为止被视为各州问题的堕胎的宪法权利建立在隐私权的理论之上，而这一理论本身与宪法或其修正案中实际存在的任何语言相去甚远。

妇女的隐私被认为包括拥有或不拥有孩子的权利，无论对胚胎可能造成什么后果。最高法院不认为胚胎享有任何宪法权利--在二十世纪末，胚胎是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奴隶一样的宪法外实体。"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并不适用于奴隶，《独立宣言》的语言也没有被罗伊诉韦德案的法官们应用于胚胎。

堕胎辩论是新旧道德冲突的极端例子，尽管在其他领域也有同样显著的冲突，旧的社会组织及其道德受到了新的挑战。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在新教和天主教会中，都非常强调性角色。没有婚外或婚前的异性性交。没有生殖器的同性恋关系。女同性恋没有被强调，因为社会几乎不承认它的存在。当维多利亚女王第一次被告知此事时，她坚决拒绝相信这种事情发生在妇女之间。政治正确是所谓的受压迫群体的道德。同性恋者声称他们的生活方式具有平等的有效性，并对传统上反对他们的性行为提出挑战。

"恐同症"被认为本身就是一种令人发指的偏见，就像种族歧视一样。对同性恋的批评被新的道德观视为与批评黑人、犹太人或妇女一样不可接受。

与此同时，其他的性禁忌也被侵蚀或废除了。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了新的自由恋爱浪潮，部分原因是基于女性避孕药的明显安全性，但也受到改变情绪的药物和流行音乐的推动。这导致了越来越多的非婚同居现象。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在英国这个比美国大多数国家更为守旧的社会中，人们认为爱德华王子在白金汉宫与他的女友睡觉是绝对正常的，就像学生们在 1960 年代的宿舍里互相睡觉一样，是一种稳定但未婚的亲密关系。很少有人认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作为英国教会的领袖，纵容她最小的儿子的行为是奇怪的，她的三个大孩子的婚姻已经破裂了。那些抱怨的人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落伍者和假正经。然而，仍有许多人认为旧的道德观是可取的，即使他们自己不实践，或认真地期望他们的孩子在相当早的年龄之后也能这样做。

政治正确运动也有其清教徒的一面。由于它源于被视为最大受压迫群体的妇女的利益，它对男性的性行为有一定的敌意，无论是积极的还是以前被认为是无害的形式。一些妇女认为，所有男人都是天生的强奸犯，对强奸的自然恐惧被夸大为对男性的普遍谴责。另一些人则专注于性骚扰，这是一种真正的不满--许多男人都有非常粗鲁的性行为--这在一些琐碎的案件中变得很可笑。性骚扰甚至被指责为仅仅是眼神，没有任何言语，更不用说身体接触。因此，新的道德规范可能是非常审查性的。

白人可以被指控有种族偏见，不是因为他们有偏见，而是因为他们他们是白人。男人可以被指责为性骚扰，因为他们的表情显示他们发现一个女人很有吸引力，这在上一代被认为是一种恭维而不是一种侮辱。

政治正确派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团体互相激烈批评，然而在现代世界中，他们看起来相当相似。他们都认为某个特定的道德教义具有权威性，好像它是普遍的，尽管他们的道德教义是不同的。两者确实可以因为同样的缺陷而受到批评，因为它们都是夸大和过于自信的道德主义，缺乏深度，缺乏历史感，也缺乏宽容。两者都被抨击为与十七世纪的清教主义相似，与英国的奥利弗-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 ）这样自信的道德家相似，他几乎移民到了新英格兰，或者与塞勒姆的女巫猎人相似。无论是更教条的妇女运动，还是圣经地带的保守传教士，都不能指责他们缺乏道德，而是指责他们过度发展和僵化。这些道德观的核心有时似乎变成了石头。这种道德动脉的硬化对社会的共识道德的破坏性不亚于它所抗议的 "什么都可以 "的无政府状态。

它是对道德力量的歪曲，是对自以为是的粗暴化。法利赛主义，即坚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美德，与人类一样古老，对耶稣基督尤其反感。对道德的侵蚀，认为道德选择纯粹是个人偏好的问题，就像选择衣服一样是个人的事，是最近的现象。这种信念反映了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道德。它把古典的自由学说带到了一个相当新的阶段，把 "追求幸福 "从约翰-洛克最初的意思，以及 1776 年杰斐逊对它的理解，变成了一种不计后果的享乐主义。

"追求幸福 "一语取自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1691）。"智力性质的最高完善在于谨慎地追求真正的和坚实的幸福，因此，对自己的关心，使我们不把想象的幸福误认为是真正的幸福，是我们自由的必要基础。"他接着说，"每个人都不会把他的幸福放在同一件事上....，心灵和味觉都有不同的感受....。人们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东西，但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假设他们只是像一群可怜的昆虫，其中一些是蜜蜂，喜欢花和花的甜味，另一些是甲虫，喜欢其他种类的食物。"然而，他继续争辩说，宁要恶习不要美德，"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判断"。他特别看重宗教论点，但也认为 "恶人在这里有更坏的部分"。他认为，"建立在其真正基础上的道德，不能不决定任何愿意考虑的人的选择"。洛克的自由学说无疑给人类的偏好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范围，而不是像更多的专制道德体系那样寻求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并强加统一的行为。然而，很快，经典的自由学说就认识到了集体道德要求的必要性，包括尊重社会中的其他人，特别是他们的生命和法律规定的对其财产的和平所有权。集体道德的普遍侵蚀威胁着自由，这既是直接的，因为它引入了无政府状态的因素，也是间接的，因为它鼓励了社会中最独裁的力量。我们可以把公共道德的

历史看作是无序与专制之间的循环；现代专制道德，包括女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都是作为对 1960 年代享乐主义的循环反应出现的。

我们已经描述了下个世纪的新世界的一些属性。它将被两种主要力量所塑造，一种是正在开放亚洲经济的技术转变，另一种是使公民逐渐减少对当地政府依赖的新的全球电子通讯。新技术将取代或已经取代了许多中间人的技能--生产线工人、办公室文员，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中层管理人员。但它奖励了更稀有的技能，创造了一个由高技能者组成的国际认知精英，新的通信为他们的技能打开了最广泛的市场。像大多数精英一样，这些认知精英往往有点高高在上，相当傲慢，并认为他们可以设定自己的标准。他们因此而与社会疏远。

在下个世纪上半叶，将有大量财富从旧西方转移到新东方。政治上的失败--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上落后的国家--可能会推迟这种财富和战略力量的转移，但最不可能阻止它。它们不能逆转它。

在任何情况下，这种财富转移的过程都会给北半球以白人为主的国家、欧洲和北美带来最大的压力。目前，约有 7.5 亿人属于这一地区的先进国家；直到最近，日本是唯一达到欧美生活标准的亚洲非白人国家，尽管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南部非洲的白人人口中存在着欧洲人种。即使在 1990 年，先进工业国家的总人口也只占世界 50 亿人口的 15% 左右。世界财富 302 的分布形状是 15% 的富人，85% 的穷人，非常像 100 年前先进工业社会的收入分配。到 2050 年，在一个加速的过程中，预计先进的经济体将包括大约 30 亿人，而世界人口可能已经上升到 70 亿，

或者财富分配是 40%的富人，60%的穷人。到本世纪末，这些数字很可能被颠覆，财富分配可能是 60%的富人和 40%的穷人，贫困尤其集中在非洲。国家之间的变化将是更大的财富平等，但在国家内部，可能将是更大的不平等。人才和资本的有效使用者将比那些技能一般或资本不多的人有决定性的优势。这种财富将是高度流动的。贫穷的人在

是 15%的富人，85%的穷人，非常像 100 年前先进工业社会的收入分配。到 2050 年，在一个加速的过程中，预计发达经济体将包括约 30 亿人，而世界人口可能已经上升到 70 亿，或财富分配为 40%的富人，60%的穷人。到本世纪末，这些数字很可能被颠覆，财富分配可能是 60%的富人和 40%的穷人，贫困尤其集中在非洲。国家之间的变化将是更大的财富平等，但在国家内部，可能将是更大的不平等。人才和资本的有效使用者将比那些技能一般或资本不多的人有决定性的优势。这种财富将是高度流动的。先进国家的穷人将无法像二十世纪那样向富人征税；那些试图这样做的国家将在激烈的竞争中倒退。

当然，如果没有世界大战，世界经济的总生产力将继续上升，也许整个世界平均上升 3%。如果这被证明是正确的，世界总产品将每二十五年翻一番，到 2050 年将是现在的四倍多，到 2100 年将是十六到二十倍。即使到 2100 年世界人口增加到 80 亿，到本世纪末世界人均 GDP 也将是现在的十倍。这样的财富增长可以照顾到新工业社会的崛起，以及认知精英的数百万美元收入，并且仍然为其他先进的劳动力提供一个体面的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但差异将与 20 世纪的差异有很大不同。从世界范围来看，穷国的收入增长将比富

国的收入增长快得多；从国家范围来看，富人的收入，如 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将比中等或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快得多。在下个世纪，我们将见证一个世界超级阶级的诞生，也许是 5 亿非常富有的人，其中 1 亿人富有到可以成为主权个人。

这个过程将产生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社会的同质性将大大降低；民族国家将变得更弱，或完全崩溃；认知精英将把自己视为世界性的。在同一全球职能部门工作的人已经在发展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与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同僚相比，更接近他们在旧民族国家的同胞。一个伦敦的投资银行家在首尔可能比在格拉斯哥更有家的感觉；一个华盛顿的公务员在波恩可能比在华盛顿本身的黑人地区更有家的感觉。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对道德价值观产生的分裂效应。个人的道德观部分是由教育决定的，即个人在童年时所受的教育；它也部分是由生活经验决定的。认知精英的教育和经验都将是世界性的，并倾向于将人们从他们的地方社区中分离出来。

当我们迈向下一个世纪时，在不断增长的认知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家庭中几乎没有得到宗教或道德教育。精英们最常见的宗教是一种不可知论的人文主义。许多这样的家庭本身就因离婚、再婚和随后的第三次婚姻而分裂。好莱坞的婚姻模式在美国并不普遍，但在欧洲-303 的认知精英们

美国的离婚率很高，大概平均有三分之一或更多。这些离婚父母的孩子很少接受基本的宗教教育，他们知道父母、继父母和继兄弟之间道德态度的差异。如果将这个群体的初始道德教育与爱尔兰或波兰村庄

的道德教育相比较，农民教育显然提供了两者中更强的宗教训练。

一个无神、无根、有钱的精英不可能幸福，也不可能被爱。

下个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群体在最初的道德教育中的这种不足，很可能被他们的生活经历所强化。

这些人将接受这样或那样的高级技术教育的约束，以适应他们作为新的电子世界的领导者的新角色。

但他们将从中只学到一些历史上作为人类社会行为框架的道德教训。按照孔子、佛陀或柏拉图（公元前 500 年）、圣保罗（公元 50 年）或穆罕默德（公元 600 年）的标准，他们可能是道德文盲。他们会被灌输经济效率、资源利用、追求金钱的教训，但不会被灌输谦逊或自我牺牲的美德，更不用说贞洁了。从本质上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作为异教徒长大的，他们的价值观更接近于罗马共和国后期的价值观，而不是基督教。即使这些价值观也是高度个人化的，而不是共享的。正如我们所论证的那样，只有当真正的道德价值观得到广泛认同时，社会才会强大。先进国家已经进入这样一种情况：许多人将持有薄弱或有限的道德价值观，其他人将以激烈地坚持非理性的价值观作为补偿，很少有价值观会在整个社会中被共同持有。毫无疑问，我们之前描述的一些 "竞争性领土俱乐部" 将对居住地施加严格的道德标准。

财富的差异本身在历史上并没有产生宗教价值观的根本差异。在具有强大传统的密



集而稳定的社会中，陡峭的等级结构，"富人在他的城堡里，穷人在他的门口"，可能会掩盖贯穿等级制度的价值观，但这取决于富人和穷人的共同感受的力量，以及社会传统的力量。

这两种情况现在都不存在，社区感情和传统都被正在发生的经济和技术革命削弱了。许多人和少数人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疏远。技术革命是通过打破旧的做事方式而实现的。在每一个领域，都是激进的人获胜，而传统的思想家则落伍了，他们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比赛。我们的政治可能由传统思想家领导--比尔-克林顿、赫尔穆特-科尔、约翰-梅杰，但我们最成功的企业是由对新技术世界有着敏锐理解的激进分子领导的；其典型代表是比尔-盖茨。传统思维因其无法应对变化的速度和力量而信誉扫地。

然而，道德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以摩西的科学为例，它形成于大约 1000 年前。

公元前，它能告诉我们的东西非常少。《创世记》中关于创造的描述很可能包含一个神学真理--上帝创造了宇宙和人类，但它并没有对物理结构的实际发展作出科学描述。

然而，如果我们以摩西的道德为例--十诫--它有很多东西要告诉我们。

尊重父母和忠于婚姻是维护家庭生活的最佳方式；家庭生活是培养道德健康的孩子的最佳方式。偷窃会损害小偷和被偷东西的人，而且是对工作和储蓄的一种抑制。

社会秩序取决于证人的真实性。谋杀是错误的，诸如此类。

在科学方面，三千年来完全改变了人类知识的内容；在道德方面，我们可能实际上已经退步了。普通的心理治疗师给病人提供的关于如何生活的道德建议，可能还不如普通犹太人在摩西时期从他的老师那里得到的好。当然，基督教本身仍然存在，但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它是以前的一个苍白的幽灵。很少有人拥有早期的信仰，甚至是不太成熟的社区的信仰；人们不会在公园大道上寻找圣徒。

对传统的破坏一直是科学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都还相信太阳是围绕地球转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发展出卫星通信。事实上，我们认为的科学本身只是一系列的假设，不完美的解释，由于被其他的解释所取代，更强大但仍然不完美。然而，对传统的破坏对世界的道德秩序是一场灾难。

孔子教导我们应该始终保持适度的行为（他称金庸为 chum yum，至少在十七世纪学者的翻译中是这样）。

他还教导说，我们应该尊重权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

这一教诲有二千五百年的历史。作为一种传统，它影响了中国所有有记载的历史，但对许多现代中国人来说，儒家思想似乎是一种过时的传统，他们不重视节制，尊重武力而不是权威，当然也不像他们自己希望的那样对待他人。随着传统的丧失，

社会会失去其道德共识的全部词汇。与西藏相比，中国虽然拥有不断进步的实力，但现在却是一个道德上落后的国家，像西藏人一样贫穷和受压迫。

一个好的社会道德具有某些特征。它应该有助于社会和个人的生存，以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方式。它应该包括宽容，避免自以为是。它应该是宗教的，而不仅仅是不可知论的。它不应该假装决定科学事实的问题。它既不应该是无政府主义的，也不应该是独裁的。它应该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深刻的坚持。这样的社会道德对于家庭和将儿童培养成独立和负责任的成年人尤为重要。它提供了一个良好社会的焦点。

我们发现，任何这样的道德都得到了来自商业和同胞感情的相互依赖的逻辑的支持，但却受到了肤浅的科学主义的攻击，受到了一个超级阶级和一个次级阶级的疏远，受到了旧的地理经济的根基的丧失的威胁。也许会有对这些趋势的反应。

必须承认它们对下个世纪的社会极为危险。

随着以赛亚-伯林所说的 "西方历史上最可怕的世纪 "的结束，社会结构中的巨人主义时代也接近尾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日子注定是一个缩减、下放和重组的时代。

这将是被困在焦油坑中的社会恐龙的时代。也是一个清道夫的时代。

鸟儿会去捡恐龙的骨头。政府、公司和工会将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倾向进行调整，以适应微技术的渗透所建立的新的元体制条件。它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行使暴力的边界。

今天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更多的变化，比 CNN 和报纸告诉我们的更多。而它的变化恰恰是在对大政治条件的研究中所指出的方向。正如我们在《血流成河》和《大清算》中所论证的那样，当技术或其他设定行使暴力的边界的因素发生变化时，社会的特征不可避免地随之改变。一切依附于人类互动方式的东西，包括道德和我们看待世界的常识，也将随之改变。在一个表明一个时代结束的道德松懈期之后，我们将看到一种更严厉的道德的觉醒，它有更严格的要求，以满足一个竞争性主权世界的更严格的要求。

可以预见，新道德的几个特点。首先，它将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以及创造收益的人保留收益的正确性。另一个必然的观点是投资效率的重要性。

信息时代的道德为效率喝彩，并承认资源被用于其最高价值用途的优势。换句话说，信息时代的道德将是市场的道德。正如 James Bennett 所说，信息时代的道德也将是一种信任的道德。

网络经济将是一个高信任度的社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牢不可破的加密技术将允许贪污者或小偷将其犯罪所得安全地置于追讨范围之外，因此将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来避免损失，即首先不与小偷和贪污者进行交易。就像前面提到的贵格会成员的例子一样，诚实的声誉将是网络经济中的一项重要资产。在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中，这种声誉可能并不总是适用于一个已知的人，但它将通过识别加密密钥而得到可靠的验证。如果加密或加密身份的认证被歹徒或其他人破坏，可能会出现辐射性的困难，这足以使人们强烈反对雇用任何其行为可能表明缺乏可信度的人。贝内特设想

了 "网络空间的绅士俱乐部"，这些受保护的区域需要加强安全措施才能参与，"可能使用生物识别，如声纹识别。经营者将承担保证参与者身份的责任，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他们的可信度，实现'网络空间的绅士俱乐部'（尽管现在也欢迎女士）。在这些领域，人们可以在比一般网络空间领域更安全和更有信心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因此，21 世纪可能会看到一个类似维多利亚时代的强调 306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可信度，实现了一个 "网络空间的绅士俱乐部"（尽管现在欢迎女士）。在这些领域，人们可以在比一般网络空间领域更安全和有信心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因此，在 21 世纪，人们可能会看到在一个维多利亚时代无法想象的环境中，回归到维多利亚时代对可信度和性格的强调 306"。

网络空间的保护区也可以提供保障，以减少风险，类似于香槟伯爵为保护往返于香槟集市的商人而提供的域外保护保障。其他司法管辖区实际上 "对旅行商人在经过特定贵族管辖的领土时可能产生的任何损失进行赔偿"。"集市卫士"，最初由伯爵任命的官员，提供安全保障和 "司法法庭"

最初由伯爵任命的官员，在集市上为商人提供安全保障和 "司法法庭"。他们最终演变成更独立的实体，有独立的印章，对合同进行公证并强制执行，有权 "禁止任何被发现不支付债务或不履行合同承诺的商人参加未来的交易会。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惩罚，以至于很少有人愿意冒着被剥夺未来盈利机会的风险。然而，除此之外，看守可以扣押违约债务人的货物，并为其债权人的利益出售这些货物"。39

当替代市场的数量增加时，排斥作为执行合同的手段的重要性就下降了。然而，随着现在新的信息技术的出现，对骗子和违约者的排斥可能再次成为下一阶段社会中分散的主权国家的有力的执行机制。

计算机联动可以通过不可伪造的信用和欺诈信息来警戒网络空间。由于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将是一个特别小的社区，骗子和欺诈行为将被劝阻。

除了强调收入和效率的道德，并重新强调性格和可信度，新的道德还可能强调暴力的邪恶，特别是绑架和敲诈，这将越来越重要，因为它是 "摇动 "个人的手段，否则他们的资源不会轻易成为犯罪的牺牲品。

另一个可能刺激更严格的道德的因素将是权利和收入再分配的结束。当援助落后者的希望主要基于对私人和慈善机构的呼吁时，对于那些自愿发放慈善的人来说，慈善的接受者在道德上是值得的，这一点将比二十世纪更重要。

"补贴、意外之财和经济机会的前景消除了需要保护的紧迫性。民主再分配和经济发展的口号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值和生育率，促进了人口增长，从而使环境 and 经济螺旋式下降的趋势更加严重。"维吉妮亚-阿伯纳西

在某些方面，新的信息世界将更好地鼓励对道德问题的严肃态度。在美国、加拿大和西欧，收入再分配的承诺激起了不幸者和不成功者的期望，这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反作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外国援助和

为防止饥荒和提高生活水平而作出的干预承诺是刺激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这种增长超过了落后经济体的承载能力。二战以来世界人口的惊人增长，以及其对森林、土壤和水资源的破坏性影响，都可以追溯到全球范围内的干预。这种干预使长期以来使当地人口与支持他们所需的资源保持平衡的负反馈后果短路 307。

当然，许多生活在当地资源匮乏、几乎没有增长的环境中的人，非常高兴得到保证，他们的村庄生活的限制性因素可以被搁置。

他们热切地采纳了国际援助工作者、和平队志愿者、当地革命者和冷战时期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者所传递的乐观信息，他们告诉大家，美好的一天就在前方。这恰恰是一个错误的信息。

文化间重新分配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使那些生活在非工业文明中并坚持非工业价值观的人具有人为的竞争力。国际援助、对抗饥荒和疾病的救援任务以及技术干预使许多人相信他们的生活前景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而他们却没有必要更新他们的价值观或大大改变他们的行为。

国际收入再分配不仅鼓励了世界人口不可持续的激增，而且以重要的方式促成了文化相对主义和对文化在使人们在当地环境中繁荣的关键作用的广泛混淆。今天，大多数人认为，文化更多的是品味问题，而不是指导行为的来源，它既能误导，也能告知。我们太热衷于相信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太迟钝于认识到适得其反的文化的弊端。对于本世纪在世界许多地方的补贴和干预的温室中开始出现的混合文化，尤其如此。就像美国内城的犯罪亚文化一

样，它们保留了适合早期经济发展阶段的不连贯的文化片段，并将它们与信息时代的行为价值观相结合。

因此，信息革命不仅会释放出天才的精神，也会释放出克星的精神。在未来的千年里，两者将进行前所未有的较量。

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必将是令人惊叹的。

从经济生活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总是涉及到一场革命。我们认为，信息革命可能是所有革命中影响最深远的。

它将比农业革命或工业革命更彻底地重组生活。而且它的影响将在一小部分时间内被感受到。系好你的安全带。

附录 1:

影响和战略

"在所有 36 种摆脱麻烦的方法中，最好的方法是--离开。"

中国谚语

本书的论点对在信息时代实现财务独立有许多非正统的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

公民身份已经过时了。为了优化你的终身收入并成为有主权的个人，你将需要



成为一个政府或保护服务的客户，而不是一个公民。你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谈判一个私人税务条约，使你为政府的服务支付的费用不超过它们对你的实际价值，而不是支付由贪婪的政治家强加给你的任何税收负担。

在全球所有的国籍中，美国公民身份带来了最大的责任，在成为主权个人的道路上设置了最多的障碍。因此，寻求经济独立的美国人将获得其他护照，作为使自己私有化或非国家化的一个必要步骤。如果你不是美国人，成为美国的居民，从而使自己面临美国的掠夺性税收，包括出境税，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

根据其他面临崩溃的主导系统的历史，那些选择极端的 *refugium* 并尽早退出的人，最终会有更好的结果。

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危机的反应所带来的危险，使得我们不能低估暴政和恶作剧的范围。你永远不应该把你的钱留在任何声称有权征召你、你的孩子或孙子的管辖区。

无论你目前的居住地或国籍如何，为了优化你的财富，你应该主要居住在你持有第一本护照的国家以外的国家，同时将你的大部分资金放在第三管辖区，最好是避税天堂。

你应该广泛旅行，在有吸引力的地方选择替代住所，在紧急情况下你有权利进入。

暴力将变得更加随机和地方化；有组织犯罪的范围将扩大。因此，与 20 世纪相比，在安全的物理空间内办公将更为重要。保

护将更多地是技术上的，而不是司法上的。在中央权力薄弱的时期，将麻烦制造者挡在门外是将犯罪暴力最小化的一种有效和传统的方式。

如果你在经济上是成功的，你可能应该雇用自己的家丁来保证你的保护，以防止犯罪分子、保护伞和政府的隐蔽恶作剧。警察的职能将越来越多地由与商人和社区协会有联系的私人卫兵来担任。

机会和安全的领域将发生变化。在工业时代富裕起来的经济体很可能受到生活水平的通货紧缩和社会动荡的影响，因为政府被证明没有能力保证繁荣和权利项目的崩溃。

四十八个最不发达国家，包括约 5.5 亿人，人均收入不到 500 美元，在信息时代的命运将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国家将变得更加边缘化和绝望，只为最勇敢的投资者提供一个场所。但是，那些能够克服结构性问题以维护公共健康和秩序的国家将从快速的收入增长中受益。

享受高生活水平和经济机会的首选管辖区包括南半球的改革地区，如新西兰、智利和阿根廷，这些地区拥有足够或优越的基础设施和许多美丽的风景，并且不太可能成为挥舞核、化学或生物武器的恐怖分子的目标。

下个世纪增长最快和最重要的新经济将不是中国，而是网络经济。为了充分利用它，你将需要把你的业务或职业放在万维网上。

加密将是网络上商业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个人自主权的实现。你应该立即获得并开始使用强大的加密技术。就像教会在中世纪末试图禁止印刷一样，美国和其他一心想要控制的侵略性政府也会试图禁止有效的加密。就像五个世纪前发生的那样，这可能只是把这种禁忌技术推向既定权威的最薄弱领域，确保它将被用于最颠覆性的用途，破坏各地的国家控制。

在可能的情况下，所有的企业都应该在离岸的避税区注册。这对网站和互联网地址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在岸上的高税收管辖区几乎没有优势。

信息时代的公司将越来越多地成为 "虚拟公司"--没有任何物质现实的合同关系束，或许也没有实物资产。虚拟公司应该以离岸信托的方式注册，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责任。

辖区内的收入将变得更加不平等，但辖区间的收入将更加平等。在这些条件下，具有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传统的国家可能比那些在工业时期形成了强烈的收入平等预期的 310 个管辖区相对更稳定。

由于在决定报酬方面，相对业绩比绝对产出更重要，因此代理人的职业将越来越重要，不仅是对高薪的表演者，如足球明星或歌剧歌手，而且对技能一般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可能欢迎帮助他们找到一个有偿职位。

"工作 "将日益成为任务或 "计件工作"，而不是组织内的职位。

许多受监管行业的成员将被采用互动信息检索系统的数字仆人所取代。

对资源的控制权将从国家转移到具有卓越技能和智慧的人手中，因为更多的财富将通过将知识添加到产品中来创造。

正如盖-博伊斯教授在他的历史著作《一千年的变革》中所观察到的，"在一个困难越来越多的时期，社会主体中的弱者往往会围绕着一颗新星而分化。"在两千年的变革中，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将是主权的个人。随着民族国家体系的瓦解，以前会在政府中寻找工作的规避风险的人可能会在成为非常富有的人的家臣中找到一个替代方案。

你应该预期美国等国家的人均消费会放缓或下降，这些国家在工业化后期一直是世界产品的主要消费者。

政治的死亡将意味着中央银行对货币的监管和操纵的结束。网络货币将成为信息时代的新货币，取代工业主义的纸币。这不仅意味着纸币印刷商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也意味着通货膨胀作为民族国家征用资源的有效手段的死亡。实际利率将趋于上升。

虽然十九世纪的经验证明，即使在通货紧缩提高货币价值的情况下，长期增长也能迅速进行，但商业和投资战略必须调整，以适应通货紧缩的陌生现实--也就是说，应避免债务；应更迫切地追求节约和降低成本；可能应制定具有灵活名义条款的长期合同和赔偿方案。

主要民族国家的征税能力将下降 50%至 70%，而事实将证明，以有序的方式减少开支要困难得多。

可以预期的结果是，困扰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赤字将继续存在，并伴随着高实际利率。

取代就业的技术创新可能应该在没有生产相关产品或服务传统的管辖区进行。

认知技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奖励。清楚地思考将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想法将成为一种财富形式。

思考当前系统的终结是禁忌。要理解向信息时代的巨大转变，你必须超越传统思维 and 传统信息来源。

由于在发达经济体中，非常富有的人的收入将比其他人的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个需求增长的领域将是满足非常富有的人的需求的服务和产品。

越来越多的犯罪危险，特别是贪污和无法察觉的盗窃，将使合伙人之间的道德和荣誉比工业时代更加关键和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其衰落的年代。